

杜繼平 著

#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人間出版社



# 目錄

序 陳映真 1

自序 杜繼平 25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的過去與未來 31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75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127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219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 375

## 附錄

穿越統獨的迷思——與邱義仁辯論統獨問題 403

——一場精彩的意識辯論會



# 序

陳映真

馬克思主義思潮流傳到二十世紀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的台灣，造就了一些台灣人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思想家和革命實踐者的歷程，在一九三九年出版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卷（漢譯本《台灣社會運動史》，創造出版社，一九八九）中，有比較豐富的資料。書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思潮從兩個來源滲入台灣。在新俄革命成功和第三國際的強烈影響下，二〇年代日本的知識界和文化界急速左傾。當時留學日本的一些台灣青年知識份子受到日本左派個人或團體的影響而左傾，把馬克思主義思潮帶回台灣，起了一定的影響。另一方面，五四運動後，受到一九一七年成立的蘇聯和一九二一年建立的中共，以及中國左翼反帝風潮（例如五卅運動、北伐革命）的影響，當時留學大陸的台灣青年知識份子也受到思想衝擊，把馬克思主義思潮帶回台灣，也起到一定的影響。留日馬克思主義青年比較著名的有彭華英、連溫卿、蘇新、和楊逵等，受到中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的，比較突出的有翁澤生、許乃昌、林木順、謝雪紅、潘欽信、蔡孝乾、王萬得等人。

台灣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的知識思想體系，寫成理論文章，成爲台灣馬克思主義文獻的並不

很多，但也還是不少，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的重要傳統和文獻。

據連溫卿指出，早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十五日，在東京發行的《台灣青年》上，就有彭華英寫文章介紹「旋風似的社會主義學說之發展」。一九二三年七月，《台灣青年》又刊出秀湖寫的〈台灣議會主義和無產階級解放〉。一九二四年四月，在上海的台灣左翼青年辦的刊物《平平》，有文章抨擊台灣資產階的議會請願運動，並且主張「一、對內謀全民族的極鞏固的團結；二、對外和勞農俄國、以及日本被壓迫階級與朝鮮、中國等處的被掠奪民族結成國際的聯絡……做革命的鬥爭，這樣我們才能到完全的解放……」

一九二六年八月，在《台灣民報》上，陳逢源和留學中國大陸，並曾被中共選派前往莫斯科學習的許乃昌之間，爆發了有關「中國改造（革命）論」的爭論。

陳逢源的文章題為〈我的中國改造論〉。他依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著名的序文中有關歷史和社會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公式，先強調社會進化的行程有一定的客觀規定性。因此，資本社會比封建社會進步。雖然當前世界資本主義已屆其衰亡的末期，但資本社會「非達到極點」，「斷沒有社會主義之實現」。未來社會主義社會非經資本社會之洗禮不可。

陳逢源繼而指出，當前中國社會「一部份已進入資本主義（如上海、漢口等），但大部份仍停留在封建社會。眼前中國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蘇聯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日本的資本主義道路。日本

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弊端百出」，所以日本的將來只有走蘇聯的道路。

但陳逢源說，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受到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摧殘，一方面在一次大戰後看見「中國工商階級的興起」。所以他主張中國要先走資本主義道路，以強大化的工商階級削弱軍閥，統一中國，發展資本主義以改造中國。

同年十月，許乃昌也在《台灣民報》上發表長文〈駁陳逢源的中國改造論〉。他強調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序言中所稱，當物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矛盾時，「社會革命的時代便展開」這一論述中的革命、突變、變革的一面。親身在大陸體驗了一九二七年清黨前夕聯俄容共、國民革命時期的許乃昌，力陳中國的改造端賴國民革命。他認為中國已淪為「資本主義列強的公共半殖民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商品市場、原料供應地、資本的投入所」。而沿海地區的中國工商業，無非是帝國主義、官僚主義和買辦主義資本的工商業。封建餘孽軍閥分別受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和操控，中國內戰無已，貧困破產，再也不可能走日本資本主義改造、發展自己的資本主義之路。而當時聯俄容共、進步的國民黨提出的國民革命論，主張聯合先進國被壓迫人民和世界被壓迫民族打倒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工具的封建軍閥、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保護民族工商業，扶助工農階級，由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的國民革命，改造中國。

針對陳逢源的扶助中國工商階級，許乃昌指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反動性」。他認為中國資產階

級和帝國主義資本固然有一定矛盾，但也有彼此互相溫存的一面。他們對中國工農階級的崛起心存疑懼，在一九二五年五卅鬥爭中，中國資產階級叛賣了革命。陳逢源企望中國資產階級救中國是妄想，而中國的改造，只能依靠中國的工農階級。

受到二〇年代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浪潮的鼓舞，殖民地反帝鬥爭的聯合可能使殖民地解放運動不經資本主義階段直接向社會主義改造「跳越」的思想，一時流行於當時第三國際的思維中。受此影響，許乃昌特別強調「社會組織」（即社會生產方式）的可跳越性，主張資產階級性質的國民革命有可能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直接向社會革命「跳越」。許乃昌認為，當時中國社會的性質，既已不是封建社會，也不是資本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的殖民地中間形式」的社會，頗類後來一般所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許乃昌批評陳逢源的社會演化觀的「機械唯物史觀」。許乃昌主張社會發展行程各國各民族不完全一樣，不能機械地套用公式，而「必須連系一國社會特殊形式和國際政經關係」。如果中國國民革命勝利地打倒了帝國主義，匯合世界無產階級革命，消滅了世界資本帝國主義的支配，則落後國（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自無發展餘地和可能，於是資產階級性質的中國國民革命就會「自然發展為社會革命」。許乃昌接著引用了列寧所說勝利的無產階級進行組織化宣傳，在蘇維埃援助下，「則落後國沒有蹈襲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之必要」……而進入蘇維埃組織……達到共產主義的話。



許乃昌說，鴉片戰爭後，中國傳統封建宗法社會正在解體。「一九二一年後，外國商品大量輸入中國，外國工廠和銀行林立……」中國社會不是封建社會，不是資本社會，「也不是由封建社會向資本社會過渡的社會」，而是「帝國主義時代特殊中間形態的社會」，所以既不能像蘇聯一步走向社會革命，也不可能走日本資本主義化道路，而須經由國民革命的過渡進入社會主義。

同年十一月，陳逢源發表長文〈答許乃昌氏駁中國改造論〉。他仍然強調革命只有在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生矛盾，向來的生產關係成了新生產力發展的桎梏時才發生。他引用馬克思的話「當物質存在條件懷孕於舊社會母胎內滿期之前決不會發生社會革命」的話。因此中國社會的改造，仍須鼓舞「國民精神」（民族主義），以打倒封建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促成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陳逢源以實際數據比較了一八九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間中國紡紗工業的巨步發展，說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列強內鬥的空隙下，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陳逢源反對許乃昌以社會革命改造中國之論，因為依當時國際形勢，中國一旦豎起赤旗，必然外部招來列強干涉，內部也引人民疑懼。至於國際無產階級的團結，先進國與落後國無產階級間利益也不一致。陳逢源更以革命後蘇聯不得不實行妥協的「新經濟政策」，開放農村自由市場，中農階級滋生，「以經濟上的讓步替代政治的讓步」，這是不估計社會性質，「只靠暴力推翻舊政權」的結果。他也批評革命後的蘇聯行一黨專政，「斷非無產者的天堂」。陳逢源一再強調「中國不能實行共產主義」，一再強調以民族主義（「國民精神之振興」）「求國家之統一」，

打倒帝國主義列強與封建軍閥，廢除不平等條約，接受「資本主義的洗禮」，實行資本主義，再以社會政策救濟資本主義的弊端……

同年十二月五日，蔡孝乾也在《台灣民報》發表〈駁芳園（即陳逢源）君的中國改造論〉，指出當時中國問題的根本，是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豆剖瓜分，「於是才有辛亥革命、五四和五卅」。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中國不可能發展。而當時中國的一點工商業，無非帝國主義或買辦資本，中國走資本主義是不可能的。他也以五卅運動為例，說明中國資產階級動搖性和反動叛變。「當前中國的生產關係比革命前的俄國還落後，無產階級受到多重壓迫，因此必須打倒帝國主義，打破現在的生產關係——無產階級革命才能改造中國」。

一九二七年二月，許乃昌寫〈給陳逢源氏的公開狀〉，指出陳逢源的「共產赤化」論是反共法西主義的國家主義論，是反共宣傳，「資本家的辯護人」。他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序文：「科學的批評的一切判斷，是我們所歡迎。然而對於我所未曾讓步的所謂輿論的偏見，那偉大的夫魯連斯的格言依然可以適用於我：『你行你自己的路，任別人說他們要說的話吧。』」許乃昌最後說，「我們絕不怕有根據的批評。但對於那些有產階級的『輿論偏見』可以不必管牠了」，結束了這次冗長的爭論。

這場論爭的兩造，固然有左、右，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革命主義和改良主義的區別，但早在台共先後兩個政治綱領之前兩年至五年之前，台灣思想界就發生（全部或部份）使用馬克思歷史唯物主

義語言，討論社會變革（「改造」或革命）理論中關於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變革運動的性質，變革的主力、變革對象和變革運動的方針政策等諸問題，是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十分重要的文獻。其次，已故台灣史學者戴國輝曾向作者提示，陳許間「中國改造論」之爭，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爭論的表面雖然談中國的「改造」，其實骨子裡也是躲避日本偵警爭論殖民地台灣革命的兩條路線——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改良論的道路，還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道路。果然，則這次爭論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之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第二個重要文獻是台共一九二八年政治綱領和一九三一年的政治綱領。雖然這兩個綱領都有日共、中共和第三國際在起草、審定上的影響，但畢竟也是台灣馬克思主義者參加起草、審定的文獻。二八年綱領中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問題和赤色救援會等方針策略的提綱，是由林木順總結起草的。現在就兩個綱領關於台灣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變革（革命）運動的性質、階級分析、變革對象和變革主力等各方面的理論認識，做最概括性的介紹。

## 一九二八年綱領

一、社會性質：殖民地台灣社會「一方面存在著（日帝資本）占支配地位的高度資本集中，同時又存在著台灣本身落後、幼稚、依附性的資本。在台灣農村存在著非資本主義（封建）經濟要素」。

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了。

二、變革運動的性質：封建的地主・佃農關係，總督府獨裁政治、日本金融資本與台灣封建地主階級的結合……凡此皆規定了台灣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即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主義的民族・民主革命。

三、階級分析：二八年綱領將台灣社會階級劃分為九個，即日帝大資產階級；「反動資產階級」（指台灣本地以地主為基盤的、有濃厚封建成份、依附於日本金融資本的大資產階級）；「進步資產階級」（指從地主階級演化出來的城市工商資產階級）。日本帝國主義資本阻礙他們的充分發展，又身受歧視與壓迫，使他們帶有一定的革命性，但也有妥協動搖性；小資產階級，指的是小商人和小企業經營者，經濟地位不穩固，在日常中受日帝經濟壓迫而瀕於破產，故有較資產階級熱烈的革命性，但也帶有動搖性。其他教員、知識份子也屬於這個階級；大地主階級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反動走狗，依靠對佃農的現物榨取而存在；中地主，指佔農村人口八％而擁有二八・八％土地的地主階級，有資本主義傾向，但也與進步資產階級有連繫；自耕農階級，他們占農村人口三〇％，占有二三％土地。因農村工業的發展、土地集中、日帝強徵土地而日益零落，瀕於破產，淪為農業無產者與貧農，故有其革命性；貧農和農村工資勞動者，他們蒙受日帝和本地地主階級的雙重壓迫，是農村中最低下的階層。農村工資勞動者指農村工廠工人、農場雇工及從農村分化出來的自由勞動者。而集結在農民組合旗下

的農民，是自耕農、農村工人和貧農，正與日帝展開殊死的鬥爭；工人無產階級，占全人口三〇%。在世界不景氣中，提高了政治與組織的自覺，但尚未結成獨立的階級勢力……

「二八年綱領」雖然把台灣社會階級細分為九種，強調由工人階級領導、團結貧農和其他帶有不程度革命性的小資產階級，進行「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以完成反日帝而自日帝取得民族解放與獨立，並打倒封建主義，完成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革命，最後向社會主義過渡。綱領批評當時文協左派和工農運動的骨幹多為進步小資產階級和青年學生，有「左」傾現象，對殖民地台灣社會殖民地半封建性認識不足，從而主張直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傾向，加以批評，力言台灣革命是台灣無產階級為領導核心，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展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但是特別受到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受資產階級叛變出賣所遭受的慘烈「清黨」的鎮壓與迫害的歷史經驗影響，二八年綱領仍然對台灣資產階級的革命性之動搖和薄弱性，加以強調，警惕資產階級在革命中走向反動。饒有興趣的是，和許乃昌一樣，二八年綱領既強調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性，又不憚於強調革命最終向社會主義必然轉化的展望，理由是①革命由台灣工人階級領導；②中國與日本革命的社會主義展望（以及蘇聯的壯大），等等。

一九三一年的綱領，雖然更多地受到主要是中共、其次是國際的影響，但相對地台灣馬克思主義者已進一步有了自己起草各項提綱的能力。例如三一年綱領中政治提綱、勞動運動提綱、農運提綱、

青運提綱和好運提綱，分別由蘇新、蕭來福、陳德興、吳拱照和莊守起草。趙港、王萬得也是當時主要的馬克思主義者。

和二八年綱領相較，受到當時中共激進化的影響，三一年綱領把台灣的階級分析簡化為日本獨占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依附性或買辦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工農階級和「勤勞大眾」。對於台灣社會性質，綱領認為台灣是「高度發達的日本人資本主義與殖民地落後的自然經濟、小手工業」的結合體。較諸二八年綱領，三一年綱領對台灣大小資產階級採取更消極和不信任的態度，強調了台灣資產階級對日本大資本的依附性，買辦性和地主階級根性。因此雖然綱領規定台灣革命的性質仍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但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除外）完全排除在革命的主力——工農、小資產階級和勤勞階層……之外，主張「孤立資產階級」，直接實行「土地革命」以消滅地主封建勢力，並且在「農村與工廠進行烈的階級鬥爭，打倒日帝，建立台灣工農民主政權（蘇維埃）」。然而綱領又認為當前革命的性質「仍為資產階級性的工農民主革命」，是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必由之路。而與許乃昌、二八年綱領一樣，三一年綱領更熱烈地提出台灣革命在島內外革命形勢下最終向社會主義革命移行的展望。

一九三一年，日軍發動進攻我國東北的戰爭，日帝在島內展開對於各反帝、反殖民社會運動的全面「檢束」（起訴）。文協、民衆黨、農組和台共先後遭到徹底的法西斯鎮壓。但從黨和其他陣線四

散的力量，逐漸移轉到台灣文學戰線，繼續和敵人進行曲折的鬥爭。直到一九三四年左右，台灣文藝界仍熱烈探討大眾語，大眾文學這些左翼文學理論。從台灣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的觀點看，一九四三年皇民文學派西川滿、濱田隼雄、葉石濤，和反帝民族主義派世外民、吳新榮、台南雲嶺和伊東亮（楊遠）關於評價台灣新文學中現實主義的爭論中，楊遠的文章〈擁護狗屎現實主義〉最見突出。一九四三年，日本當局要全面將台灣新文學納入文學為侵略戰爭服務的「台灣文學奉公會」，西川滿在《文藝台灣》發表了〈文藝時評〉，辱罵台灣新文學批判現實主義傳統是「狗屎現實主義」，頌揚日本文學的唯美主義傳統，最後又大力宣傳為侵略戰爭服務的皇民文學。楊遠的駁論提出審美的階級性（農民、農業、農作物對「屎」的評價），更以靈活的辯證唯物主義討論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對立統一。楊遠說真正的浪漫主義是從現實出發，並對現實懷抱熱烈的希望，盡力去改革現實中的醜惡，發揚現實中存在的亮光，凝視現實，克服現實中的「否定要素」，培養否定要素中的肯定要素，轉換否定與黑暗為肯定與光明。而真正的現實主義，也是立腳在（敢於改造、敢於勝利的）浪漫主義……楊遠文章說理深刻，處處發揮辯證唯物論的智慧，義正辭嚴，在戰爭末期日本法西斯氛圍逼人的時代，勇於鬥爭，捍衛了台灣新文學的批判現實主義傳統。這是台灣馬克思主義文學論中相當重要的文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身在大陸從事抗日活動的台灣人革命家李友邦，在一九四一年發表了題為《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的小冊子，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分析自十九世紀後半以迄四十年代初的台

灣社會經濟性質。他和前此台灣社會性質論的分析略為不同的是，他強調鴉片戰後台灣封建經濟的崩潰，佔優勢的日帝資本已經一掃農村自然經濟，將台灣經濟納入日帝的國民經濟。但他也指出日帝在台灣保留了封建主佃榨取關係，日帝和台灣封建大地主階級相溫存的關係。李友邦也指出台灣本地資產階級反帝革命意志的動搖性和軟弱性，與受薪小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可能性。然而李友邦的變革理論最終卻強調殖民地台灣內部在日帝強化支配下，民族矛盾的絕對性，以「各階級共同的（民族解放）利益為基礎」，引導民族（反帝）運動之發展，最後先打倒日帝而自日本獨立，然後與中國革命合流，使台灣復歸於中國，完成民族的解放與統一。《日本在台灣之殖民政策》，今日視之，可能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但無疑是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有關殖民地台灣社會性質論的不能忽略的文獻。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自殖民統治下解放。從一九四五年底到一九四九年末，大陸和台灣之間很快地納入當時全國的政、經、文化和思想的共同的潮流。舊台共人員如蘇新、謝雪紅復甦，在文化和社會運動中活躍。一九四六年中共省工委來台，吳克泰、周青、陳炳基、葉紀東年青的共產黨人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下活躍。在這個時期，台灣的變革運動自然成爲中國大革命的一部份，自然沒有特別發展台灣一省革命理論的需要，而仁人志士，無不投入大革命的實踐中，後來有的在四七年二月事件後西渡大陸，更多的人仆倒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暴風中。台灣優秀作家呂赫若、簡國賢、朱點人、徐瓊二人毅然奔向了革命實踐，潛入地下，最後都壯烈犧牲。



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間，台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有了高於日據期的豐碩成果。一九四五年底開始，有些進步的大陸文化人來台，和台灣本地進步知識份子共同從事進步文化宣傳啓蒙的工作。在文學上，一九四六年開始配合大陸進步文藝機關的號召，紀念魯迅，論述魯迅。在創作作風和創作方法上，宣傳文藝作家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主張對日據下台灣文學進行爲了再出發的反思，提倡大眾的、人民的文學，提倡現實主義的文學和宣傳民主鬥爭的文學，並確立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組成部份之論。這些理論家有楊逵、范泉、賴明弘、樓憲、張禹、王思翔和龍瑛宗。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開始，在《台灣新生報》歌雷主編的「橋」副刊上展開了一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春天的，關於如何重建光復後台灣新文學的熱烈的討論，參加論議的有省內外作家和文化人、文藝批評家，很大一部份人都使用或素樸、或深刻的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方法和語言，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本省作家楊逵和省外作家羅鐵鷹的論文。

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五日，楊逵發表〈臺灣文學問答〉，對當時台灣文學界共同關切的若干問題提出了思想深刻的回答。楊逵說，中國各省各地都設有特別標榜各省各地的文學，但在四八年當時，卻有提倡「台灣文學」概念的必要。這是因爲五十年殖民統治爲台灣帶來一定的社會、歷史和生活的變化，造成光復初期省內省外人士之間的隔閡。光復後，有識之士，莫不爲消除此隔閡而努力。深入台灣人民的生活，表現當時台灣人民的遭遇、苦惱、思想和感情的「台灣文學」，甚有必要。

楊逵認為「台灣文學」不能與中國文學對立而論，因為「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然而台灣「託管派」、「親日派」、「拜美派」要發展他們的文學，就與中國文學對立起來。這種文學是「奴才文學」，不得人心，不能發展。

二二八事變以後，特別是國府當局常常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才對陳儀集團的統治有了二心。這種說法很引起省內知識份子的反感。楊逵的回答說，自有階級和（帝國主義）民族壓迫，壓迫階級和民族就對被壓迫階級和民族進行「奴化教育」，以利統治。但有人為自己私利被奴化了，但「絕大多數人不被奴化」，而且起而反抗，支持抗日鬥爭（領導過幾萬農民組成的「台灣農民組合」的楊逵當然對此有深刻的體會）。楊逵說當時的台灣「託管派」、「拜美派」就是被奴化的人。楊逵說，國府法西斯獨裁統治和長期隔閡，「使台灣人民無從接觸」當時大陸「很高的文化」（指民主革命思潮）。省內省外有識之士，應該力爭深入省內與省外人士間的交流與團結，「到人民中去，支持和理解台灣人民。而這正是當時『台灣文學』的任務。」

就是這樣，緊密聯繫了一九四八年全中國國情，楊逵提出了「台灣文學」寫什麼——寫台灣人民的生活與現實；寫誰——寫廣泛台灣人民的生活與苦惱；為什麼寫——為了反映台灣社會和歷史真實，增進省內外同胞的民族團結，為了反對獨裁政治、反對親美崇日和分離主義的「奴才文學」。在有關「台灣人民思想被日本奴化」的問題，楊逵以歷史唯物主義和階級論，論證統治階級（或民族）的奴

化教育自古有之，但不都能達到奴化的效果。拒絕奴化、果敢地為解放而鬥爭的史實所在多有。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起，駱駝英（羅鐵鷹）在「橋」列刊連載了長文〈論「台灣文學諸論爭」〉，為這次的廣泛論議做了總結。文章的要旨如下：

一、四〇年代當時「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規定了中國文學反帝反封建的任務」。文學應該在四八年當時「反帝民族革命時代」中，在民族民主立場上，在反（美）帝・反封建原則下結成廣泛的統一戰線。

二、駱駝英說，一方面台灣直接受到日本統治五十年，台灣新文學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實倍於大陸文學，而予以高度評價。但他也同時認識到殖民地台灣孤懸海外，孤獨無援地面對日帝壓迫，所以台灣文學除了表現反帝抵抗的精神，也有少部份表現出悲觀、絕望的消極精神。

三、他提出要把台灣的「特殊性」與內地中國的「一般性」做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的認識。駱駝英從台灣社會經濟史觀點，回顧了鴉片戰爭以至馬關割台的歷史，來說明台灣是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自來獨立的社會被日帝割佔，也是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侵凌中國人民之歷史的一個組成部份。四八年當時的台灣社會，因四五年光復而成為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一環，因此台灣社會既有其歷史發展的「特殊」性，也是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普遍（一般）性格的具體顯現形態。要看到一般性，同時也要看一般中的特殊，即一般與特殊的辯證統一。而台灣社會的特殊性，「必

然而且應該向內地人民普遍覺醒的一般性（指當時民主革命）轉化」。在一九四八年內戰形勢急轉直下的背景下，話中的思想，不言可喻。

四、關於台灣文學要繼承「五四」還是超越「五四」精神的問題，駱駝英也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提出了回答。他說，中國社會自「五四」以來，社會經濟有很大變化，但中國社會形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本質基本沒變。一九二七年後中國的工人階級逐漸覺醒，中國社會發生了量與質的變化。工人階級在各地建立了工農政權，一九四八年當時，中國革命「已經臨近了決定性的勝利」。因此台灣新文學「應該不但承繼五四精神和五四以來一切優良的傳統」，回到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與科學」的原點重新出發。

五、在台灣左翼文藝思潮史上，駱駝英在這篇文章中深入、系統地介紹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他討論了「消極浪漫主義」、「積極浪漫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討論了現實主義以及現實主義與積極浪漫主義相結合的革命的現實主義……他也討論了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理論中關於文學作品中的階級性、個性和典型性問題，使台灣馬克思主義文論相對於三〇年代的素樸、簡單，提高了很多。

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國民黨當局先發制人，全面鎮壓受到大陸上的學生民主運動影響的、以台大和師院為中心的進步學生。和學運有連係的楊達、《新生報》「橋」副刊主編歌雷及文藝論爭主要角色孫達人被捕下獄，雷石榆遭驅逐，隨之茫茫無際的五〇年代反共肅清撲面而來。台灣馬克思主義

者、傾向者、組織、哲學、政治經濟學和文藝理論被連根剷除，反共法西斯主義在內戰與國際冷戰雙重結構下成爲窒息性的反共「國家安全」體制，全面破壞了台灣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從一九五〇年，一直到一九七〇年的保釣運動前後，台灣被編入美國遠東反共反華的冷戰前線。極端的反共主義和經由美國「援助」體系，留美體系，美國冷戰意識形態和右翼自由主義經由美國宣傳、教育和意識形態機器所培養的大量台灣親美精英長期統治台灣。在文藝界，戰後美國冷戰意識形態之一翼的，以美國爲中心而擴散的「現代主義」、「抽象主義」、「超現實主義」，在四七年迄四九年台灣左翼文論被粉碎後血腥的泥土上，遍開陰白顏色的花朵，支配了台灣的文學與藝術。三〇年代以來台灣和大陸發展的進步文學和文論傳統被全面禁絕，台灣文壇變成了外來文學的殖民地。

一九六〇年代末，以美國爲中心，連帶在歐洲、日本等地爆發了左傾的學生和校園運動，標榜反對美帝國主義、反對越戰、反對歧視黑人，主張改革高教課程，增進校園內進步課程和言論的自由，也主張重新認識中國、越南、古巴和中美洲的革命。在進步學生和教師、知識份子的推動下，風雲迭起。受到其影響，台港留學北美的部份學生受到震動，逐漸形成星散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重新研究和認識中國革命及三〇年代左翼文學。因此，一九七〇年保衛釣魚台運動發生後，運動很快地左右分裂，是自然的事。在釣運左翼，產生了比較系統深入研究馬列主義的個別的知識份子，在文革結束、保釣運動歸於沈寂時，還有個別的幾個人至今日猶繼續沈思馬克思主義和中國革命諸問題。對於

這些人，應該提到許登源、金寶瑜、蔡建仁和李義雄、林孝信等人。在熱火朝天的文革中探索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這些知識份子，在八〇年代展開的大陸「開放改革」等重大生產模式的轉變引起了他們批判的關心。重新審視中國社會主義、再思與捍衛毛澤東主義，討論毛澤東以工農聯盟發展中國經濟的方針、毛澤東以群眾運動作為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策略、毛與劉鄧關於「勞動改革」(labour reform)的不同觀點、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復辟的理論、中共黨的階級性質……這些思想探討，一直延續到九〇年代。對於中國社會主義變化的憂思，不可避免地使他們重思左派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及民族與階級、國際與國家諸問題，終至於發展為部份保釣左派與(中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相悖而形成一種台灣一島社會主義變革的強烈傾向。在另一方面，從九〇年代中後，特別是金寶瑜的論文中，表現了她對資本全球化與第三世界、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和世界金融獨占資本主義的批判的分析。而蔡建仁、林孝信返台後孜孜矻矻致力於運動實踐，相對較少發表論文。

在七〇年代的台灣文藝界，受到北美保釣左派的曲折的影響。前文已經說過，保釣左派，利用在北美比較「自由」的環境，和各大學東亞研究機關豐富的藏書，方便許多人去尋找中國革命和三〇年代左翼文學作品與理論，從而改變了世界觀、人生價值，也改變了對文學藝術本質、創作對象、作品創作方法的觀點，逐漸否定了新殖民主義的外來「現代主義」、「超現實主義」而重新回到為民眾寫、寫人民群眾、重視文學的中國民族傳承，強調了作品的民族風格、民族形式的左派文論傳統，對台灣

政治、經濟、文化的對外庸化，提出強烈的批判，而對六〇年代末台灣社會經濟性質，也提出了素樸卻重要的「殖民經濟」論。雖然總的說來，在法西斯戒嚴時代，鄉土派文學理論未成體系，質樸而無法深入展開，但從台灣文藝思潮史看來，一九七七年到七八年的鄉土文學大論戰實際上接續了中斷了二十年的「文學寫台灣人民及其生活。文學講民族形式和風格；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一在一九四七至四九年台灣新文學論議中提出的左翼文學理論的傳統，沖破了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後文學領域上內戰／冷戰意識形態，在沈重壓力下，戰勝了反共文學和外來新殖民化文學，影響深遠，是台灣左翼文學及其理論的一次奇蹟般的復甦。

從一九五〇年代大肅清後，台灣少數士紳與來台省外右翼民主人士發展的資產階級民主運動，與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全中國的民主運動（反蔣獨裁、反美反日、反內戰、要求和平建國）的性質完全不同，自始就帶著反（國民黨法西斯）獨裁、親美、親日，反共，不反美日帝國主義，以「民主自由」的台灣充當外國勢力反共冷戰前線等這些特質。謝雪紅一再告誡「反蔣也要反美」的卓見，不見容於這些台灣戰後歷代資產階級民主化運動，發展到「美麗島事件」之後，乘七〇年代後國府外交合法性破滅之時，突變為反民族分離主義。台獨論議一時成爲意識形態霸權，但至今尚沒有見到他們以嚴謹的社會科知識建構的系統性的理論著作。

前文說過，保釣左派在北美洲尚見餘緒，並且在理論上留下了一些不能磨滅的跡痕。在上述極概

括性的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二十一世紀出台的年輕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杜繼平的定位，就初步表現在這本文集《階級、民族和統獨爭議：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了。

我以為這本書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潮史上，至少有這幾方面的特點：

一、作者廣泛、全面通讀並研究了大量馬恩列的著作系統，徵引廣博，據以分析和批判重要的知識和思想問題，是三〇年代以來台灣馬克思主義者留下的文獻中所少見。

二、和戰前甚至七〇年代的台灣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不同，杜繼平也深入研究了各家激進的發展社會學派，在傳統馬克思主義基礎上，添加了諸如西方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世界體系論等新的裝備。例如本書中從世界體系論分析和批判了台灣民族分裂主義，就有新的視角。而即使在大陸，在八〇年代之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也很少與戰後世界上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發展出來的新的社會科學理論和學派有碰觸的機會。

三、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基礎上，為了批判和理解，杜繼平也一絲不苟地通讀一些右派的、自由主義的，在當代國際學界中哲學、社會科學領域起作用的西方論著。而且因為這樣，杜繼平才能廣徵材料，揭發和批判台灣分離主義「理論家」歪曲、斷章取義、濫用西方右派、自由主義派、反馬克思派的理論為分離主義服務的學術詐欺，揭破何六九對於西方自由派關於「公民民主主義」論等問題的一知半解。本書中〈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就是這一類文章的代表作。在〈跳蚤左派的滿紙



荒唐言」中，也揭發了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認識錯誤甚至無知，擊中其知識詐偽的要害。

四、杜繼平廣徵博引馬、恩、列的原典，說明和論證了馬克思主義對於階級與民族的關係，階級運動與民族獨立、國家統一運動的關係，關於無產階級只有以一個統一強大的國家為條件成長、發展、奪取國家政權，關於國際的聯合只能以各個獨立民族國家為條件，以及關於左翼將祖國、愛國主義這些概念拱手讓給反動右派的危險性等重要問題。這些論述很及時地為文革後台灣新舊左派只談階級、忌談民族與國家，忌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忌談建設統一獨立的中國，甚至有人不同程度地向台灣一島社會主義傾斜的思想迷亂與苦悶，提供了新的參照架構和深刻的啟發。我個人就覺得受益不淺。

五、從一九五〇年迄今，美帝國主義干預中國內政，培養台灣分裂主義，使台灣成為反對中國人民，反對東亞人民的冷戰戰略前線，在台灣淪為現實上美國新殖民主義保護區的現時代，作為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知識份子，杜繼平和其他一些避談民族統一的「左」派不同，始終旗幟鮮明、針鋒相對、不假辭色、果敢堅決地對台灣反中國的民族分裂主義進行猛烈的鬥爭，揭穿台獨派諸「理論」的謬誤，暴露其為美日新帝國主義的扈從奴才根性，表現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和現實及歷史中矛盾核心緊密聯系的批判精神，以及勇於面對歷史的反動做堅決、及時鬥爭的氣概，震動人心，令人讚佩。

六、杜繼平對當前中國從社會主義的蛻變（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懷抱嚴肅、認真的關注，並

在一九九二年到一九九九年在大陸留學，親自觀察、體會、調查了這一場巨大變化。對於這個變化，杜繼平毫不曖昧地、批判地認定當前大陸的生產方式已經資本主義化。他不苟同把一九四九到一九七九的社會主義建設說得一團漆黑的論調，實事求是地對中共建國後的前三十年的思想、方針、建設給予科學的評價。但另一方面，他並不因當前大陸經濟的資本主義化而只談階級，不問民族，或向一島社會主義傾斜。正相反，他清楚認識到中國民族統一、建設獨立強大的國家對於包括台灣無產者在內的中國無產者形成更強大的階級，促進台灣和祖國大陸新的變革的重要性。

相應於大陸經濟社會的重大變化，當前的大陸也正在展開「新左派」和「自由主義」派的深刻理論爭議。台灣的左翼知識份子終究不能自外於這一場或下一場論爭。像杜繼平這樣的新生代台灣馬克思主義者，應該自覺地刻苦學習和鍛鍊，早日成長，以與大陸學界以「等身高」的地位，共同探討國際獨占資本主義必欲全面支配和剝奪全世界的歷史時代中，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再變革的前程，從大陸經過一九四九年的大革命、三十年社會主義建設，旋又與世界體系「接軌」的歷史和社會經驗出發，為世界被壓迫人民探求新的解放與發展的理論與實踐的方針。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沒有理由不像印度、中南美、中東所產生的幾個國際性的、批判的發展理論家那樣，適時出現中國的、屬於全世界被壓迫各民族與人民的變革的、批判的發展社會學派。這就不能不寄厚望於像杜繼平這一代年輕的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了。

無可諱言，特別在「蘇東波」巨變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的蛻化之後，馬克思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相對正處於退潮的時期。但同樣絕不可忽視的是，馬克思主義在當代學術、思想領域中，仍然具有強大的威信和深刻的影響。但，由於歷史原因，台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傳統，不能不說一般地薄弱。因此，把杜繼平這初收的理論果實，擺在台灣馬克思主義思想與實踐史中去評價，本意在對杜繼平和少數一些在當前台灣的這裡和那裡結成小規模馬克思主義讀書、研究小組表示敬意，並且爲了像我這一代已老的「左」派，由於用功不足、實踐無力而給今日青年留下一個思想空虛荒蕪的局面，使他們步履艱難，表示深深愧對後之來者的懺悔、自責，與對他們的努力的感謝。

二〇〇二年六月廿二日。病中。



# 自序

杜繼平

收在這本集子裡的，主要是近五年來針對統獨左右的爭議而寫的理论文章，大部分發表於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創刊的《左翼》雜誌。

這些論述的重點是：一、剖析台灣分離運動產生的歷史——結構因素，及其必然沒落、失敗之由；二、對台灣分離主義荒誕不經的謬論提出全面而系統的批判，指出其高唱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虛妄不實，並揭露其充當美、日帝國主義奴才、走狗的醜惡本質；三、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釐清階級與民族的關係，針對左、右各方的統獨爭議，提出左翼的統一觀。貫串於其間者，則為唯物辯證的方法與歷史唯物論的觀點。

本書論述的內容涉及台灣與大陸的政治、經濟、思想與歷史發展，是多年來親身經驗與調查、研究的成果，更是深切反思的結晶。自一九八〇年代初，我即投入台灣的黨外運動，擔任《夏潮論壇》的編輯工作、為黨外人士助選，因而對台灣的民主與台灣運動有了真切的認識。八〇年代後期，則參與工黨、勞動黨的創建，見證了勞工運動由盛轉衰的過程，洞悉了台灣左翼運動的困境所在。為了深

化理論素養並實際了解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一九九二年我辭掉了《中國時報周刊》的工作，到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進修一年，次年考入該校經濟系博士班，直到一九九九年六月通過博士論文口試。這七年之間，正是鄧小平南方講話後，中共大步邁向資本主義道路的急遽轉型時期。除了上課、讀書，我遊歷了大半的大陸河山，接觸了工、農、士、商各個階級，親見親聞了中國大陸資本主義化後，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巨大變動與各類人等的切膚感受，對我探索中國兩岸的前景有莫大的助益。本書主要是我總結在中國兩岸生活的經驗與觀察，加以理論概括後的成果。

發表在《左翼》上的文字，俱為論辯之作。各篇的措辭容有寬猛之別，但秉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態度，則是一以貫之的。可以看出，〈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與〈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二文，在批判陳芳明與何六九之際，語氣凌厲，絲毫不假辭色。主要原因是兩人品質極為低劣，思想庸妄錯亂、不自知學殖淺陋事小，意氣囂張之外還缺乏起碼的知識真誠，為文論事，言偽而辯，極盡曲解事實與所引材料之能事。對於陳芳明，早在一九八四年他於《台灣文藝》發表〈現階段台灣文學本土化的問題〉後，我就在同年《夏潮論壇》革新版三月號上，以吳德山的筆名撰述〈走出台灣意識的陰影〉一文，指出他那篇文章在台獨教條的指導下，「通篇充滿了惡意的曲解、幼稚的理論及獨斷的教條，論點之錯亂不通與論據之謬誤不實都達到驚人的程度，徹底顯現了宋冬陽（按：即陳芳明）對台灣史、台灣文學的無知。」十數年來，他毫無

長進，鄙陋無識依然如故，憑藉台獨教條，肆意強暴台灣史料，以曲爲直的惡行仍舊不改。在糟踏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之餘，近年來還禍延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在沒有能力消化吸收之下，逕予曲解濫用、惡用。這些在〈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中，都有詳盡的揭露。有趣的是，在二〇〇一年八月出版的《聯合文學》中，陳芳明忽然說了「從不以左派自居」一語。這頗類乎他在十多年間頻頻自我標榜要重建「客觀」的台灣歷史，強調「歷史研究，絕對不是爲了政治效勞而進行的」，迭次指責統派的台灣歷史解釋是爲政治服務後，卻又在一九九八年表示「特別堅持」「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陳芳明過去有沒有以台獨左派自居，我們請讀者參閱他發表過的《謝雪紅評傳》、《殖民地台灣》、《左翼台灣》等著作、文章，自行判斷。本來，「以今日之我戰昨日之我」，並不是罕見的事。一個人的思想歷程，由右轉左，或由左變右，發生中途改宗者，也所在多有。但像陳芳明這樣倏忽在立場上來個截然不同的翻轉，卻又不交待「誤入歧途」、「迷途知返」的緣由，只是逕直臉不紅氣不喘地信口否定前此載於白紙黑字的觀點與立場，倒是難得一睹的。這種反覆無常、以今日之我「忘」昨日之我的不誠行徑，除了「卑劣」沒有第二個更恰當的形容詞。至於他在該文中，對馬克思的殖民理論與後殖民主義而發的胡言亂語，只是更加暴露他思想貧困卻又喜強不知以爲知的愚鷺本質，徒然貽笑大方之家，自取其辱而已。

關於爲批判何六九而寫的《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正如我在文中所說，並不是何六九

那些思想水平低下、邏輯錯亂、曲解材料的文章本身有什麼值得理會之處，而是何六九的觀點雜湊了左右派庸俗觀點之大成，通過批判這些錯謬的觀點，可以全面明白表述從左翼的立場主張中國統一的理由，並釐清階級、民族與民主等相關問題。我對論爭的基本原則，一是根據中國古訓，「來而不往，非禮也」，只要對手態度誠篤，真心質疑辯難，那便相析以疑義，期冀同得真知，反之，若以輕佻傲慢之姿，叫陣挑釁，便當還以顏色，痛加撻伐，盡暴其醜，以為效尤者戒；二是繼承馬克思以降的馬克思主義傳統，不徒逞銳利的詞鋒，還運用既唯物又辯證的方法，以堅實的論證與嚴謹的邏輯為武器，有力地駁倒論敵，而非以意氣取勝。我相信，我在《左翼》上發表的論辯文章，不但在知識、理論上經得起嚴格的檢證，也符合現實局勢的發展，在階級、民族與民主的關係等國際學術與政治的重要問題上的論證與分析，更具有長久的價值，讀者只要細加研讀必有豐富的收穫。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奴才意識〉發表於今年二月在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舉行的「第五次東亞和平與人權」國際研討會，文中剖析了李登輝等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奴才意識的根源及其與日本右翼勢力狼狽為奸的企圖，頗受與會的日本、韓國朋友的肯定，澄清了他們前此對台灣政情的一些誤解。論文發表後不久，今年三月李登輝違法利用國安局秘密帳戶，收買美、日右派政客、學者的黑幕全面曝光。讀者如能將此文的剖析與台灣分離主義者進行的各種勾當聯繫起來，當更能洞悉「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本來面目」。



最後一篇的附錄是我與現任國安會秘書長邱義仁在一九八八年進行的一場統獨辯論的記錄。雙方在辯論中都不以民族主義立論，充分表述了各自的觀點與依據。十多年後，回顧這場辯論，最起碼截至目前為止，大勢所趨，應是符合我當時的預見。

感謝陳映真兄決意出版本書，並在身體違和之際，勉力寫序。衷心期盼天假以年，祝願他能早日康復，作為中國傑出的左翼知識份子長發其熾熱的光焰，為中國多添一分光明的力量。

二〇〇二年六月五日於台北新店



# 從世界體系的觀點看台獨運動 的過去與未來

二戰後的「台灣獨立」的運動萌芽於四〇年代後期，茁長於八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初期達於極盛，但自九二年後遭遇發展的瓶頸，此後即由盛轉衰，前景黯淡。

「台灣獨立」運動的發展與世界政治經濟結構的變動密切相關。單由台灣本身，絕對無法洞悉其始末與底蘊。故本文採用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world-system）理論的方法論與觀點，加以剖析，期能提供較為全面的認識。

1、

華勒斯坦主張要從「整體」(totality)掌握人類社會，才能透徹地認識社會的現實(reality)，而要掌握社會的整體，唯有運用「歷史的社會科學」(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的方法。所謂「歷史的社會科學」即認為歷史與社會科學不該分割開來，而應相互融合成一個有同一研究主題的學科。而且社會科學內部也不可機械地劃分為互不相干的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他指出：

「『政治經濟學』這個詞就告訴我們，我們假定了：要對真實的世界做出有意義的分析，就不能把它分離為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三個（或更多的）範疇，再以不同的方法，在互不相涉的範圍內研究（即使這種分離僅是暫時的）。經濟是植根在既有制度環境中；政治是社會經濟勢力的表現；而「社會的」結構則是政治經濟壓力下的結果。」(Kaplan ed. 1978: 7)

世界體系理論還強調，研究現代世界應該以世界體系這個整體為分析單位，而不是以國家為單位。

華勒斯坦說：

「各民族國家並非竹柞自分離、平行發展的社會，而是構成一個整體並反映那個整體的組成部分。……要瞭解一個特定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與政治鬥爭，我們必須首先把這個國家放在世界經濟的整體結構內。」（Wallerstein 1979: 53）

再者，華勒斯坦還主張，世界體系由中心（core）——半外圍（semi-periphery）——外圍（periphery），三層結構所構成。中心國家在資本、技術、金融、國家力量上都佔有優勢，它們藉著剝削外圍、半外圍而壯大，處於中間的半外圍則一方面受到中心國家的剝削，一方面剝削外圍，使世界體系免於兩極化，有助於穩定世界體系。（Wallerstein 1979: 69）更重要的是，各國在這三層結構中的位置並非凝固不動。中心國家可能下墜至半外圍而外圍可以晉身半外圍，半外圍也有希望躍昇為中心國。（Wallerstein 1979: 76-89）

本文將運用上述的方法與觀點剖析台獨運動的發展過程並預估其前景。

## 二、

「台灣獨立」運動產生的根源在於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動。原來多個中心的帝國主義國家爭雄的局面，經過戰火肆虐，英、法飽受摧殘元氣大傷，德國慘遭分裂，義大利一蹶不振，日本到處斷壁殘垣，唯獨美國安然無恙，戰後國力不減反盛，在生產、貿易、金融各方面的實力都凌駕於其他國家，使得世界體系由多個中心國家的爭雄 (rivalry) 轉變成美國的獨霸 (hegemony)。(Hopkins and Wallerstein 1982: 52-62) 然而，經過三〇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與法西斯主義的猖獗，資本主義的弊端畢露，戰後社會主義革命與反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湧，形成沛然莫之能禦的反體系運動 (ant systemic movements)，對各中心國家構成重大威脅，尤其不發達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往往也以社會主義革命為旗幟，令美國為首的中心國家膽顫心驚，深恐赤潮洶湧，危及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於是，用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種手段，撒下天羅地網，全力遏制 (contain) 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勢力，進行長達四十多年的冷戰。所謂「台灣獨立」運動其實就是冷戰時期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及其對亞洲影響的產物。

台灣在日本投降後，依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回歸中國，本是順理成章，毫無疑義之

事。不料，一因國共內戰再起，二因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倒行逆施，激起民怨，發生「二·二八」事變，令台人大為反感，遂使台灣問題複雜化。

國民黨自一九四七年末，敗象已露，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淮海戰役失利後，更是大勢已去。美國對國民黨的腐敗、軍隊的無作戰能力，深惡痛絕，決定放棄國民黨，但又害怕台灣澎湖諸島落入中共之手，不利美國，因而改變原先支持台灣回歸中國的政策。

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稱NSC）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九年末的會議文件，可總結出美國對台政策的重點如下：

一、美國的基本目標是不讓台灣、澎湖落入共黨控制，成為蘇聯的戰略據點，從而有損美國的國家利益，最可行的方法是將台澎與中國大陸隔絕。（NSC371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二、爲了方便美國介入，提出「台灣地位未定」論，指稱國民政府對台灣只是實質佔有，未擁有主權，台灣的法律地位須待對日和約決定。（同上）

三、美國如直接以武力佔領台灣，將露出美帝國主義的面目，既激起中國人民一致反美，又會遭國際社會責難，故不宜。（同上，又見NSC481號，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四、因此，美國應在台灣當地培植取代蔣介石的非共黨華人政權，並與台灣籍領袖密切接觸以便時機成熟，符合美國國家利益時，即應利用台灣自主運動。（NSC371號及NSC372號，一九四九年

二月三日)

五、當台灣無力抵抗中共之進攻時，即謀求台灣獨立，其策略是：策動友邦向聯合國提案，要求由聯合國託管台灣，由台灣人民自決，實行公民投票。(NSC375號，一九四九年三月一日，以及國務院政策計劃處處長肯楠(George Kennan)的《台灣意見書》，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三日)

美國往後的對台政策大抵是依上述重點做為主線，而「台灣獨立」運動的訴求與策略大體上也是依照美國設計的方案行事。不過，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之間的美台關係尚有些重要的轉折必須剖明。

首先是美國對蔣介石由「去之而後快」轉為「不得已而用之」。蔣介石在國共內戰中，接受美國龐大的軍事、經濟援助最終卻仍以一敗塗地收場，令美國當局痛心疾首，認為國民黨完全喪失民心，無可救藥，蔣介石尤為罪魁禍首，於是自一九四九年後，即強烈要求蔣介石下台，並力圖阻止蔣及國民黨的殘兵敗將流亡至台灣，以免拖垮台灣。但蔣早自一九四九年初，即安排親信陳誠至台灣掌控軍政大權，故一九四九年六月蔣介石倉皇避難台灣，仍能重掌政權。但美國仍處心積慮逼迫蔣交出政權，欲使其成爲政治難民。其手法是利用國民黨須賴美國援助方能生存的弱點，要求重用吳國禎、孫立人等親美自由派人士出任台灣省主席與陸軍總司令等政治、軍事要職，以此做爲取得美援的條件。(顧維鈞 1988: 530-31; 552-53) 甚至策劃由孫立人發動政變，驅逐蔣介石(cummings 1990: 541)。而美國



中央情報局（CIA）也曾企圖在沖繩訓練中國軍隊，用以推翻蔣介石及其政權（顧維鈞 1988: 566）。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全面潰敗，正式遷台，美國認定，若無美國軍事干預，中共必將取得台灣（Tucker 1994: 30）。美國軍方基於軍事觀點希望繼續援助國民政府，但國務院反對，遂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於十二月二十九日召集參謀長聯席會議（Joint chiefs of staff）討論台灣問題。艾奇遜指出：中共通過土地革命，取得政權，而非靠武力，中國沒有抵抗共產主義的基礎。毛澤東掌權是經由自己的努力，而不是藉蘇聯軍隊扶植上台的。蘇聯著手分裂中國北方省份，這必會造成中共與蘇聯對抗。艾奇遜又說：「這種情況是我們在中國的一項重要資產。若不是為了非常重要的戰略目的，我們絕不要採取行動，使自己取代蘇聯成爲威脅中國的帝國主義。」艾奇遜認爲，援助腐朽、聲名狼籍的國民政府不但會使美國聲譽受辱，還將激起中國人民一致仇恨美國的情緒。總之，艾奇遜主張利用民族主義在亞洲的力量，分化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並預期須有六到十二年的時間，才能看到效果。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Omar Bradley）最後同意國務院的政治考慮應該高於軍方的軍事考慮（FR, 1949IX: 463-67）。

艾奇遜提出這樣的對華政策並非個人的奇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徵詢所有國務院重要官員（包括 Rusk、Kennan）與顧問的意見，獲得了如下的共識：不立刻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也絕不策動台灣與中國大陸分離；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是把北京政權從斯大林的控制下分離出來，鼓勵

中蘇分裂；絕對不可做出任何把中國人民推向俄國懷抱的事。（Cohen 1980: 40）

美國國務院當時認為，鼓勵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受蘇聯支配，比控制台灣，更加有利於美國國家安全；援助蔣介石在台灣政權會把美國再捲入中國的內戰，激怒毛澤東，逼使毛向斯大林靠攏，增加中國侵略的可能。他們認為，如果中共政權不被激成敵手，就不需要台灣做為軍事基地。軍援台灣非但不能加強美國的安全，反倒會因製造敵人而需要基地。何況，台灣在防止共產黨攻擊日本的戰略價值上，還遠不如韓國，而當時美國陸軍卻已堅持要從韓國撤軍了。（Cohen 1980: 41-42）

爲了反駁共和黨議員出兵佔領台灣的主張，美國總統杜魯門（Harry S. Truman）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發表了對華政策聲明。其重點如下：

1. 根據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的開羅宣言，凡屬日本從中國奪取的領土，如台灣，應歸還中華民國。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波茨坦宣言宣布開羅宣言所載各款應予執行。

2. 遵照這兩個宣言，台灣交回蔣介石委員長；過去四年來，美國和其他盟國接受了中國對該島行使權力的解釋。

3. 美國對台灣或中國其他領土沒有野心。美國目前無意在台灣謀取特權優惠或建立軍事基地，也無意用武力干涉現狀。美國政府不採取導致捲入中國內爭的方針。

4. 同樣，美國不對台灣的中國軍隊提供軍事援助或意見。（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79)

艾奇遜在杜魯門發表聲明後，召開記者會闡釋該聲明的涵義說：

中國人治理台灣已有四年。美國和任何其他其他盟國都從未對其在佔領期間行使權力提出異議。當台灣成為中國的一省時，沒有人就此提出法學上的疑點，而是被認為符合約定的。

現在有人認為情況變了。他們認為目前控制中國大陸的力量是對我們不友好的，這個力量無疑很快會被一些其他國家所承認。因此這些人要說「好吧！我們不得等待一個和約。

……

不論法律地位如何，杜魯門先生今天早晨說，美國對台灣地位的完整性不準備在法學家的用語方面進行糾纏。……全世界必須相信，我們是堅持原則的，我們是尊嚴、體面的人民，我們不像其他國家那樣，說話只是為了進行利己的宣傳，一旦情況發生變化，使我們堅持這一立場有困難時，就立刻加以推翻。

總統說，因此對待台灣目前的局勢，我們不準備使用軍隊。我們不準備奪取這個島嶼。我們不準備在軍事上以任何方式介入台灣。就我所知，沒有一位政府負責人，沒有一位軍人，曾認為我們應使我們的軍隊介入台灣。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XXII, January 16, 1950, P.81)

這些話說得何等動聽、漂亮！又何等斬釘截鐵！然而，究其實際，不過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辭令。事實上，在韓戰前，美國雖對中共有所顧忌，不願明目張膽地直接控制台灣。但時時想要在趕蔣介石下台後，通過聯合國託管，掌握台灣。例如：一九五〇年五月三十日，美國國務院主管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就曾計劃要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告訴國民黨領導人，台灣的陷落是不可避免的事，美國不會前來救援，蔣介石唯有要求聯合國支持他，託管期間，美國將派出第七艦隊，控制台灣海峽，保護台灣，使台灣中立化，而蔣也必須下台，把權力交給孫立人，出國流亡，做政治難民。這樣，杜魯門就可以倒轉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的聲明，名正言順地使用武力保衛台灣。（Cummings 1990: 536-538, Cohen 1980: 46）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杜勒斯告訴蔣介石的親信董顯光說，蔣委員長若能稍微謙遜一點，那麼台灣還可能有救。董顯光向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談及此事，顧維鈞記述說：「杜勒斯沒有說美國方面有什麼計劃，我和董推測，這可能意味著要我們把台灣當做依靠美國軍事力量戰勝日本而取得的佔領區，從而申請美國協助防守台灣；或者申請對台灣的託管權。但這也可能包括以美國負責保衛台灣為條件，而要蔣委員長下台的意圖。」（顧維鈞 1988a: 762）

蔣介石自退處台灣後，即面臨四面楚歌，情勢危殆的困境。一方面是中共隨時會兵臨城下，另方面美國又存去之而後快之心，煎逼甚急，明言只要蔣介石不下台，美援就不來。蔣介石自覺朝不保夕，在一九五〇年五月末，即尋求到菲律賓或韓國避難。六月十五日甚至要國民政府駐盟國軍事代表團團長何世禮上將以「絕對機密」通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他急切地要求「美國全面接管，希望麥克阿瑟將有意受此重任，這樣對整個遠東，特別是台灣比較好，他本人及各級政府的屬員都願接受麥克阿瑟將軍的調度指揮。」（Cummings 1990: 531）

不過，蔣介石想拉麥克阿瑟當守護神的圖謀並沒有成功。美國國務院的計劃是要蔣介石完全交出政權，徹底剪除他的黨羽勢力。一九五〇年六月十九日，國務院推翻蔣介石的策劃已經瀕臨瓜熟蒂落的時候。這一天，國務院重新檢討一月五日杜魯門的聲明。在名為《當前美國對台政策要點摘要》的文件中指出，「中蘇同盟條約」已「大大降低莫斯科與北平之間會發生嚴重裂痕的可能」，這樣一來，「民族主義」的議題就無法再加以利用了；同時，大陸的情況正在惡化，這就加強了台灣做為「反共基地」的重要性。於是，美國現在若要防衛台灣，蔣與他的親信「必須願意離開台灣，交出文武職權給美國任命的中國人與台灣領袖。」這時美國海軍會進入台灣海峽，使兩岸互不攻擊。萬一蔣抗命不從，「美國應極秘密地由私人密使通知孫立人，假如他願意搞政變，對台灣實行軍事管治，美國政府準備提供必要的軍事援助與意見。」文件稱，蔣甘心下台的可能不大，由孫立人搞政變較為可行，但「必

須快刀斬亂麻，幹得乾淨俐落」。(Cummings 1990: 541)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杜魯門於六月二十七日發表聲明，命令第七艦隊阻止大陸進攻台灣，也要求台灣的中國政府停止對大陸進行海、空攻擊，並要第七艦隊負責監管，務必使其命令得以貫徹。更重要的是，杜魯門宣稱台灣地位有待「該地區恢復穩定與和平，或者簽訂對日和約，或者由聯合國討論決定」。

美國悍然出動軍隊介入中國內戰，不准國共雙方進取領土，固然給台灣多了一道屏障，但杜魯門的聲明，正如顧維鈞所說，是「粗暴」、「蠻橫」的（顧維鈞 1989a: 7）。美國不僅入侵中國海域，限制中國軍隊的行動，還否定了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視台灣地位為未定，企圖培植一個獨立於國、共兩黨之外的台灣。艾奇遜想保的是台灣而不是他所鄙視的蔣氏政權。他認為，第七艦隊使台灣海峽雙方「中立化」後，就有可能把台灣從大陸分割出去，暫時由美國或聯合國統治，最後由當地的政權治理。事實上，這是 Rusk 與 Dulles 早先提出來的構想。(Schaller 1985: 282-83)

因此，蔣介石在韓戰爆發後，只是暫時獲得喘息，還沒有完全得救，美國仍處心積慮在尋找親美的第三勢力，準備隨時取代他。中國著名的自由派學者胡適、蔣廷黻、顧孟餘等人與國民黨的非蔣系將軍張發奎、許崇智等人都曾是美國看中的人選（顧維鈞 1989a: 216, 218, 229, 255, 422）一直到一九五一年中期，美國都視蔣為台灣改革的障礙，一再表示只要蔣在位一日，美援即不可能大幅增加。（顧

維鈞 1989a: 203)。

不過，由於韓戰中共使美國遭受前所未有的挫敗，對中共敵意急劇升高；美國認定中蘇共聯盟極為鞏固，中共成爲惡魔式的威脅，台灣作爲反共基地的價值大爲提昇。(Chang 1990: 80) 蔣介石固然不討美國歡心，但胡適、蔣廷黻、顧維鈞等美國所欲扶植以取代蔣的自由派人士，一再告訴美國國務院當局，蔣牢牢掌握軍權，縱使有諸多缺點，但無可取代，只能期望在其領導下改革(顧維鈞 1989a: 338-39)，加以韓戰爆發後，蔣介石以其子蔣經國爲核心進行國民黨的改造，排除了CC派、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黨羽，使黨權更集中於蔣氏父子之手，而軍中政治工入尸系統與情報特務也由蔣經國實際掌握，蔣介石在台灣島內的權力可謂十分鞏固，美國面對這種局面，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後，在「反共優先」下，逐漸接受現實，持續增加對台軍事、經濟援助，蔣介石遂轉危爲安。尤其自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台灣在美國保護下，中共的威脅大爲減輕，國民政府受美國援助的龐大軍隊特務勢力竟成爲對島內實行高壓統治的最有力憑藉。

由於美國的保護，蔣介石服下了續命丹，但這猶如浮士德與魔鬼的交易般，也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即：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橫遭美國擱置，爲「台灣獨立」運動鋪設了溫床。

韓戰爆發後，美國採取分裂中國的政策，杜魯門聲明台灣地位應交由對日和約或聯合國決定。在對日和約的磋商過程中，美國爲恐中共取得台灣主權，力排中共與會，而英國、印度等承認中共爲中

國合法政權的國家則力主台灣應歸中共。雙方僵持不下之餘，遂以將國共都排除於對日和會之外，台灣地位懸而不決做為結論。國民政府對於被排斥於對日和會之外，深感受辱，而爲了深恐台澎主權未能確定，將影響民心士氣，喪失政府威信，更堅持台澎主權不能讓。但迫於須靠美國生存最終不能不吞下苦果，接受美國的安排。同時，美國也利用日本戰後須依賴美國的保護、復興的弱點，壓迫日本首相吉田茂冒著得罪中共的風險，與台灣的國民政府建交、訂約。（詳情見顧維鈞 1989b）

一九五二年蔣介石在美國壓力下，與日本單獨簽訂和約，默認了台灣的主權未定。一九五四年蔣介石爲了拉住美國以自保，力求美國與其簽訂《共同防禦條約》，美國則利用這個條約遂行它分裂中國的目的。在訂約的商談過程中，美國強調：一、美國所欲保護者儘爲在國際法上未定而由國民政府管轄的台灣、澎湖，至於明確歸屬大陸的沿海島嶼如：金門、馬祖等則不在保護之列；二、國民政府若欲調動軍隊離開台澎，須經美國同意。正如顧維鈞所說的美國想利用這個條約「約束台灣行動的同時，也通過維持台灣的存在以制約共產黨」。（顧維鈞 1990: 432）於是，通過這個條約，蔣介石被美國「拴」在台灣島上，沒有了重返大陸的自主權。

可以說，從韓戰至今，美國所執行的實質上的「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到了一九五四年就已鋪平了道路，打好了地基。而「台灣獨立」運動也就有了客觀存在的空間。



### 三、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雖然萌芽於四十年代，但生根、茁長則是五十年代以後的事。

台灣光復之初，一些日據時期的台灣御用紳士辜振甫、許丙、簡朗山等人恐懼遭受清算會勾結少數壯日本軍人圖謀台灣獨立，不久即國民政府破獲，紛遭判刑下獄。這樁台獨案件與日後的「台灣」運動並無關連，可視為時代轉換中的一幕醜劇，不足深論。

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捕殺了多位台灣各地頗有聲望的士紳，在民變的過程中，死傷了數以千計的民眾（實際數字眾說紛紜，至目前尚無法確知，估計當在數千至萬人左右），激起頗大的民怨。這時，美國派駐台灣、香港等地領事館的官員，利用台灣人的不滿情緒，大肆煽動「台灣託管運動」，主張在美國的幫助下，由聯合國託管台灣，實行公民投票自決，其後並直接鼓吹台灣獨立。當時響應這個號召的主要是留學美國的化工博士廖文毅與其弟廖文奎，還有先後在日本總督府與美軍工作過的黃紀男等人。他們與美國領事館密切聯繫，並前往南京晉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Leighton Stuart）與奉命赴華調查軍政情況的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表達自決、獨立的願望（蘇新·176-80…李世傑1988:56-57）。一九四七年十月中旬美國駐台的新聞處長卡度（Cor-

10) 告訴一位台灣議員說，對日和約尚未締結，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仍在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管轄之下，台灣人若願意脫離中國統治，美國可以幫忙云云（蘇新：181-82）。一九四八年七月，黃紀男等人果真到日本東京向麥克阿瑟遞交要求自決獨立的請願函（李世傑 1988: 62-63；蘇新：185-87）。

廖文毅等人在台灣並無群眾基礎，他們捏造了多個組織的名義，搞出一個「台灣再解放聯盟」虛張聲勢。一九四九年初，當美國有意支持「台灣獨立」時，曾派姓華參事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到台灣來探查虛實。莫成德多方接觸後，下了這樣的結論：「台籍人民對於政府誠有不滿，但台獨無堅實之組織與共戴之領袖，不足成事。是則欲使台灣免入共產黨之手，只有向聯合國要求託管之一法。」（海峽評論 1991: 119）

廖文毅等人在一九五〇年初，將「台灣再解放聯盟」從香港遷到日本東京，改組為第一個標舉「獨立」的台灣人政黨——「台灣民主獨立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等人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由廖文毅任大總統。這個台獨組織因無群眾基礎，內部又遭國民政府調查局特務大量滲透、收買、分化，不過十年左右即告眾叛親離。廖文毅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返台向國民政府投誠。「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全面瓦解（李世傑 1988）。

然而，在國民政府全力壓制下，「台灣獨立」運動並沒有就此絕跡，反而持續茁長，至八〇年代成為對台灣政治具重大影響的運動，這必然有其容觀存在的因素。

從外部因素來說，在美國霸權的支配下，台灣的國際地位遭到擱置，兩岸徹底隔絕，已如上述。從內部因素來說，國民政府在美國支持下外患減輕，於是得以將主力投注在內部控管上。蔣介石在韓戰後，在台灣確立起一黨甚至一人獨裁的黨、國統治體制（party-state system），掌握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權力。舉著「反共」的大纛，蔣介石父子肆無忌憚地捕殺異己，禁止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限制學術、言論、出版的自由，形成長達數十年的「白色恐怖」。美國則在戰略考慮下，不願台灣動盪，破壞反共基地的安全，又苦於遍尋不著可成氣候的第三勢力以取代蔣介石，對蔣介石父子的高壓統治，只有默爾而息，改採長期培養親美份子的策略。

在美國「反共優先」的政策下，蔣介石可以沒什麼顧慮地放手鎮壓反對人士。一些原來仰承美國意旨，為美國政策服務的人，也就跟著遭了殃，倒了霉。像「二·二八」後，積極響應美國「託管」、「台獨」的號召，汲汲奔走於美國使館之門，通消息、給情報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台灣支部部長黃紀男就是一例。黃紀男在「二·二八」發生後數月，求見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並請其支持台灣獨立，司徒雷登表示：「台灣獨立是一條漫長艱苦的道路，但值得去奮鬥。」黃紀男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被捕，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得知後，對國民政府表示「相當關切」，國民政府就把案子暫時擱置，考慮釋放黃紀男。但韓戰爆發後，蔣介石有恃無恐，判了黃紀男十二年徒刑。黃紀男事後大感不滿，批評美國政府心目中，只看到台灣在西太平洋的戰略地位，根本看不見台灣的老百姓（李世傑 1988:

57-58)。另一個例子是孫立人。擔任過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與國務卿的臘斯克在晚年曾憶及韓戰爆發前，孫立人請專人送來密訊，表示將發動政變，驅逐蔣介石，請美國支持，但當這個訊息呈報杜魯門尚待決定之際，韓戰爆發，美國方面認為孫立人若於此時發動會在台灣製造不穩定，極不明智，因此勸他不要採取行動。（美洲時報周報 288 期）孫立人是否真的曾於韓戰前準備發動政變，頗有爭議（Cummings 1990: 533-42）。但臘斯克在一九九〇年接受上述訪問時的回答，卻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美國當局的心理。其實，孫立人到了一九五〇年應該已不敢有政變之心。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蔣介石透過陳誠穩控台灣軍政大權時，孫立人已知事不可為，而責怪美國人未及早行事，坐失良機（FRUS, 1949IX, P.352）。更糟糕的是，美國情報單位在一九四九年末竟然將孫立人對蔣不滿並有革命念頭的最機密報告，給蔣介石的親信、軍統的特務頭子鄭介民看。鄭介民由美返台後，即警告孫立人不可在美國人面前肆無忌憚地放言高論。孫立人聽後大驚失色，告訴美國駐台武官，美方這麼做，會讓他無法立足，生命恐將不保。蔣介石得知孫立人有政變意圖，隨即從海南島把劉安祺的部隊調到台灣，派駐在孫立人部隊與台北之間，以防不測（Confidential U.S. 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Formos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孫立人既已警覺蔣介石對他早懷有戒心，豈敢輕舉妄動？不過，這些例子都說明，美國隨時會因其國家利益犧牲它的棋子。「出賣」在美國的歷史記錄中絕不是什麼新鮮事！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九日，顧維鈞即對想邀他組反對黨的國民政府叛將毛邦初說，有些美國人雖不

喜歡蔣，但現在已改採現實的態度，他們知道蔣的軍隊是可利用的反共力量，目前會把對他的政治制度或政府模式的不滿放在一旁，不管任何人，只要願意反對共同的敵人，就是美國的朋友（顧維鈞 1989b: 472-73）。

因此，蔣氏父子在台灣實行白色恐怖在美國眼裏，就再也不是什麼不可容忍的事了，美國一向高舉的「自由」、「民主」、「人權」云云，在「反共優先」的政策下，變得微不足道。於是，我們看到一九五三年美國力捧的紅人台灣省主席吳國禎被逼赴美，一九五五年，孫立人以兵變罪名被押，美國國務院默不作聲，美援依舊源源而來。美國把寶押在蔣介石身上時，也就是特務橫行，酷吏猖狂之際。根據國民政府法務部官員在立法院的報告，「非現役軍人的刑事案件，在戒嚴三十八年中共有二萬九千四百零七件之多！」（李敖 1991 序言：5）其中慘遭冤屈、酷刑甚至枉死者不知凡幾！

經歷過「二·二八」的鎮壓，又遭受長期的恐怖統治，台灣民衆尤其是知識份子對蔣氏父子與國民政府深懷不滿者衆多，是可想而知的事。尤其國民政府在一九七九年之前，受到美國支持，在國際上宣稱代表全中國。於是在台灣島內，它就可以名正言順地聲稱仍享有正宗的中國法統（legitimacy）。爲了維護這個代表全中國的「法統」中央級的民意代表遂無法由台灣本地產生，造成田四十多年無法全面改選的「萬年國會」，台灣的國會遂由欠缺本地民意基礎的大陸籍代表長期壟斷。黨政部門中央層級的高官也大多由大陸籍權貴充任。台灣籍人士參政管道大受阻礙，大多只能通過省、縣、

鄉、鎮的地方選舉擔任公職。大陸人中的多數雖然也是沒什麼權力的被統治者，但因少數大陸籍權貴佔有了高位，遂表現為「外省的大陸人統治台灣人」的假象，成為省籍矛盾的重要根源，給予「台獨」運動者可乘之機。

更糟糕的是，蔣介石為維持其獨裁專政，不容在國民黨之外有具群眾基礎的政治勢力，尤其懼怕大陸籍的自由主義者與台灣籍的政治人物結合，落地生根，對國民黨構成威脅。由胡適、雷震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積極鼓吹自由主義，經常針砭時弊，揭露國民黨宣傳的各種神話，也時有為台灣人鳴不平的文章，是五〇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政論雜誌，蔣介石父子視如洪水猛獸。至一九六〇年，雷震與隨國民黨從大陸來台的民社黨、青年黨重要幹部欲與台灣籍政治領袖合組「中國民主黨」，形成不分省籍的政治大聯合之際，蔣介石立即逮捕雷震等大陸籍人士，罪名之一是「煽動本省人背離政府」（雷震 1978: 197-201）。這一事件使大陸籍人士與台灣籍人士合流對抗國民黨的努力遭受重挫。日後，台灣反對運動的主流偏向以省籍矛盾為主要訴求，傾向排斥外省人的「台灣獨立」運動。

雷震籌組的「中國民主黨」之所以胎死腹中，輕而易舉地被蔣介石鎮壓。有內外兩方面的因素。外在因素是美國撒手不管。胡適、雷震辦的《自由中國》雜誌，其實背後有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新聞處的資助（Tucker 1994: 77）。美國從四十年代末就一直期待國共之外的親美第三勢力能夠茁壯成形，在香港、台灣、美國各地積極培養反共反蔣的力量，但韓戰後，基於遏制中共的戰略考慮，

恐怕萬一蔣介石倒台，台灣出現權力真空，予中共可乘之機，故一旦台灣的反蔣人士真有所行動，蔣介石反撲，美國又往往投鼠忌器，僅坐壁上觀，任由反蔣人士坐牢犧牲。內在因素則是當時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尚處於半封建的資本主義初期階段，缺乏民主化所需的客觀物質基礎。國民黨於五〇年代初與日本一樣，在美國的幫助下，實行土地改革，剷除了台灣的地主階級，大量佃農轉為自耕的小農，構成了國民黨在農村的支持力量。六〇年代之前，台灣還是以農業為主體的社會，有限的工商企業大多是國民黨掌控的公營企業，民間的資產階級尚待國民黨哺育、培養，面對握有龐大軍警特務的國家暴力的國民黨，既無力也無膽與之相抗。此所以在七〇年代之前，台灣的反對力量微弱之至，不堪蔣介石一擊。

不過，一切事物總是在發展變化的。七〇年代後，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有了巨大的變化，國際政治氣候也出現了新局面。反對運動在七〇年代後期開始，爆發出越來越強勁的力道。

前已述及，戰後美國對台灣的既定政策是不讓台灣落入不友好的國家之手，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美國原來希望扶植蔣介石成為親美的中國政權，在國共鬥爭中，給錢、給槍，援助蔣介石，不料蔣政權倒行逆施，大失民心，迅速潰敗。美國對蔣的不爭氣，憤恨不已，艾契遜在二十年後，猶餘憾未消地說：「中國已經統一了，而且邁向強國之路，但不是靠我們做到的，也不合乎我們的利益。」（Acheson 1969: 729）美國在中共大獲全勝後，曾有棄蔣就毛的念頭。他們認為中國飽經戰禍，經濟

凋敝，一定需要美國的經濟援助，就想以利相誘，爭取中共。當時的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於一九四九年未曾向中共表示，若他們肯和莫斯科決裂，美國可提供千百萬美元的貸款，幫助中國重建經濟。不料，中共聞之震怒，視為莫大侮辱。司徒雷登說，那時他才知道「毛是非賣品」（「Mao was not for sale」）（Chang 1900: 41）。不過，在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五〇年初，美國當局仍抱持分化中蘇共，削弱社會主義陣營的想法。因此，曾打算將台灣放手給中共。但一九五〇年二月，中蘇共簽訂「友好同盟條約」，兜頭給了美國一盆冷水，美國國務院又想抓緊台灣。至韓戰爆發，中共參戰，大挫美國銳氣，美國震怒交加，遂決定用經濟制裁、軍事包圍等手段，全面遏制中共，企圖逼迫中共在內部經濟困難，國際又有強大政治、軍事壓力下，離開蘇聯，向美國屈服（Chang 1990）。在美國這樣的戰略構想下，台灣水漲船高，成了美國的寵兒，蔣介石也絕處逢生，重獲美國的護身符。

為免台灣落入中共手中，美國最希望的是台灣能夠獨立於中國之外。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的NSC371與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的NSC372文件，美國當局就指出：「美國應即謀求發展與支持一個地方性的非共華人政權」，「美國亦應謹慎謀求與台籍領袖維持接觸，俾使一旦時機成熟，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時，即可利用台灣自主運動。」（海峽評論社 1991: 111-112）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顧維鈞也明白指出：「在建立防線方面，他們之中有些人認為建立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是最有效的辦法，因為這個共和國會或多或少地成爲美國的衛星國，以及形成美國的防禦和安全體系的重要一環。再者，



美國人對蔣介石委員長和國民政府的反感當然依舊存在。這種反感並未消失，儘管朝鮮戰爭和共產黨侵略把它推到他們思想深處去了。」（顧維鈞 1989a: 583）一九五一年，蔣介石的親信董顯光也告訴顧維鈞說：時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的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對他說，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辦法是使台灣成爲一個獨立的國家，董表示要光復大陸，艾森豪威爾夫不以爲然地說：「那樣將意味著與蘇聯打仗。」（顧維鈞 1989a: 426）。

韓戰之後，美國即處心積慮創造台灣脫離中國的條件。其手法是：一、在國際上泡製「台灣地位未定論」，逼蔣介石在「對日和約」中默認，二、多方逼迫蔣從金門、馬祖等外島撤軍以徹底斬斷台灣與大陸的連繫。但蔣深知一旦真的撤軍，將坐實台灣獨立，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立刻失去基礎，必將垮台，因此而力抗美國壓力。蔣最終能保住金門、馬祖，是靠 1958 年的「八·二三」金門炮戰。毛澤東洞悉美國意圖逼蔣撤出金門、馬祖以利搞兩個中國或台灣獨立，遂與蔣台演一齣雙簧給美國看，即：中共故意不攻下金、馬，雙方維持單日打雙日不打的炮擊，以示國共雙方尚處內戰，兩岸關係屬於中國內政問題（林克等 1995: 267-86; Tucker 1990: 259-60）。三、對台灣進行經濟、政治、學術、文化的全面滲透，使台灣籠罩在美國的影響下，以利出現可以取代蔣氏政權的美國化政權。

要做到上述第三點，並非難事。當時國民黨政權在經濟、軍事、政治上完全依靠美國的支持才得以倖存。台灣今日的基礎是五、六十年代在美國經濟、軍事援助下奠立的。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有

幾項目的：一、以經濟增長支持軍備，減輕美國的負擔，二、照美國模式，推動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將台灣納入美國支配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三、通過創造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使私人資本茁壯，進而在社會中形成新的權力中心，於適當時機即可促進政治與社會變遷；四、以經濟快速發展，做為冷戰意識形態的鬥爭工具（Jacoby 1966: 31-2; 137-148）。對第四點，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日美國駐台北大使館代辦葉格爾說得最為露骨：「當美國援外逐漸減少之際，美國華盛頓高層的想法是想選擇數個過去對美援運用成績優良的國家如自由中國，作重點式的援勵，使經濟加速發展而成爲援外成就的楷模。……經濟本爲政治的工具，經濟上的重大成就，就可予共產主義國家重大的打擊。」（康綠島 1993: 140）今天看來，美國的這幾項目的都達到了。台灣經濟在美國的設計支配下，從五〇年代依附美國、日本取得快速的增長而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Periphery）上升的爲半外圍（semiperiphery），被美國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吹奉爲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楷模，賦予「東亞四小龍」、「經濟奇蹟」的美譽，甚至連中共都頗爲稱道。而台灣的私營資本自六〇年代實行加工出口經濟後，也急速成長，大量從事加工出口貿易的中小企業興起（隅谷三喜男等 199: 148-50），經濟結構自七〇年代後也邁入工業化社會。社會上因此而形成一批由中小企業主、專業人士爲主構成的小資產階級。美國爲扶植台灣經濟而大開市場。迄八〇年代止，美國一直是台灣最主要的出口市場，這客觀上就易於形成一批親美的勢力。正如阿敏（samir Amin）所說，台灣、香港、南韓等地的外向出口工業「確實產生

了一個由經理、工程師、官員構成的受薪中產階級，他們有機地附屬在世界體系上，也就固守著世界體系的消費方式與意識形態。」（Amin 1976: 214）更何況，美國還刻意透過各種獎學金、基金會，資助台灣的教師、技術人員、官員、教授、大學生到美國受訓、進修、留學。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甚至透過亞洲基金會（Asian Foundation）推動學術交流，資助學者從事東西冷戰對抗的研究。而電影、電視、雜誌、書刊也被大量利用來宣傳親美反共的意識（Tucker 1994: Chapter 5）。對於美國從台灣大量選派官員、教師、技術人員到美國受訓的用心，顧維鈞明白指出：「他們是否在考慮訓練一批年輕的技術人員、行政人員和學校教師，以期建一個獨立的台灣共和國，我到處都碰到過美國高級人士流露這種想法。」顧維鈞還指出美國庇護台獨人士說：「一些有政治考慮的台灣人也贊成台灣獨立運動，他們能夠而且確實得到中央情報局的幫助。有些台獨領袖在日本避難，有些人甚至被送到美國以推進這個運動。」（顧維鈞 1989b: 582-83）。

經過美國二十多年的精心培育，到七十年代，在政治、經濟、意識形態上都已為台灣形成親美反共反蔣的勢力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國際政治方面，七〇年代也出現了重大的轉變。先是美國深陷越戰泥淖師老無功，國內為越戰而分裂對抗、擾擾不安，經濟陷於滯脹（stagflation），財政赤字日趨惡化，布列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 System）崩潰、美國可內外交困，尼克森（Richard Nixon）焦頭爛額。而一九六九年中蘇發生珍

寶島之戰，美國看見了期待已久的中蘇分裂，遂想藉中共之力早日結束越戰，並進一步聯中制蘇。在美國眼裏，台灣的戰略價值自然大不如前。一九七一年，美國與中共關係解凍。尼克森七月十五日宣佈將訪問大陸，九月十六日表同意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十月二十五日，中華民國就失去聯合國的席位。失去聯合國席位對蔣介石政權的打擊甚大。這代表在國際上國民政府已不再是中國的正統，從而在台灣也難以合理地照舊宣稱自己是中國的中央政府。美國這個龍頭一改善與中共的關係，日本等政治隨從當然也迫不及待地與中共建交。國際地位的不保與島內民心的不安、不滿，迫使蔣氏父子必須在政治上有所改革。尤其對台籍人士必須放出更多權力以安撫台灣人心。一九七二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長，「蔣經國時代」，開始啓用多位台籍人士擔任台灣省主席、副院長、部長等重要職位，並小額增加台灣選出的國會議員名額，逐步推行國民黨的「台灣化」、「本土化」。

然而，這些漸進改革遠遠不能滿足新興中產階級的要求。當美國的支持轉弱，外交不斷失利後，「法統」的神話就不再能維持，而獨裁專政數十年所積累的民怨也已極爲深厚。所以自一九七七年反對派在省議會和縣市長選舉中獲得空前勝利後，反對運動風起雲湧。一九七九年美國與中共建交，一九七九年底國民黨爲了鎮壓澎湃洶湧的反對浪潮，發生了著名的「高雄事件」，多位知名的台灣籍政治人物被逮捕。這一震驚台灣內外的政治事件，非但沒有嚇退反國民黨的力量，反而以更加猛烈的氣勢衝擊國民黨政權。在以後的多次選舉中，反對人士節節勝利，證明台灣社會已產生了一股不是以國

民黨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的反對勢力。而原本以美國、日本為基地的台獨組織，這時也以資助運動，傳佈台獨理論書刊、在美國遊說國會議員與行政部門向國民黨施壓的方式，積極向台灣島內發揮影響力，原來以「民主」為主要訴求的反對運動，逐漸被導向「台灣獨立」，經數年的發展，台灣的主要反對勢力「民進黨」終於在一九九一年將「建立台灣共和國及制定新憲法」寫入黨綱。

「台灣獨立」運動的主要訴求是「台灣地位未定」、「台灣民族自決」、「一中一台」、「公民投票」，其手段則是宣傳「台灣意識」，強調認同台灣本地，反對「中國意識」，鼓吹「台灣人不是中國人」，推動國會全面改選，省長、院轄市長、總統民選，重新制定新憲法，疾呼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從其主張來看，依舊是四十年代末美國制訂出來的策略，毫無新義。然而，舊形式下卻有了實際的新內容。台灣自一九四九年末與大陸徹底隔絕後，在美國扶植下，與大陸各自獨立發展了三十多年。尤其經濟上被納入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八〇年代後，有明顯的資本輸出，流向大陸、東南亞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由外圍上升為半外圍，外匯存底會多年高居世界第二位，對外貿易也長期居於前十五名之內，經過政府不斷宣傳強調，一般人民不免會有自得之感。在思想意識上，一方面隨著經濟、政治、軍事的依附於美國，美國式的價值觀、思考方式成為社會的主流，另一方面，則受國民黨「仇共匪、恨共匪」的宣傳教育，反共意識深植人心。客觀上既有經濟、

政治上對美國、日本的依附，主觀上又有親美、反共的意識，自然構成了美國數十年前所企求而未得的台灣本土親美反共反蔣力量的基礎。所謂「台灣意識論」、「台灣命運共同體」論，其存在依據在此。

台獨勢力從八十年代以後之所以能快速茁壯，從內部因素來說，除了客觀的社會經濟基礎，還由於他們利用在國民黨大陸籍統治階層威權統治下，行使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壓制措施造成的民怨，以台灣人利益的代言人自居，鼓吹「台灣人出頭天」掌握台灣政權，刻意強調省籍矛盾、極力擴大衝突的層次與範圍，造成Schattschneider所稱的「社會化衝突」(Socialize conflicts) 或者說是「擴大衝突」(enlarge conflicts)，使更多台籍人士涉入衝突過程，引為奧援，以造成新的權力均勢。(林佳龍 1989: 123) 他們指稱，國民黨根本無力統一中國，國際社會早普遍不承認其代表中國正統，它卻仍堅守「法統」，不肯全面改選國會、開放總統、省長、院轄市長的民選，是想藉中國統一的神話，維持動員戡亂體制，鞏固既得利益，繼續壓迫台灣人。由於台灣人口中台籍佔多數，他們認為根據多數統治原則，民主化自然也就是由台灣人掌握政權的「台灣化」，因此他們極力使用「台灣人意識」爭取台籍人士的支持，發揮了相當有效的動員效果；導致省籍矛盾超越階級矛盾並影響到國家認同的統獨之爭。從外部因素來說，則是台獨人士利用美國的壓力迫使國民黨讓步。曾任台獨聯盟主席的蔡同榮就明白指出：「有人說國民黨的國會不是設在台北市，而是在美國國會山莊。國民黨可以不理會立法

院，但對美國國會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如欲改善台灣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海外同鄉須遊說美國政府。並且現在全世界各國間，有能力且願意阻止中共蠻橫地強制台灣住民接受共產制度的唯有美國這國國家，我們也應影響美國政府阻止中共侵略台灣。所以 FAPA 初期外交工作的重點是放在促成台灣廢除戒嚴令、釋放高雄事件政治犯及爭取台灣住民自決的權利。」（蔡同榮 1990: 87）美國在七〇年代前，爲了反中共而支持國民黨的威權統治，但同時也資助反對派與台獨運動。七〇年代後，爲了與中共聯合反蘇聯，逐漸減低對國民黨政府施壓，支持反對派，促進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特別是八〇年代後，美國財政、貿易赤字達到千億美元，而台灣對美順差年達百億美元。美國更迫切希望台灣能快速實行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減少管制、開放農業產品及資本的市場、調整匯率政策，以爲其紓困，並利其進佔市場。因此，一個放棄國家資本主義、軟性、更弱化但穩定的台灣政權，是符合其利益的。

#### 四、

一九九一年十月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台灣獨立」運動可謂達於頂峰，此後的「台獨」訴求，漸失其動員號召的力道。一九九六年三月的總統大選，旗幟鮮明地高舉「台獨」大纛的彭明敏僅

得到二百二十多萬張選票，遭到慘敗，「台獨」氣勢大挫。民進黨的「美麗島」、「新潮流」兩大派系與施明德等其他要角在總統大選前，見外有中共飛彈示警，內有民衆對台獨的疑懼，已知「台灣共和國」的主張勢不可爲，爲謀生存發展，乃調整策略，與國民黨謀求聯盟，與反「台獨」的新黨和解，企圖藉「中華民國」式的實質獨立，取代不切實際且易立即招來戰禍的「台灣共和國」。但這種轉變無法爲脫離現實的所謂「台獨基本教義派」接受，遂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從台獨陣營分裂出去，成立「建國黨」，並嚴詞抨擊民進黨背叛台獨立場。

自民進黨通過「台獨黨綱」後，一九九一年底的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選舉，即受重挫。一九九六年的總統大選敗象之慘，更是前所未見，這反映了多數台灣民衆對「台灣獨立」運動的不信任與恐懼。民進黨主流勢力警覺到若不改弦更張，則永無執政機會，且有禍台之虞。

這種形勢的轉變，可由島內與島外因素分別剖析。從島內來說，台灣經濟數十年來在安定中成長，鮮見大幅波動，社會經濟秩序一直維持基本的穩定；政治上，自蔣經國掌權後，刻意加速提拔台籍幹部，推動「本土化」政策，並因應反對勢力的挑戰，在內外壓力下進行政治改革，在一九八八年過世前完成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等自由化政策，而李登輝繼位後，更一一接納反對勢力所提出的國會全面改選、省市長民選、總統直接民選等主張。國民黨政權經過民主化、本土化的洗禮，其權力基礎已完全紫根於台灣。過去國民黨靠國家暴力維持統治，中央政權主要由大陸籍權貴把持壟斷，並未



經台灣民意的認可，於是構成「台獨」運動攻擊的把柄，也是「台獨」運動藉要求「民主」為名，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依據。但是隨著自由化，民主化的政治轉型，「台獨」以「民主」之名奪權的策略已逐步被化解。尤其「台獨」爲了想利用多數暴力，加速革命建國的步伐，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將省籍矛盾無限上綱，大肆煽動「台灣人意識」，形成所謂的「台灣人情結」，化爲「台獨」運動的主要推動力量。但李登輝出任總統後，勢單力孤，爲了鞏固權位，不惜利用「台灣人情結」，結合民進黨，共同鬥倒黨政軍系統中的大陸籍權貴，終得盡攬大權於一身。李登輝在台灣政治市場上，取得「台灣人牌」的正字標記，成了正宗的商標代理人。「台獨」經營多年的品牌竟讓李登輝坐收漁利，在總統大選中大挫老牌台獨彭明敏，令台獨深有「惡紫之奪朱也」之憾。而就在激進派「台獨」大搞省籍矛盾，強以台灣人建國意識之際，常表現出強要以閩南語爲「國語」，斥責、謾罵不說或不會說閩南語者，動輒以「中國豬滾回大陸去」辱罵甚至毆打具中國意識者等等「台獨法西斯」行徑，也令許多民衆反感、嫌惡乃至恐懼，認爲他們的本質與蔣氏國民黨沒有兩樣，講「民主」是假，搞「台獨法西斯」是真，不值得支持。而內部派系惡鬥與浮現腐化病症使其道德形象下墮，令民衆離心，猶其餘事。

就島外而言，中共再三警告，只要台灣宣布獨立，必以武力保土衛權，使數十年來未經戰亂的民衆，恐懼「台獨」會引來兵災，破壞長期安定的生活。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後，實行經濟改革，

對外開放。作為台灣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由於資本小，技術低，缺乏研究發展能力，無法提昇產品層次，加以台幣匯率上升、工資增加、地價高漲等島內不利因素，在大陸、東南亞國家也紛紛採取勞力密集的加工出口經濟後，國際競爭力大幅下降，於是紛紛將產業移往大陸尋找第二春。台灣原有的加工出口主力產業如鞋、傘、玩具、燈飾、紡織等幾乎都已轉至大陸生產，以投資帶動貿易的方式為台灣賺取鉅額的外匯。近幾年來，每年台灣對大陸的貿易順差，都超過百億美元。台灣出口的主要市場已由美國轉為中國大陸，台灣經濟對大陸的依賴度大為增加。兩岸如果因「台獨」而兵戎相見，大動干戈，台灣經濟必將崩潰。再說，兩岸進行經濟、文化交流，打破過去數十年的隔絕狀態後，所謂「看不見也摸不到長江、黃河」因此產生不了中國感情、意識的論調自然不攻自破。兩岸在經濟、文化關係日益密切後，「台灣意識論」與「命運共同體論」的基礎逐漸受到侵蝕。「台獨」主張之日益失去客依據是理所當然的。

前已述及，在美國與中共處於敵對狀態下，美國的對台政策是支持「台灣獨立」或「兩個中國」，使兩岸分裂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從五〇年代到六十年代艾森豪的國務卿杜勒斯與甘乃迪的國務卿斯克，多次設法搞「兩個中國」。其方法包括：在一九五四年磋商「共同防禦條約」與一九五四—五五、一九五八年兩次金門炮戰期間，力促蔣介石從金門、馬祖撤軍，以徹底割斷兩岸的連繫（此即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金馬撤軍論」之由來）；要求北京承認台灣獨立，美國則以承認北京為中國合法

政府並支持北京獲得聯合國席位相交換。(Rusk 1990: 284-85; Tucker 1990) 不過，這些圖謀，都為國共雙方所反對，在毛、蔣合作下遭到粉碎。

但李登輝上台後，即逐步推動「兩個中國」政策。他放棄由國民黨重回大陸主政的幻想，通過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接民選，使中華民國台灣化，對外則積極推動重返國民黨，向國際宣布希望獲得雙重承認，企圖用兩德、兩韓的模式處理兩岸關係。呼應美國「兩個中國」論的，其實並非始自李登輝。早在一九七二年，甫經十年牢獄之災後不久，雷震即向蔣介石建言，放棄一個中國的主張，在台灣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雷震 1972)。李登輝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實與此論有同工之妙。

本來，蔣介石為求得美國保護而不得不在「對日和約」中，默認「台灣地位未定」，又在簽訂「共同防禦條約」時，承諾未獲美國同意不得以武力反攻大陸，就已使台灣實質上與大陸分裂，僅存留形式上的一個中國主張。尤其數十年來，蔣氏父子拒不與大陸謀求和平統一，偏安台灣，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與台灣內部政治、經濟結構的必然發展，國民黨的「一個中國」論就日益凸顯其虛幻性，難有說服力，而成爲「台獨」振振有辭地攻擊的把柄。李登輝正是想利用「中華民國式」的獨立，對內凝聚「生命共同體」的共識，化解「台獨」攻勢，對外推動「兩個中國」企求國際承認，將台灣問題國際化，擺脫兩岸的內戰狀態，以便國際干預。是故，李登輝自九十年代後，即與民進黨合作積極推動加入聯合國。一九九五年六月更訪問美國，大言炎炎、若有所指地宣稱要「向不可能挑戰」。而民進黨

黨在島內也不斷煽動台灣民衆放膽支持獨立，把台灣遭逢的國際困境全部歸咎於台灣沒有宣佈獨立，更不負責任地叫囂台灣宣布獨立中共也「不敢打、不會打、不能打」。然而，正當李登輝志得意滿地訪美歸台，猶自躊躇滿志，陶醉於自以為勝利的喜悅中，中共卻召回駐美大使並開始了一次比一次逼近台灣的軍事演習，令美國愕然，台灣駭然，而國際默然。後來美國雖在台灣總統大選期間，出動航空母艦向中共示警，克林頓卻在不久後，承認對中國的認知有誤，派國家安全顧問雷克到大陸訪問，重新學習認識中國，以圖修好。美國與中共的關係在不到一年之間出現了戲劇化的急遽轉折。何以故？

美國與中共的關係自一九七九年建交，中共進行經濟改革後，在八十年代，大抵處於平穩的和緩狀態。此其間，美國爲主的西方商品、思潮大量湧進大陸，在知識青年中掀起一股強勁的西化浪潮，至一九八九年終因官倒、通貨膨脹問題的惡化而發生「六·四」事件。中共親美的趙紫陽派系因而倒台，西化派學生也紛遭逮捕或流亡海外。中共又重提反對美國的和平演變，與美國關係陷入低潮。此後，美國不斷以人權、經貿等問題對中共施壓，並寄望中共內部親美勢力復出，使中國大陸出現符合美國利益的政權。但江李體制下的中共卻對美國持不妥協態度，美國面對綜合國力增強，政治上卻不甘雌服的中共，滿懷戒慎恐懼，於是右翼保守人士在政界、學界、新聞界泡製出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倡議恢復冷戰時期的「遏制」政策。尤其自一九九〇年東歐、蘇聯的共黨政權相繼垮台，倒向西方之後，中共成了美國最不放心的對手，雙方在政治、經濟、軍事問題上屢生摩擦。美國於是又有

意利用台灣這顆棋子來與中共作對。李登輝與民進黨誤以為中共既著力於經濟建設，又面臨鄧小平將逝的接班問題，必不致輕易對台動武，更何況他們認為美國與中共不睦，一旦有事，美國這個總後台大靠山也必將出兵保護台灣。這就是一九九六年之前，李登輝與民進黨何以敢掙中共虎鬚，屢屢向中共「一個中國」政策挑戰的原因。然而，中共在一九九六年的飛彈演習中，向美國、台灣與國際社會明確表示了不惜與美國一戰解決台獨的決心，而國際社會卻未見強烈反應。美國雖有遏制中共之心，眼見中共護士衛權之心堅決不可動搖，歐亞各國又無共同遏制中共之意，美國若與中共正面衝突將得不償失。過去美國之所以處心積慮地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主因之一即不願捲入中國內戰，避免與中共發生全面戰爭。今日在勢單力孤之下，當然更不願冒巨大損失之險，爲了台灣與中共一戰。在評估得失之後，唯有改弦更張，由遏制中共轉而與之積極交往。甫卸任的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弗已公開宣稱，美國不應幻想將美國價值觀加諸中國大陸上，明白表示了這一看法上的轉變。

美國與國際社會對中共態度的轉變主要是由於自七〇年代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生了結構性的巨大變化。

首先是美國經過多年的對外插手干預、參戰、對內實施大政府的社會福利政策，國力耗損過巨，不堪負荷，造成貿易、財政雙赤字與日俱增，連年居高不下。自七〇年代後，國勢已日漸衰落。反之，日本與歐洲的德法等國則在戰後既獲美國經濟援助，軍費負擔又大多轉嫁給美國，經濟因而得以快速

增長。九〇年後，歐洲市場的統合更見成效。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戰後初期的美國霸權（hegemony）轉化成美國、日本、歐洲三足鼎立的爭雄（rivalry）局面。

再者，中共自一九七九年後放棄了毛澤東時期向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挑戰的嘗試，改採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接軌的經濟改革。而蘇聯自戈巴契夫上台後也積極與美國和解，至八〇年代後期冷戰終止，一九九〇年東歐、蘇聯共產政權更相繼垮台，引進資本主義。美國對社會主義遏制的戰略可謂已經大功告成，社會主義國家既紛紛解體，兩大陣營的對峙即不復存在，沒有共同的敵人，原先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也就無從鞏固。

最後是中共的經濟改革，自一九九二年後，加速融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成為整個體系發展最快最大的市場，世界各中心國、半外圍國無不爭相搶食。中共非但不再是毛澤東時期令資本主義國家畏懼的洪水猛獸，中國大陸反而成了各國競相奔赴的投資樂園。各國非但不可能再與美國聯合遏制中共，法國、德國、日本等甚至還可能利用美國與中共交惡，在中國大陸獲得龐大的商機。面對歐洲、日本各中心國家的壟斷資本、跨國公司大舉進軍中國大陸、美國的壟斷資本自然也全力搶進，唯恐喪失先機，在世界市場競爭上落於下風，當然也就不會允許美國政府與中共關係惡化，以致阻擋財路，故而必然要對美國政府施壓，要求改善與中共的關係。美國政府在此新形勢下，若還想重施遏制中國故技，只能是搬石頭砸自己的腳，註定要失敗。

中共在一九七〇年之前，受到美國遏制政策的影響，經濟被封鎖，於是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delink)，實行自力更生政策，因此而自行發展出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在基礎科學上打下深厚的根基，並擁有了一些世界先進的高科技，科技研究發展的潛力十分雄厚。以中國大陸市場的廣大，技術潛力的雄厚，配合充沛的各級人力，多樣的資源，極有可能發展成爲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的一個新的中心國。

反觀台灣，由於企業以中小型的爲主，資金、研發能力都不足，而大型企業也多半缺乏遠大的眼光與氣魄，不肯投資於資金大、風險高的高科技產業，因而產業升級叫喊多年卻成效不彰。前經濟部長趙耀東就曾感慨台灣的企業主大都短視近利，只想賺錢，卻不肯將賺來的錢大筆投資於研究發展（劉玉珍 1995: 107-8）就以台灣列爲高科技明星產業的資訊業與半導體 IC 來說，到今天在技術上仍仰賴歐、美、日等技術大國。IC 業最重要的八項材料中，有七項由日本廠商，一項由德商掌控，技術的基礎研究明顯不足，尙停留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階段，只能在技術先進國後追著跑（楊丁元、陳慧玲 1996: 202-8）。八〇年代後，在技術能力不足，產業升級不易，內部市場狹小，而土地、勞力等各項生產成本節節升高，政府效率又不彰，兼且社會風氣不良，環境、生活品質不佳等各項病症雜陳下，對台灣經濟增長造成極大的傷害，台灣的競爭力正在下降。近年來若非與大陸進行經貿交流，經濟早由中度成長跌爲低度成長，從而引發失業、通貨膨脹等社會經濟難題。尤其，台灣在

政治經濟轉型過程中必然會同時也正在發生利益的重分配。一方面是薪資勞動者會要求分享更多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是資本家們想擴大利潤，而生產力增長卻有限，雙方面的利益衝突會通過政治對抗表現出來。隨著經濟的自由化、國際化，競爭日形激烈，破產、兼併日益增多，貧富差距加大，失業問題也必日益惡化。近年來，在野政黨與民間要求社會福利的呼聲越來越高，政府財政赤字有增無已。一旦產業技術遲遲無法升級，生產力停滯難前，而階級矛盾與人民的就業生活無法有效解決，政權必然發生合法性危機。這在外圍在半外圍資本主義國家屢成嚴重問題（Prebisch 1981）。台灣若不能與中國大陸進行經濟合作善加利用大陸的資源，恐將在競爭力衰退下，跌回外圍地位，難再翻身。

近年來，「台獨」論者經常夸夸其談所謂「台灣主體性」，屢發仇視、醜詆中國（包括歷史、文化）之語。其實從台灣戰後依附於美、日等資本主義中心國家才得以生存來看，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方面，台灣都沒有所謂「主體性」可言。李登輝與「台獨」論者口中所謂的「普遍的文明價值」、「人權」等等，不過是毫無批判思考地照單全收美國販賣的貨色，是一種徹底臣服於美國式價值觀的奴化思維。他們仰望、敬畏美國、日本等中心國家卻蔑視非西方文明，他們無視美國在第三世界國家支持獨裁政權（包括台灣的國民黨）、搞政變、暗殺、販賣毒品支持反共勢力而國內則廣泛存在的種族歧視、階級壓迫。對美國他們充滿了諛頌之詞，對於中共、馬來西亞、乃至新加坡這些敢於批判美國霸權主義的國家，則反唇相譏，指責他們的亞洲價值觀，視美國為文明、人權的「上



「國」，為美國迴護唯恐不及，充滿了奴顏與媚骨。這充分顯現了攀附權貴諂上而欺下的豪奴心態，也很符合客觀上台灣在世界體系中所處的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位置。然而，如前所述，未來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新一輪的競爭中，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正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台灣還能繼續像過去那樣依附著美國、日本而保持地位甚或向中心躍昇嗎？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看不到這個前景。

### 參考書目

#### 中文部分

- 李世傑（1985）《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廖文毅投降始末》，台北：自由時代。
- 彭明敏（1989）《自由的滋味》，台北：李敖出版社。
- （1994）《彭明敏看台灣》，台北：遠流。
- 彭明敏、黃昭堂（1995）《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台北：玉山社。
- 施明德（1988）《施明德的政治遺囑》，台北：前衛。
- 陳隆志（1994）《台灣的獨立與建國》，台北：月旦。

- 蔡同榮（1990）《我要回去》，台北：敦理。
- 蘇新《憤怒的台灣》，台北。（未著出版年月及出版社）
- 李登輝（1995）《經營大台灣》，台北：遠流。
- 李登輝（1996）《經營大台灣》，新刊本，台北：遠流。
- 顧維鈞（1988）《顧維鈞回憶錄》，第七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 （1989a）《顧維鈞回憶錄》，第八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 （1989b）《顧維鈞回憶錄》，第九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 （1990）《顧維鈞回憶錄》，第十一分冊，北京：中華書局。
- 劉進慶（1992）《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中譯本。
- 雷震（1978）《雷震回憶錄》，香港：七十年代。
- （1972）《救亡圖存獻議》，手稿。
- 林克、徐濤、吳旭君（1995）《歷史的真實》，台北：書華。
- 海峽評論雜誌編輯部編（1991）《台灣命運機密檔案》，台北：海峽評論社。
- 李敖審定（1991）《安全局機密文件》，上册，台北：李敖出版社。
- 康綠島（1993）《李國鼎口述歷史》，台北：卓越。

- 張俊宏 (1989) 《台灣的危機與轉機》，台北：自立晚報。
- (1989) 《台灣工商人——「不落日工商帝國」的締造者》，台北：自立晚報。
- 許信良 (1995) 《新興民族》，台北：遠流。
- 史明 (1980) 《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自由時代。
- 王育德《苦悶的台灣》，台北：自由時代。
- 隅谷三喜男、劉進慶、涂昭彥 (1993) 《台灣之經濟——典型NES之成就與問題》，台北：人間。
- 林佳龍 (1989) 〈威權侍從政體下的台灣反對運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二卷第一期。
- 資中筠、何迪編 (1992) 《美台關係四十年 (1949-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
- 楊丁元、陳慧珍 (1996) 《業競天擇——高科技產業生態》，台北：工商時報。
- 劉玉珍 (1995) 《鐵頭風雲——趙耀東傳奇》，台北：聯經。

#### 英文部分

- Acheson, Dean. (1969)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N. Y.:Monthly Review Press.
- Blum, Robert M. (1982) *Drawing the line*. N. Y.:W.W. Norton & Company.

- Chang, Gordon H. (1990)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8-1972*.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mmings, Bruce. (1990)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I*.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Warren I. (1980) *Dean Rusk*. Totowa, New Jersey: Cooper Square Publishers.
- Gaddis, John Lewis. (1982)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pkins, Terence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982) *World-System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 Sage.
- Jacoby, Neil H. (1966) *U.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 Kaplan, Barbara H. ed. (1978) *Social Change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Economy*. Beverly Hill: Sage.
- Prebisch, Raul. (1981) *Capitalismo Periferico*. Me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omics. 中譯本…《外圍資本主義》·北京·商務·1990。
- Rusk, Dean. (1990) *As I Saw I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Schaller, Michael. (1985)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Jap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cker, Nancy Bernkopf. (1994)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Y: Twayne Pub-

Ishers.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Taiwan Roots of the “Two china policy”’. in Richard H. Immerman, (ed.) John

Foster Dulles and the Diplomacy of the Cold Wa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llerstein, I.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Unthinking Social Scien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發表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廿二～廿三日在台北舉行的第一屆「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學術研討會」)



#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

台灣的左翼力量多年來之所以處於渙散狀態，無法凝聚，原因固有多端，但關鍵之一就在於對客觀形勢的認知不同，對台灣的統獨走向爭議尤大。實際上，「台灣往何處去？」的問題若不得解，「台灣左翼往何處去？」的問題，也就沒有著落。若說統獨問題是當前台灣社會無可迴避的主要矛盾，當不為過。自《左翼》創刊以來，圍繞著統獨問題展開了熱烈的爭論，是理有固然的。

爭論的焦點集中在：一、階級與民族的關係；二、對中共的評價與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本文將探討這兩大問題，供各方左翼的朋友參考，期望對釐清一些糾纏不清的觀念有所助益。

階級與民族是絕對對立的嗎？

在左翼的陣營中，長期以來，有一種觀點認為，階級與民族是兩個絕對互斥的對立概念，似乎無產階級只能有超越民族、國家的國際主義，而主張建立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則純屬資產階級的觀點，

爲左翼所不當取。這個論點的主要根據是《共產黨宣言》中的：「工人沒有祖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中許多批判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論述。這樣的觀點是不是真正符合馬克思主義呢？抽象地或形而上學地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然而，從辯證的、具體的、歷史的觀點來看，卻又不然。

且看以下這段話：「全德國宣布爲一個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國」。這段話語出《共產黨在德國的要求》，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於一八四八年二月發表《共產黨宣言》後，同年三月底爲共產主義者同盟所寫的德國革命的政治綱領第一條（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5卷：3，以下簡稱《全集》），綱領之首就印著：「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說：「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27-428，以下簡稱《選集》）再看一段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七日恩格斯致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的話：「德文『Reich』一詞則側重在體現著民族統一（按：黑體字爲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權這一概念；而這種統一是在德國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他們將誓死爲之戰鬥。我們決不（按：黑體字爲原文所有）想把德國推回到一八六六年前以前那種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全集》，第39卷：88）。



這樣看來，在馬克思主義中，階級與民族並不是簡單地截然二分與對立，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與建立獨立而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要求也不必然是衝突的。怎麼解釋這種看似矛盾的立場？

在進一步闡釋之前，先引述恩格斯在〈暴力在歷史中的作用〉的一段論述：

「從中世紀末期以來，歷史就在促使歐洲形成為各個大的民族國家。只有這樣的國家，才是歐洲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正常的政治組織，同時也是建立各民族協調的國際合作的必要先決條件，沒有這種合作，無產階級的統治是不可能存在的。要保障國際和平，首先就必須消除一切可以避免的民族摩擦，每個民族都必須獲得獨立，在自己的家裡當家做主。這樣，隨著商業、農業和工業的發展，從而隨著資產階級社會勢力的增長，民族意識也就到處發揚，被分割、被壓迫的各民族都要求統一和獨立。」（《全集》，第21卷：403-404）

恩格斯的這段話，很扼要地概括了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民族國家與國際主義的關係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在封建制度下分崩離析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力圖統一成一個完整的大國，英、法、俄、奧等大帝國時而相互勾結，時而兵戎相見，不斷重劃歐洲疆界，上演瓜分、併吞弱勢國家的醜劇，而遭受欺凌、壓榨的弱小民族則為爭取民族獨立

奮鬥不懈。整個歐洲陷於複雜的民族糾紛中，民族主義也成了歐洲的主要意識形態。面對這樣的形勢，鼓吹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當然必須妥加處理階級與民族的問題，以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進程。

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看法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一、根據歷史唯物論的觀點，認為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資本主義社會相對於封建社會是進步的，也是社會主義得以滋長成形的母胎。因此，從促進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的角度來說，擺脫地方割劇，廢除封建特權，建立中央集權的統一而強大的民族國家，有利於形成一個具有統一的貨幣、法律、度量衡、關稅、交通運輸的大市場，從而促進工商業、貿易的發展，壯大資產階級，加速資本主義的成熟。而與資產階級構成對立統一體的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發展的過程中，隨資產階級的茁壯而茁壯，社會矛盾也日益加劇，這才為社會革命準備了客觀的物質條件。換句話說，大的民族國家符合資本主義政治與經濟集中的歷史趨勢，因而在一定的階段與範圍內，有其進步意義。只有明白了這一點，才能理解為什麼馬克思與恩格斯會在一八五〇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說：「民主派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目前在德國，實行最嚴格的中央集權制是真正革命黨的任務。」（《選集》，第一卷：390），以及為什麼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為巴黎公社的革命而寫的〈法蘭西內戰〉一文中要特別澄清說：「公社制度被誤認為是企圖用孟德斯鳩

和吉倫特派所夢想的那種許多小邦的聯盟，去代替在各個巨大民族那裡雖然最初是用政治強力造成的，可是目前已經成爲社會生產強大因素的統一。」（《選集》，第一卷：376-377）

正是從歷史發展的角度，馬克思與恩格斯贊同具有明確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生命力因而掌握了歷史主動權的大民族如：德意志、意大利、波蘭、匈牙利等建立強大的民族國家，卻不主張民族不分大小、不論歷史、地理、政治和工業等客觀條件都可追求獨立。故而，反對法國皇帝路易·拿破崙所支持的每個民族（nationality）都應當是自己命運的主宰的「民族原則」。恩格斯指責所謂的「民族原則」不顧歐洲各國皆由核心民族與少數民族組成多民族國家的事實，不考慮小民族在歐洲的重要性與在國際上生存的生命力，是荒謬絕頂的；究其實際，這個口號不過是法、俄爲了併吞波蘭等國領土而泡製出來的騙人把戲（見恩格斯：〈工人階級同波蘭有什麼關係？〉，《全集》，第十六卷：170-183）。

### 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

二、只要有民族壓迫存在，則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革命即難以進行，因爲工人階級必須先在本國內組成一個階級，以本國爲鬥爭的戰場。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一月二十三日的波蘭起義十二周年紀念會

上的講話中指出，歐洲的工人政黨同波蘭的解放是休戚相關的，國際工人協會的第一個綱領就說恢復波蘭是工人政策的目的之一。恩格斯在同日發表的演說〈支持波蘭〉中，進一步闡釋工人政黨同情波蘭的命運的原因時說：「首先，當然是由於對一個被奴役民族的同情，這個民族對奴役他們的人進行了不斷的英勇鬥爭，從而證明了它具有民族獨立和民族自決的歷史權利。國際的工人政黨力求實現波蘭民族的恢復，這根本沒有絲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蘭重新爭得了自己的獨立以後，只有當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運的時候，它的內部發展過程才會重新開始，它才能夠作為一種獨立的力量來促進歐洲的社會改造。當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國侵略者壓迫的時候，它就必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來反對外來的敵人；當它的內部生活因此陷于癱瘓的時候，它是不能為爭取社會解放而鬥爭的。」（《選集》，第二卷：62）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恩格斯致考茨基的信中也說：「……國際合作只有在平等者（按：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之間才有可能。……只要波蘭還被分割，還受壓迫。那末不論是國內的強大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發展，還是德國和其他國家的無產階級同除流亡者以外的任何波蘭人的真正的國際交往的發展，都不可能。每一個波蘭的農民和工人，一旦從自己的閉塞狀態中覺醒起來參加為共同利益進行的鬥爭，首先就會碰到存在民族壓迫的事實，它到處都是他們前進的第一個障礙。排除民族壓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發展的基本條件。……歐洲有兩個民族不僅有權利，而且有義務在成為國際的民族以前成為國家的民族，這就是愛爾蘭

人和波蘭人。他們只有真正成爲國家的民族時，才更能成爲國際的民族」（《選集》，第4卷：428-429）《共產黨宣言》「在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這句話之後，緊接著是：「因爲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爲民族的領導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爲民族，所以它本身暫時還是民族的，雖然這裡所說的『民族的』一詞和資產階級所理解的完全不同。」這句話的確切涵義會引起許多爭議，但由上述的脈絡即可得到真解。馬克思寫於一八七五年的〈哥達綱領批判〉的這段話可爲明證：「爲了能夠進行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在國內組成爲一個階級，而且它的直接鬥爭舞台就是本國，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階級鬥爭不是就內容來說，而是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就形式來說』是本國範圍內的鬥爭。」（《選集》，第3卷：15）

### 從是否有利世界革命區別民族獨立運動

三、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必須從民族獨立客觀上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來決定對民族獨立運動的態度。這裡我們根據與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泛斯拉夫民族主義、波蘭與愛爾蘭民族獨立問題的意見來加以說明。

一八一五年之後，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境內的斯拉夫人鼓吹泛斯拉夫主義，主張分散在俄、奧、

德、土等國的斯拉夫人形成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民族，建立起統一的斯拉夫國家。於是作為十九世紀歐洲封建專制的支柱的俄國成了團結斯拉夫民族的核心。當一八四八年的民主革命（逢虫虫）起於德國、奧地利、匈牙利等國之際，泛斯拉夫主義者積極為俄皇與其庇護下的奧地利王朝效勞，充當壓迫革命民族的反革命的主要工具，鎮壓了歐洲各地的民主革命。恩格斯為此嚴厲譴責泛斯拉夫主義者為了虛幻的『民族獨立』的前途而把民主與革命出賣給了反革命勢力。恩格斯認為，散居在德、奧、匈境內的斯拉夫人由於語言不通、歷史斷裂、經濟落後、政治無力，要想獨立無異痴人說夢，但只要他們能投入歐洲的社會主義革命，則獨立建國或可有希望。（參見：《全集》，第6卷，〈匈牙利的鬥爭〉、〈民主的泛斯拉夫主義〉；第11卷，〈德國和泛斯拉夫主義〉等文）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主導下的第一國際始終堅決支持慘遭多次瓜分的波蘭民族恢復獨立。這除了前述第二點中所提到的原因外，還有從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立場出發的三項理由：

1. 波蘭人一直以全世界革命戰士的身份在美國獨立、法國革命、一八四八年匈牙利、德國和意大利的革命、以及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革命中，無役不與，驍勇善戰，立下了輝煌的汗馬功勞；
2. 一八一五年俄國主導的俄羅斯、普魯士、奧地利三個神聖同盟聯合瓜分了波蘭，普魯士、奧地利也因陷於依附俄國的地位，只有促成波蘭的獨立，打斷這三個反動的軍事專制國家結成的鏈條，德、奧才能徹底擺脫宗法封建的專制政體，從而掃除各民族解放的最大障礙；

3. 波蘭之所以能被瓜分是因波蘭大封建貴族與俄、普、奧勾結。波蘭的小貴族、城市市民與一部分農民因而結成獨立革命的聯盟，同時要求打破封建的土地制度，實行土地民主革命，波蘭的獨立有利於解放農奴制或勞役制的農民變為自由的農民。（見《全集》，第5卷，〈法蘭克福關於波蘭問題的辯論〉；《選集》，第1卷，〈論波蘭問題〉；第2卷〈支持波蘭〉）

對愛爾蘭的問題，馬克思有一段長時期認為可能借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高漲來推翻統治愛爾蘭的制度，但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後，得出了相反的信念：不是在英國，而是只有在愛爾蘭才能給英國統治階級致命的一擊；英國工人階級若不能與統治階級的愛爾蘭政策一刀兩斷，就還得續受英國統治階級的支配；英國工人階級必須支持愛爾蘭的民族獨立，這不是出於對愛爾蘭人的同情，也無關乎抽象的正義或博愛，而是基於英國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因為這是英國社會解放的首要條件；並且由於英國統治了世界市場，是國際資本的大本營，同時英國也是唯一具備社會革命所必需的物質條件的國家，因而加速英國的社會革命就成了全世界工人運動的最重要目標，而加速這一革命的唯一辦法就是使愛爾蘭獨立。（參見《全集》，第32卷：389, 625, 654-657）。

馬克思在一八七〇年的〈總委員會致瑞士羅曼語區聯合委員會〉的通告信中闡釋了愛爾蘭的民族鬥爭和工人階級解放的關係，其要點如下：

1. 愛爾蘭是英國大地主所有制的支柱。如果大地主所有制在愛爾蘭崩潰了，它在英國也必定要崩

潰，這有利於英國的無產階級推動社會革命。愛爾蘭的土地問題攸關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死存亡，故經濟鬥爭都集中在土地所有制上，由於英國土地貴族也就是愛爾蘭的大地主，因此土地問題同時也是民族問題。

2. 由於租地日益集中，愛爾蘭的貧民日增，被迫移民英國，造成英國工人的工資與生活水平下降，英國工人因而憎恨愛爾蘭工人。再者，英國工人自居為統治民族的一份子，加上宗教信仰不同，於是就像美國白種貧民看待黑奴那樣厭惡愛爾蘭工人，愛爾蘭人也同樣地憎惡英國與英國工人。英國資產階級遂刻意煽動無產階級間的這種對立，分裂無產階級，削弱無產階級的力量，從而鞏固了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而在愛爾蘭人大量移民美國後，雙方的對立還越過大西洋，成為美國與英國之間衝突的隱蔽基礎，也使大西洋兩岸的工人無法真誠地聯合，謀求共同的解放。

3. 愛爾蘭是英國政府維持龐大的常備軍的唯一藉口，一有需要，這支軍隊就被用來對付英國工人。（《全集》，第16卷：439-440）

綜而言之，馬克思與恩格斯承認工人階級的民族特性，主張工人階級應先成為本民族領導階級，再在平等的基礎上形成國際的合作。同時，由於資本主義已發展出世界市場，各國的生產、交換是在世界範圍內進行，各國的資產階級也聯合起來對付無產階級，他們不斷呼籲無產階級應剷除民族偏見，警惕民族沙文主義，秉持國際主義的精神，共謀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因此，他們不是根據「自由」、



「平等」、「人道」、「博愛」、「正義」等道德字眼（事實上，他們經常嘲笑巴枯寧、普魯東等人唯心地濫用這些道德詞彙），而是從歷史唯物論與社會主義革命的觀點，把民族問題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判斷其所具有的進步或反動作用，從而決定採取支持或反對的立場。

### 列寧對階級與民族問題的觀點

列寧在階級與民族問題上和馬克思、恩格斯的觀點基本上是同條共貫的。下面幾段話代表了列寧的主要論點：

「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問題上有兩個歷史趨向。第一個趨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運動的覺醒，反對一切民族壓迫的鬥爭，民族國家的建立。第二個趨向是民族之間各種聯系的發展和日益頻繁，民族壁壘的破壞，資本、一般經濟生活、政治、科學等等

的國際統一的形成。……民族原則在資產階級社會中，有歷史的必然性，因此，馬克思主義者完全承認民族運動的歷史合理性。……打倒一切封建壓迫，打倒一切民族壓迫，打倒某一民族或某一語言的一切特權，這是無產階級這個民主力量量的絕對職責，是受民族紛爭蒙蔽和

阻礙的無產階級鬥爭的絕對利益。然而，超出這些嚴格限制在一定歷史範圍的界限去協助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就是背叛無產階級，站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無產階級不能贊同任何鞏固民族主義的作法，相反地，它贊同一切幫助消除民族差別，打破民族壁壘的東西，贊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間的聯繫日益緊密和促使各民族融合的東西。採用其他的作法就是站到反動的民族主義市儈方面去。」

「當然，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聯邦制和分權制的，原因很簡單，資本主義為了自己的發展總是要求有一個盡可能大盡可能集中的國家。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覺悟的無產階級總是堅持建立更大的國家。它總是反對中世紀的部落制，總是歡迎各個大地域在經濟上盡可能達到緊密的團結，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地域上，無產階級才能廣泛地展開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

「資本主義生產力的廣泛而迅速的發展，要求有廣闊的、聯合為國家的統一地域，只有在這樣的地域，資產階級——和它在一起的還有它的死對頭——無產階級才能分別團結起來，消滅一切老舊的、中世紀的、等級的、狹隘地方性的、小民族的、宗教信仰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界限。」（以上見《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關於民族問題的批評意見〉）

可以看出列寧的上述觀點與馬克思、恩格斯並無二致。由于列寧處於列強在全世界瓜分殖民地、各劃勢力範圍的帝國主義時代，各被壓迫的弱小民族紛紛掀起民族獨立的革命怒潮。爲了聯合殖民地與半殖民的被壓迫民族共同對抗帝國主義，推動世界革命，也由于俄羅斯長期實行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壓迫俄國境內的少數民族，列寧比馬克思、恩格斯更強調弱小民族脫離壓迫民族獨立建國的民族自決權。但他只是原則上贊成，卻並不鼓勵實際行使民族自決權。他在〈論民族自決權〉中說：「無產階級……承認各民族平等，承認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國家的平等權利，把各民族無產者之間的聯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從工人的階級鬥爭眼來估計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離。」（《列寧選集》，中文版，第2卷：523）在〈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中，他又說：「民主運動的個別要求，包括自決在內，並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而是世界一般民主主義（現在是一般社會主義）運動中的一小部分。在個別的具體情況下，部分可能和總體相矛盾，那時就必須拋棄這一部分。某一個國家的共和運動可能只是其他國家教權派或財閥君主派進行陰謀的工具，那時我們就不應當支持這個具體的運動，但是，如果根據這點就從國際社會民主黨綱領中拋棄共和國的口號，那就可笑了。」（《列寧選集》，第2卷：863）

很清楚，列寧雖然側重提出了民族自決權，但和馬克思、恩格斯一樣是從歷史唯物論與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觀點，用唯物辯證的方法，把階級與民族的關係放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處理，絕不抽象、

片面地談論階級運動與民族運動。

### 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民族觀點看台灣的統獨左右之爭

在探討完馬克思主義對階級民族問題的觀點後，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上面的論述來評析台灣的統獨左右之爭。

目前對台灣前途的看法，大概可分為五種。除了主張統一的左、右派與主張台獨的左、右派外，還有一種不願把自己歸類為前四種的「未定論」派。這裡所謂的「未定論」不是指右派台獨捨美國主子牙慧所泡製而現在已經過時的「台灣地位未定論」，而是說，對統獨問題不抱明確的立場，端看時局形勢發展而定。這種「未定論」派也可分為標舉「階級優先」的左翼與尊崇自由主義的右翼。台灣的統獨問題是遲早要解決的事，這種「未定論」當然也不可能長期存在，最終還是要滑向統獨兩個立場。

「未定論」派的出現，主要根據有二：一是對「階級」與「民族」的辯證關係認識不清，二是對中國大陸的發展趨勢存有疑慮。

《連結》編輯部的文章集中地表達了左翼的未定論派，也就是「階級優先」論者的觀點。《連結》

的〈台灣「左翼」何去何從？〉對統獨問題提出以下的看法：一、階級的利益是最高的準則，所謂「全民族」的民族的利益皆應服從階級的利益，不應該讓狹隘的民族與國家的界限束縛階級的團結；二、基於民主主義主張人民（？）有民主自決的權利；三、數百年來台灣民衆不斷受到外來統治，加上國民黨專制獨裁的高壓統治，台灣民衆容易產生類似反民族壓迫的情緒，因而台灣人民有自決或獨立的權利。

以上第一點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僅就抽象層面來說，左翼陣營中人應該不會有人反對。《連結》文章主要是針對統一的左派而來，其意若曰統派沒有超越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牢籠，因而未能從純正的左派的階級觀點來看統獨問題。《連結》也表示他們並不贊成台灣民族主義，並指出了台獨運動實質上是美日帝國主義操縱下的產物，但對台獨，尤其是所謂「左翼」的台獨仍抱持一定程度的同情，並支持台獨的「自決論」，其理由是上述的第二、三點。

所謂自決（self-determination）論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勃興後，為解決民族紛爭與國土歸屬而產生的理論。其基本前提是先有民族的存在，才有民族自決問題的產生。《連結》不用「民族」自決而改用模糊的「人民」自決字眼，是迴避了問題的核心。試問此處「人民」意指所指？是指統治階級之外的各種被統治階級，還是也包含了統治階級的所有社會成員？若說「人民」是people的中文翻譯，那麼people的另一涵義即是「民族」。更重要的是存在「台灣民族」嗎？台獨不論是右派或所謂「左派」，數十年來，想方設法，生搬硬套，老想憑空製造出一個「台灣民族」，所可嘆者，迄今猶未竟

其功。在台獨陣營中，對台灣民族是否已經成立？是否需要鼓吹台灣民族？都還爭議不決。而「台灣民族」的內涵，即「台灣人」是什麼？哪些人構成「台灣民族」？從五〇年代至今說法迭經數變，連台灣民族論者自己也還沒有搞清楚，令卯足了勁鼓吹多年的台獨領導者如黃昭堂之流亦感慨不已。（以上所述，可參見黃昭堂 1994）。然則，「民族自決」又從何說起呢？其實，「台灣民族」論不過是台獨爲了抹除台灣民衆傳統的漢民族思想並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以建立對台獨的認同而搞出來的粗製濫造的工具，其呈現矛盾混亂的狀態是理有固然的。

由於無論從人種、語言、宗教、文化等各個方面，台灣都缺乏成爲一個民族的客觀條件，台獨論者便著力於製造歷史神話，企圖以反中國的台獨史觀，建立主觀上的民族認同。也就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所說的：「所有捏造出來的傳統，只要可能，就利用歷史做爲行動的合理根據與凝聚群體的黏合劑。」（Hobsbawm and Ranger eds. 1983:13）台獨史觀右派的代表作是王育德的《苦悶的台灣》，「左派」的代表作是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兩派對台灣民族形成過程的解釋雖不盡相同，但本質上都是主觀唯心論的產物，都是先有獨立的念頭再回過頭去從史料堆中剪裁拼湊，再加以曲解，建構出符合台獨立場的歷史敘述。換句話說，他們不是用「以漢還漢，以唐還唐」的尊重歷史本身的方法，不是從事件據以產生的歷史條件，而是從現今的實際需要來歪曲歷史事實。正如考茨基批判某些政客出於政治動機玩弄歷史時所說的：「第一、他們也許會企圖完全依照

現在的模樣以鑄造「已往」；第二，他們也許會力求依照他們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觀察「已往」。由於兩人都拿台灣史做為政治鬥爭的工具，重以學殖淺陋，缺乏高明的史學與社會科學造詣，書中充斥著荒唐之言與謬悠之論。這裡沒有必要對書中史料諸多的謬誤解釋與自相矛盾之處細加批判，那需要另文專論。只須指出其基本觀點與方法的錯誤即可。

## 台獨史觀的謬誤

台獨史觀的主軸是：台灣是中國的棄地，台灣人是中國的棄民，四百年來，台灣人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新天地渡海移民來台開拓，而自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到國民黨都是外來政權，可憐的台灣人慘遭其嚴酷的殖民統治，一部台灣史就是台灣人從不斷反抗外來殖民政權的鬥爭中逐步形成台灣民族的過程，台獨運動也就是台灣不繼承先民的歷史使命為擺脫台灣的殖民地地位而奮鬥的民族解放運動。聽起來其氣甚為悲壯，但事實上是這樣的嗎？這種論調是典型的以今釋古，也就是上引考茨基所說的「依照他們的目前的政策需要以觀察『已往』」。台獨史觀缺乏的就是史學研究中最基本的「歷史發展」觀點，也就是今天的事物都是歷史與社會發展過程中的產物的觀點。今天台灣漢人的祖先並不是在四百年前台灣島荒榛未闢、瘡痍滿佈之際同時由中國大陸移民過來的，而是由荷蘭、明鄭、清

朝三個時期分階段、分批移民而至。王育德、史明的書中，自己就已提到至荷蘭撤走時，台灣人口不過十萬左右，鄭成功率十幾萬軍民來台，台灣人口才劇增至二十餘萬，且為生聚教訓，恢復中原，又極力墾殖、教化，開發之地遠過於荷蘭時期。說明鄭是外來的殖民政權，對原住民來說可以成立，對漢人尤其是隨明鄭而來的漢人來說，他們本身就是外來的殖民者，而不是被殖民者。漢人大量自大陸移民至台的高潮是在清朝領有台灣版圖之後，至清末割台之時，台灣人口已達二百多萬人，若非台灣屬中國所有豈能讓漢人在二百多年間大批湧入台灣？對於明鄭時期在台灣漢人來說，清朝分批而至的漢人就是外來者，就像今天台灣的外省人相對於台籍人士是外來者一樣。這些清朝時期的外來者，有的是游民、罪犯，有的是經官府批准由豪族大戶招來的佃戶，有的是宗親鄉鄰相互牽引而至的拓墾者，有的是搞貿易、商業的商人。請問在清朝時期誰是殖民者？誰又是被殖民者？

史明喜歡拿清朝時期「台灣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這句話來證明台灣人「反唐山」、反中國的傾向。這只足以證明他缺乏歷史分析的能力，連基本的社會科學知識都不具備。以清朝時期，朱一貴、林爽文、戴潮春發動數十萬民衆的三次大起義來說，無不把矛頭對準代表地主階級的貪官污吏，起義群眾也以貧農、游民為主，舉的政治旗號則是「大明重興」、「遵明制」等反清復明的宗旨。這反的一是封建的階級壓迫，一是異族統治，非但不是「反唐山」、更不是反中國，其重要動力正是台灣獨忙了半天老清除不了，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大漢族主義。而且，朱一貴起義在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



一年）距離台灣歸清設府的康熙二十三（一六八四）不過三十七年，朱一貴的供詞中，寫的籍貫是福建省長泰縣，林爽文到台灣的時間更短，他是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十七歲左右隨父母至台，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就起義了（參考：陳在正、孔立、鄧孔昭等著1986）。以前台獨（當然也包括史明）連到台灣三、四十年的外省人都不承認他們是台灣人而排除在「台灣民族」之外，（近年來，因為台灣島內外的政治形勢出現重大的變化，為了便於推動獨立，台灣開始把所謂認同台灣（應說是認同台獨）的外省人稱為「新住民」，「新台灣」讓他們光榮列入「台灣民族」了），可是寫起歷史來，卻把到台灣沒有多少年又充滿著大漢族思想的朱一貴、林爽文等人奉為台灣人「反唐山」、反中國的先賢先烈了。這只能說明在台獨意識形態的籠罩下，曲解史料，睜眼說瞎話，可以荒唐到什麼程度。

至於「棄民」、「棄地」之論更是荒誕不稽。王育德與史明筆下的「棄民」論，主要依據是明、清兩朝所下的禁海令。明朝時，台灣常為盜賊、倭寇的逋逃藪，清初則是鄭氏父子的反清復明根據地，試問古今中外哪個政權不對敵對勢力實施堵截？國民黨的政權直到八〇年代中期不准台灣居民與大陸有任何接觸，否則以「通匪」論處，自有大刑伺候，照他們二人的邏輯，那就是國民黨視大陸人民為「棄民」，可是國民黨正是以中國正朔自居，企圖重新君臨中國呀！「棄地」論主要指兩件事：一是清康熙帝因為台灣孤懸海外，鞭長難及，原不欲收歸版圖，經施琅勸阻才改變心意。可是，史明與王

育德都不知道，日本奪取台灣之初，遭到台灣人民激烈抵抗，日軍死傷慘重，領軍的北白宮親王也命喪彰化，鎮壓抗日行動所需的軍費劇增。爲了維持在台的殖民統治，每年需一千萬圓，其中七百萬須靠國庫撥款補助。日本國內深感台灣偏遠難治，且管治、開發台灣所費不貲，將造成資本主義仍不甚發達的日本沈重的財政負擔，因而出現「可以一億圓拿台灣賣給外國或中國」之議（見矢內原忠雄1985:9），經擔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力爭，此議遂寢。王育德對日本促成台灣的近代化感恩戴德，卻不知道台灣也差點成了日本的「棄地」。「棄地」說的另一根據是說清廷棄台灣如敝屣，毫不在乎地割給了日本。這更是連基本史料都不讀的胡說八道。自鴉片戰爭後中國屢受帝國主義侵凌，台灣作爲東南半壁的海防要地，戰略地位日形重要，於是有一八八七年的升格建省，清廷更派出洋務運動的大將劉銘傳出任台灣巡撫，在台灣鋪鐵路、架電線、開礦務、清丈田畝，勵精圖治，使台灣成爲全中國推動洋務最先進的省份。台灣地位如此重要，清廷投注心力如此之大，依照常識也可判斷，清廷再昏聩無能，也不可能輕易拱手讓出台灣。對台灣割讓之事，清廷重臣張之洞、劉坤一等人費盡心機想利用列強矛盾也援俄、德、法三國干涉還遼之例，以德、法等國制約日本，圖免割台，由於歐洲列強對台灣興趣不如遼東半島之大，不願出面，清廷迫於無奈才忍痛放棄台灣。而台灣被割，舉國震動，才激發了戊戌變法，變法不成，乃有辛亥革命。王育德不從中國積弱不振方遭喪權割地之恥來看割台一事，卻刻意曲解割台之舉爲「一口氣就答應」、「毫不在乎」（見《苦悶的台灣》，第98

頁），居心之可鄙，於此可見。

無知雖然不是論據，但也不算是罪過。最可鄙的是，指鹿爲馬，刻意曲解史料。一九一五年由余清芳領導得西來庵事件是台灣武裝抗日後期，人數最多也最壯烈的起義。余清芳的檄文上分明寫著：「古今中華主國，四夷臣卿，……豈意日本小邦倭賊……不遵王法藐視中原，侵犯疆土……今我中國南陵，天生明聖之君，英賢之臣……我朝大明，國運初興，本帥奉天，舉義討賊，興兵罰罪，大會四海英雄，攻滅倭賊，……。」這清清楚楚是以中國正朔自居，爲討伐小日本而發動的反日起義。然而，王育德刻意掩蓋余清芳的中國意識，略而不提。史明則更令人齒冷，竟然指稱余清芳「志在推翻日本統治並建設台灣國」（見《台灣人四百年史》，四四二頁）所謂「台獨史觀」就是這樣靠無知與曲解堆砌起來的。

台獨史觀的其他諸多可議之處，包括：什麼叫「殖民地」、「殖民政權」之類的概念，因篇幅已過長，不再評論。台獨史觀成爲台獨的煽動工具，謬種流傳多年，本以爲所誤導者僅爲一部分不具嚴謹的社會科學素養的輕信盲從之徒，未料卻很遺憾地看到矢志追求真理與社會解放的《連結》諸君，竟爾援以爲據，而有同情之語，遂不憚詞費做了稍嫌過長的評析。

《連結》文中提到要顧及「廣大民衆反對外來統治、反對壓迫的素樸願望」和「民衆反壓迫要求的正當性」這明顯指的受台獨影響的群衆。然而，第一，反國民黨的專制壓迫爲什麼就一定要走台獨

路線呢？台灣的民主運動正是受到台獨毒害，而步入了歧途，至今連民進黨自己也深受其苦，弄個台獨黨綱的包袱扛在背上，既不敢廢，又實踐不了，徒然造成兩岸關係緊張。坦白說，民進黨的政客們，若不是因目光短淺、急功近利而自己吃下台獨類固醇，又給群眾猛灌台獨迷幻藥的話，老老實實走反專制的民主道路，早些年就該取得多數支持而順利執政了，陳水扁今天也絕不會弄到不論在內政或兩岸關係上都左支右絀、進退維谷；第二，這些受台獨誤導的群眾有多「廣大」呢？按照這十多年的選票估算，大概充其量不會超過三成，再者，既然，台獨史觀是站不住腳的，那麼爲什麼我們不該加以批判、糾正，再盡量宣揚，讓群眾迷途知返，而要追隨在那並不十分「廣大」的民衆之後，屈從他們的要求呢？而「民主」、「當家作主」與獨立建國又有什麼必然的聯繫呢？這些都是我們不能同意於《連結》諸君的。

台灣的統獨之爭涉及的當然不單是台灣內部的政治經濟問題，也還關涉到對岸的大陸。對「爲什麼要統一？」與「台灣獨立有可能嗎？」的問題，若不深入探討大陸的過去與未來發展趨勢顯然不可能有恰當的答案。以下我們將接著討論大陸的情況。

在台灣的統獨之爭中，中國大陸政治、經濟的發展趨勢一直是個受到關注的焦點，至今也仍是個聚訟未決的問題。李登輝與台獨右派經常拿反共八股的教條來恐嚇台灣民衆，胡說什麼大陸猶爲共產體制，若與大陸統一，台灣人民的財產將遭共產，陷於「共慘」的悲運，以此煽動反對統一的恐懼情

緒。懷有中國民族情感的右翼眼見中共的經濟改革走向市場經濟，私有經濟也蓬勃發展，愈來愈與台灣模式趨同，已逐漸減輕對統一的疑慮。在左翼陣營中，對「中共是否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大陸還是社會主義體制嗎？」也出現了不同的看法，從而造成「統」與「左」的分裂。認為中共未背離社會主義路線的，主張「統」「左」並舉；斷定中共正變質為資產階級政黨的，則力言「左」優先於「統」，不必與強調中華民族主義卻日益偏離社會主義路線的中共同聲相應。《左翼》第四號的《連結》文章代表了後一種觀點，而第八號中汪立峽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台灣問題初探〉則代表了一種立場。

汪立峽支持中共鄧小平路線的論點遭到大陸左派朋友蕭喜東、蘇杰在《左翼》第九號的反駁。雙方的爭議主要是：何謂社會主義？根據何種標準判斷中國大陸的社會性質？中共的「補課論」能不能成立？

蕭喜東在《左翼》第六號與第七號的〈二十年來的對台政策需要檢討〉及第九號的〈回覆汪立峽，兼談「中國特色」〉諸文中，一再提到要以新民主主義革命做為大陸與統一台灣的政策綱領，汪立峽則將新民主主義等同於鄧小平路線所標舉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足見新民主主義是雙方爭論的核心概念。可惜，蕭喜東對「新民主主義」語焉不詳，而汪立峽則誤解「新民主主義」，混淆了「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

## 何謂「新民主主義」

根據毛澤東在一九四〇年一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新民主主義論》，自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後，中國逐漸變成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因此，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分為性質不同的兩個階段。即：第一步，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性質的反帝反封建，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道路；由於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經濟上與政治上異常軟弱，又不願意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與農村的封建地租剝削也有密切聯繫，這就註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無法由資產階級領導，只能靠無產階級聯合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等各革命階級來完成新式的、做為社會主義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的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第二步，經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過渡到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

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什麼必須以新民主主義作為過渡階段？那是因為中國外受帝國主義的欺壓，內受封建主義的束縛，國民黨的官僚資本又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密切結合，導致中國經濟難以發展，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生產力極為落後，不像歐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具備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話說就是：「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

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因此，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下，打破束縛中國經濟發展的枷鎖，解放生產力，創造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條件。其經濟方針即是孫中山所提的「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在具體做法上，(1)沒收封建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實行「耕者有其田」，使農民成爲私有者；(2)沒收國民黨的壟斷資本，掌握國家的經濟命脈；(3)保護民族工商業，促進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總目標則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參見〈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一版，第四卷，第1253-1256頁）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私人資本主義的態度。先引兩段毛澤東的話：「有些人不了解共產黨人爲什麼不怕資本主義，反而在一定的條件下提倡它的發展。我們的回答是這樣簡單：拿資本主義的某種發展去代替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壓迫，不但是一個進步，而且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它不但有利于資產階級，同時也有利于無產階級，或者說更有利于無產階級。現在的中國是多了一個外國的帝國主義和一個本國的封建主義，而不是多了一個本國的資本主義，相反地，我們的資本主義是太少了。……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之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

計的範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於社會的目前發展。」（〈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三卷，第1060-1061頁）

「由於中國經濟現在還處在落後狀態，在革命勝利以後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需要盡可能地利用城鄉私人資本主義的積極性，以利于國民經濟的向前發展。在這個時期內，一切不是于國民經濟有害，而是于國民經濟有利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都應當容許其存在和發展。

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經濟上必要的，但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如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不受限制，任其氾濫的。它將從幾個方面被限制——在活動範圍方面，在稅收政策方面，在市場價格方面，在勞動條件方面。我們要從各方面，按照各地、各業和各個時期的具體情況，對於資本主義採取恰如其份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孫中山的節制資本口號，我們依然必須用和用得著。但是為了整個國民經濟的利益，為了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現在和將來的利益，絕不可以對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限制得大大太死，必須容許他們在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政策和經濟計畫的軌道內有存在和發展的餘地。」（〈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1-1432頁）



可以看出，毛澤東認為，在私人資本主義仍有助於中國經濟發展時，一要保護、利用，二要限制，以避免其過於壯大，具備操縱國民生計的能力。

### 新民主主義經濟的內涵

如前所述，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屬於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新民主社會只是個過渡階段，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仍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運行。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包含了：1. 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2. 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3. 私人資本主義，4. 個體經濟，5. 國家和私人合作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任由市場機制發揮作用，這五種經濟成分顯然都將發生變化，例如：在農民中再出現兩極分化，而私人資本主義也可能由中小資本茁壯為雄厚的大資本，如此等等。因此，如果運用政治、經濟、法律等各種手段，善加引導，則新民主主義經濟可以改造、轉化為社會主義經濟；反之，若政策上失誤也可能倒退為資本主義經濟。

新民主主義經濟正如列寧晚年所實行的『新經濟』政策，都是社會主義經濟因素與資本主義經濟因素並存，兩者處於既聯合又鬥爭的狀態。毛澤東很清醒地看到：「對於私人資本主義採取限制政策，是必然要受到資產階級在各種程度和各種方式上的反抗的。特別是私人企業中的大企業主，即大資本

家。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四卷，第1432頁）因此，毛澤東還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並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後，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對內的節制資本和對外的統制貿易，是這個國家在經濟鬥爭中的兩個基本政策。」（同上，第1433頁）。

欲使新民主主義順利過渡到社會主義，政治上，要有堅強的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經濟上，國家要掌握經濟命脈，在工業、商業、金融、交通各個方面佔據制高點，並取得農民支持，鞏固工農聯盟，否則資產階級不可能輕易就範。中共在五〇年代能快速推動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短短七年內基本完成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理由在此。

討論過『新民主主義』的內涵後，我們回過頭來看汪立峽對『新民主主義』的認知：「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呢？其核心思想不外是：新民主主義重新確立了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發展的目標，而同時它又把社會主義『暫時』描述為從資本主義吸取經濟活力的發展過程的保護者。……是以資本主義來『補充』社會主義，為社會主義的目標服務。」汪立峽接著把『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發展進程表述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半封建（或半資本主義）—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發達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並說：「『新民主主義』作為一種力圖尋找資本主義發展

的『同等物』，使其不僅能滿足社會主義的要求，還同樣能符合本國自主發展（富國強兵的民族解放）的需求，有什麼必然站得住的理由認為它已偏離社會主義而不是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實踐呢？」

從上面的論述可知，汪立峽先是錯把『新民主主義』當成『社會主義』，再把『新民主主義』等同於中共所稱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完全是誤解『新民主主義』所致。

### 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

在中共黨內確實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共過早從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入社會主義。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毛澤東本人多次表示，由於中國的經濟文化還相當落後，即使革命在全國勝利以後，在長時期內（或相當長的時期內），還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發揮其積極性。甚至在一九五三年制定『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時，也還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爲我國國家和社會的唯一的經濟基礎。……要完成這個任務，大約需要經過三個五年計畫，就是大約十五年左右的時間（從一九五三年算起，到一九六七年

基本完成，加上經濟恢復時期的三年，則為十八年，這十八年已過去了四年，那時中國就可以基本上建設成爲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毛澤東 1990: 405-406）孰料，中共的革命氣勢如虹，使億萬勞動人民獲得翻身解放，深獲民心，各項政策的推動，勢如破竹，至一九五六年底即基本完成了社會主義的改造，速度之快，連毛澤東也不太能置信，擔心是否過急過快。不過，毛澤東眼見大批幹部、群眾幹勁十足，認爲民氣可鼓不可泄，還是接著在一九五八年提出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發動「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於是引發了中共黨內多次的路線鬥爭，逐步升級至「文化大革命」而達於頂點。

一九五八年以後的路線鬥爭有複雜的國內與國際因素，此處無法詳論。但核心的問題是：「怎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一窮二白」，又受到強大的帝國主義包圍、封鎖的農業大國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這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沒有現成的答案，蘇聯模式也不可照抄照搬，實踐的經驗可謂極其貧乏，一切只能通過自身的摸索、實踐。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擴大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的認識，必須有一個過程，必須從實踐出發，從沒有經驗到有經驗，從有較少的經驗，到有較多的經驗，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的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至於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

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毛澤東 1999: 300-302）「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為了確立社會主義在中國的不拔之基，為了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而發動的一次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宏大實踐。雖然最終遭到了挫折，但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為人類邁向社會解放的偉業留下了彌足珍貴的遺產。今天我們必須正視的問題是：「文化大革命」何以未竟其功？其失敗的國際因素與國內的政治、經濟、文化因素是什麼？

### 中共黨內的計劃與市場之爭

中共的鄧小平路線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礎上產生的。他們認為，毛澤東晚年脫離了中國的客觀實際狀況，強調保持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急於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因而主張公有制規模愈大愈好，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愈快愈好，並在這樣的思維下，極力限制商品的生產與交換，否定農村中的「三自一包」，希望早日割掉「資本主義尾巴」，結果造成經濟缺乏活力與階級鬥爭擴大化，阻礙了中國的發展。鄧小平路線主張，由於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的階段，商品經濟本不夠發達，

故不宜跨過商品經濟這個不可逾越的階段，過早杜絕商品的生產與流通，因而應該像列寧晚年採取新經濟政策一樣，實行戰略上的退卻，允許多種經濟成份並存，尊重價值規律，充分運用商品生產與市場的功能來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

不過，在反對文革的陣營內部，對於計畫與市場的關係、商品生產與流通的範圍該有多大的問題卻存在著分歧。以陳雲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搞活市場，市場調節，這些只能在計畫許可的範圍以內發揮作用，不能脫離開計畫的指導。」（陳雲（1982:287）這就是把計畫比喻為籠子，市場比喻為鳥的「鳥籠經濟論」。換句話說，陳雲派仍堅持計畫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市場只能作為補充，即所謂「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畫商品經濟」。這個提法在中共十四大以前佔居主流地位。但中共黨內的右派並不滿足於這種小腳放大式的改革，處心積慮擴大市場作用的範圍，力圖打破計畫經濟的框框。計畫與市場的主從之爭，經過多年鏖戰，在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講話之後，市場派躍居上風。一九九二年十月的中共十四大就明確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础性調節作用」，從而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本來，在一九八八年中共闖價格改革關失敗，造成物價飛漲、人民搶購商品的惡性通貨膨脹後，中共即厲行經濟的治理整頓，加以一九八九年又發生「六四」事件，中共黨內即興起一股強烈質疑經濟改革走偏了方向的聲浪，認為再不有所警惕，明確改革是姓「資」還是姓「社」，中國的社會主義

將遭和平演變，導致江山變色，走上資本主義的邪路，其批判的鋒芒即指向鄧小平。鄧小平在深圳、上海等地發表南方講話，提出：「計畫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畫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畫；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3）的論調，正是針對以北京為中心的計畫經濟派的反戈一擊。此論一出，計畫經濟派為之氣悶，自由經濟派則感激涕零，如大旱之逢甘霖（此話絕無誇大，曾任人民大學經濟系主任的著名自由化學者魏杰在自己書中的序言就坦白描述他當時激動落淚的心情）。在鄧小平表示不要搞姓「資」姓「社」的爭論，要解放思想，敢冒風險，大膽地試，大膽地闖的鼓勵之下，大陸隨即掀起一陣大炒股票、房地產的投機熱潮，挪用公款、貪污受賄之風大起，導致一九九三、一九九四年的經濟過熱，幸賴朱鎔基採納了左派經濟學家的意見，刹住了惡性通貨膨脹，才免於經濟崩潰。

### 鄧小平對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本質認識不清

鄧小平所謂「計畫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說法，混淆了資本主義經濟的「計畫」與社會主義經濟的「計畫」的涵義，無論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資

產階級經濟學來說，都是不通之論。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計畫只是對經濟增長、貨幣供給、財政收支等提出總量規劃以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並不直接支配生產、分配、交換與消費，生產要素的流動也交由市場機制決定，資本家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根據利潤最大化原則來組合生產要素以獲取剩餘價值。這種經濟計畫既無法消滅剝削，也不能免除經濟震盪，豈可與馬克思主義的計劃經濟相提並論？一旦以市場作為經濟的運行機制，勞動力也勢必商品化，而勞動力的成為商品，成為創造剩餘價值的源泉，正是馬克思指出的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所謂「公有制」經濟，所謂國有企業也就不足以做為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特徵。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早已指出，資本主義的生產愈來愈社會化後，股份公司大量興起，而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產的領導，開辦規模龐大且需要大量資本的鐵路、郵政、電報等企業，「但是，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愈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愈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係並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恩格斯還譴責說：「自從俾斯麥致力於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一種十足的奴才習氣，直接了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國營是社會主義的，那麼拿破崙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馬恩選集》，第三卷：317-318）



因此，我們可以確鑿無疑地說，中共自十四大確立以市場作為配置資源的機制後，基本上已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沒什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別。所謂國家的宏觀調控，所謂的公有經濟為主體（且不說「集體經濟」相當多數實質上已是私有經濟，而國有經濟也正大量被侵蝕、稀釋中）都不足以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這些話決不是什麼從「本本」出發或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個別論點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而是實事求是，揭示問題本質的論斷。要證明上述論斷的正確性，只要以台灣為例證就夠了。五〇年代中期之前，台灣公營經濟的工業產值都超過私人企業，而石油、水、電、鐵路、公路、鋼鐵、郵政、電信、銀行、肥料、糖、鹽等各種攸關國民生計的企業直到九〇年代初都由官方壟斷，國民黨一手掌握了台灣的經濟命脈，按照鄧小平派的邏輯，台灣戰後數十年來所實行的也跟大陸一樣都是社會主義了。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照這個邏輯再推下去，那麼國民黨今天的下場，也可能就是中共未來的寫照。

鄧小平之所以混淆資本主義的「計劃」與社會主義的「計畫」的區別，又只把計劃與市場當成經濟手段，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自己所承認的：「我讀的書並不多，就是一條，相信毛主席講的實事求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82）。他所謂的實事求是，其實是實用主義、經驗主義。就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鄧小平也就是他那個「貓論」。鄧小平敏於治事，辦事幹練，但終非有深遠洞見之輩。他所謂的計劃與市場並非制度的本質特徵之說，其實是聽信了大陸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胡說，因

無力判斷而遭到了唬弄。毛澤東生前曾感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並多次號召幹部要多讀馬列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經典著作，正是看出了值得憂慮的問題。

鄧小平在南方講話中，語帶情緒地指責那些認為外資多了就是發展了資本主義的人，「連基本常識都沒有」。那我們來看推行新經濟政策的列寧怎麼說吧：「新經濟政策就是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制，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而恢復資本主義。……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租讓合同，把企業租給私人資本家，這些都是直接恢復資本主義，是從新經濟政策的根上萌發出來的。……這是經濟學初級讀本教給我們的最基本的經濟常識」（《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2卷：184-185）看吧！是誰沒有基本常識？

經濟改革的根本問題——誰戰勝誰？

列寧之所以採取新經濟政策是因俄國原是個經濟文化落後、小農佔人口多數的國家，在蘇維埃政權初建之際，更遭到俄國資產級聯合帝國主義列強以武力反撲，三年內戰期間被迫實行「戰時共產主義」，由國家直接組織生產與分配，結果，戰後經濟凋敝，政治不穩，列寧見正面強攻，直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方法不可行，遂實行戰略退卻，改採迂迴包圍，決定推動新經濟政策，希望憑藉國家資本主義作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手段。列寧很清醒地看到，開放了國內貿易市場，引進了外資，就是給資

本主義鋪設了溫床，因此，一再告誡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提出「誰戰勝誰——是資本家還是蘇維埃政權？」的問題，明白指出：「全部問題就在於誰跑在誰的前面？資本家如果先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把共產黨趕走。」但鄧小平則反是，不惜曲解馬克思主義，不願也不敢承認搞了資本主義，一再強調主要是防止「左」，說什麼：「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鄧小平文選》，第三卷：375）。列寧之所以是列寧，而鄧小平只是鄧小平，差別就在這裡！

中共經改的戰略構想相當程度上借鑒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但比列寧走得更遠。中共黨內對要退卻到什麼程度，曾有不同意見，有的主張退回到新民主主義，有的認為中國既然缺乏一個發達的資本主義階段，就算退到資本主義補一堂資本主義的課也無妨。但在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權威在中國大陸仍無法撼動，守住社會主義制度這道防線成為黨內最大共識。於是在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明確表示：「儘管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但是毫無疑問，我國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任何否認這個基本事實的觀點都是錯誤的。」（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 1991：61）但中共從八〇年代初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退到一九八七年十三大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再退到十四大的市場經濟體制，一步一步滑向資本主義，已是

「久假而不歸」了。新民主主義還對私人資本主義加以限制，並逐步引導向社會主義，中共目前則是強調建立所謂公平競爭的市場，讓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優勝劣汰，已遠離了新民主主義不可以道里計。經濟運行機制雖已發生質變，鄧小平派一怕坐實了「走資派」的罪名，二怕引起人心不滿，政治動盪，卻始終不敢拿下「社會主義」的招牌，美其名曰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其實，依中共目前實行的政策若硬要說是社會主義的，那只能說與歐洲社會黨式的社會主義差堪近之，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不甚相干。

中國大陸的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中共十四大後，很沈痛地慨歎：「沒想到資本主義在中國這麼快就復辟了」。確實，曾經震撼了世界，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的中國革命竟然在毛澤東過世後十多年就變了質，走了樣。何以致此，很值得總結經驗，深入探究。這當然會是個浩大而費時費力的工程，追究起來，因素也必然複雜多端，但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中的一段話是個啓人深思的角度：「當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必然消滅、從而也使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必然顛覆的物質條件尚未在歷史進程中、尚未在歷史的『運動』中形成以前，即使無產階級推翻了資產階級統治，它的勝利也只能是暫時的，只能是資產階級革命本身的輔助因素，如一七九四年時就是這樣。所以，法國的恐怖統治所能起的作用，只是通過自己的猛烈錘擊，像施法術一樣把全部封建遺跡從法國地面上掃而光。這樣的事情是怯懦的資產階級在幾十年中也辦不到的。因此，人民的流血犧牲只是給資產

階級掃清了道路。」（《馬恩選集》，第一卷：171）

中共在鄧小平領軍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蛻化變質，腐敗成風，當然為親者所痛，仇者所快。帝國主義與資產階級額手稱慶，喜出望外，為宿怨大敵竟自行繳械不戰而降而雀躍不已，全世界的左翼則或憂心忡忡或憤慨怒責，氣未能平。台灣的左翼在統一問題上出現爭論，毋寧說是正常的。

鄧小平路線的主調是：振興中華、強國富民以實現中華民族的雄心壯志。中共一方面由社會主義向後退卻，一方面則高舉民族主義大旗，這與毛澤東時代合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為一體相較，自然會讓左翼陣營中人產生不滿，甚至質疑中共以發展經濟為名，急於溶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勢必依附於帝國主義，淪為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這種看法在蕭喜東與蘇杰的文章中都有所反映。從主觀上說，鄧小平派欲增強國力，使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用心，大概無庸懷疑，而藉著致富圖強的號召，中共也確實凝聚了一股民氣。比較關鍵的問題是：中共的發展戰略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是否能使中國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殺戮戰場中斬將奪旗，躋身自主的經濟大國之列。

經濟的理論與實踐都表明：曾為殖民地或半殖民的國家，由於外受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控制，內有買辦資產階級與封建勢力，若不驅逐帝國主義，變革社會經濟結構，絕對無法進行自主的資本積累，建立獨立而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很難得地完成了上述任務，成就了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無的偉業。鄧小平路線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了經濟的改革開放。也因此，中國大陸

具備了幾項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缺乏的有利條件：1、有一個強大而組織深入遍佈全國的黨與國家機器。2、有一個第一部類、第二部類乃至國防，部門完整的工業體系，以及能穩定提供糧食、工業原料的農業。3、有一批素質優良的科技隊伍，基礎科學紮實且具備了一部分世界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因此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的競爭力明顯優於許多外圍與半外圍國家，很難以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在戰後的發展經驗直接類比。

中國大陸完全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後，會不會喪失自主權淪為屈從於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依附型資本主義國家呢？這是左翼陣營中許多人關心甚至憂心的問題。對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或半外圍國家能否在世界體系的等級結構中，經過慘烈的國際競爭，由下而上逐步躍升為中心國家，在左翼的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中有不同的看法。阿明（Samir Amin）抱持較悲觀的看法，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則不排除這種可能性（參考：Amin 1976, 1990a; Wallerstein 1979）

### 「脫鉤」（delinking）的真正涵義

阿明對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則推崇備至。多年來，他積極鼓吹處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外圍（periphery）的第三世界不發達國家的生產體系與中心國家脫鉤（delink），以免受制於中

心國家的壟斷資本擴張的運動邏輯，這樣才可望進行以本國為中心的（auto-centric）發展，建成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否則無以擺脫被帝國主義殖民所造成的經濟各部門支離（disarticulation）、生產率不平衡從而依附於中心國家的悲運。阿明的「脫鉤論」（de-linking），正是以毛澤東的路線做為典範的。不過，「自力更生」並不意味閉關自守，斷絕對外貿易。毛澤東時代中國大陸與資本主義世界近乎隔絕的狀態，主要是美國帝國主義企圖扼殺中國社會主義勢力於襁褓之中而實行經濟封鎖所造成的，初非毛澤東所願。阿明也極力澄清，絕不能把他的「脫鉤論」混同於閉關自守的「自給自足」（autarky）。他指出，外圍國家由於自然資源不足，技術落後，也難以製造精密的資本品，不能不從事出口貿易換取外匯，進口短缺的物資與技術，這是迫於無奈的「必要之惡」，只能力求減少負擔而無法避免。阿明再三強調，所謂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意指國家的發展戰略立足於本國的社會生產關係與價值規律。而不根據中心國家所主導的「比較優勢」、國際分工、「世界價格」行事。換句話說，對外交換應服從於本國發展的需要，而不是相反，讓國家發展受制於中心國家資本擴張的要求（以上參見：Amin 1990a：18-19, 62-83, 132-133）。

中國大陸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下，號召億萬勞動人民發揮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實行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的發展戰略才創造出前述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無的優越條件，使中國在飽經百年的帝國主義掠奪與兵連禍結後，從衰病交侵中，淬鍊成精壯結實。因此，中國大陸在鄧小平路線下，重新進入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便具有比一般第三世界國家更強的競爭力。

### 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要件

衆所周知，形式上取得政治獨立的國家，實質上仍可能遭到帝國主義的中心國家以新殖民主義的方式控制其經濟乃至軍事、文化。阿明指出，外圍國家的資產階級就算掌握國家機器，只要還不能控制本地的資本積累過程，就稱不上是真正的民族資本主義國家，其資產階級也就不夠資格稱爲民族資產階級。

阿明進一步闡釋說，所謂「積累的控制」是指本地的資產階級及其國家控制了積累過程的五個必要條件：

- 一、勞動力的再生產。這意味：第一步，國家的政策要確保農業發展能生產足夠多的餘糧，且在價格上能讓資本獲利，第二步，工資消費品的生產量須能同時跟上資本與工資總量的擴張；
- 二、剩餘的集中。這意味：不僅要有國家的金融機構，而且這些金融機構對跨國資本的流動有相對的自主性。這樣才能確保本國引導投資方向的能力；
- 三、為本國產品保留大部分的國內市場，甚至在沒有高關稅或其他保護措施下，也能做到這一點；



並且在世界市場上也有競爭力，至少是特別選定的產品要有競爭力；

四、自然資源。這意味：除了有形式上的所有權，國家要有能力開發或留為貯存。就這點來說，中東產油國並不真正控制了本國的油源，因為，就算它們寧可讓石油保存在地下而不願持有隨時可被剝奪的金融資源，也無法自行「關掉龍頭」；

五、由本國控制技術。這是指，技術不論是本國發明或是進口的，都可以很快地再行複製，不用不斷進口生產設備、製程技術等必要的投入品；

阿明認為，只有控制了這五個社會再生產要件的國家與資產級才可當民族資產階級與國家之名而無愧，而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建立也就等於是「以本國為中心的民族經濟」的形成（Amin 1990a: 10-11）。

照阿明的標準，中國大陸到目前為止大體上符合民族資產階級國家的要件，雖不中亦不遠。阿明近年來認為，中國已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構成多極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極，且成爲亞洲經濟的支柱（參見 Amin 1997）。

中國會不會喪失自主性？

當然，值得關注的是，中國大陸加入 WTO 之後，工業、農業、金融業等各領域會否受到重大衝擊，因而改變了現有的經濟格局，引發社會、政治的動盪，從而削弱其政治、經濟的自主性？這涉及到對中國大陸經濟實力的評估問題。大陸的科技部部长朱麗蘭今年在接受台灣《天下雜誌》專訪時表示：「想後來居上，不靠科技，沒門！」對於大陸集中兩百多個專家在清華大學搞的 CIMS（計算機集成製造系統）示範工程在一九九五年得到美國大學領先獎，朱麗蘭頗為自得地說：「這就說明我們從空白開始，靠自己的力量，同樣可以走到世界的前頭。所以我們整個發展高科技的思想，就叫頂天立地。你得有自己的創新，不是盲目自大說頂整個的天，這不可能，但是在有些方面是可以完全自主，可以從沒有走到前頭去的。」對於加入 WTO，朱麗蘭更底氣十足地說：「我們一點都不害怕，而且在一定的程度上，還有更大的一種推動力，因為我們不想侵犯人家的智產權，同時更大的開放，對保護我們自己的知識產權是有好處，激勵科技人員更突出創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推動力。」（《天下雜誌》，第 231 期，二〇〇〇年八月一日）。

從朱麗蘭的思維可以看出，中國大陸經過前三十年的艱苦奮鬥已打下從無到有的深厚根基，累積

了一些家底，在高科技領域有本錢也有膽子，敢在世界市場上與經濟大國一爭長短。至於實際較量的結果如何，目前還言之過早。「頂天立地」的豪情壯志，若因戰略失當，也可能落得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可悲下場。我們特別重視高科技領域的情況是因為技術的壟斷控制已是帝國主義國家駕馭、榨取發展中國家的主要手段，技術租金成爲壟斷利潤的主要來源。正如阿明所指出的：「有理由認爲，技術的依附將逐漸取代直接的佔有來進行支配。只要壟斷了特定型態的設備的供給，售後服務、零部件的供給、專利，加上所有各式各樣的『善意』，就越來越有可能榨取一家企業的大量剩餘價值，而根本不需要擁有該企業的法定所有權。今天已經可以設想一種工業雖然是本國所有，甚至是公有的完全依附型經濟。」（Anin 1976: 251）換句話說，經濟所有制已不是關鍵所在。只要你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參與國際分工，按照中心國家根據其勞動生產率規定的社會勞動必要時間而決定的世界市場價格，遵循中心國家運用政治、經濟實力規定的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在世界體系內進行競爭，那麼不管你掛的是「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招牌，企業是公有或私有，都會受制於同樣的經濟規律，接受同樣殘酷的考驗。

二十多年來，中共的鄧小平派熱衷於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忙著所謂「與國際接軌」，有心在世界市場上奮力拼搏，冀望榮登爲中心大國。這是場世紀大賭注，對全中國（包括香港、台灣）都會有關鍵性的影響。勝負如何？目前尚難論斷。這主要取決於幾項因素：農業的經營體制與生產效果、

離農以及（或者）離鄉的農民如何安頓？工業結構的調整及民族工業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失業工人的數量與處置方式、金融業的經營體制與效率、經濟結構轉型後的收入分配方式以及政權的穩定性等等。

可以預見，中國大陸走資的勢頭不到走不下去是不會回頭的。這一方面是中共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爲了徹底否定文革，連帶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中不少正確的成份，爲走資本主義道路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國際上自八〇年代後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九〇年代初，東歐、蘇聯共產黨政權相繼垮台，所謂「沒有其他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 TINA 症候群更成了右派振振有詞的藉口。

中國大陸的資產階級學者與中共黨內的官僚資產階級假借改革之名，正在磨刀霍霍合謀將國有資產或凌遲、肢解，或待機與內外資本鯨吞國有企業。中共十五大給股份制開了綠燈後，資產階級學者笑逐顏開，喜孜孜地相互致賀：「私有化的閘門已經啓動了！」加入 WTO 後，大陸新興的資產階級與官僚資產階級將與全世界的資產階級同心協力聯手加速推動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深化，是無可置疑的。面對資本主義的狂瀾滔天而至，中國的左翼在道德的義憤填膺之餘，還應當通過全面的調查研究，做出深刻的政治經濟分析，準確掌握局勢的變動，與受損害的人民同呼吸、共命運，防止中國大陸出現土崩瓦解的危局，更重要的是，結合理論與實踐找出一條可行的社會主義新模式以因應新時期客觀現實的變化。這是一個艱苦繁難的過程，但若不拔荆斬棘以啓山林，則中國的社會主義

不會有前途，全世界的社會主義也不會有出路，中國的左翼實無旁貸。

### 統一的中國經濟圈是大勢所趨

近二十年來，在中共開放大陸市場，港、台資金大量湧入大陸下，港、台、大陸已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經濟圈。這個趨勢在兩岸加入WTO後，會更加快速的進行。由於兩岸在八〇年代之前的發展戰略不同，兩岸在經濟結構上有高度的互補性。大陸在毛澤東時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不以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為指導原則，主要著力於重工業、國防工業與高科技，走的是重積累輕消費的路子。台灣則是加入世界體系的國際分工，按照比較優勢論，充當跨國資本的加工出口基地，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急功近利的結果是，重工業的基礎薄弱，基礎科學與高科技都難望大陸項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潛力。八〇年代後，大陸與東南亞也紛紛效法東亞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勞動力成本本來就低於台灣，加上台灣內部勞工與環保運動風起雲湧，更加重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做為台灣加工出口經濟主幹的中小型企業除了大量外移大陸與東南亞之外，別無生路。九〇年代後，大陸加速了經濟增長，內部市場擴大，高科技產業也開始茁長，而台灣的生產成本有增無已，政治鬥爭在民主化後更形劇烈，整個投資生產環境日形惡化，催化了台灣企業加速外移至積極招商引

資的大陸。而且，此際外移的已不僅是中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大型企業與電子、信息產業也趨之若鶩地往大陸投資設廠。過去，民進黨一再以危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決反對兩岸三通。近來，從總統陳水扁到大批民進黨立委卻大談三通為台灣經濟發展所必需，李登輝限制台商投資大陸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時宜，應早日鬆綁。以前聲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謂國家安全忽焉置諸腦後，不以為意了。這很鮮明地顯示了客觀現實的發展趨勢。綜而言之，統一的中國大市場的形成是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結構性變化的必然結果。

二戰後，中國的分裂是美國利用台灣做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八〇年代前，台灣在美國羽翼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成為美日經濟圈的附庸，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但台灣的依附型經濟並不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八〇年代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變，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轉弱，大陸實行經濟的改革開放，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發生困難，迫使台灣重回中國經濟圈。這些因素使台灣的分離勢力陷於愈來愈不利的處境。

## 台獨已是日暮途窮

衆所周知，台灣要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沒有美國的鼎力支持絕無可能。台獨運動從來不具備獨

立自主的能力，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面對中國大陸強勁的民族主義，美國若公然支持台獨，就必須冒與北京開戰的危險，這非但將危及美國本土，也破壞了美國推動資本全球化與和平演變中國的大戰略，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失之舉。在美國看來，台灣進入中國經濟圈，可與全球資本共同戮力演變中國大陸，有利於使中國早日與美國親善，並可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避免美國捲入戰端，這遠比支持台獨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在美國這樣的戰略構想下也只能俯首聽命。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從總統大選前到僥倖當選後，一再申言，他的兩岸政策會讓美國滿意，即可窺見此中消息。

台灣的漢人無論是血統、語言文化、宗教無不源自中國，而台灣與大陸近百年的兩度分離又無不為帝國主義所造成。台獨在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大肆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這無疑只能製造兩岸人民的仇視對立，尤其為深懷反帝民族意識的大陸人民所無法容忍。台灣要搞獨立，兩岸只有戰爭一途，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是無可迴避的現實。台獨人士經常自說自話什麼兩岸是遠親近鄰，台灣獨立之後，兩岸可以親善友好，成為兄弟之邦，這些純屬自欺欺人的痴人說夢。其實台獨要能成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敦請美國主子出兵打敗中國。不過，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從華盛頓到洛杉磯都可能遭到中國核彈攻擊而死傷慘重，台灣也落得個一片斷壁殘垣。姑不論要美國為台灣建國流血只是天方夜譚，果然成真，請問又對誰有利？從這點來說，台獨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沒什麼獨立自主可言，從而台獨也沒有左右派之別，思維上都是主觀唯心，實踐上

都是帝國主義的奴僕。

最後，我們願再重申本文開首論述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與民族觀點的要旨：根據歷史唯物論，由大的民族國家形成統一的國內大市場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加速社會矛盾的深化，而統一的民族國家是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明乎此，我們才能理解何以馬克思與恩格斯原本鼓吹以由下而上的人民革命促成德國統一，反對普魯士王朝實行由上而下的統一模式，但在俾斯麥完成德國統一後，依然堅決支持德國的統一，絕不同意德國重回分裂、軟弱的狀態。事實上，階級並非存在真空中，而是具體形成於民族與國家之內。抽離了民族與國家來談論階級是沒有意義的。期望台灣的左翼能認清這個事實，正視兩岸統一的趨勢，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盡一份推進之功，那麼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也就會多一分希望。

### 參考書目

Amin, Samir (1976)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90 a) *Delinking: Towards a Polycentric World*. London: Zed Books.



- (1990 b) *Maldevelopment :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 London: Zed Books.
- (1992) *Empire of Chaos*. N. Y: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97)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ondon: Zed Books.
- Hobsbawm, E. and Terence Ranger eds.(1983)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79)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 (1984) *The Politics of the world-ec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馬克思·恩格斯(1956-198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1984-1988)《列寧全集》，中文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列寧選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毛澤東(1991)《毛澤東選集(一—四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90)《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1999)《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陳雲(1982)《陳雲文選(1956-1985)》，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獻研究室(1991)《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育德(未著出版年月)《苦悶的台灣》，台北：自由時代。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自由時代。

施正鋒編(1994)《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

黃昭堂(1994)〈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1985)《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書店。

陳在正 孔立 鄧孔昭等著(1986)《清代台灣史研究》，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原載二〇〇〇年八月、十月的《左翼》第10、11、12號)

# 跳蚤「左派」的滿紙荒唐言

## ——評陳芳明的所謂左翼台灣史觀

「以有限的知識做籠統的表達，是長期存在於台灣知識份子中的惡習。……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陳芳明《書評不是這樣寫的》（一九九二年五月）

「近兩三年來，許多大學生、文學家和其他沒落的青年資產者紛紛湧入黨內。……所有這些先生們都在搞馬克思主義，……關於這種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曾經說過：『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倣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穫的卻是跳蚤。』」——恩格斯：致保·拉法格（一八九〇年八月二十七日）

馬克思主義探討了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人與自然的關係和人與人的社會關係，涉及哲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人類學等廣義的歷史科學，幾乎涵蓋了所有與人有關的知識。用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阿圖塞（L. Althusser）的話來說，馬克思繼希臘人開拓數學大陸、伽利略開拓物理學大陸之後，「以驚人的發現為科學知識和人的自覺實踐開闢了一個新大陸，歷史的大陸（the Continent of History）」（Althusser 1971: 99）。自馬克思開闢了這個歷史的新大陸之後，馬克思主義成了研究人文與社會科學無可迴避的理論體系，而歷史研究尤然。著名的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科（M. Foucault）的這段話可為佐證：「如今，撰寫歷史而不使用直接或間接與馬克思的思想相聯系的一整套概念並且置身於馬克思所界定與描述的思想領域內，那是不可能的事。人們甚至可以自問，做一個歷史學者與做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究竟有什麼區別。」（Foucault 1980: 53）

### 台獨主觀唯心地強暴台灣史料

不過，自馬克思主義問世，一百多年來，即不斷遭到誤解、曲解與誤用、濫用。由於馬克思主義最深刻徹底地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罪惡，揭示了資本主義自我毀滅的必然性，並號召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結束人類社會的私有制，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學者在驚恐不安之餘，或出於淺陋無知或出

於刻意淆亂，曲解馬克思主義不遺餘力，固不待言。就連諸多傾心於馬克思主義的深邃宏富與崇高的道德正義感，而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知識份子也常不免於誤解、誤用馬克思主義。這除了階級根源的因素外，還由於馬克思主義的體大思精，包含了複雜深奧的哲學與社會科學理論，非經艱苦的鑽研探索，無法掌握其精義要旨。雖然馬克思曾明白告誡：「在歷史科學中，專靠一些公式是辦不了什麼事的。」恩格斯也一再警告，歷史唯物主義是研究工作與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教條、公式，切忌把唯物史觀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然而，把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論斷當成套語，一知半解地胡亂套用的現象始終存在，因而浮現了一大批庸俗的、冒牌的所謂「馬克思主義者」。這類被恩格斯痛斥為跳蚤的「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生前即已有之，不過於今為烈。這明顯地表現在史明及其徒子徒孫的所謂台獨「左派」身上。

在台灣，要檢驗一個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台灣史知識的水平，一個很好的判準就是看他有沒有能力洞悉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在一堆馬克思主義術語包裝下的主觀唯心論本質，批判其雜湊、曲解台灣歷史材料，絲毫禁不起嚴格史學檢證所編造出來的所謂左派台獨史觀的神話。史明這部理論貧乏、錯誤與矛盾百出的台灣史神話，可以用恩格斯的一段話給予最恰當的論斷：「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末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版，第四卷：472）唯物論的方法要求，根據客觀

的證據、材料，運用嚴謹的批判性思考，修正主觀成見中的錯誤認識，才能得出符合實際的論斷，而不是相反，把材料、證據五花大綁綑在根據主觀的立場、成見製成的刑床上，以電鋸、刀斧頭動用酷刑，大加砍削，必欲其符合刑床的尺寸而後已。馬克思在《資本論》的第二版跋中說：「研究必須充分地佔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繫。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後，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資本論》，中文版，第一卷：23）。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也指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這些原則不是被應用於自然界和人類歷史，而是從它們中抽象出來的；不是自然界和人類去適應原則，而是原則只有在適合於自然界和歷史的情況下才是正確的。」（《馬克斯·恩格斯選集》，第三卷：74）所謂台獨史觀，不論「左派」或右派，其實都是為台獨的政治目的服務的，沒什麼歷史客觀性可言。西方史學家 Tillinghast 曾說：「過去遭到每一位歷史學者的強姦，即使那些懷著最高貴的意圖的歷史學者也一樣強暴了過去。」此話雖不無過當之處，但用在史明、王育德身上卻是恰如其分，頗為貼切。台獨史觀正是史明、王育德粗暴地強姦台灣史料後虛構出來的怪胎。

史明的忠實信徒陳芳明十餘年來匍匐在史明虛構的台獨史觀的框框裡，汲汲於塑造所謂台灣左翼史觀，極力抨擊「中國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學術的紀律。」還大言不慚地宣稱：「要維護台灣史實的正確性，要保存台灣學術的自尊，左翼史的重建顯然無可拖延。」（陳芳明

1998: 17) 其氣也甚壯，其志也可嘉，只可惜有其志而無其才。台灣歷史在陳芳明這個江湖庸醫手執台獨手術刀肆意切割整形下，變形為一副嘴歪眼斜橫鼻豎眉、面目全非、慘不忍睹的尊容。而不論是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或後殖民主義，任何理論一經過陳芳明那毫無理論思考能力的漿糊腦袋的攪和，也無不扭曲走樣，成為荒誕可笑、失去實質內容的空話、廢話。與陳芳明自我標榜的完全相反，在陳芳明筆下，台灣歷史的正確性非但沒有得到維護，反而橫遭踐踏，台灣學術的自尊不僅沒有獲得保存，簡直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這樣的批評是否過當？沒有！以下我們先展示陳芳明如何誤解、曲解並且誤用、濫用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概念，再揭穿陳芳明的台灣歷史論述在史實與解釋上的錯謬，以證明上述論斷的確鑿無誤。

### 國民政府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嗎？

一九九九年八月，陳芳明在《聯合文學》一七八期上發表了他正在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第一章〈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這篇文章概述了他的理論觀點與全書要旨。文中自稱根據台灣社會的性質，把台灣新文學史的發展劃分為日據的殖民時期（1921-1945）、戰後國民政府再殖民時期（1945-1987）與解嚴後的後殖民時期（1987-）。這明顯是把視國民政府為殖民政權的台獨教條與為

趕時髦而硬搬來的後殖民理論，拼湊在一起的產物，一點也不具備嚴謹的知識內涵。台獨爲了便於脫離中國長期高唱台灣民族自決論，乞求美、日帝國主義在聯合國爲其撐腰。於是便炮製出台獨是殖民地而國民政府是「失去母國的殖民政權」這類譏笑世界的荒誕不經的論調。陳芳明辯稱「一個社會不是屬於殖民統治，可以從國語政策的有否實施得到驗證」（陳芳明 2000a: 161）因爲國民政府實施國語政策，於是得出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的幼稚可笑的結論。吃了過多台獨迷幻藥而神智不清的陳芳明忘了，在國語政策下不准說家鄉話（或曰母語）的不只台籍學生，除了極少數的北京人，所有從大陸來台的三十餘省外省學生（包括新疆、蒙古的少數民族）都不准不說北京國語，如有犯禁者照樣處分、罰款。照陳芳明的邏輯，在台灣的非北京籍外省人子弟，包括浙江籍的蔣介石家族的子弟都被迫不得在學校說母語，因而也都被國民政府殖民了?! 事實上，實行國語政策是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一個要件，除了少數特殊的例外，這已是國際常態，差別只在實施的手段有異而已。這裡先引一段話供陳芳明欣賞：「語言的問題，是會規定民族與其成員的思考形式和世界觀，並關連到民族發展的基本問題。所以，儘早實現合乎獨自的生活與文化之統一語言，可說是台灣人今後的重要任務之一。」說這話的是誰？不是別人，就是陳芳明的啓蒙導師史明（引文見黃昭堂 1994）。看吧！偉大的台獨左派導師史明也要求台灣要有「統一語言」，照陳芳明的邏輯，史明顯然也想殖民台灣了。陳芳明還舉了壟斷式金融資本、監視型的戶籍制度、強制性的民族教育做爲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的依據，徒見其淺



陋。我們只要問德、意、日法西斯政權以及其他國家的獨裁政權，只要力所能及，那個不實施類似的制度？準此以論，它們也都對本國人民「殖民」了？這種論調根本把有著明確內容的社會科學概念，搞成了毫無意義的廢話！

### 不知歷史唯物論為何物

正因陳芳明的文章中充斥著諸多違背社會科學知識甚至常識的荒唐觀點，遂引起陳映真的批判，雙方交戰了數個回合，從論戰的內容來看，雖則戰火熾烈，硝煙四起，卻缺乏實際的交集。主要的原因是，陳芳明雖然自稱：「接觸左翼思想後，我不再迷信史料高於一切，而漸漸注意到史料背後所暗示的歷史條件與社會結構。我開始警覺到，歷史上的政治事件往往可以聯繫到經濟性質與階級因素。這樣的思考，為我的知識訓練帶來新的紀律。」（陳芳明 1998a: 7），但正如本文起首所引錄的陳芳明自己的話：「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從他的思維方式上看，他是既不唯物，也不辯証的。對唯物論與辯証法他連最起碼的知識也沒有，因而對歷史唯物論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對此下文會進一步詳論）。於是，當陳映真指責他不從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也就是不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著眼，依據台灣社會形態的性質做為台灣新文學史分期的標準，並據以分析台灣文

學的內涵時，陳芳明竟然不知陳映真意何所指，可笑地批評陳映真只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而不知列寧的帝國主義論，轉而胡攪瞎纏在「何謂殖民地社會」的問題上。這種對話頗類陳映真提出微積分的演算問題，而陳芳明卻拿加減乘除的算術以對，根本不是同一個層次的爭論。稍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誰不知道什麼叫殖民地？又有誰不知道台灣在日據時期是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社會？關鍵是：這個殖民地社會的「生產方式」是什麼？它的社會生產關係是什麼？也就是它的經濟與階級結構是什麼？在這樣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它的政治鬥爭與意識形態（包括文學的表現）呈現出什麼樣的形式？問題的核心在這裏。然而，陳芳明根本慮不及此，任憑陳映真狠敲猛打，他那冥頑不靈、愚鈍不堪的漿糊腦袋依舊昏昏然、懵懵然，非唯未稍見清醒，仍強不知以為知，耍弄輕佻的痞子腔，曲意迴護他那主觀唯心的台獨史觀，還幼稚地反問：「我正在撰寫的《台灣新文學史》，並不是在探討台灣社會性質的演變史，也不是在追問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史。為什麼進行文學史的回顧，必須字字句句唯『馬』首是瞻？」（陳芳明 2000a: 158）這不由得讓人想起阿圖塞批評五、六十年代法國學院裏的假馬克思主義者的話：「在學院裏，特別是歷史學者、經濟學者，以及大批各式各樣學科的意識形態家（眾所周知，今天的人文科學界每個人都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然而，這些知識份子腦袋裏的馬克思主義觀念十有九成都是錯誤的。」（Althusser 1971: 79）

## 共賞陳芳明的「奇文」

在遭到陳映真連番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痛加批判後，理屈詞窮之餘，陳芳明拋出了〈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聯合文學》，199期）抨擊陳映真依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名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來討論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係，是「死死抱住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甚至指稱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是經濟決定論、機械反映論，早經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進行革命性的修整與擴充」，而陳映真猶奉為信條，是遠遠落後於時代的「歷史的孤兒」、「歷史的棄兒」。然後自鳴得意地說，「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的存在」。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不論是經典馬克思主義或是新馬克思主義）的淺薄無知與主觀唯心論的本質，在這篇文章中徹底暴露無遺。他對陳映真的指控實在太「精彩」了，爲了和大家「疑義相與析，奇文共欣賞」，以下大幅引用陳芳明的原文以令其自暴其醜：

「當年，我也迷信過陳映真在現階段所奉爲神明的陳腔濫調語言：『不同的生產方式，因其相應的、不同的社會生產關係，形成不同的經濟基礎，從而有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也就是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意識形態體系。』這種教條的、僵化的思考方式，早已偏離了唯物的軌道，而帶有濃厚的

唯心傾向。陳映真照搬這些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無怪乎他回到中國去演講時，被他筆下形容的「我國」的大學生譏諷為「比老幹部還老幹部」。

……這裏可能是有一些不禮貌，但又不能不提的一個問題，試問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形成？他的馬克思主義思考，究竟是由現階段的中國生產方式來決定，還是由台灣的生產方式來決定？如果是由前者決定，為什麼中國大學生會說他是「老幹部」；如果是由後者決定，為什麼台灣大學生會稱他是「黃昏老人」？

台灣統派語言的疲態，極其精確而典型地由陳映真表現出來。他的思考方式，不僅悖離了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與當前的台灣社會全然脫節。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他雖然是自稱為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內容在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卻是找不到相應的經濟基礎。包括中國領導人江澤民、朱鎔基在內，北京城裏已經找不到真正的、唯物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們不僅向西方資本主義靠攏，而且還高舉「改革開放」的旗幟，恬然向台灣的資本家招手討好。陳映真口口聲聲的「我國社會科學界」，早已整編到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之中。他們的思考才是真正唯物的，真正由中國社會的存在所決定。這樣看來，在北京的整個中國社會科學院裏，恐怕只剩下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歷史孤兒，一個徹底唯心的偽唯物論者。對於他的尷尬處境，我不能不寄以「一種令人同情的哀痛」。

爲什麼說他是一位歷史的孤兒？理由至爲明顯，正統馬克思主義已經是一個歷史名詞。那樣規規矩矩地背誦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在中國社會，甚至放言世界的左派思考中，已經不再存在陳映真式的模範信徒。不要說陳映真文中提到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即使是稍早的馬庫色（Herbert Marcuse）及其法蘭克福學派，以及更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對庸俗的、機械反映論的老馬進行了革命性的修正與擴充。人類歷史已經跨越了二十世紀末，陳映真的思考卻仍選擇停留在十九世紀末。珍惜這種世紀末的世紀末思維的陳映真，可能不只是歷史的孤兒，恐怕還是歷史的棄兒。

……他死死抱住庸俗的馬克思主義，只不過為了證明他的左派精神之不滅。這裏不厭其煩地說明陳映真之變成歷史孤兒，乃是為了指出他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並不是甚麼科學知識態度。他頑強的拒絕面對客觀現實，而自囚於他馬克思主義的空中閣樓之中，恰恰証明了人們的意識是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的。這裏揭露他的思考與他所賴以生存的社會發生嚴重的脫節，並非是在拆穿他的洋相；恰恰相反，通過這樣的說明，乃在於協助陳映真釐清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樂於協助他，只不過是要提醒陳映真，馬克思的名言並沒有那麼神聖而偉大。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不同的生產方式會形成相應的、不同的上層建築。但是，也有許多具體的証據足以說明，人們的意識也能決定社會的存在。

陳映真的思考方式，便是極其科學的證明這個命題是可以成立的。我與陳映真之間的對話，在思考方式上足足相差了一百年。不過，遙望著十九世紀末期的陳映真，我仍然願意耐心地與他討論台灣文學的問題。這位可敬可畏的馬克思老爺，誠然需要一些協助。

……在他的經濟決定論裏，並沒有看到人的主體之存在，並沒有看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的事實，更看不到人的心理結構，以及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

看完陳芳明這一大段洋洋自得、自命先進、意氣高昂的妙文，只要稍微認真研讀過歷史唯物論的人鮮有不忍不住嘔飯的。是誰的思考還停留在十九世紀末呢？恰恰就是陳芳明自己。陳芳明根本不知道他所謂的馬克思是經濟決定論與機械反映論，把經濟看成唯一的決定性因素，沒有注意到包括意識形態因素在內的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些指控非但了無新意，而且通通是十九世紀九〇年代早已出爐的陳舊不堪的破爛貨。陳芳明恬不知恥地表示樂於「協助陳映真釐清他自己的思考方式」，我看，還是讓我們來幫助他清理清理他那雜草叢生、堆滿陳年垃圾的腦袋瓜子吧！

## 恩格斯澄清馬克思主義不是唯經濟決定論

十九世紀的九〇年代，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勢力茁壯，馬克思主義也日益風行，成了時髦的理論。大批大學生、文學家加入社會民主黨，把歷史唯物論當成公式、套語，庸俗化爲唯經濟決定論，自我標榜爲「馬克思主義者」，在報紙、雜誌上大唱革命的高調，因而引起恩格斯的不滿，本文起首引錄的恩格斯話語，即起因於此。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學者也歪曲唯物史觀，硬說馬克思主張經濟是歷史發展中唯一的決定因素。例如：一八九〇年，德國資產階級哲學家保爾·巴爾特（Ernest Emile Paul Barth 1858-1922）在他爲申請萊比錫大學的教授職位而寫的《黑格爾和包括馬克思及哈特曼在內的黑格爾派的歷史哲學》中，就用了二十頁的篇幅駁斥唯物史觀。巴爾特曲解馬克思的理論爲唯經濟決定論，他雖然承認經濟在個別情況下起決定作用，但思想、政治等因素在其他情況下也同樣決定社會的發展，而政治、法律、宗教、哲學有其本身的發展規律，並不完全遵循經濟基礎決定的法則，陳芳明的論調與此類似，但還沒有巴爾特全面。

針對黨內外對唯物史觀的曲解與濫用，恩格斯對歷史唯物論做了一系列深刻的闡述。釐清了諸多混亂的觀點。對於黨內亂套唯物史觀公式的「青年派」，恩格斯指責說：「對德國的許多青年作家來

說，『唯物主義的』這個詞只是個套語，他們把這個套語當作標籤貼到各種事物上去，就以為問題已經解決了。但是我們的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並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方法。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但是，許多年輕的德國人卻不是這樣，他們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經濟史還處在襁褓之中呢！）儘速構成體系，於是就自以為非常了不起了……。在依附於黨的青年文學家中間，是很少有人下一番功夫去鑽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475-76）對於歪曲歷史唯物論為唯經濟決定論的調論，恩格斯駁斥說：「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得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這裏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而在這種交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



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即這樣一些事務，它們的內部聯系是如何疏遠或者是如此難以確定，以致我們可以忘掉這種聯系，認為這種聯系並不存在）向前發展。否則把理論應用於任何歷史時期，就會比解一個最簡單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了。」（同上，477）

### 陳芳明思想水平還滯留在十九世紀末

以上引述的歷史唯物論要旨其實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常識。然而，陳芳明硬是連這樣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常識都不具備，停留在十九世末，撿拾早已過時的陳腔爛調，強把「經濟決定論」的帽子栽到馬克思頭上。陳芳明嘲諷陳映真只讀了《馬恩選集》，可是他連《馬恩選集》都沒好好讀，或說沒有讀懂，還大言不慚要「協助陳映真釐清思考方式」呢！恩格斯譴責巴爾特的話，可以原封不動，非常準確地用在陳芳明身上：

「巴爾特對馬克思的批評，真是荒唐可笑。他首先臆造一種歷史發展的唯物主義理論，說什麼這應當是馬克思的理論，繼而發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根本不是這麼回事。但他並未由此得出結論：他，巴爾特，把某些不正確的東西強加給了馬克思，相反的，卻得出結論說，

馬克思自相矛盾，不會運用自己的理論！『咳，這些人那怕是能讀懂也好啊！』——遇到這類批評時，馬克思是這樣感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8卷·124）

馬克思地下有知，看到不長進的陳芳明，時隔一百多年還在重覆巴爾特之流的錯誤，想必也要再感嘆一次：「咳，這些人哪怕是能讀懂也好啊！」一百多年來，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十有八九都是肇因於沒有讀懂，這類例子車載斗量，陳芳明不過是又做了一次不光彩的表演罷了。

陳芳明對馬克思主義的可笑的歪曲不僅止於此，更荒唐的滑稽戲還在後頭。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序言中，把唯物史觀做了扼要簡明的概括：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係，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並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恩格斯

這段話已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名論，凡是論述唯物史觀者，無不以此為主要依據，陳映真當然也不例外，他在〈關於台灣「社會性質」的進一步討論——答陳芳明先生〉（《聯合文學》，第一九一期）中，根據這段話的要旨批評陳芳明未從台灣的社會經濟結構著眼來論述台灣新文學的發展。然而，陳芳明竟然指稱馬克思的上述論斷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還以一副覺今是而昨非的先進姿態說他已不再「迷信這種陳腔濫調語言」，指控陳映真猶「奉為神明」，是「教條的、僵化的思考方式，早已偏離了唯物軌道，而帶有濃厚的唯心傾向」。其實，他那裡會「迷信」過，他只是「迷糊」，從一開始就「迷糊」，而且「迷糊」至今猶未清醒。這些對馬克思與陳映真的批評，最明白不過地暴露了他對歷史唯物論驚人的無知。陳芳明是怎麼理解「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這個唯物史觀的基本命題的呢？且看下面分解。

陳芳明先是不無得色地質問，生存在資本主義的台灣與面對正在資本主義化的中國大陸，「陳映真的意識形態（按：指陳映真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是由怎樣的「社會存在來決定？又是由怎樣的『生產方式』來形成？」進而嘲諷道：

「台灣統派語言的疲態，極其精確而典型地由陳映真表現出來。他的思考方式，不僅悖離了當今的中國社會，同時也與當前的台灣社會全然脫節。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他雖然是自稱為唯物論者，他的思想內容在台灣社會與中國社會卻是找不到相應的經濟基礎。」

接著陳芳明道出了他自命唯物卻極端主觀唯心的本質，抨擊陳映真：「他再三強調『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並不是甚麼科學知識態度。他頑強的拒絕面對客觀現實，而自囚於他馬克思主義的空中間樓之中，恰恰證明了人們的意識是可以決定社會存在的。」

### 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

這些幼稚的言論充分顯示了陳芳明的不學與低劣的理論思考能力。馬克思為何提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所謂「社會存在」、「社會意識形式」是什麼意思？這完全超乎陳芳明的知識與理解能力。正因為他根本不知道歷史唯物論的立論基礎與形成背景，也就不可能理解「社會存在」論的內涵，從而混淆了「社會意識」或「社會意識形式」與「個人意識」（即個人的思想與立場）的區別

，這才對陳映真提出了上述荒謬可笑的質疑，得出了他主觀唯心的結論。

阿圖塞之所以推崇馬克思爲人類的科學知識和自覺實踐開關了一個「歷史的新大陸」，就在於馬克思和恩格斯推翻了主導人類思想數千年之久的唯心史觀，首度確立以人的物質生產活動爲基礎的世界觀，使人們對人類歷史發展的認識有了正確的立足點，爲人類研究歷史與探索未來的方向提供了一把鑰匙。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5-1846 年間，爲了批判德國「青年黑格爾派」的唯心哲學與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樹立指導無產階級從事社會革命的世界觀，兩人合寫了《德意志意識形態》。在這部著作中，詳細闡述了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論證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社會意識的命題。該書序言開宗明義就說：

「人們迄今為止總是爲自己造出關於自己本身、關於自己是何物或應當成爲何物的種種虛假觀念。他們按照自己關於神、關於模範人等等觀念來建立自己的關係。他們頭腦的產物就統治他們。他們這些創造者就屈從於自己的創造物。我們要把他們從幻想、觀念、教條和想像的存在物中解放出來，使他們不再在這些東西的枷鎖下呻吟喘息。我們要起來反抗這種思想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15）。

馬克思與恩格斯把人們從唯心史觀的枷鎖下解放出來的方法就是從人的現實生活出發，指出：「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同時這也是人們僅僅為了能夠生活就必須每日每時都要進行的（現在也和幾千年前一樣）一種歷史活動，即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32）

在確立了這個唯物的歷史前提後，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闡釋了人的存在與意識的關係：

「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關係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制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

30）

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就踢倒了唯心論的神龕，把被唯心論者搞得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又具有創造並統治現實世界的神威的觀念、思想，從虛無縹緲中押回到活生生的現實基礎上：

「德國哲學從天下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裡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想像的、所設想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只存在於口頭上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像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我們還可以揭示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回聲的發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態，以及與它們相應的意識形式便失去獨立性的外觀，……那些發展著自己的物質生產和物質交往的人們，在改變自己的這個現實的同時也改變著自己的思維和思維的產物。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30-31）

在上面這些引文裡，所謂的「意識」都是指道德、宗教、哲學、法學等指導、規範人的思想與行為的「社會意識」，而「存在」、「生活」指的都是「社會存在」即：人在勞動生產過程中結合成的社會生產關係，也就是社會的階級關係與經濟結構，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說：「人是

最名副其實的社會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87）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又說：「語言和意識一樣，只是由於需要，由於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因而，意識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同上，第一卷：35）這表明人的生存、生產與意識形態都離不開社會。

### 主觀意識與客觀結構

爲什麼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相反？首先，歷史唯物論揭示了：人爲了生存就必須通過社會分工進行生產，以勞動改造自然界的物質使之成爲人類所需要的產品，然後再分配、交換、消費勞動產品以維持生計，這些經濟活動構成了人類社會賴以存在的現實基礎。在維持溫飽之餘，人才可能從事政治、宗教、哲學和藝術等活動。再者，在哲學的認識論上，唯物論主張物質是第一性的，精神、意識是第二性的，意識反映外在的客觀世界，構成意識的內容。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並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資本論》第一卷：24）但這裡必須強調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是辯證唯物論而不是機械唯物論。意識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絕不是機械的反映關係，也不是絕對對立的，而是既對立統一，又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馬克思在《黑



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9）就表明了理論與實踐、精神與物質可以相互轉化的辯證關係。馬克思在1845年寫的《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要鉤玄地闡述了歷史唯物論的要旨，第一條就表示：

「前此一切唯物主義（包括費爾巴哈的在內）的主要缺點都在於對對象、現實界，即感性世界，只以對象的形狀或直觀得來的形狀去理解，而不是把對象作為人的具體的活動或實踐去理解，即不是從主體方面去理解。因此，活動的方面不是由唯物主義反而是由唯心主義抽象地闡明了，——唯心主義當然不知道實在的具體活動本身。費爾巴哈所想要的是和思想對象實在不同的感覺對象，但是他不把人的活動本身當作對象方面的活動來理解。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質』裡只把認識活動當作真正的人的活動，而把實踐只理解和固定為猶太人的那種卑鄙的表現方式。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或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此處根據朱光潛改譯的譯文，見《美學拾穗集》：73，天津：百花文藝，1980）

馬克思在這裡第一次提出實踐的觀點，批判了前此的機械唯物論不知道客觀對象也是人的實踐活

動的產物，只以靜態、直觀的方式觀察、反映外在的客觀世界，忽視了人的實踐的主觀能動性，結果卻由不知實踐為何物的唯心論者片面而抽象地闡述了人的主觀能動性。

馬克思通過實踐的觀點，克服了西方哲學中主體與客體分裂以及認識與實踐分離的二元對立，在本體論與認識論上完成了主客體的統一。歷史唯物論表明，人用有意識、有目的的實踐活動，既改造了世界，也深化了對世界的認識，同時還增強了本身的能力，而客觀世界經過人的實踐改造即由舊貌換新顏，成爲人必須重新面對與認識的客觀實在。不過，馬克思的實踐觀點與片面強調人的主觀意志的唯心論者有根本的區別。馬克思主義始終把外部客觀世界的結構視爲實踐活動的限制條件，認爲只有充分研究客觀世界，掌握其運動規律後，順勢而爲，才可能達到預定的目的，否則，不但費力多而收功少，還會經常事與願違，遭到失敗的命運。

陳芳明根本不了解這些歷史唯物論的要旨，搞不清楚何謂「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胡說什麼「陳映真的左派語言，恰恰與他引用的馬克思『社會存在論』與『生產方式論』發生了可笑的矛盾衝突。」還不自知淺陋地下了「人們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這個荒誕不經的結論。如前所述，歷史唯物論的「社會存在」是指人的社會生產關係所形成的階級與經濟結構，它決定的是作爲上層建築的政治、法律制度及與之相適應的宗教、道德、政治思想、法學、藝術等社會意識形式，而不是個人的思想、立場。個人的思想、立場固然主要受本身階級的影響，但也可能因這樣那樣的因素改變立場，

背棄本身的階級。饒是如此，主觀立場的變化並不可能改變客觀的階級規定。一個工人可能或因受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蒙蔽或被資本家收買而背叛工人階級，在階級鬥爭中支持資本家，成了工賊、勞工貴族，但他絕不可能因此就成了資本家。陳芳明所謂「人的意識可以決定社會存在」，才真是可笑的謬論，只足以說明他的無知妄言與主觀唯心的思考方式。

陳芳明的主觀唯心論還顯地表現在他批評陳映真的這段話：

「在他的經濟決定論裡，並沒有看到人的主體之存在，並沒有看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互滲透的事實，更看不到人的心理結構，以及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

所謂「人本身就是自己的歷史之創造者」，這種論調與古希臘詭辯學派的普羅泰哥拉所說的：「人是萬物的尺度」一樣，片面強調了主體的作用。十九世紀末，俄國的民粹派也同樣高唱此調，遭到了列寧的嚴詞批駁。其實，馬克思在1851年—1852年3月間寫成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早就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603）這又再一次證明陳芳明的不學與淺陋，陳芳明批評陳映真是「一個徹底唯心的偽唯物論者」，其實是他自己的自畫像。

## 東西「輝映」的兩隻「馬克思主義」跳蚤

走筆至此，對陳芳明這個自我標榜為「左翼」的跳蚤，真有夫復何言之感！看來，還是拿陳芳明自己神氣十足地責罵別人的話回敬給他自己最為恰當：

「以有限的知識做籠統的表達，是長期存在於台灣知識份子中的惡習……最基本的黑格爾、馬克思經典，他也不甚了然。」

話又說回來，陳芳明雖然高聲叫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但先是他的導師史明拿著這個命題當公式，主觀唯心地硬套在台灣歷史上，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地曲解台灣史料，以證明台灣社會歷時四百年已發展成與中國大陸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從而為所謂「台灣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陳芳明學舌於史明，多年來一點也不花腦筋地照抄照搬史明的台獨史觀，直至發表在《聯合文學》上引起陳映真批判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依然不改。謂予不信，請看陳芳明的原文：

「在日本殖民體制的支配之下，不僅使台灣與中國之間的政經文化連繫產生嚴重的斷裂，也使島上住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受到徹底的改造。原是屬於以農業經濟為基礎的傳統封建社會，在殖民政策的

影響下，急劇轉化成爲以工業經濟爲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台灣社會的傳統漢文思考，也正是受到整個大環境營造的改變而逐漸式微，而終至沒落。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知識的崛起，以及資本主義的擴張與再擴張。就是由於這種新世紀的到來，台灣新文學才開始孕育釀造。」

且不論其所言與事實之不符，這段論述所表達的，不正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嗎？陳芳明一方面自己還在以此爲立論依據，一方面卻又標榜自己已經「覺悟」，不再「迷信」這「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豈不怪哉？這只有兩種可能，或是他壓根兒不知道他從史明那搬來的論點源自「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論；要不就是，他缺乏最起碼的知識真誠，純粹爲了攻擊陳映真而故作違心之論。

陳芳明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何以糟到如此不堪問問的地步？我們大概不好說他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這種最基本的典籍都不會讀過。但可以確定的是，即使讀了，「他也不甚了然」。何以故？我們不妨探究一下，以爲後來者戒。

阿圖塞在1969年爲法文版的《資本論》第一卷寫了一篇序言，指導讀者閱讀的方法。他提到理解《資本論》有兩種困難。第一種肇因於受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控制；第二種則由於缺乏理論修養。其實，這兩種困難豈僅閱讀《資本論》時會碰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經典著作時都無法避免。

陳芳明正是既未徹底擺脫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又不曾潛心鑽研哲學、政治經濟學，甚至連本行的

史學方法訓練也沒搞好，以這樣的浮薄之徒要想弄懂體大思精的馬克思主義，當然是戛戛乎其難如上青天了。

恩格斯在1890年10月27日寫信給康·施米特痛斥曲解唯物史觀為唯經濟決定論並且當做公式隨處濫加套用的社會民主黨「青年派」作家保爾·恩斯特（Paul Ernst）時說：

「這個人具有如此豐富的想像力，以致不把別人的話讀成相反的意思，就連一行也讀不下去，這樣的人可以把自己的想像力用於其他方面，而不能用於社會主義這個非幻想的方面。

讓他去寫小說、劇本、文藝評論和諸如此類的東西：這樣他只會損害資產階級教育，從而對我們有利。……這個反對派所表現出來的一大堆幼稚的胡說八道和絕對愚蠢的東西是我任何

時候任何地方都沒有遇到過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491）

恩格斯這番重話，火氣旺得可以聞出焦味，多麼像在描述陳芳明啊！陳芳明與恩斯特一東一西、一今一古，時隔百餘年，卻又何其相似，相互「輝映」成趣。康有為有言：「東海有聖人出，西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看到陳芳明與恩斯特這對絕配，康有為的話可以改為：「東方有蠢人出，西方有蠢人出，此心同，此理同。」

慘遭陳芳明歪曲、濫用的何止馬克思主義理論一家，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也一樣不能倖免。接著我們來看看陳芳明的漿糊腦袋是怎麼胡亂攪和這些理論的。

1980年代後期，台灣這塊美國的經濟、文化殖民地，經過知識界的文化買辦之手，開始進口在美國宗主國大行其道的文化商品——「後現代主義」。不旋踵，台灣的知識文化界也就以學步摹倣來的拙劣舞姿，紛紛大跳起「後現代」來。一些「後現代」的術語、概念被半生不熟地大量使用於學術圈與傳播媒體。但陳芳明直到90年代初尚未跟上這股風潮，猶懵然於後現代主義的基本理論概念。

### 為台獨意識形態服務的《謝雪紅評傳》

爲了宣傳台獨史觀，陳芳明自稱費四年之功撰述了《謝雪紅評傳》，於一九九一年七月出版。這部洋洋七百多頁充斥著錯誤的敘述與荒謬的解釋的政治宣傳品，旁徵博引了數百種史料，狀似嚴謹覈實，實際上是陳芳明在史明的台獨教條導引下，用他那沒有學精的十九世紀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派科學實證史學與粗陋的馬克思主義概念加工製造的劣等貨，甫出版即被淺薄的台獨知識份子濫加吹捧爲所謂「劃時代的貢獻」、「劃時代的創舉」（對此後文會有進一步的批判）。陳芳明在《謝雪紅評傳》的後記中自我標榜：「這本書的撰寫，在於釐清長期以來統治者所加諸於謝雪紅身

上的扭曲形象。我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主要是爲了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1991b: 712）但1992年4月路況在《中國論壇》第379期發表〈歷史意識與歷史造像運動〉的書評，運用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的詮釋學與後現代理論指出陳芳明標榜「要尋找謝雪紅的原型」、「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其實，是爲了替台獨意識形態服務，而「將謝雪紅塑造爲台灣民族的史詩英雄」：

「《謝》書自始就是一部『時效性』的歷史書寫，它針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革命法統』加『文化道統』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提出了另一套『民族解放建國史詩』。於是，『謝雪紅』這個名字從塵封的檔案與沈埋湮沒的禁錮記憶中挖掘出來，重新洗雪擦亮，搖身一變爲解放台灣人民的『聖女貞德』，召喚著一個新民族新國家的誕生。此一『時效性歷史』的現代史詩企圖才是《謝》書真正的旨趣所在，至於其史料的蒐羅舉證是否客觀翔實，行文修辭是否時而流於煽情誇飾，則猶其餘事也。

其實，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原就是相應於資本主義理性化過程的一種集體化的『激情形式』（passional form），無論是官方說法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或是《謝》書的『民族解放建國史詩』，要之皆為相應於同一個台灣資本主義國家模型的兩套民族激情形式。前者歷經四十年的文化霸權優勢，終於在解嚴以來解咒除魅的狂飆洪流中日趨式微沒落。後者乘



勢崛起，企圖取而代之，在資本主義『解除疆界』的運動中，以『本土現實』為圖騰符碼進行『再疆界化』的掙扎努力，召喚台灣社會大眾重新凝聚為一個新民族的歷史主體，一個重寫國家命運的『命運共同體』。在這『集體主體化』的非常運作中，當然有其意識形態糾結的歷史系譜與社會現實脈絡，然而最有趣也最耐人尋味的，卻是它所訴求的『激情的與活生生的形式』。這『激情的形式』不是別的，就是《謝》書所揭櫫的『歷史造像運動』。

## 不知「後現代」為何物

路況雖然誤用了加達默爾 effective history 的概念（路況譯為「時效性歷史」）（註1），但這些評論可謂道出了《謝雪紅評傳》的實質。不過，一來路況把《謝雪紅評傳》的「民族解放建國史詩」與國民黨的「反共復國神聖史詩」等量齊觀，顯示了台獨史觀並不比國民黨政府的中華民族主義史觀更「科學」、「客觀」、高明，都同樣是有意識形態建構的產物。這對多年來不斷指控「統治者刻意擦拭與惡意歪曲」台灣歷史，嘵嘵不休地叫嚷要根據「史實」，「建立以一個台灣社會為主體的史觀」的陳芳明來說，自然是極為難堪的事。再者，路況以「癡候」閱讀法寫書評，文中又多方徵引了加達

默爾與福柯、德勒茲 (Gilles Deleuze)、李歐塔 (Jean-Francois Lyotard) 等人的後現代主義觀點，不知詮釋學與後現代理論為何物的陳芳明讀來如墜五里霧中，根本看不懂路況的批判何所據而云然。陳芳明不先虛心補課搞懂對手的觀點，卻惱羞成怒寫了貽笑大方的《書評不是這樣寫的》一文，以台灣學術紀律檢察官的姿態，指責路況「嚴重觸犯了書評撰述的大忌」，「學識淵博」，卻非常不誠實，甚至是非常反智的」，還提出「尊重知識的基本條件，是專業與敬業」。這篇反駁文章就像他與陳映真的論戰，都是在感覺到對手的批評直接刺中本身要害，卻又無力理解對手的論旨之下，出於心理自衛機制的反射式攻擊行動，徒見其不自量而已。

眼見美國、台灣的學術文化界（特別是文學領域）後現代、後殖民的術語到處流竄，陳芳明這幾年也不甘落後，要弄起後現代、後殖民的詞彙。然而，由於既缺乏嚴格的思考訓練，也無哲學、社會科學的紮實功底，一如他的曲解、誤用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理論在他筆下也同樣荒腔走板，大失原旨。

陳芳明是怎麼理解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的呢？在《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中他說：

「解嚴後表現在文學上的後殖民現象，最重要的莫過於各種大敘述之遭到挑戰，以及各種歷史記憶的紛紛重建。大敘述 (grand narrative) 指的是文學上習以為常的、雄偉的審美觀

念與品味。在中華民族主義當道的年代，文學的審美都是以地大物博的中原觀念為中心。這種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為基調。具體言之，大敘述的美學，不免是一種文化上的霸權論述。文化霸權之所以能夠蔓延橫行，乃是拜賜於威權式的戒嚴體制之存在。在霸權的支配下，整個台灣社會必須一律接受單元式的、壟斷式的美學觀念。這種一致性的要求，使得個別的、差異的、弱勢的審美受到強烈的壓制。

然而，緊跟著戒嚴體制的崩解，大敘述的美學也很快就引起作家的普遍質疑。」（陳芳明 1999）

前已述及，陳芳明秉持主觀唯心的台獨教條任意把國民政府在台灣的戒嚴體制定性為殖民統治，於是解嚴後的台灣進入了後殖民時期，解嚴後的台灣文學也就成了所謂的後殖民文學。這種純粹為了政治教條服務的分期標準，明眼人一看即知其嚴重違背客觀現實，自不待言。可笑的是，陳芳明為了替他的台獨教條找理論依據，援引了近年來在國際學術界頗為時髦的後殖民理論，以壯聲勢。然而，頭腦不清又不肯用心的陳芳明，以他一貫望文生義、想當然爾的思考方式，在曲解馬克思主義之後，又胡扯起他根本沒有搞懂的後殖民與後現代理論了。陳芳明在這段引文中把後現代理論的「大敘述」（grand narrative）概念解釋成：「文學上習以為常的、雄偉的審美觀念與品味」，並說在台灣「這種

審美是以中華沙文主義、漢人沙文主義、男性沙文主義、異性戀沙文主義為基調」，接著又把「大敘述」混同於西方馬克思主義先驅葛蘭西（Gramsci）首創的「文化霸權」（hegemony）概念，思想混亂與無知妄議的程度，真足令人驚詫。

何謂「大敘述」？

陳芳明見到「大敘述」（grand narrative）的大（grand），不用心細究其理論內涵，就拿出他寫詩的想像力把它想像成是「雄偉」，然後直接附會到他所痛惡的中華民族主義上。其實，所謂「大敘述」根本與「雄偉」毫不相干，更與民族主義無涉。在後現代理論中，「大敘述」與「主導敘述」（master narrative）、「本源敘述」（metanarrative）是同義詞，都是指號稱「放諸四海皆準、俟諸百世不惑」，統攝科學、道德哲學、美學等所有學問於一體，且聲稱人類正朝向自由、進步解放目標前進，但又未經經驗證實的理論體系。後現代理論的內容紛繁多姿，各主要理論家的論點也不盡相同，但大多質疑十八世紀啓蒙運動所標舉的理性、自由、進步、解放的觀念，右批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自由主義，左打社會主義（特別是史大林主義），認為兩者都繼承了啓蒙運動的遺產，把人當作理性的主體，自居為世界的「中心」，並藉由突出科學、理性的「大敘述」，支配人類的思想，壓制了其他非

科學、理性所能規範的知識、欲望、情感等領域。後現代理論認為啓蒙運動的「現代精神」(modernism)，猶尊理性、科學，強調總體性(totality)，造成了思想上的恐怖專政，也為政治上的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奠定了合法的基礎，於是「解放」的口號反而成了鎮壓的枷鎖，為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脫困之道就是批判「現代精神」，超越啓蒙運動，打破理性的獨裁，開發出百家爭鳴、異議之花遍地開放的生動活潑的局面。

這裡且舉後現代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李歐塔的說法以見一斑：

「我以『現代』一詞來指稱運用本源論述(metadiscourse)為本身正當化的科學，這種本源論述明白地訴諸像：精神辨證法、意義詮釋學、理性或勞動主體的解放、或者財富的創造這類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用最簡單的話來說，我所說的『後現代』就是對本源敘事(metanarratives)的質疑。」(Lyotard 1984: XXIII-XXIV)

李歐塔在《解釋後現代》一書中又說：

「『後現代的問題』越是在國際上展開討論，就越顯得複雜起來。1979年寫作《後現代

狀況》時，為了簡化起見，我把『後現代問題』與『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連繫起來。

在《後現代狀況》中，我論及的『本源敘事』（metanarratives）是指現代特性（modern-ity）的標誌：理性與自由的不斷前進解放、勞動的進一步解放或災難性解放（資本主義異化的價值的源泉）、以資本主義技術科學的進步使全人類富裕、甚至——若把與古代的古典主義對立的基督教本身包括在現代特性中的話——以靈魂皈依基督為愛世人而殉身的故事來獲得救贖等等，黑格爾的哲學統攝了所有這些敘事，並且，就此而論，它本身就是玄想的現代特性的凝結。」（Lyotard 1993: 17-18）

我們對照李歐塔對「大敘事」的闡述與陳芳明純粹憑著望文生義而來的曲解，就可看出其荒唐可笑的程度，真可謂中外古今罕有其匹。

### 不知「後殖民」為何物

再看陳芳明在《後現代或後殖民》一文中的一段話：

「後現代主義在於解構中央集權式的、歐洲文化理體中心（logocentrism）的敘述，而後殖民主義

則在瓦解中心／邊緣雙元帝國殖民論述（Appiah/119-24）」（陳芳明 2000c (1998) : 55）

這段話陳芳明標示說是引述 Appiah 收在 Bill Ashcroft、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主編的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中的論文。但通讀 Appiah 的全文卻看不到陳芳明引文中的任何一個字。原來，陳芳明把 217 頁上的編者引言誤植為 Appiah 的論述。頁碼引錯事小，連作者也張冠李戴，那就證明了他知識上的詐偽。陳芳明經常指責別人不遵守學術紀律，屢次高喊要維護台灣的學術紀律與尊嚴，然而，他自己不但違犯學術紀律的次數遠高於一般人，所違犯者還皆為不可饒恕的錯誤，丟盡了台灣學術的臉（如果他寫的東西還算是『學術』的話）。

不僅此也，陳芳明扯進後殖民理論以為台獨教條張目之際，卻不認真搞懂後殖民理論（話又說回來，台獨本身就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他若真的了解後殖民理論就不敢胡亂套用後殖民理論為台獨教條撐腰了）。他在《後現代或後殖民》中說：「所謂後殖民主義（postcolonialism）的『後』，並非指殖民地經驗結束以後，而是指殖民地社會與殖民統治者接觸的那一個時刻就開始發生了。對於殖民體制的存在，殖民地作家無不採積極的抗爭（如批判），或消極的抵抗（如流亡、放逐）。因此，這裡的『後』（post），強烈具備了抗拒的性格。」（同上）這段話沒有註明來源，但其實也主要抄自 Ashcroft 等人所編文集的編者引言。該書編者是這麼說的：

「我們所界定的『後殖民』並不是指『獨立後』(post-independence)或『殖民主義之後』(after colonialism)，因為這樣一來就會誤以為殖民過程已經結束。實則從殖民統治一開始就產生了後殖民主義。後殖民論述實乃與殖民主義俱生的對立物。就此而論，後殖民的寫作有一段很長的歷史。」(Ashcroft et al, eds. 1995: 117)

Ashcroft 等人這段話的涵義是說，後殖民主義不是個按年代分期的概念，而是與殖民主義對抗的產物，所以「後殖民」不是指殖民統治之後的歷史階段，因而也沒有「後殖民時期」之說。自1970年代晚期興起的後殖民理論旨在批判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對殖民地人民思想、心靈的宰制，造成被殖民者的奴化人格。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並未隨殖民統治的結束而告完結，迄今仍以新殖民主義的方式支配著形式上獲得獨立的前殖民地，因而後殖民理論竭力清理殖民主義的遺毒，力圖重新確立前殖民地人民思想、心靈的主體性，以擺脫奴性，自覺地對抗帝國主義的支配。對於後殖民理論的「後」(post)字該作何解釋，在後殖民理論中迭有爭議，有人認為，「後」字是指殖民地獨立以後的時期，但 Ashcroft 等人不同意這樣的觀點。陳芳明既引用 Ashcroft 等人的解釋做為立論依據，卻又同時自相矛盾地指稱「1987年解嚴以後應該可以定義為後殖民時期」(陳芳明 2000c [1998]: 55)。這就跟陳芳明一方面用馬克思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做為詮釋台灣歷史的基礎，另一方面又自打嘴巴地大



肆批評那是「老掉牙的、落伍的馬克思語言」一樣，根本沒有搞清楚自己匍匐而吞的理論觀點的確切含義，稀裡糊塗地亂讀，也稀裡糊塗地濫用，這無不彰彰明甚地顯示陳芳明思想的混亂與理論思考能力的薄弱。

### 後殖民與後現代的後結構主義來源

以下我們再來看看陳芳明是怎麼談所謂的「後殖民文學」與「後現代文學」的：

「後殖民文學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作家已自覺到要避免開權力中心的操控。這種去中心（decentering）的傾向，與後現代主義的去中心有異曲同工之處。因此，有人常常把解嚴後的台灣文學的多元化現象，解釋為後現代狀況（postmodern condition）。不過，這裡必須辨明的是後殖民與後現代之間有一很大的分野，乃在於前者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r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而後者則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de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以這個觀點來檢驗解嚴後文學蓬勃的盛況，當可發現那是屬於後殖民文學特徵，而非後現代文學的精

神。」（陳芳明 1999）

陳芳明的這些話表明他對後殖民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了解是極其膚淺的。後殖民與後現代固然有所差異，但兩者的關係密切，都反對中心的霸權壓制或抹煞處於邊緣的異口（others），主張讓被中心貶低為卑賤、反「常規」者發出自己的聲音，確立本身的地位。這些共通的觀點不是陳芳明所謂的「異曲同工」，而是系出同源，都受惠於後結構主義理論家福科、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福科與德希達繼承了德國哲學家尼采、海德格爾對西方以笛卡爾思想為代表的人本主義（humanism）的批判。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哲學觀把人視為理性的主體，具有認識並控制外在客體的能力，這就突出了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人成了自然的主人，一切事物都淪為人的俘虜，由人的理性構成的知識成為無堅不摧、所向披靡的巨大權力，不論是外在於人的客體或內在於人的欲望、感情都成了受到人的理性壓制的「異己」，不得不向人的理性俯首稱臣。西方資產階級的啓蒙運動高舉理性、自由的大纛，發展了科學技術，造成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突飛猛進，對非資本主義地區大肆擴張掠奪，理性、科學、自由也就隨之席捲天下、包舉宇內躍居為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精神」，被尊為至高無上的「真理」，凡不符合理性、科學、自由精神者即是「不成熟」、「未開化」、「落後」、「野蠻」、「反常」。此所以著名的後殖民主義理論家史碧法克（Gayatri Spivak）會指控：「帝國主義的主體

與人本主義的主體兩者關係密切。」尼采與海德格爾不滿於理性的專制，不願萬事萬物都沈淪在理性的淫威下輾轉呻吟，任由理性的計算宰制，於是大肆抨擊人本主義，強調人的主體性與理性是站不住腳的形而上學，指出人的主體與理性有其非理性的根源，理性主導一切只能使人類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尼采更強調沒有所謂絕對、客觀的真理，每一種不同的觀點都可言之成理，所謂「事實」也須靠人的詮釋才得以成立，如此等等。

德希達的解構理論深受尼采與海德格爾的影響，在理性／非理性、中心／邊緣、西方／非西方、男／女等等二元對立的關係中，指出兩者的相互依存並力圖顛覆前者對後者的支配地位。在《白色神話學：哲學文本中的隱喻》一文中，他指出西方白種人奉理性的形而上學為普世最高權威，指控非西方、非理性者為非法，其實是種族中心論的帝國主義行徑。海德格爾痛斥笛卡爾的人類中心觀視外在於人的物為「異己」，漠視其存在的價值，濫加宰制。福柯承其遺緒也極力撻伐笛卡爾式的理性主體錯誤地把罪犯、瘋子、外國人、同性戀者、女人都視為「異己」加以壓制、排斥。福柯推崇尼采反啓蒙理性的精神，否定人可以根據某種中心、本質掌握真理的總體理論，認為這將掩蓋人類社會的複雜多樣，壓制差異，形成思想的專制，因而主張解消主體、放逐本質、挖掉所謂「真理」的本源基礎，倡導運用局部分析的方法分析社會不同層面的事物，讓分殊各異的觀點、立場百花齊放，綻放異彩。康德曾在《什麼是啓蒙運動？》一文中說，啓蒙運動的意義在於人類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性從而擺脫了

不成熟狀態 (Kant 1991: 54)。福科抨擊這種觀點把本是歐洲文明在特定歷史時期發展出來的啓蒙理性普遍化爲人類的本性，抹煞了人類的異質性 (Rabinow ed. 1984: 32-50)。福柯還根據尼采的「權力意志」論，提出權力生產知識而知識也鞏固權力的觀點，並指出西方的殖民主義正是利用知識與理性達成了對非西方世界的經濟支配與政治霸權。

德希達、福柯上述反理性至上、反中心、反總體性理論、反本質論、反客觀的絕對真理，強調異質、多元、邊緣的看法，既成了後現代理論的主要論點，也給後殖民理論諸多啓發。此所以後殖民論者如 Linda Hutcheon, Bill Ashcroft 等人常說後現代與後殖民兩者緊密相連，有頗多重合 (overlap) 之處。

### 後殖民的主體觀

當然，後殖民主義並不同於後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片面否定宏大敘事、普遍性、主體性，帶有濃厚的懷疑論、相對論甚至虛無主義的傾向。這自然與強調政治意義、汲汲於確立本身的主體意識以對抗帝國主義支配的後殖民論者有所扞格。但這種區別也不是簡單如陳芳明所說的後殖民「側重強調主體性的重建」而後現代「傾向於強調主體性的解構」，或者「後現代主義的最終目標是在於主體

的解構，而後殖民主義則在追求主體的重構」（陳芳明 2000c [1998]: 56）兩者在主體性問題上除了差異之外還有重合：後殖民論者與後現代論者一樣反對身份認同的本質論。後殖民論的代表人物如：薩伊德（Said）、史碧法克、巴巴（Homi K. Bhabha）等人都同意後結構／後現代「反本質論的這一觀點：人的主體、身份不是先驗、固定的，而是人為建構起來的，不存在純粹、不變的民族與文化本質。因此，他們反對爲了對抗帝國主義而大肆宣揚本土本質特徵的本土論（nativism），指責建立在本質論上的「身份認同的政治觀」（identity politics），封閉了主體、身份朝向開放、包容的可能性，只強化僵固的身份認同觀，結果等於是重複了壓迫者二元對立的邏輯，並沒有超越支配者而開出一條更高明、可取的新路。因此薩伊德步武反殖民的先驅法農（F. Fanon）之後，提出了「開明的後民族主義」（enlightened postnationalism）提倡超民族的國際團結，巴巴也強調文化交融的混血（hybridity）論。許多後殖民論者也指出，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其實是相互滲透、相互轉化的，被殖民者中也存在著與殖民者的共謀勾結，二者並不是單純的對抗關係，僅只突出殖民與反殖民的對立面，不免失之片面、膚淺。這些視野都超出陳芳明所理解的後殖民主義。多年來，陳芳明陷在台獨教條的框框裡，只會用本省／外省，如「歷史的整體性，基本上就是一種歷史結構。……這種結構性的觀察，又必須放在本省、外省兩條路線的脈絡裡，才能看得清楚。」（陳芳明 1992: 80）、台灣意識／中國意識、台灣人／中國人的對立這類粗糙而又站不住腳的台灣人本質論去強暴台灣史料、歪曲台灣文學的內涵。以這種簡

陋淺薄的思考方式去看後殖民主義，根本無法掌握其精義，是理有固然的。

陳芳明不僅對後現代、後殖民的主體觀不甚了然。對後現代的歷史觀更無半點認識，胡扯什麼「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後殖民主義者則非常重視歷史記憶的再建構」。後現代主義者那裡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李歐塔在批評有人把後現代主義的「後」字解釋成繼現代之後的一段新時期時說：

「這種按年代序列的線性觀念本身就完全是『現代的』。它既是基督教、笛卡爾也是雅克賓精神（Jacobinism）的一部份：既然我們啟動了全新的某種事物，時鐘的指針就必須撥回到零點。正是現代特性（modernity）這個觀念與這個原則密切相關：與傳統決裂再設置煥然一新的生活與思考方式，既是可能的又是必要的。

我們懷疑這種『決裂』事實上是忘懷或壓抑過去的一種方式，也就是，重蹈覆轍而非超越前進。」（Lyotard 1993: 76）

這裡完全沒有不在意歷史記憶的意思。不僅李歐塔沒有忽視歷史，福科也以歷史學家自居，致力於重建被中心排斥的邊緣論述的被遺忘的歷史。後現代的主要理論家反對中心霸權壓制處於邊緣的弱

勢者，鼓勵被壓迫者發出異議，重建本身的地位與尊嚴，故而也支持婦女、少數民族、勞工、同性戀者等被壓制者向支配者爭奪歷史解釋權，以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著名的後殖民學者 Hutecheon 就指出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都共同關切歷史與邊緣問題（Hutecheon: 1989）。

後現代史學的特點是立基於德希達的「文本之外無他物」與福柯的「權力知識」論，質疑實證史學所謂的歷史「客觀性」，強調史料只是客觀存在的「過去」的遺痕（Trace），而非「過去」本身，史家撰寫歷史都是從當代的現實出發，根據特定的意識形態，著眼於特定的利益，為權力鬥爭而服務的。因而，沒有純粹「客觀」的歷史，也不可能重建真正完整的「過去」本身，所有撰述出來的歷史都受到史家具有的價值觀與所處的社會脈絡影響，歷史就是不同利益集團為爭奪正統解釋權的權力鬥爭的戰場（參考：Jenkins 1991）。這根本沒有什麼「不在意歷史記憶的重建」的問題。

陳芳明之所以一意要否定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後現代現象，代之以後殖民文學，仍然是主觀唯心的思考作祟，硬要把解嚴後台灣文學塞進他根據台獨教條劃分的後殖民時期裡，卻徒然暴露了他對後現代與後殖民理論的淺薄無知。以下我們接著看陳芳明是怎麼幹那削足適履的勾當的：

「……曾經被權力邊緣化的弱勢聲音，在戒嚴時期所形成的挑戰格局是相當多元化的。

中國大敘述的文學開始遭逢台灣意識文學的挑戰。然而，台灣意識文學不免帶大敘述的色彩

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不免受到同志作家的質疑。這說明了後戒嚴時期的後殖民文學之所以特別精采的原因。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都同時並存的現象，正好反證了在殖民時期與再殖民時期台灣社會的創造心靈是受到何等嚴重的戕害的。潛藏在社會內部的文學思考能量一旦獲得釋放以後，就再也不能使用過去的審美標準當做僅有的尺碼。所有的文學作品，都應該分別放在族群、階級、性別的脈中來驗證。

每一族群，每一個階級，每一種性別取向，都有各自的思維方式與歷史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日據的殖民時期與戰後的再殖民時期，主體似乎只有一個，那就是以統治者的意志做為唯一的審美標準。在單一標準的檢驗下，社會內部的不同價值、欲望、思考都完全受到忽視。但是，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給多樣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陳芳明 1999）

「因為戒嚴的殖民體制，其權力中心乃是由漢人／中原心態／男性優勢／儒家思想所凝鑄而成，它不能容忍背離這種權力核心的任何思考方式……。

我把後解嚴時期定義為後殖民時期，就在於強調殖民式的戒嚴體制終於抵擋不住整個社會會力量的挑戰。所謂後殖民，是文化上的一種去殖民（decolonization）的行動。它旨在檢討舊



體制在既有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同時也在重新建立屬於自我主體的文化內容，解嚴後的台灣文學，便是在這樣的情境下次第展開。台灣意識文學的崛起，在於批判傲慢的中原沙文主義。女性意識文學的大量產生，則在於挑戰既有的男性沙文主義。眷村文學的出現，則是出自對台灣意識過於激化的畏懼與戒心，原住民文學的營造，則是在抗拒漢人沙文主義。同志文學的釀造，則在抵制異性戀中心思考的泛濫。」（陳芳明 2000a）

## 胡亂攪和後現代文學與後殖民文學

陳芳明在上面極盡牽強附會之能事地把台灣意識文學、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各種不同性質的文學，不分青紅皂白全裝進了「後殖民文學」的籬筐裡。陳芳明這種歸類之荒謬是顯而易見的。後殖民主義的對立面是殖民主義，而女性主義的對立面是男性沙文主義，原住民的對立面是漢族沙文主義，外省籍作家的眷村文學的對立面是台獨法西斯而同性戀的對立面是異性戀中心論，各有不同的矛盾對立性質，不同的對抗對象。按照陳芳明自己的說法，「後殖民文學」是對抗殖民主義重構被殖民者主體的文學，又是殖民時期之後的文學。但男性沙文主義是自母系社會崩解、

父權社會確立後，不論中外都存在了幾千年的事實，與殖民主義毫不相干，全世界（包括台灣）女性主義及其文學的發展也都早於後殖民理論。異性戀中心則是幾千年來中外皆然的思想，何關乎殖民與後殖民？陳芳明又說「台灣意識不免帶有大敘述的色彩時，也終於受到原住民作家與女性意識作家的挑戰。同樣的，當女性意識作家開始出現異性戀中心的傾向時，也不免受到同志作家的質疑。……在族群問題方面，漢人沙文主義事實上還相當程度地瀰漫於知識份子之間。……外省作家或眷村作家的作品，常常必須受到『本土』尺碼的檢驗。」（陳芳明 1999）。據此而論，那麼女性文學、原住民文學、眷村文學、同志文學如果可以被歸類為「後殖民文學」那就是因為它們分別對抗台獨法西斯的台灣（漢人、男性沙文主義）意識與異性戀中心的殖民壓迫以樹立自己的主體性了。然而，陳芳明的後殖民史觀矛頭所向明明白白地是國民政府的戒嚴體制與中華民族主義，在這裡這些「後殖民文學」所抵抗的對象（殖民主義）卻忽焉轉換成了台灣意識與異性戀中心論了。我們一再指斥陳芳明思想混亂，滿腦袋漿糊，在此可以再度證明陳芳明不但沒有能力掌握馬克思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的要旨，他連前後一致、連貫完整地表述自己觀點的本事也付諸闕如。

陳芳明在上述引文中還說「不同的族群記憶，或階級記憶，或性別記憶，那都分別是一個主體。……在後殖民時期，威權體制已不再像過去那樣鞏固，劃一的、全盤性的美學也逐漸讓位於多樣性的、局部的、瑣碎的美學。」多樣、局部、瑣碎（應該說是相對於總體的片斷、裂片〔fragmentation〕）

這些都是後現代理論反對現代總體性理論而塑造的用語，而強調差異、異質、多元與邊緣弱勢群體的獨特存在價值，倡導小敘事（minor narrative）、小論述（minor discourse），也是後現代理論家如：福科、李歐塔、德勒茲、瓜塔里（Felix Guattari）等人的主旋律，陳芳明卻又諱言（或曰不知）其後現代起源，一股腦兒全派給了後殖民。其實，從1980年代末，一批留美回台的後馬克思主義者即在報刊、雜誌上積極鼓吹新社會運動，大量引介福科、德勒茲、瓜塔里等人的後現代觀點，提倡情欲解放、邊緣論述，對女性主義、同性戀、原住民、國族認同等問題多所著墨，其影響也反映在文學表現上。陳芳明卻爲了符合他台獨教條的框框，硬是用胡說八道的技倆把解嚴後台灣文學的後現代痕跡抹除淨盡，殊不知，這種卑鄙的心態與行徑，非但無法掩盡天下人耳目，徒令有識者齒冷而已。

### 人格分裂與思想錯亂

過去，陳芳明經常號稱要重建「客觀」的台灣歷史，「尋找台灣人的歷史原貌」，奪回台灣歷史的解釋權，又高呼「歷史研究，絕對不是爲了爲政治效勞而進行的」（陳芳明1992: 81）。但任何真得史學三昧的人都可輕易一眼看穿陳芳明所寫的台灣歷史無不是在搞台獨的政治宣傳。然而，他屢屢以「客觀」、「不是爲政治效勞」自居，譴責「統派的歷史解釋，是僞民族主義，也是僞社會主義的；

其真正面目，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陳芳明 1998a: 17），說得多麼慷慨激昂、義正辭嚴！不過，荒唐透頂的是，就在與這段話的出處同年同月同日出版的《左翼台灣》序言中，他一反前調說了一段狠狠自掌嘴巴的話：

「我很同意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所以就在這個立場上我特別堅持。我越來越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解釋，從而我也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台灣社會既然塑造了我這樣的人格，那麼我在討論台灣歷史時，便不可能無視台灣社會所具備的殖民地經驗。這是很主

觀的，無需討價還價。」（陳芳明 1998b: 8）

「特別堅持」「所有的歷史解釋都屬於政治的」，「不相信有所謂客觀的學術」、「這是很主觀的，無需討價還價」，口氣的決絕與專斷跟他指責「統派」、「中國學者」不客觀，「為政治目的效勞服務」一般無二，面對這種在同一時期出現卻絕對自相矛盾的論斷，我們除了說他人格分裂、思想錯亂之外，找不到另外的理由。

陳芳明自己願意撕下多年來偽裝客觀、超政治的假面具，露出本相，我們當然歡迎。但只聽罪犯自己坦承犯行還不夠，我們還必須回到犯罪現場重建作案過程，才可以定讞。陳芳明向來以建立左翼

的台灣史觀自翊，我們就根據他對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史的論述，揭露他不但史學無方，更且缺乏史識，有慚史德，爲了服務台獨的教條而武斷史料，逞一偏之見的劣跡惡行。

### 扭曲台灣歷史製造反中國情緒的台獨史觀

歷史經驗是建構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佔台灣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自大陸移民來台傳承了漢民族的歷史、文化、宗教，生活方式與思想意識無不深受中國文化的濡染，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並未根本改變這一事實。台獨搞台灣獨立在台灣內部碰到的最大阻力就是台灣漢人由根深蒂固的漢民族觀念衍生出來的中國意識。因而，台獨要建構「台灣民族」論煽動台灣漢人脫離中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千方百計地歪曲台灣歷史，把台灣說成是中國的「棄地」，台灣人是中國的「棄民」，而中國歷來都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藉此加工製造出仇視中國、中國人的「台灣意識」、「台灣人意識」。台獨史觀，不論左、右派，所根據的理論容有不同，但都是圍繞這一主軸展開的。陳芳明所謂左翼台灣史觀自不例外。在他所寫的以謝雪紅爲中心的台共歷史中，有幾個重點：一、「台灣是一個被壓迫的象徵」，台灣人身負「原罪」，不論在台灣的國民黨或在大陸的共產黨統治下都註定要遭受被壓迫的悲慘命運。二、極力吹捧謝雪紅，把她塑造爲台獨的「民族鬥士」，「一生都強烈表達了

台灣人的反抗精神」，反映了「全體台灣人的命運」，「代表了潔白與火熱：必將是一個不屈的被壓迫者的永遠象徵」。三、最重要的是，盡力切割開台共與中共的關係，強調台共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與中共處於平行、獨立、自主的地位，中共非但無助於台共的發展反而破壞第三國際「一國一黨」的原則，力圖控制台共、「篡奪」領導權，於是造成台共分裂，導致台共組織遭日本總督府摧毀。換句話說，中共成了台共在日據時期未成氣候乃至潰散瓦解的罪魁禍首。而謝雪紅才是台共的正統領導中心，代表了與中共對立的親日路線，從而成爲中共批鬥謝雪紅的根源。這些說法究竟是根據可靠證據得來的合理論斷？還是政治偏見加上不學無識的謬妄之言？我們不妨好好加以檢視一番。

歷史研究的基本精神是「求真」，但在歷史研究中，罕見有完備無缺的材料可供採用，有關歷史事件與人物的資料，常因證據湮沒竟或根本沒有留下記錄而出現斷裂、罅隙，而涉及現實政治者，更往往因檔案封存尚未解密或當事人出於主客觀因素未公佈本身證言，致使史料嚴重不足。因此，史家撰寫歷史重建一去不復返的「過去」時，不免要依據殘缺的材料，做一定程度的推斷以補足歷史的空隙。但史學的戒律要求，從事這種推斷，試圖建構歷史圖像時，切忌任意、武斷，必須秉持嚴謹、審慎的態度，做到孔老夫子所說的：「多聞闕疑，慎言其餘」。換句話說，史料越有限，就越能檢測出史學功力的高下，史德與心術的優劣。只要歷史工作者態度嚴肅認真，有合乎邏輯的思考，精通史學方法，具備博洽的歷史與社會科學知識，即使在文獻不足徵的情況下，也常能由新出土的材料或尚

存於世的當事人證明其所測繪出的圖像符合真相或雖不中亦不遠。反之，受強烈的黨派成見或主觀好惡所左右而寫出的「歷史」，一旦檔案解密或散佚失落的材料重見天日，乃至當事人現身發言，虛構的神話必不攻自破，登時暴露撰述者違理害真的醜行。而虛構的神話一旦被戳穿，偽裝「客觀」、「真實」的外衣遭到徹底剝除，隱藏其後的撰述者的意識形態偏見也就鮮明無比地赤裸裸展現於世人面前，無所遁形。

### 台共為何提出「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

陳芳明會費心廣搜史料撰述日據時代的台灣左翼運動史，主要是受他的台灣史啟蒙導師史明影響。日據時期台灣共產黨的政治綱領提出了「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史明見之欣然色喜，主觀唯心地加以曲解、挪用，據以為台灣左派「台灣民族」論與「台灣獨立」論的張本（史明 1980: 581-582）。台共的政治主張必須放在日據時期具體的歷史背景與時空條件下，才能明瞭其真實涵義。首先，台灣當時是日本的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直接對立面是統治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因此，台灣獨立當然是指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鎖鏈枷鎖。再者，台灣人民不論是漢人或原住民都不屬於日本大和民族。根據第三共產國際民族與殖民地綱領，台灣人民以「台灣民族」的身份要求

民族獨立與殖民地的解放是天經地義的。最後，中國本身積弱不振，也正遭逢包括日本帝國主義在內的國際帝國主義的侵凌、壓迫，國勢凌夷，並無餘力要求收復台灣，僅能暗地協助（註2）。依據當時的國際形勢，鼓勵台灣從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獨立解放，可以大大削弱日本的國力，有利於中國對抗日本的侵侮。此所以不論國民黨或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前都支持台灣的獨立運動，而在抗戰勝利後又都立即力主收復台灣，其間沒有什麼矛盾之處，反而是基於對抗日本帝國主義、恢復中國完整主權的一貫政策。左右派台獨根本不了解這樣的歷史背景與時空條件，自以為聰明地質疑國共兩黨對台灣問題的主張前後矛盾，徒見其淺薄無識。台共的領導幹部蘇新在1980年有《關於「台獨」問題》一文批駁台獨對台共「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主張的曲解。他說：

「我們這裡說的『台灣民族』，指的是居住在台灣的『漢民族』和『高山族』，並不是指別的什麼『台灣民族』。因為世界各民族中，不論是政治學上，或人類學上，從來也沒有聽說過有什麼『台灣民族』這個名詞。……當時的所謂『獨立』，當然是指『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自己成為『獨立的國家』。當年第三國際領導下的任何殖民地的革命鬥爭都是採取這種方針的。……至於台灣不能歸還中國，什麼時候歸還中國，那是中國革命成功以後的事情。但思想上是有『台灣歸還中國』的準備。……至於『台獨』人士利用舊台共的



綱領來為它的『台灣民族論』和『台獨』運動辯護，這是對歷史的歪曲。舊台共的『台灣獨立』的政治綱領，是根據當時的台灣社會的具體情形制定的。當時台灣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所以把反對日本統治的革命運動說是台灣的民族獨立運動，是『名正言順』的。

『台獨』各派有一個共同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把國民黨人當作外來的異民族侵略者，把大陸的人稱為『中國人』、『中國民族』、『中華民族』，把原來的台灣人稱為『台灣民族』，故意製造一種民族矛盾，把台灣的革命鬥爭說成是『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獨立運動』。」（蘇新 1993: 263-267）

蘇新的這些說明很透徹地闡明了台共當時提出「台灣民族」與「台灣獨立」的緣由。曾任台共第一屆中央委員的莊春火也在一九八八年五月廿九日由「台灣史研究會」舉辦的「台灣抗日運動與台灣獨立主張」的演講會上表示，當時的第三國際決定，殖民地的各民族應該獨立，因此台共遂站在漢民族的立場，主張台灣獨立，這與現在的台獨主張大不相同（《聯合晚報》，1988.5.29.另參見：莊春火 1988）。關於台共主張「台灣民族」論的問題，右翼的前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不像史明和陳芳明爲了替台獨左派偽造歷史根據而強加曲解，實事求是地承認說：

「日本統治時代，台灣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的創黨綱領曾提倡台灣民族主義。我暫稱之為『早期台灣民族主義』。我對『早期台灣民族主義』曾予以很高的評價，但是，其實台灣共產黨也不過利用台灣民族主義做抗日口號而已。共產主義才是該黨的目標。一九四九年共產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他們就去支持他們的祖國了。世人看不到一位台共黨員繼續主張台灣共和國。……既然沒有台灣獨立建國運動附隨在身，台共的台灣民族主義是假的，至少可以宣告壽終正寢。」（黃昭堂 1994）

### 史明引謝雪紅為同道

史明罔顧這些歷史脈絡並利用謝雪紅受到中共批判、整肅的遭遇，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刻意凸出謝雪紅在台共的地位，把謝雪紅說成代表日共台灣民族支部的勢力與企圖篡奪台共黨權的中共系統對抗，並曲意迴護謝雪紅的政治錯誤（史明 1980: 592-593）。揆其目的不外強調台共相對於中共的獨立性與台共、中共之間的對立，藉此彰顯台獨左派上承謝雪紅為代表的台共，也獨立於中共並與中共對抗的立場。史明的忠實信徒陳芳明撰述的日據時期左翼運動史大體上是循此基調進行，並以更

為激越的情緒，大加發揮。

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前，由於台共的主要領導幹部或亡故或於二二八事變後居停大陸，個人撰寫的自傳、回憶錄又大多未公開發表，故而台共可供研究的直接史料除了輯錄於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的文件與審訊口供外，為數不多。尤其關鍵人物謝雪紅完整的自傳久未面世，更是研究台共的一大障礙。陳芳明為了宣揚台獨史觀，在史料極為殘缺的情況下，主要依靠《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蘇新的自傳與回憶錄、日共成員的回憶文字與台共幹部親朋故舊的悼念文章與口述記錄，大膽寫起了《謝雪紅評傳》與相關的台共歷史。本來，陳芳明如果抱持清朝考證學家崔述所說的嚴謹態度：「凡無從考證者，輒以不知置之，寧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以他所網羅採扶的豐富材料，也可以寫出接近實際情況的日據時期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然而，在滿腔激情的台獨狂熱下，他只顧醜詆中共，發洩反中國的情緒，根本無法冷靜地分析材料，小心求證，加以所學不精，沒有搞好史學方法，故而屢見睜眼說瞎話，肆意曲解材料，不遺餘力地吹捧謝雪紅，為謝雪紅曲筆迴護，上粧抹彩，把她打扮成聖潔的台灣民族女英雄，甚至譽為「世界性的領導者」。

不過，對陳芳明來說，很不幸的是，由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的謝雪紅長篇自傳《我的半生記》，被楊克煌的女兒楊翠華從大陸取得，並於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在台北出版了。書中披露的謝雪紅個人經歷與台共歷史徹底摧毀了陳芳明依據史明的台獨偏見所虛構的神話。

## 是誰企圖以主觀意志改變客觀史實？

前面已經提到，陳芳明撰寫台共歷史念茲在茲的就是要證明：台共與中共是平起平坐的，而中共只圖篡奪台共的領導權，對台共非徒無助而又害之。他自述研究台灣左翼史的動機時說：

「北京的決策者，有計劃、有系統地對台灣文學、台灣史學建構一套周密的歷史解釋。中國學者在採取左派觀點，分析台灣歷史過程中的政經結構，企圖剔除台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歧異史實，而刻意強調兩個社會有同質性格，並進一步聯繫到「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北京對台政策。以研究台灣共產黨史為例，中國學者既解釋台灣左翼受中共的領導，又宣稱台共的成立係中共一手扶持。在這樣的解釋裡，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史觀是僵硬地套用在台灣歷史之上。中國學者的研究，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學術的紀律。面對如此嚴重的錯誤，台灣對於左翼史的研究是不能不及時著手進行的。只有在確立台灣本身的史觀之後，才有可能批駁來自中國的挑戰。

第二，由於島內思想與言論尺度的放寬，台灣的統派學者終於不再掩飾他們對北京政權

的靠攏。在教條的政治信仰指導下，他們也採取一種貌似社會主義的觀點來解釋台灣歷史。基本上，在這方面的研究，「統」的味道遠遠超過「左」的解釋精神，政治氣息則高高凌駕於學術訓練之上。統派歷史解的重點，無非是呼應北京對台政策。依照那樣的史觀，台灣的左翼運動幾乎就是中國革命的下游，台灣社會簡直是依附中國的陰影而成長的。中共地位受到無上的尊崇，凡不利於北京的史實都受到精心的掩蓋與擦拭，台灣歷史人物如果受到肯定的話，並不是因為他們有自主性的理想與行動，反而是由於中共的支配與指揮。台灣左翼史在這種摧殘式的拼湊之下，其面目全非的程度，可謂不堪辨識。統派的歷史解釋，是偽民族主義，也是偽社會主義的；其真正面目，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這種來自台灣內部的輕侮，對左翼史研究所造成的扭曲，並不亞於來自中共的蠻橫解釋。要維護台灣史的正確性，要保存台灣學術的自尊，左翼史的重建顯然無可拖延。

第四、左翼史研究具有文化批判的意義。……有自主性的殖民地知識份子精神，便是孕育濃厚的抵抗文化與批判文化。台灣左翼運動遺留下來的批判傳統，在後殖民時期的今天仍然富有高度的暗示。尤其是北京企圖在台構築代理人政權的事實，使台灣知識分子產生自覺，而這樣的自覺與左翼傳統是可以密切結合起來的。「台灣民族」、「台灣獨立」、「台灣革命」的主張，是左翼運動提出來的；面對著中國帝國主義的野心，以及在台統治者的投

降心態，這些主張還是帶有強悍的現代性。因此，台灣左翼史的研究，是改造殖民文化時不可偏廢的重要工作。」（陳芳明 1998：16-19）

你看，只要說「台灣左翼受中共的領導」，就是把「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史觀僵硬地套用在台灣歷史之上」，就「全然不符史實，並且也非常違背學術的紀律」，「只不過是為中共的政治目的效勞服務」，罪名不小，帽子很大。他更嚴厲地指控中共說：「中共史家對於台共的態度則是予以篡改、扭曲，以便符合北京對台政策的要求。他們最典型的說法，便是再三強調台共是在中共的『直接指導與協助之下』成立的。……蘇新到中國後所寫的自傳，也指出台共在上海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誕生。……如此簡單的事實，中共卻一再牽強地要篡改，以便導出『台共接受中共指導』的結論。這種知識暴力正好反映出北京的殖民心態。企圖以主觀意志來改變客觀史實，正是殖民主義的另一種變相表現。」（陳芳明 1998a：255, 257）這下是連「殖民主義」的滔天大罪都搬出來了，但到底是誰「企圖以主觀意志來改變客觀史實」，等一下我們就會見分曉。他又說：「一般人都妄加論斷，台灣的抗日運動，是接受中國的領導。這個沒有根據的論調。在戰後沿用了四十餘年，而從謝雪紅的史實裡，我們發現中國是在台灣抗日運動中扯後腿。從她的整個政治生涯，也可發現台灣抗日運動的視野極為開闊，而且也一直是一種自發性、自主性的運動，它不僅沒有被中國領導，反而還去領導中

國的抗日運動。」（陳芳明 1988: 187），「曾經身為第二國際指揮下的台共主席，她（按：指謝雪紅）並不認為毛澤東的地位比她高。在第三國際的系統裡，中共與台共的主席，政治地位是平等的。」（同上：197）最後，陳芳明給中共與台共的關係下了這樣的論斷：「從謝雪紅的史實來看，中共並沒有對台共有過任何的協助；相反的，它在幕後唆使的奪權運動，使台共偏離第三國際的戰略原則，使台共發生內部分裂，……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後投靠中共不久即受到整肅鬥爭，有一個重要的歷史因素，便是她從來就是拒絕中共的領導」（陳芳明 1998a: 42），「中共是否協助了台灣人民的殖民地革命？答案很清楚，全然沒有。然而，中共自來出版的有關台灣史書籍，卻再三宣稱給予台共有力的支援與指導。歷史事實活生生提出了證辭，中共不僅沒有協助，反而對台灣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革命力量處處阻撓，使抗日陣營發生分裂，終而導致台共的覆亡。」（同上：232-233）這些義憤填膺、氣勢洶洶的指控，到底有沒有可靠的根據呢？沒有！用陳芳明的話再說一次，「全然沒有」！

### 謝雪紅自傳摧毀台獨左派虛構的神話

陳芳明以上的這些看法是根據什麼呢？

原來，他始終認為謝雪紅是二二八事件後才於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成為中共黨員的。在此之前，謝

雪紅「走的仍然是舊台共的道路。……舊台共一直是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陳芳明 1991b: 277）因而與中共頻生磨擦。陳芳明一直認為由中共的台籍黨員翁澤生、蔡孝乾、潘欽信等人組成的「上海大學派」（簡稱「上大派」）在中共中央指使下向謝雪紅代表的日共路線奪權後才造成台共的內鬩分裂（陳芳明 1991b: 86, 148-149, 191-216; 1998a: 98-119, 227-233, 248-253）。陳芳明的這些認知完全與歷史事實不符。

實際的情況是怎樣呢？我們來看看謝雪紅自己是怎麼說的：

「一九二五年六月間，由安存真、宣中宣兩人介紹我、林木順、陳其昌等幾個台灣青年參加了「共產主義青年團」，記得是林木順代我填表。……1925年七月間，我、林木順、陳其昌三人由杭州調往上海參加「救援會」工作。……我調來上海之後不久，黃中美幾次叫我去「法國公園」或到旅社講話。他幫助我提高對共產黨的認識，鼓勵我爭取入黨，並向了解我的家庭、出身和經歷等。同年八月間，黃中美到閩北我的住處，向我宣佈我已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介紹人就是他。」（謝雪紅 1997: 170, 173, 174）

看吧！史明與陳芳明整個對謝雪紅與台共歷史的詮釋，最關鍵的一個立足點，就這樣被謝雪紅的



自述徹底摧毀了，由此而建立起來的那些主觀臆造與胡說八道也就如朽木難撐之大廈立時轟然崩塌、灰飛煙滅了！

說來可悲，如果陳芳明不被台獨的狂熱情緒所蒙蔽，能夠以冷靜、清醒的頭腦去分析他辛苦搜集來的豐富史料，原本也不難推斷出這個歷史事實。這可從以下幾點看出：1. 陳芳明在探討是誰推薦林木順與謝雪紅到莫斯科留學時，提到「根據日共領袖之一德田球一的回憶錄，謝雪紅乃是由中國共產黨的台灣支部所推薦」（陳芳明 1998a: 55）；2. 陳芳明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已知在 1924、1925 年之間「可以確信的是，林木順在這段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上：53），其實這就可以合理的推測，與林木順關係密切，同在上海大學就學，又一齊被選送莫斯科受幹部訓練的謝雪紅也有中共黨員的身份；3. 在《謝雪紅評傳》中，陳芳明又引述謝雪紅親信周明的話說：「一九四六年底蔡孝乾到台中找謝雪紅，當時謝要求恢復黨籍」（陳芳明 1991b: 275），既謂之「恢復」黨籍，即表示先前已具備黨員身份。這種種跡象都可以合理推測謝雪紅早在進莫斯科東方大學前已加入中共，而謝之得入東方大學也是中共推薦的。請看謝雪紅的自白：

「一九二五年十月間，黃中美同時向我、林木順和林仲梓三人宣佈黨命我們赴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他說黨派我們赴蘇學習是為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台灣的同志在

台建黨。」（謝雪紅 1997: 183）

這不是很清楚了嗎？不但謝雪紅、林木順是中共選派赴蘇聯學習的，而且還「是爲了培養幹部，考慮將來幫助台灣的同志在台建黨」。

可笑的是，陳芳明自己被台獨魔障所惑，無法合理地推斷謝雪紅早年即已加入中共也就罷了，當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在爲謝雪紅舉行骨灰移放的儀式上發表〈謝雪紅同志生平〉，總結對她一生的評價，其中提到謝雪紅「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參加五卅運動，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芳明竟然還幼稚地質問：「文中提及，謝雪紅在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就是很不實際的一種寫法。

中共與台盟人士，有什麼證據可以顯示她在這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陳芳明 1991b: 701）

中共有沒有指導台共？

正是由於史明與陳芳明不知道謝雪紅早在一九二五年即是中共黨員這一事實，他們無視既有材料中早已明白顯示台共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現實，虛構出謝雪紅堅持「台灣民族」論與「台灣獨立」、謝雪紅領導的台共與中共對抗，以及中共中央企圖篡奪台共黨權的故事（註3）。陳芳明一再譴責中共

史家所說的台共是在中共的「直接指導與協助之下」成立的。然而，這個事實並不是中共史家憑空捏造的。《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中就明白引述了日本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台灣共產黨暫時以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之名義組黨」、「日本共產黨目前因為選舉鬥爭而忙碌，有關組黨事宜應請求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王乃信等譯 1989: 9）。史明在《台灣人四百年史》中引述這段文字（史明 1980: 576），就連陳芳明自己也在《謝雪紅評傳》中加以引用（陳芳明 1991b: 88）。可是，在同書中以及述及台共的文章裡，陳芳明卻不斷否認中共「援助指導」台共，痛斥中共「棄史實於不顧」、「一再牽強地要篡改」，是「知識暴力的橫行」，甚至扣上「殖民心態」、「正是殖民主義的另一種變相表現」的大帽子。我們說陳芳明睜眼說瞎話，肆意曲解史料，絕非過當之辭。

其實，台共在組黨伊始，於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日發表《台灣共產黨組織宣言》的同時，也有一封《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信》，從中可見雙方關係之密切：

「台灣共產黨的構成份子大部分曾加入中國共產黨，接受過中國共產黨的指導訓練。是故，台灣共產黨的成立與中國共產黨頗有密切的意義（關係），台灣革命與中國革命之間亦有頗多關連。因此，懇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產黨能多加指導與協助。這是大會全體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熱烈的要求。」（王乃信等譯 1989: 98）

「大會全體同志」「最熱烈的要求」「懇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產黨能多加指導與協助」，這樣的宣示，還用得著中共史家去「篡改」史實嗎？真正篡改、扭曲史實的不是陳芳明所指控的「中共史家」或台灣的「統派學者」，而正是「作賊喊捉賊」的陳芳明自己。

中共不但在台共建黨時受託「援助及指導」台共。在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共遭日本當局大逮捕而癱瘓之後，台共無法再與日共聯繫接受領導，第三國際遂委由東方局通過中共領導台共的工作。《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所收錄的謝雪紅口供就說：

「黨成立十日後，於上海有數名黨員遭受檢舉，致與日本共產黨的連繫斷絕，同年八月林日高為恢復連絡而上京。翌年四月發生所謂的四·一六事件，致連絡再次中斷，其後直接連絡的希望更是渺茫。因而企圖透過翁澤生與中國共產黨連絡，……此間，我數次向中國共產黨、日本共產黨或國際東方局提出報告，……」（王乃信等譯 1989: 125, 128-129）

同書收錄的翁澤生供詞又說謝雪紅在台共發生權力鬥爭後，

「阿女（按：即謝雪紅本名）向中共中央部上訴……其後連續地以同一旨趣的報告呈上

中央。中共方面亦認為有調查的必要，於昭和六年（一九三一年）三月上旬，由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組織部長就上述各點審問過我。……接著於同年五月重被交付中共審查委員會……」（同上·132）

台共的內訌鬧到中共中央去要求調查、裁奪，這不是領導關係又是什麼？

對於台共與日共、中共、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曾任台共第二屆中央委員兼宣傳部長的蘇新在一九八一年所寫的〈台灣共產黨的歷史〉一文中有很好的說明：

「台灣共產黨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具體地說，即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從誕生到消亡），在台灣出現的怪物。說它是怪物，是因為它是不像的東西。

第一，它成立時，是作為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叫「台灣民族支部」），組織上（名義上）屬於日共，但是，日共從來就沒有有效地領導過它。

第二，它成立後，由於日共遭到大破壞（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及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分別叫做「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台共與日共的關係被切斷，因此，台共的領導機構，不得不通過台胞的中共黨員（翁澤生等），求助於中共中央。因此，台共

雖然與中共沒有組織關係，但是，思想上、政治上，比較多地得到中共中央很大的領導。

第三，一九三一年二月間，第三國際東方局派人到台灣，召開台灣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之後，台共就名義上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的支部，但是，實際上是通過中共中央，接受東方局的領導的，因為當時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是瞿秋白，第三國際東方局負責人也

是瞿秋白。

總之，台灣共產黨，成立當時是日共的一個「民族支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後，成為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但是，思想上，政治上受中共的影響較大。

說它是日共的一個支部，不像；

說它是第三國際的一個獨立支部，不像；

說它是中共的一部分，但又沒有組織關係，也不像。

所以，我說它是「三不像」的怪物。」（蘇新 1993: 128-129）

蘇新這篇未完稿與其自傳、回憶錄一起收在《未歸的台共鬥魂——蘇新自傳與文集》裡，陳芳明引用蘇新的自傳中所言台共是日共系統來痛斥中共「篡改」史實，而同一本文集中對台共歷史的敘述，卻因與其論調相背，即視而不見。截取同一文集中的片言隻語，斷章取義來誣指對手「篡改」史實，

而對蘇新全面敘述台共、中共與第三國際歷史關係的文獻則置若罔聞，這算那門子史學方法？西方主觀唯心論的代表貝克萊主教有句名言：「存在即被感知」。陳芳明的魯莽滅裂則尤有過之，他是連已經感知到的史料，只要不符合他的台獨教條，也等於不存在。我們說他武斷材料，無視反證，睜眼說瞎話，於此又得一明證。

### 「改革同盟」與謝雪紅的黨內鬥爭

史明與陳芳明將台共「改革同盟」開除謝雪紅黨籍奪取領導權的內訌歸因於台共「上大派」奉中共中央之命剷除日共系統的謝雪紅，完全是出於台獨偏見的曲解。這種說法之站不住腳是顯而易見的。且不論謝雪紅即是中共黨員的事實，單從謝雪紅本身就讀上海大學，而本為日共黨員的蘇新與農民組合的趙港等人與中共並無淵源，卻也群起而反對謝雪紅，使謝陷於四面楚歌、孤立無援中，就可得知所謂中共的「上大派」與日共系統的謝雪紅對立這種分類法是粗糙不堪，難以說明問題的。其實，《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對台共內鬥的觀察是頗為深中肯綮的：

「蓋阿女與改革同盟一派造成對立的原因，主要基於對客觀形勢的認識不同，以致對黨戰術的見解引起差異。惟其久久在不活潑狀態下採閉門主義，徒以神秘殿堂將黨包藏，一味

壟斷黨的權力，阿女此等性格與女性特有的傾向，使黨員產生反感與不滿，加以種種感情因素似乎也有存在，終至演變成內訌，彼此除名，積極的互相排擊鬥爭。」（王乃信等譯 1989:

124）

然而，陳芳明對謝雪紅的壟斷權力與專橫卻拿出女性主義來為她迴護說：「謝雪紅處在女性受到歧視的時代裡，……她爲了對抗男性沙文主義，處理組織的方式也許也不能不有過度的反應。這些因素應該考慮進去，才能知道她在當時之所以被孤立的理由。」（陳芳明 1991: 202）這番開脫的話可謂用心良苦。然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身爲革命組織的領導者，只要不能團結人以集合衆人之力戰勝敵人，那就會危害大局，就是不適任，就該下台。其實，何只革命組織、政治團體不容許這種現象長期存在，任何一個民衆團體，只要想發展也不會容許，其理至明。謝雪紅的跋扈、暴烈性格在多種資料中都有所反映。陳芳明自己就引述了謝雪紅東方大學的同學、中共早期領導人張國燾夫人楊子烈的描述說：「她對『表弟』（按：即林木順）是很嚴厲的，動輒咬牙切齒用台語斥罵。中國男女同志看不慣她那驕橫樣，言語之間，對她不免有些諷刺，但她個性倔強，仍罵如故。……見她橫眉怒目，聲調高亢，知道她又發了雌威。大家都討厭她，奇怪的是她那位臉黃身瘦的『表弟』始終一聲不響，異常馴服。」（陳芳明 1991: 72）這裡所呈現的簡直是「女性沙文主義」了。前台共中央委員莊春火也



指出，謝雪紅以「蠻橫」的方式奪了台共書記林日高的權（莊春火 1988）。

關於台共「改革同盟」與謝雪紅的黨內鬥爭問題，陳芳明始終不會用自己的腦袋，秉持「虛其心以求之，平其情而論之」的治史態度，好好分析搜集來的材料，只會盲從史明站不住腳的論調，強把台共的內鬥歸因於中共中央企圖「奪」台共的領導權。史明與陳芳明對台共內鬥的思考邏輯是這樣的：翁澤生、潘欽信、王萬得等人的中共「上大派」VS. 謝雪紅的日共系統，而支持翁澤生的是代表中共中央與第三國際東方瞿秋白，故而台共內鬥也就是由中共中央欲「奪取」日共系統的謝雪紅的領導權造成的。這種主觀臆斷根本無法從相關的材料中得到確證，而是基於台獨立場刻意曲解史往的結果。

從前面引用過的史料，我們已經知道台共創黨的主要幹部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潘欽信、蔡孝乾等人皆為中共黨員，可以說台共自始就是以中共黨員的骨幹創立的。史明和陳芳明把林木順、謝雪紅歸類為日共的系統完全是主觀臆造的胡說八道。台共第一任領導人林木順在成立大會時就表示：

「本大會承蒙中國共產黨派遣代表參加，並得以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與指導，使我們深感無上的欣慰與光榮。現在中國的革命正進入建立工农兵蘇維埃的成熟期，中國共產黨代表特以其長期領導工農的奮鬥經驗教導我們。我們承受其教導，應努力在台灣革命的實踐運

動中予以履行……」（王乃信等譯，1989：11）

在前面引述過的台共《致中國共產黨中央》的信也明白表示：「懇請中國共產黨對台灣共產黨能多加指導與援助。這是大會全體同志對中國共產黨的最熱烈的要求。」很清楚，台共自始就主動要求中共的「指導與援助」，何勞中共再費心去籌劃「篡奪」台共的領導權？

台共的組織必須重建、調整，其實是當時客觀形勢下的必然要求。台共甫成立，即遭逢「上海讀書會事件」，謝雪紅等人被日本警方逮捕，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五日台共成立時的大會議事錄、宣言、政治、組織綱領，其他各部門的運動綱領等秘密文件全被日本當局取得，導致黨的領導幹部林木順、翁澤生、蔡孝乾、洪朝宗等人紛紛走避，黨的組織與活動無法按照預定計劃展開。台共形式上雖告成立，實際上卻處於無組織、紀律可言的渙散狀態。在外有日本官方嚴密監控，日共復自身難保，無力領導、援助，內則幹部寥落、經費短絀下，台共處境之艱難可想而知。故而，台共成立初期在台灣的工作難以展開，在勞工、農民等群眾運動上績效極為不彰。要推動台灣的革命，這種低迷不振的狀態必須突破改善，是勢所必然的。問題是，主要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組成的台共，既無組織與實際鬥爭的經驗，又缺乏嚴格的訓練，處理起政治事務不免粗糙、幼稚，因而激化了黨內矛盾。

對台共在台灣困境，在台中中央委員林日高、謝雪紅曾多次通過翁澤生向中共與第三國際東方局提交報告。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東方局與中共皆認為台共有糾正機會主義與關門主義並加以改造的必要。翁澤生告知謝雪紅選派的代表陳德興這項指令，要求陳德興返台後向台共幹部傳達。但謝雪紅抗拒改

造黨的要求，認為第三國際受到翁澤生的蒙蔽，不了解台灣實際情況，陳德興所傳達者是否真為東方局的指令殊為可疑（王乃信等譯 1989: 116）。王萬得、蘇新、趙港等人遂組成「改革同盟」另立中央。此其間謝雪紅向中共指控「改革同盟」搞宗派鬥爭，中共中央經調查後，認為「改革同盟」未通過黨大會正式決議，私自另立黨中央，違反組織原則，犯了原則性的錯誤。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共中央派人帶回東方局《致台灣共產者書》指示黨的改造方針。一九三一年四月又派遣潘欽信代表東方局返台，攜回《中共中央致台灣同志書》，《台灣共產黨新綱領》等文件，並要求「改革同盟」承認錯誤，解散「改革同盟」的組織。蘇新在自傳中說：

「當時潘欽信所指出的主要內容是『翁澤生同志並不是叫你們另外組織領導機構，由上而下去進行黨的改造工作，而是在大會之前一方面檢討過去的工作，另一方面展開群眾的組織和鬥爭，用這樣的方法來教育一般黨員，提高黨員的水平，準備迎接大會，在大會上由下而上批評領導，以達到改造黨的目的。』但當時（潘欽信返台前）我們由於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低，未能理解這個精神。」（蘇新 1993: 48-49）

「改革同盟」接受了東方局與中共中央的批評意見，於一九三一年五月三十一日至六月二日召開

黨大會，重新確立黨的路線，改組領導班子，並承認「改革同盟」違反組織原則，應予解散，同時以抗拒黨的改革為由，開除了謝雪紅、楊克培、楊克煌的黨籍。謝雪紅在被捕後供述說，「改革同盟」將黨陷入機會主義、活動遲滯不活潑的原因完全歸咎於本人而加以非難，但他們所犯的一切謬誤與怠慢則悉數隱蔽而不加反省。這些全為翁澤生、王萬得、潘欽信等人的陰謀，因此而造成今日多數黨員繫獄，使黨從根柢遭遇破壞殆盡。此一切責任應由他們改革同盟承擔。」（王乃信等譯：1989:124）這些指控，其實有失公允，也不合實情。台共的主客觀條件皆極為不利，工作難以推展，已如前述，但謝雪紅的導領風格與工作方式不當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對於台共改革的必要性，《台灣總督府察誌》有如下的敘述：「至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後半期，黨員人數逐漸增加，黨的活動因受到內外情勢的刺激，亦逐漸活潑起來。與此同時，少壯黨員中擔任赤色工會組織運動、農民組合、文化協會的指導工作者，對謝氏阿女等中央委員的活動的不充分、不活潑，態度之消極漸漸感到不滿。這種不滿情緒逐漸於黨內擴大，遂發展成爲對中央委員的不信任。此時林日高、莊春火相繼脫黨，使中央委員只剩謝氏阿女一名，情況不容輕視。原本封鎖在秘密中，茫然妄想新加盟黨員的台灣共產黨的組織，實際上僅有二、三名中央委員與不滿二十名的黨員的貧弱真相，至此逐漸揭露。且對林日高、莊春火的脫黨通告，既無任何處置，黨員又久未聚晤，連絡活動方針亦未能確立。依此推演，黨的未來實有召致自行潰滅之虞。」（王乃信等譯 1989: 111-112）可見，台共再不改造，境況危殆。台共困頓的原

因當然不能僅歸咎謝雪紅一人，而是整個黨的問題，第三國際與中共也都有此認知。潘欽信在台共第二次大會上發言時就表示：

「黨已陷入極端的機會主義的謬誤。故必須清算此錯誤，根本地改變黨，以確立黨的新政治方針。此事既已向同志陳德興詳述使其歸台，唯其報告有些曖昧，致引起同志中對錯誤的本質的理解並不充分。

黨改革的方針，為對黨的機會主義根源的小資產階級基礎的清算，將黨的機會主義的錯誤由實踐上去認識：激發工農的日常鬥爭，在其過程中爭取工人及貧農入黨，鞏固黨的無產階級基礎，而圖黨的布爾什維克化。然而過去似有一種想法，認為單是黨的上部組織進行改造即能刪除此種錯誤，而改革同盟的組織便是出於這種想法。這是錯誤的。改革同盟非為造就黨中黨而組織，乃為忠實執行國際的指示，為準備黨的政治方針的根本改變而組織者。是故，在政治動機方面雖可謂其正確，但不可諱言地違反組織原則。所以改革同盟應予解散。」

（王乃信等譯 1989: 164）

台共在大會結束之際發表的《告全體同志書》中也說：

「大會承認改革同盟依國際指示，執行了特派至國際的同志歸國前的通信中所言『召集大會實行黨的總清算、確立新方的方針以前；在黨內進行充分的政治上的準備，使黨員毅然反對機會主義；抱持接受新政治方針的決心與基礎。在實際工作上須開始改變過去的錯誤方式』的諸工作。其動機雖在政治上正確，唯此種組織在組織原則上犯了錯誤。此等錯誤同時將附帶以下數個錯誤的危機。即，易使黨員誤認：清算機會主義僅只從事組織紀律的工作即可容易致效，而輕視政治上的鬥爭及剷滅機會主義在組織上、工作上的基礎，以為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是若干被處分黨員的錯誤，不但無法認識機會主義錯誤乃全黨所犯的錯誤，所有黨員皆受其深遠的影響，也無法瞭解必須經過長時間的困難的鬥爭始克奏效這一事實，且也容易蓄積宗派主義的根源，導致黨分裂為多種派別，而削弱黨的力量之危險。畢竟此事實乃起因於不了解政治改革、政治鬥爭的全般的意義。在黨改革的政治上的準備，雖已因改革同盟的工而收到相當的效果，但不能說已經充分。其成果是使大多數的黨員毅然地反對機會主義，使其產生接受新方針的政治決心，促進了召集大會的時期。故大會承認改革同盟在政治上的正確性，且肯定其政治上的工作，另一方面必須指摘其組織上的錯誤，令其即刻解散，使一切黨員恢復組織的常態，在新的政治方針與組織方針下，實行統一的行動。」（同上：169）

在這裏，既譴責了「改革同盟」在組織原則上犯了錯誤，也提醒不要「以為機會主義的錯誤只是若干被處分黨員的錯誤」，而是「全黨所犯的錯誤」，以免「蓄積宗派主義的根源，導致黨分裂為多種派別，有削弱黨的力量之危險」。台共的黨內鬥爭當然也包含有個人的情緒與意氣之爭，但這樣的處理與認識應該說是比較全面的。然而陳芳明對台共內訌的歷史敘述根本不提上述共產國際與中共對「改革同盟」的指責與台共第二次大會對台共機會主義根源的全面檢討，只片面按照謝雪紅情緒性的指控來論斷是非曲直。陳芳明對這些於台共內訌至關緊要的材料，視而不見，在其著作中完全加以抹除，只不過是爲了達成他主觀臆造的、一點也沒有客觀證據的論點：中共通過「上大派」的台共黨員精心策劃鬥爭日共系統的謝雪紅，以達到奪取台共黨權的目的，結果導致台共的潰滅，故中共對台共不惟無助而又害之。從上舉史料，我們可以很清楚得知這種論調根本完全站不住腳。

### 謝雪紅為何眾叛親離？

謝雪紅到大陸後之所以遭受批判、整肅，除了她的地方主義傾向與個人英雄主義之外，還有個原因就是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主席時，專權跋扈，妒賢嫉能，搞「家長作風」，多次誣陷同志是「國民黨特務」、「叛徒」，致使多人久久難以翻身。主要受害人之一就是蘇新。蘇新本來極受中共中央重視，一九五〇年周恩來原打算起用蘇新任外交部日本科科長，卻遭謝雪紅誣指在日據時期是台

共「叛徒」，使得蘇新不再受中共信任，過了三十年暗淡的生涯。對此蘇新晚年憤恨不平地說：「可惜出任日本科科長的事，因謝雪紅極力反對而不成。對這點，她大概是驚（怕），她沒有本事，她一個女孩子，也無讀冊（唸書），也無受什麼教育，在工作能力、專業方面要勝過我，當然是不可能。但是，在共產黨的環境下把她造成什麼主席（台盟），大家都可以接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並不是說她有什麼能力，……她是可以當個台盟的主席，公開出來講幾句話。這樣子而已。這樣子也很好，她做表面的事情，我們做實在的事情，她要是好好做，而我也不是擁護她的，她又何必那麼驚（怕），向這個說壞話，向那個說壞話，報告過來，報告過去，搞得亂糟糟的，……」（蘇新 1993: 91）蘇新所言確實道中了謝雪紅的心態與作風。謝雪紅由於本身能力與地位不相稱而產生的自卑、自憐心理在她的自傳裡也有所表達：

「有很長時期人們都以為我是個知識份子，卻不知我是個文化水平很低、不會寫字的人。這件事常令我心中產生矛盾；每當我被組織提拔得越高時，我就越擔心自己的低文化和高職位不相稱，以致於越想要盡力掩蓋自己文化低的事實，唯恐暴露了這個事實會辜負組織對我的器重和提拔。在東京的時期，許多工作，特別是抄寫工作都是林木順替我做的，而上級領導卻又偏要重用我，我就擔心不能完成任務。一些受過教育的知識份子，每因知道我文化低



的事實，就開始歧視我、蔑視我、不服我、排斥我，以至於侮辱我，我一輩子吃了不少這樣的虧。」（謝雪紅 1997:235）

謝雪紅由於出身貧苦，從小被賣為童養媳，及長又被騙為妾，故而對舊社會有刻骨的痛恨。一九一九年到中國青島親眼目睹了正如火如荼在中國大陸展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謝雪紅自述：「青島是喚起我的漢民族精神、階級鬥爭思想以及對幸福社會憧憬的地方，在那兒停留的日子，也是我一生經歷的轉折時期。」（謝雪紅 1997:125）也是在這時，謝雪紅看到天津大學學生展示俄國工、農、兵在皚皚白雪中前仆後繼攻打俄皇冬宮而血流遍地的悲壯相片，深受撼動，遂決心改名「雪紅」（同上：124-125）。因此，謝雪紅反帝、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民族與階級立場是堅定而毋庸置疑的。但她受限於性格、知識與能力，雖有極強的「出人頭地」欲望，而歷史也給了她幾次充當領導人物的機緣，卻始終無法成為稱職的領導者。終其一生，不論在台共或「台盟」，她一直不善於處理不同的意見，更不善於團結人，造成本身政治上的孤立，實為她個人的悲劇。這點是無論用什麼生花妙筆也無法曲予迴護的。

## 史學敗類的醜行

謝雪紅對台共的「改革同盟」成員如王萬得、蕭來福、蘇新三人奪取她對台共領導權的事一生銜恨在心，在她於大陸得勢時，毫不留情地打擊報復，誣告陷害，就連夙無冤仇的人僅因提了逆耳之言也捏造不實罪名，橫加栽誣（葉紀東 2000: 116-121）。面對大量指控謝雪紅的材料，陳芳明不敢否認謝雪紅的犯行，但他卻曲筆為其迴護說，那是在宗派鬥爭中不得已而為之的自衛反擊，然後又歸咎於中共的「誣告制度」（陳芳明 1991b: 578-579）。然而，蘇新、蕭來福等人都是在「台盟」內部尚未發生宗派鬥爭之前就被謝雪紅誣陷，而葉紀東本是謝雪紅想拉攏的人，也被謝雪紅誣告了，這是主動出擊而不是自衛反擊。至於歸咎於什麼「誣告制度」，那麼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五日台獨先覺彭明敏公開造謠構陷當時主張三通的人民黨主席許信良在一九八四年向中共要求資助，且於當上黨主席後前往中國駐日大使館報到，這又是什麼「誣告制度」造成的呢？

十多年來，陳芳明既譴責台灣歷代的統治者基於統治利益「刻意擦拭與惡意曲解」台灣歷史（陳芳明 1992: 1），又氣勢汹汹地不斷指控國民黨、中共史家與台灣的統派學者「篡改」、「扭曲」台灣歷史（陳芳明 1991b: 714; 1998a: 17, 63, 238-239, 255, 257, 259），還屢次高唱「以科學、落實的態度

去檢驗史料，去認識史實，才是今日台灣史研究的急務」（陳芳明 1988: 225），「我的基本態度是，無論意識形態或政治立場是如何有所出入，在進行歷史解釋時，必須以事實做爲主要根據。歷史知識畢竟不能等同於小說創作；要探測歷史，僅能依賴事實，而不能憑恃想像」（陳芳明 1992: 231）。這些話都很堂皇動聽，然而，正如我們所揭露的，陳芳明實際上是言行相背，表裡不一，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他指控別人「篡改史實」、「刻意擦拭與惡意曲解」等惡行，本身卻俱優爲之，也正是他自己，罔顧客觀史實，「憑恃想像」把歷史當成了小說創作，虛構了諸多不實的神話。

本來，撰寫歷史的基本態度應該是清朝史學家章學誠所說的：「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抑揚之能」。然而，陳芳明所寫的台灣歷史在台獨教條的指導下，卻充斥著唐朝史學家劉知幾所斥的「醜行」：「舞詞弄札，飾非文過……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這種史學敗類，我們還是用劉知幾的話給予定論最爲恰當：「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

### 【註釋】

1. 海德格在《存在與時間》中指出，每個人一出生就被「拋擲」進入他無可選擇的世界，在成長過

程中深深浸潤於其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與社會生活中，形成其基本價值觀與偏好，從而構成其存在的基礎。加達默爾承襲海德格這個存在本體論的觀點，發展出他的詮釋學理論。他提出 effective history 的概念，揭示歷史傳統深植於每個人的意識中，形成根深蒂固、無法拋棄的「偏見」，構成了人存在的基礎。因此，歷史並不只是「過去」的事，而是對每個人當前的處境仍舊產生根本的影響，故曰 effective history（即對當前仍有作用的歷史）。持此觀點，加達默爾既反對強調歷史客觀性的蘭克派史學，也反對施萊爾馬赫（Schleiermacher）與狄爾泰（Dilthey）所主張的，用體驗、移情神會（empathy）的方法去理解歷史文本以掌握、重建作者真正意圖的傳統詮釋學方法。加達默爾一反傳統歷史詮釋的看法，認為詮釋者詮釋文本時，不是要力求消除本身無可避免的「偏見」，相反，應該正視歷史傳統構成的既定偏見，用這種偏見形成的當前「視域」（horizon）與過去的文本的視域，在閱讀、詮釋的過程中對話、交融，經過辨證的綜合形成一個更高更新的視域。換句話說，詮釋的理解不是重建過去而是把過去的意義依據當前的情境加以「翻譯」。因此，由過去的歷史傳統形成的「偏見」不是有礙理解歷史文本的消極因素，而是具有創造性的積極因素（參見 Gadamer 1976）。路況把 effective history 譯為「時效性歷史」，誤解成古為今用、著眼於現實作用的歷史。他說：

「所謂『時效性歷史』究竟具有什麼樣的『時效性』內容？如果說歷史的『真相』是指過去存在

過的『真人事實』，『時效性歷史』貼可說是根據這『真人實事』所改編的足以啟發現實人心的『歷史／故事』(hi/story)。『歷史』從開始就是這樣一種『雙重書寫』，它一方面必須迴溯過去發生的『真人實事』，力求逼真客觀的報導分析，一方面又必須透過這些『真人實事』編撰塑造出史詩演義式的情節動作與戲劇主體。歷史的書寫不只是述說：『歷史上的『誰』如何如何』，它更要宣稱：『你應該取法認同歷史上的『誰』如何如何』」。這顯然已非加達默爾原意，而是後現代史學的觀點了。

2. 葉榮鐘寫的《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第一章中提到，「祖國派」的台灣抗日領袖林獻堂一九一三年到北京造訪梁啟超，請教抗日之道，梁啟超告以三十年內中國無力可以救援台人，台人對日本不可力敵，只能效法愛爾蘭人抗英之法，先求放鬆壓力，繼而獲得參政權。國民黨元老戴季陶也在同年告訴前往痛陳台人處境慘狀的甘得中，中國內亂方殷，十年之內無法幫助台人。這都說明中國非無心收復台灣，而是力有未逮。

魯迅在一九二七年為「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成員張秀哲（按：即張月澄）翻譯的《勞動問題》寫的序言很能指出當時海峽兩岸知識份子血脈相連的真摯深情：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他是一個台灣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台灣青年，卻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于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魯迅 1991: 425）

台灣彰化人黃玉齋在日據時期負笈廈門大學期間，多次藉返台渡假之便從台北圖書館秘密抄錄日人著作中的台灣抗日革命史料，著成《台灣革命史》，於 1925 年由上海泰東書局出版。廈門大學教授朱謙之為其作序說：「我們所謂台灣人，就是中國民族的福建人、廣東人，所以『台灣革命史』，也可說是『中國革命史』的一部分，是我們中國學者，所應該知道的。現在僅介紹於此，並望國人對於羅福星、余清芳諸先生們作相當的紀念。」黃玉齋在書中提到「台灣獨立派」時說：「說他是『台灣獨立派』亦可；說他是『台灣光復派』也無不可！我們所謂台灣人，個個都是中國人。總而言之，所謂『獨立派』捨去極端自主外，都是要做中國的一省呀！最近極端獨立派的論調是說：『現在中國內受軍閥橫行，外受到強壓迫，幾乎自身不能顧了，焉能顧及我們台灣呢？』他們的結論還是：現在應該台民治台民，將來還是做中國的一部分！」（黃玉齋 1991: 332-333）

只有知道這個背景，才能理解何以懷抱中國民族主義、深受國民黨影響的台灣青年張深切等人卻組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從事「台灣獨立」的革命運動。日據時期的「台灣獨立運

動」其對立面是日本帝國主義，是要從日本殖民統治下追求漢民族的獨立解放，而不是要與中國對抗，更不是要求脫離中國，反之，是要在中國獨立自主後回歸中國。台獨昧於當時的歷史環境，每見「台灣獨立」之名即妄加比附引為同調，用以證明台獨有其歷史根源，實屬可笑之至。

3. 關於謝雪紅自始即要求台灣回歸中國的主張，陳芳明為了強調謝雪紅的所謂「台獨」立場，在撰寫謝雪紅的傳記文章中，又發揮了睜眼說瞎話的本事，違背歷史研究的基本戒律，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在《謝雪紅評傳》中，他先引述大陸的資料《台灣民主自治同盟領袖謝雪紅》所說，謝雪紅在參加五卅運動的遊行時，「都喊出『收回台灣』的口號」（陳芳明 1991b: 59），但其後他又說：「（1949年6月14日〔按：原書誤為1969年〕）為了執行中共的對台政策，謝雪紅也不得不改寫自己創造過的歷史。她說，台灣人民在日據時代反抗殖民地統治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讓中國『收復台灣』。……在二〇、三〇年代的謝雪紅，看過中國的腐敗與落後，根本也不可能想到要主張中國『收復台灣』。」（同上：479）陳芳明在同書中前半自己先引用了謝雪紅在1925年五卅運動時曾高喊「收復台灣」的史料，寫到後半卻武斷地認為謝雪紅不可能主張「收復台灣」，前言不對後語，豈不荒謬？在《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建立》一文中，陳芳明又引用了同一史料來源所云：「她經歷當時的『五七』、『五九』、『五卅』等運動，在那時無論報紙上或遊行的隊伍裡，她都高呼出『收回台灣』的口號，那時她的名字叫謝飛英。」（陳芳明

1998a: 54) 這份史料是謝雪紅在1949年10月接受《人民日報》記者採訪的報導，為謝雪紅親口所言，與本文引述的謝雪紅口述自傳《我的半生記》內容相符。撰述歷史而能荒唐到在毫無客觀證據支持下，全憑主觀的政治立場，就做出與自己引用的史料的事實完全矛盾的妄斷，大概是古今中外俱屬罕見的。陳芳明這類的荒謬錯亂不僅此一端，在他寫的台灣歷史中所在多有，此處無暇一一臚列其犯行，且再舉兩例，以暴其醜。對於台共第一任書記林木順加入中共的時間，陳芳明先根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說，在一九二四、二五年之間，「可以確信的是，林木順在這段時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8a: 53)。然而，在同一篇文章中(請注意：是同一篇文章)，他又根據楊克煌的《台灣人民民族解放運動小史》說，林木順在一九二九年三月以後，「他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上: 86)。在同一篇文章中引用兩個不同的史料來源，對同一件事做了完全不同的敘述，卻沒有說明、解釋何者說法正確。這是歷史系一年級學生都不該犯的錯誤，足證他連史學方法ABC都沒有學好。更糟糕的例子是，對謝雪紅是怎麼進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的，陳芳明前後後反反覆覆，自己寫的跟說的，完全自相矛盾。看了所有他有關謝雪紅的傳記文章，讀者肯定無法弄清陳芳明自己對這件事的認知到底是什麼。他一忽兒說「一九二五年，她參加了五卅運動，在遊行隊伍高喊台灣獨立自治的口號(按：此說錯誤，已見前揭史料)」，也因此受到中共的注目，從而進入中共創辦的上海大學。旋即因第三國際的代表引介，而於同年十二月，遠



赴莫斯科的東方勞動大學讀書」（陳芳明 1988:169）。「忽兒又在《謝雪紅評傳》中說：「謝雪紅雖然是由中國共產黨推薦保送東方大學攻讀，但並不必然她就應該屬於中共的路線。」（1991b: 71）荒謬絕倫的是，就在 1991 年 7 月 15 日，《謝雪紅評傳》的新書發表會上，他的發言竟然否定了自己在書中的敘述，他說「一九二五年她去了上海。當時的上海正是抗日、反帝國主義壓迫最熱烈的地方，謝雪紅那時在演講台上提出說：『必須要注意台灣需要解放』。她說這句話時，讓莫斯科派來第三國際的人聽到而認為可以栽培，就推薦她到蘇聯去讀書。」（陳芳明 1992:254）這下又回到了第三國際推薦說。就在熱騰騰的新書剛出爐之際，作者馬上毫不說明理由地提出與書中所述不同的說法，寧非咄咄怪事？讀者到底該相信那一種說法？雖然在《林木順與台灣共產黨的建立》一文中，他已提到了日共領袖德田球一的回憶錄說過謝雪紅是由中共推薦入學，但陳芳明還是迷惑地問道：「究竟是誰推薦他們到莫斯科留學的呢？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是個謎。」（陳芳明 1988a:55）。於是謝雪紅進入東方大學的問題，就被陳芳明自己搞成了一筆愈攪愈亂的糊塗帳。看了上述的反覆迷離，讀者能不懷疑陳芳明的思考能力與史學訓練嗎？一個頭腦不清、經常曲解、武斷史料而造成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的人撰寫的台灣歷史還有一點起碼的可信度嗎？這個答案我們交給每個肯用腦筋思考的讀者去判斷。

【參考書目舉要】

- 馬克思·恩格斯（1956-198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197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史明（1980）《台灣人四百年史》，台北：自由時代周刊社。
- 陳芳明（1988）《台灣人的歷史與意識》，台北：敦理。
- （1989）《鞭傷之島》，台北，自立。
- （1991a）〈七〇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現代學術研究專刊》<sub>4</sub>，台北：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1991b）《謝雪紅評傳》，台北：前衛。
- （1992）《探索台灣史觀》，台北：自立。
- （1995）〈百年來的台灣文學與台灣風格〉，《中外文學》第273期，台北：中外文學月刊社。
- （1998a）《殖民地台灣——左翼政治運動史論》，台北：麥田。
- （1998b）《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台北：麥田。

- (1999) 〈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聯合文學》，第178期。
- (2000a) 〈馬克思主義有那麼嚴重嗎？〉，《聯合文學》，第190期。
- (2000b) 〈當台灣文學戴上馬克思面具〉，《聯合文學》，第192期。
- (2000c [1998]) 〈後現代或後殖民〉，收於周英雄、劉紀惠編《書寫台灣》，台北：麥田。
- 謝雪紅口述·楊克煌筆錄 (1997) 《我的半生記》，台北：楊翠華（楊克煌之女）出版。
- 葉紀東 (2000) 《海峽兩岸皆我祖鄉》，台北：人間。
- 莊春火 (1988) 〈我與日據時期的台共〉，台北：《五月評論》，第二期。
- 王乃信等譯 (1989) 《台灣社會運動史》，第三冊，〈共產主義運動〉【即：《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中卷，中譯本】，台北：創造出版社。
- 魯迅 (1991) 《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葉榮鐘 (1971) 《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台北：自立晚報。
- 黃玉齋 (1999) 《台灣抗日史論》，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黃昭堂 (1994) 〈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於施正鋒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
- 路況 (1992) 〈歷史意識與歷史造像運動〉，《中國論壇》，第379期。

- 蘇新（1993）《未歸的台共鬥魂》，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Althusser, L.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New Left Books
- Aschcroft, Bill et al.eds(1995)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Bhabha, H. (1984)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Fanon, F (1990)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Penguin.
- Foucault, M(1980) *Power/Knowledge*. ed. by Colin Gorde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Hutcheon, L. (1989) *Circling the Downspout of Empire*, Ariel 20(4).
- Gadamer, Hans-Georg (1976) *Philosophical Hermenuitics*. tr. and ed. by David E. Lin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andhi, L. (1998) *Postcolonism Theor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 Hall, Stuart et al. eds. (1996) *Modernity: 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Societie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ers.
- Lyotard, Jean-Francois(1984)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3)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Jenkins, K.(1991) *Rethinking King History*. London:Routledge.

- Kant, I. (1991) *Political Writings*, second edition. ed. by Hans Reis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Quayson, A. (2000) *Postcolon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Rabinow, P. ed. (1984)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Said, E. (1979)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 Spiyvak, G. (1990) *The post-Colonial Critic: Interviews, strategies, Dialogues*, ed. by Sarah Haras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 P. and Laura Chrisman eds. (1994)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原載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月與四月出版的《左翼》第15、16、18號，收入本書時略有增補)



# 做一個理直氣壯的左翼統一派

民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自十八世紀末即對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兩百餘年來，民族主義非但沒有如一些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理論家所預期的趨於式微，快速化為過眼雲煙，反而在二戰後的第三世界成為主導力量，至二十世紀九〇年代，隨著東歐、蘇聯共產體制的崩解，民族主義更再度掀起高潮，促成蘇聯、南斯拉夫聯邦的分裂與兩德的統一，巴爾幹半島也因之重又陷入種族紛爭的漩渦，造成深重的災難。對這股牽動世界歷史的洶洶巨流，左右各派的理論家與學者紛紛提出分析與對策。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以來，西方學術思想界更形成研究民族主義的熱潮，其勢頭至今未衰，不少紮實的論著，於焉問世，給統獨爭論不休的台灣提供了巨大的參考價值。在統獨之爭白熱化的一九九〇年代，台灣學術界圍繞著國家認同與民族主義問題，發表了數以百計的論文與專著，但從左翼觀點立論者不多，不能不說是一大憾事。

## 哈伯馬斯的理性溝通論

從《左翼》創刊到第十二號，左翼陣營針對階級與民族問題及兩岸關係，展開了第一波的熱烈爭論。參與爭論的各方，觀點容有差異，但態度真誠，觀點鮮明，不脫擺事實、講道理的基本規範，在相互商榷、溝通下，對釐清問題，促進了解，無疑有極大的助益。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極力倡導在「理想的溝通情境」下，進行理性的論辯，以期尋求合理的共識，這場爭論可說大體上符合其旨趣。很可惜，這樣的風格沒有能在第二波關於民族問題的論戰中再現。

哈伯馬斯在論述理性的溝通行為時，提出要通過溝通達到相互理解，進而形成共識，必須滿足四個要件：1. 陳述的言詞明白易解；2. 陳述的內容真實可信；3. 態度真誠；4. 論證精當令人折服。簡而言之，就是易解、真實、真誠與正確（Comprehensibility, truth, truthfulness, and rightness）。哈伯馬斯認為，只有根據這四項規範，在沒有受到暴力威脅或欺詐的扭曲之下，進行對話論辯，才可能達成理性的溝通與理解，取得真理的共識，否則就沒有理性的溝通可言（參見 Habermas 1998a: 21-103）。哈伯馬斯的這個觀點著眼於建立開放的公共論域所需的形式條件與程序規範，其實不能保證社會共識的形成，但在一定範圍內，仍不失為可依循的溝通規範。



《左翼》第二波關於民族主義的爭論是由何六九在第十五號發表的〈當幽靈徘徊不去的時候〉（以下簡稱〈幽靈〉）挑起的。作者表面上是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者，一般地否定民族主義，實則主要矛頭對準中華民族主義，並為台灣民族主義鳴冤叫屈，末尾則是大聲疾呼台灣的左派起來進行一場文化大革命，「揭露和徹底批判漢民族主義的所有負面性質，並且把它當作一個思想運動來努力從事」。口氣不小，調子也唱得很高。然而，這完全不是篇事實充分，論證嚴謹的文章，全篇充斥著作者個人的主觀臆斷與對中華民族主義的仇恨情緒，不過是篇雜感性質的東西，根本不值一駁。然而，由於文中運用大量尖刻、挑激的字眼攻擊左翼的統派，且毫無根據地醜化中華民族主義，罔顧事實地美化台灣民族主義，還是激起了樊梅地等人在《左翼》第十六號的駁斥。

### 老鴿倡守貞？

極其可笑的是，在遭到措辭強烈的反駁後，何六九竟然致函《左翼》編輯部高談起「展開建設性辯論與對話，深入良性批判的工作」，還忿忿不平地指責：「獨裁威權式樣的文宣，不必論證就給異議份子加上帝國主義傳聲筒、奴僕等帽子，動輒鬥臭鬥垮。不料在《左翼》上，我們竟然也看到相同手法。何六九的來路，與討論議題何干？分析何六九祖先的血緣，這是哪門子的嚴謹討論？四篇文章，

外加一篇讀者投書，都是同樣的任性方式，毫無二致的粗暴語氣，吐口水淹死人，就是這個樣子吧？……台灣左派會沿襲中國文革（非文革時期也一樣）血淋淋的言語暴力，還是會另圖努力建立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讓我們拭目以待吧。」（《左翼》，第十七號）

何六九自己在文章中責罵左翼統派內心深藏漢民族主義，與右翼統派「勾肩搭背」，是「偽裝」、「偽善」、「詐騙」。這又是什麼雅馴的字眼？所謂「展開建設性辯論與對話，深入良性批判的創作」、「建立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誰不贊成？而且在《左翼》上早就有了良好的前例，不勞何六九來提倡。何六九本身的文章，包括在《左翼》二十號上的〈鄉鄙之歌〉（以下簡稱〈鄉鄙〉），一貫的用囂張、挑釁的口吻攻訐台灣左翼的統派，一貫的任性、恣意醜詆中華民族主義，為台灣民族主義幫腔助勢，也一貫的自稱是國際主義者、非民族主義者，但又一再強調台灣工人階級不能不問民族，並抬出公民族主義大加讚頌。言論如此藏頭縮尾、閃爍不定，難怪《左翼》第十六號的駁斥文章要把他說成是披著國際主義的毛皮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哈伯馬斯所提的理性溝通的四大要件：明晰易解、真實、真誠與正確，何六九無一具備，卻侈談「建設性辯論與對話」、「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其荒唐可笑，有如妓院的老鴇一邊還在掛牌營業，一邊卻在奔走呼籲婦女守貞，聞之不能不令人作三日嘔。

其實，何六九大可不必唱此高調。既然是立意要掀起一場文化大革命，是要與中華民族主義決一

殊死戰，而且也粗暴地謾罵了論敵，又何必害怕論敵以牙還牙，一遭反擊便忙不迭地指控別人語氣粗暴，是「血淋淋的言語暴力」呢？既然要搞文化革命，而且是「大」革命，那麼用毛澤東的名言來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何六九自己不就是這樣子實踐的嗎？他的文章是既不溫良也不恭，更談不上讓了。何六九的作風真像極了馬克思所嘲笑的：「攻擊別人時狂妄粗暴，對別人的粗暴則歇斯底里地易動感情」。至於所謂語氣粗暴，何六九指的是「奴僕」、「帝國主義傳聲筒」之類的措辭。這其實非中共乃至文革所獨有，更非中國首創。就左翼而言，自馬克思以降，爲了與數千年的私有制傳統徹底決裂，爲了運用批判的武器「揭露舊世界，並爲建立一個新世界而積極工作」，在批判論敵時，鋒鏑所向，常是毫不留情，或者用何六九的話來說是「粗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二版跋中說：政治經濟學「不偏不倚的研究讓位於參贊的文巧的鬥爭」，在《剩餘價值理論》第一卷也指責庸俗經濟學家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上的阿諛奉承的侍臣們」。這些話都足夠資格符合何六九所謂的「粗暴」標準。列寧批判論敵的措辭之激烈，就更不用說了。在《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中，他譴責考茨基「向興登堡和威廉二世效犬馬之勞」。在《關於自決問題的爭論總結》中，他又痛斥普列漢諾夫等人「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者和沙皇的走狗」。這些話也絕對夠得上何六九所謂的「血淋淋的語言暴力」。何六九大可不必把發明的專利權奉送給中國與中國的文章。在現代中國，魯迅倒有一句廣爲人知的絕罵：「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不過那是一九三〇年爲

貶損主張文學沒有階級性的梁實秋而創造的，其「血淋淋」遠在中共革命成功之前，當然更與文革八竿子打不著了。

## 論戰的基本規範

問題的關鍵不在用什麼樣的語言，而在於：一、爭論是什麼樣性質的爭論？二、名與實是不是相符？如果爭論雙方的出發點是抱著嚴肅、誠懇的態度，以有理有據的論述方式，為探索真理、尋求共識而論辯，那就會是「揖讓而升，降而飲」的君子之爭，雙方據理力爭，所用的措辭、語氣自然不會有刀光劍影，也就能創造出哈伯馬斯所期望的「理想的溝通情境」。因為初衷是「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爭鳴的目的是為了求友，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的，所以雙方雖然在「爭」，甚至是「戰」，但終究還保持了磊落的武士風度，講究就事論事，以理服人的基本規範。《左翼》第一波關於階級與民族的爭論，正是這樣一種「建設性辯論與對話」、「健康的對話論戰風格」。反之，如果挑起爭論的一方，一開始就打出「革命」的旗幟，那首先就已把對手視為革命的對象，雙方既屬敵我對抗，語氣要不「粗暴」，用詞要不「血淋淋」，那是天方夜譚。何六九自己發起衝鋒號的那篇〈幽靈〉就是個明證。但是，即使是敵我兩軍對壘，若能以堂堂之陣，揭正正之旗，拿出紮實可靠的論據，嚴謹精當

的論證，表現出深厚的理論功底與博洽的知識，結結實實地指出論敵舉證錯誤、論述粗疏之處，有效地駁倒論敵的觀點與立場，那也能博得觀者的喝采，甚至讓有氣度的對手尊為可敬的敵人。反之，如果像何六九那樣，先是搞不清中華民族為何物便濫肆宣洩反華情緒，誣詆左統人士。在樊梅地等人提出反批判，指其為台灣民族主義張目，是帝國主義傳聲筒後，卻不敢面對論敵的指控，提出辯解，依舊怙惡不悛，在〈鄉鄙之歌〉中繼續自拉自唱他那自以為高明、「文明」的公民民族主義老調，醜化中華民族主義。這就顯示他根本不願面對問題，打一場光明磊落的論戰。何六九認為，「帝國主義傳聲筒」、「奴僕」等指控是「粗暴」、「血淋淋的語言暴力」。這完全是心虛、膽怯的自解之詞。衆所週知，用詞的恰當與否取決於名實是否一致，無關乎「文雅」或「粗暴」。對一個信守承諾的人，即使用文雅的「食言而肥」指責他，也構成不可忍受的侮辱，而痛斥一個醜顏事仇和逢迎權貴搖尾乞憐者為「奴才」、「走狗」，也絕不是什麼污穢之詞，更說不上是「粗暴」。關鍵不在於所定的罪行嚴重，而在指控的證據確不確鑿、充不充份。

以上就是我們對論戰交鋒的基本看法。由於何六九沒有一點坦蕩的君子之風，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也不準備待他以君子，與之商榷決疑，而是毫不留情地徹底揭露他裝神弄鬼、形左實右的反動本質，戳穿他除了會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說一些空話、大話之外，根本是個不學無識、思想錯亂的庸妄之徒。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的附言中說：「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

不是爲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值不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爲海因岑宣言爲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我們駁斥何六九也同樣不是因爲他的文章值得回答，而是通過對他的批判可以釐清一些與民族主義有關的問題，並對統獨問題提出左翼的觀點。

### 曲解中華民族主義，膜拜公民民族主義

何六九在《左翼》共發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十四號的〈民族問題：台灣左翼的阿堵物〉，數千字的文章立場擺得很左，歷數馬克思、恩格斯對民族問題的論述粗糙，盧森堡則在民族問題上馬失前蹄。全文滿紙空話，沒什麼論證，其實就是要說一句話：左翼不能迴避民族問題，要從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提出自己的民族論，戰勝右翼，帶領台灣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在民族問題上更進一層樓。立意很好，可是就像天橋的把式，光說不練，沒有拿出真貨。接著就是第十五號的〈幽靈〉。令人不勝訝異的是，我們非但沒有看到「從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民族論，反而是在激烈反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情緒之外，把台灣民族主義打扮成自由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加以吹捧，從而淪爲自由主義的尾巴。而我們引頸企盼的何六九式的左翼民族觀卻依舊在虛無縹緲間，不見降世，以慰吾人之望。〈幽靈〉的胡言亂語在第十六號上遭到樊梅地等人的重擊後，經數月的整軍經武，何六九又捲土重來，但迴避

了樊梅地等人所批判的台獨與台灣民族主義實為帝國主義的衍生物這個重點，在二十號的〈鄉鄙之歌〉中重申〈幽靈〉的基調。不過，不同的是，這回採用論文的格式，引述了一些西方學者關於民族主義的看法，比較成系統地陳述了他的論點，但卻也更全面地暴露了他主觀唯心、機械的形而上學思考方式，絲毫沒有一點唯物辯證的觀點，也充分顯示了他不唯對世界史、中國史甚至對台灣的歷史與現實驚人的無知。更致命的是，他根本沒有讀懂引為立論依據的西方學者的論述，卻用自己的主觀成見胡亂曲解，濫加發揮，使這篇文章成了丟人現眼的笑話大全。

何六九在〈幽靈〉與〈鄉鄙〉兩文中呈現的思路與觀點可以概括如下：

一、他先把中華民族主義窄化、曲解成基於血緣的漢族民族主義，然後再將之貶斥為非理性、愚昧、狹隘的種族主義。接著便歷數漢民族主義的罪狀：1. 長期以來不斷製造出台灣民族主義與漢民族主義的民族矛盾對立；2. 麻痺台灣工人乃致中國大陸工人的階級意識；3. 一向在兩岸為獨裁威權體制提供最得力的掩飾和辯護；4. 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最格格不入；5. 在在阻礙台灣社會（以及中國社會）在政治思考上拋開過時舊傳統舊偏見、邁步向前的最大精神束縛。經過何六九曲解後的中華民族主義在他筆下就這樣成了集罪惡之大成的萬惡淵藪了。

二、他宣稱，相對於愚昧、狹隘、落後、非理性的血緣論漢民族主義，台灣民族主義則是非血緣論的文明、開放、進步、理性的公民民族主義。

三、他認為不列顛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在英國早已缺乏市場，並大加歌頌，從而供奉英國為民主、文明、理性的公民民族主義的典型。

### 不見左翼的民族觀，充當自由主義的尾巴

傳統右派台獨的意識形態有幾個基礎，一、美國與國民黨式的反共八股（即中共是個殘暴的專制政權）；二、由「二二八」事變激化的台灣地方意識；三、粗糙的半調子美國版自由主義。這些因素構成了反共、反中國、反中華民族的台灣民族主義的核心。所謂台獨左派雖然套用根本沒有搞通的馬克思主義語言來粧點門面，建構台灣民族論，但骨子裡與右派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是一路貨，都淋漓盡致地呈現了小資產階級主觀唯心論的色彩。自上一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後，台獨的新世代不滿基於省籍矛盾且法西斯化的台灣民族論，開始提出西方自由主義者主張的「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近幾年漸成台灣分離主義的流行論述。

何六九擺出十足馬克思主義左翼的架式，譴責左翼統一派是「偽裝」成馬克思主義者、實行「詐騙」的一群「偽善」的漢族種族主義者，還大言不慚地說要以較為先進、優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在民族問題上，提出「絕大不同的看法」，戰勝右翼。然而，在〈幽靈〉與〈鄉鄙〉二文中，我們看不



到一丁半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子。何六九的觀點其實了無新意，一、他只是雜揉了新舊台獨的論調，而且極為惡劣的是，爲了想兩面討好新、舊型台獨，睜眼說瞎話地把新型台獨所反對的「福佬沙文主義」的台灣民族論硬生生附會成「公民民族主義」；二、他緊跟在自由主義者的屁股後面，以連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有的肉麻語調歌頌起時髦的「公民民族主義」，充分顯示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尾巴，而且是較爲深思的自由主義者也不肯要的爛得發臭的尾巴。何六九用他粗陋簡單的主觀唯心思維，把西方學者爲了方便分析而劃分的「族裔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 (何六九把它窄化成血緣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兩種民族主義理想類型(ideal type)，視爲機械的、絕對對立的兩極。族裔民族主義代表非理性、愚昧、落後、狹隘，甚至血腥，而公民民族主義則代表理性、開明、進步、寬容。總之，是黑暗與光明、野蠻與文明、善與惡的天淵之別。然後，拿著這抽象的兩極對立概念去解釋十九、二十世紀的世界歷史，也拿來抨擊中華民族主義，美化台灣的分離主義。何六九就是以這樣的思維，自以爲很「理性」地指責所有的民族主義者，特別是中華民族主義者「思想貧乏」、「閉塞」、「偏執自大」。然而，何謂「理性」？用最通俗的說法，那就是運用理智，排除好惡情緒的干擾，不受主觀成見所左右，以客觀存在的事物、證據爲依據下判斷、做結論。何六九對民族主義，特別是中華民族主義，如此充滿激情的詈罵，恐怕自認爲是出於義憤，甚至是崇高的道德義憤：民族主義造成多少流血衝突啊！簡直是罪惡堆積如山，十惡不赦！

尤其，套用台獨常有的口吻來說，中國正以「民族大義」為名，用武力威脅台灣，多麼「霸道」、「蠻橫」、「不文明」、「無理」啊！可是，這絕不是什麼「理性」的反應。對於民族主義這個兩百多年來深深影響了人類歷史，至今餘威未戢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真正理性的態度是斯賓諾莎所說的：「不要哭，不要笑，但要去理解！」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社會主義的根本區別之處，在於它不僅僅像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那樣對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與不人道，有極大的道德義憤，更重要的是，它把義憤轉化成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做出最深刻、理性的科學分析的動力，而馬克思主義的深邃洞見又反過來成了鼓舞反資本主義運動的道德熱情的最強大的理論武器。這就是非理性的道德熱情與理性的科學分析的辯證發展關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得好：「……訴諸所謂永恆正義。這種訴諸道德和法的作法，在科學上絲毫不能把我們推向前進；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麼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做證據，而只能看做象徵。……憤怒出詩人，……可是憤怒……所能證明的東西是多麼的少，這從下面的事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到現在為止的全部歷史中的每一個時代，都能為這種憤怒找到足夠的資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一版，第189頁）其實，何止政治經濟學如此，所有關於人的學問莫不皆然。

## 美化、吹捧台灣民族主義

數十年來，左右各派的理論家與學者正是出於對民族主義這一極重要的歷史運動的重視，用理性的態度，做出了深刻分析，出版了為數可觀的著作，使人們對民族主義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可是，何六九完全沒有這種理性的態度。他根本不會用心認真地研讀諸多探討民族主義問題的論著。對於世界各地區、各國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更是毫無認識，只會把他沒有搞懂的「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做為二元對立的抽象概念，一個貶之入地，一個捧之上天，然後胡亂套用在世界的歷史與事務，尤其是兩岸關係上，來盡情發洩他對民族主義的不滿情緒。以下我們就來逐一揭穿何六九的論述在態度上的不真誠、內容上的錯誤、論證上的邏輯錯亂與知識上的淺陋，證明滿口空話、大話與廢話的何六九，不但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連自由主義者也算不上，只不過是個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蠢才！

何六九自稱他不是民族主義者，更不是台灣民族主義者，可是他美化、吹捧台灣民族主義的程度，恐怕連台灣民族主義者都要愧不敢當，而新型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則更是絕不敢苟同。何六九是怎麼評價台灣民族主義的，這裏且引錄兩段文字，以見其厚顏公然顛倒黑白、違背事實到何種程度：

「漢族民族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之間有極大的差異，不宜視為同類事物。至少，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論色彩，在內容上比較接近一般常見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幽靈〉）

「但是，還有另外一種典型：從民主體制的開始落實開始，原來與民主運動同步驅動的民族訴求卻逐漸淡化。台灣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大多會逐漸脫胎換骨，被那種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若加追溯，其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認同，就已經開始立意不以血緣觀念為主。民族解放之後，血緣因素更見減少，甚至於絕跡。相對於血緣民族主義者在取得政權之後更加著重民族主義宣傳，仇視民主訴求而言，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則是以共同維護民主體制以追求社會的進步為主題，相對地淡化民族主義。」（〈鄉鄙〉）

在何六九的用語中，民族主義∥族裔民族主義∥血緣民族主義，都代表了愚昧、反動、閉塞，可是唯獨台灣民族主義成了例外。台灣民族主義者長期挑動省籍矛盾，將省籍矛盾無限上綱，高喊「台灣人出頭天」大肆煽動「台灣人意識」，以謀快速奪權建國。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前，動輒以「中國豬滾回大陸去！」辱罵甚至毆打具中國意識者，連不會說福佬「國語」者都遭惡言相向，乃至被趕下計

程車。在高雄的群眾聚會中，還出現台獨屠宰豬隻後升上旗杆的血淋淋場面，這些台獨法西斯的行徑，是台灣民衆記憶猶新的事。可是，何六九卻膽敢胡說什麼「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論色彩，在內容上比較接近一般常見於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其民族解放運動時期的民族認同，就已經開始立意不以血緣觀念爲主」。要戳破何六九這種厚顏無恥的謬言，很容易。我們來看看新生代的台獨論者是怎麼說的：

「洪耀福（當時爲美麗島辦公室組織部主任）首先指出，民進黨必須克服四大問題，才能轉變爲成熟的現代民主政黨：一、應從強調對抗心態的反對黨，轉化爲有企圖心的執政黨。二、應將軍一窄化的台獨議題，轉化爲多元社會議題。三、應將教條而不切實際的中國政策，轉化爲務實的中國政策。四、民進黨已被窄化爲福佬政黨，很難爭取以北京話爲主的年輕人支持。」

王時思（當時爲新國會研究室副主任）則對族群問題痛切表示，民進黨至今仍未對濫用族群矛盾的現象進行反省，以致『台灣』逐漸成爲另一種沙文符號，造成『大台灣沙文主義』的擴散。尤其把新黨貼上『外省黨』的簡化標籤，更只求政治方便，完全無視於族群矛盾的政治惡果。

沈發惠（曾為彭謝競選總部幹事）也就族群問題提出批評，認為民進黨其實和李登輝一樣，都只會標舉『台灣人的悲哀』，卻不能認真對待客家、外省、原住民等其他族群的悲哀。

陳俊麟（當時為選舉對策委員會副執行長）則呼籲，民進黨應誠實面對兩種選民流失的危機：一是新黨選票中，高達六成為本省籍。二是傳統的民進黨選民，高達三成流向李登輝。只會把新黨說成『外省黨』，或把李登輝說成『轉向台獨』，畢竟只是自我安慰的鴛鴦主義，並未真正面對民進黨的發展危機。

李建鴻（當時為翁金珠國會辦公室主任）則單刀直入，直接批判台獨有教條化的危險，認為不少民進黨人只會說堅持台獨的原則，卻提不出實踐台獨的方法，以致在黨內逐漸形成『台獨法西斯』文化，根本無法對台獨的實踐困境，展開真誠嚴肅的討論。更嚴重的是，民進黨的領導階層，到處充斥個人英雄主義，更使務實理智的良性對話難以形成。

外省第二代的段宜康（台北市議員）更坦率指出：一九九四年省長選舉，民進黨喊出『台灣人支持台灣人』，難道不算是族群動員？他譴責民進黨內『仍在利用族群矛盾得到利益的領導人』，認為民進黨應反省『大福佬沙文主義』，不能只利用既有的族群矛盾，挑選最容易走的路。他還指出，不管是標舉『台灣人尊嚴』的彭明敏，或是主張『台灣黨』的許信良，事實上都在利用族群意識抄政治捷徑。彭明敏訴諸民進黨的本省人支持者，許信良則試圖和

最大的本省人勢力國民黨結合，兩人都未慮及政治捷徑所可能帶來的族群衝擊。」（引自郭正亮，1998：90-91）

說這些話的時機，時在不遠，就在一九九六年四月，是彭明敏高舉台獨旗幟參選總統慘遭挫敗後不久，新世代台獨所做出的痛切反省。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無不在重重地抽打何六九那張胡說瞎話的嘴巴。古往今來，這世界總不缺一種喜歡掩耳盜鈴、自以為聰明的蠢才，何六九就是這種貨色。他竟以為摀住自己的眼睛，信口胡言，世人就會輕易讓他蒙騙過去，到頭來他只能自欺，除了白痴，連小學生他也騙不了。

### 台灣民族主義是超級血緣論

何六九說的渾話還不止於此。他雖然不止一次自稱不是台灣民族論者，可是他不但處處在以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立論，還替台灣民族論者塗脂抹粉，把他們打扮得非常民主、文明、理性，而所謂漢民族主義者則被醜化成反民主、非理性、粗鄙。且看〈鄉鄙〉中的兩段文字：

「而在這個新興的民主社會裡，過去曾經長期遭受民族壓迫的族群人民，並沒有在解除壓迫枷鎖之際，如同不少地區人民那樣推波助瀾地造成另一個民族主義的狂熱浪潮。相反的，一般對於嶄新民主體制的關注投入之情，遠遠超越了以往遭受歧視欺凌所積累的憤怒。他們一再表現出寬容的胸襟，寧願讓美好夢想通過有別於民族動員的另一種政治程序得以實現。一個建立在現代公民意識基礎之上的政治認同，開始形成。從英國到台灣，民族主義情懷的漲落歷程似乎快要走完一個曲折的歷史循環。」

「在距離解嚴已經超過十年的台灣社會，仍然有許多血性的漢族民族主義者蠢蠢欲動，不耐地等待復辟和審判異端時刻的到來。然而，在遭受數十年民族壓迫的人民當中，當他們成功地以民族反抗形式為自己掙得一定的民主權利之後，反而開始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除了少數的孤立個案之外，他們並沒有因為血性漢族民族主義者一再在街道上公然辱罵挑釁，而激怒得回報以同樣的激情。不但如此，他們當中還有許多人經常在各種場合互相告誡說，穩定的民主體制才是台灣人民福祉的最大保障，而偏重倡導台灣民族主義則是可能帶來負面作用的。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和自信，與另一造的偏執和自大，恰成強烈對比。」（《左翼》第二十號，第14、21頁）



在何六九的文章中，完全以台灣民族主義者的口吻再三提到「台灣民族解放運動」、「民族壓迫」。我們倒要問問這個「台灣民族」是個什麼玩意兒？他的內涵與構成分子爲何？又遭受了怎麼樣的「民族壓迫」？何六九斬釘截鐵地否認台灣民族主義是血緣論的民族主義，這點我們不妨同意，但理由與何六九的截然不同。台灣民族主義並非超越了血緣論，而是連稱血緣民族主義的資格都沒有。台灣民族主義者雖然如何六九所云「血緣同樣屬於廣義漢族」，但他們的福老沙文主義比漢民族主義還要狹隘、閉塞。一般的血緣論民族主義是容納所有同血緣的人爲「我族」，許多台灣民族主義者對不附和台灣民族論，甚至只是不講福佬話的客家人、外省人，雖然同屬漢族，也加以排斥、歧視，對非漢族的原住民，那就更不用說了。這已經不是一般的血緣民族主義而是舉世少見的極端褊狹、排斥性的超級血緣民族主義了。這也是台灣民族主義搞了幾十年，從海外到台灣，從戒嚴到解嚴後已自由化、民主化十多年的今天，卻始終得不到台灣絕大多數不論省籍或族群的台灣居民支持的重要因素。對這點，前引台獨新生代的痛切陳詞已可充分說明。何六九煞費苦心她想抹除台灣民族主義以福佬人爲中心的極端褊狹固陋的超級血緣論的痕跡，但終究徒勞無功。在他自己的論述裡，就充分暴露了捉襟見肘、自相矛盾的窘態。他先是在〈幽靈〉中說：「台灣民族運動從開始就相當成功地擺脫了血緣色彩」，然後又在〈鄉鄙〉中說：「從民主體制的開始落實開始，原來與民主運動同步驅動的民族訴求卻逐漸淡化。台灣就是其中的一個。在這種類型的情況下，民族認同大多會逐漸脫胎換骨，被那種

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然而，在遭受數十年民族壓迫的人民當中，當他們成功地以民族反抗形式為自己掙得一定的民主權利之後，反而開始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何六九在這裡既說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民族認同」會「脫胎換骨」被「以民主權利為中心的公民意識所取代」，「以一種近似淡然的態度來對待台灣民族認同」。可見台灣民族主義本是一種與以公民權利為核心的「公民民族主義」不同的東西。否則，「脫」什麼樣的「胎」，又「換」什麼樣的「骨」呢？

那麼這個不是「公民民族主義」而又以「台灣人出頭天」為主要訴求的台灣民族主義，按照何六九自己的機械二元對立觀，不是他所鄙夷、痛加斥罵的「血緣論民族主義」，還會是其他的什麼東西呢？何六九的論述中雖津津樂道「台灣民族運動」、「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但從未給予明確的內涵，即一方面妄加比附於「公民民族主義」，一方面又自打嘴巴地承認兩者是不同的東西。這個困窘之境除了肇因於他妄圖為台灣民族主義這個天殘地缺的醜怪之物化妝美容以欺人耳目之外，還由於他根本不知道「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兩者既有所區別又相互聯繫的辯證關係。關於這部份我們在下文會進一步詳論。

## 台灣民族主義為何退潮？

對於以福佬沙文主義為核心的台灣民族主義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後之所以由盛而衰，「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逐漸在台獨陣營中得勢的原因，何六九把它歸功於台獨內部自覺自動地轉化。這當然也是罔顧事實的渾話。在台獨運動中，「民主」與「獨立」雖然並舉，但孰重孰輕，何者為目標，何者為手段，一直存在著矛盾。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期以前，台灣民族主義的獨立建國優先論可說佔居主流地位。換句話說，所謂「打倒外來殖民政權」、「台灣人出頭天」的主張是主軸。而所謂「民主」的訴求，主要是從認為民主代表多數統治、多數決定的概念出發，以為福佬人既佔台灣人口多數，只要能煽動起福佬人的「台灣人意識」（實即所謂「台灣民族意識」），擴大省籍矛盾，將之加工製造成虛構的「民族矛盾」，獲得福佬人的認同，就可對內以「民主」之名快速奪權建國，對外乞求美國為首的反共國家允許「民族自決」，獲得國際承認，取得國際地位。在台灣民族主義者這樣的思維裏，「民主」只是奪權建國的工具，而不是最高的價值。即使是比較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台獨論者，也只是把「民主」當成台灣獨立背書的「程序」要件，此即所謂「公民投票」、「住民自決」論。這當然不是資本主義民主的真正實質內涵。可是，就連這種形式上的程序民主，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眼中

也不是首要之務。在極力擴大省籍矛盾，將之上綱上線為「民族矛盾」的煽動宣傳下，自然發展出前述極其褊狹與反理性的福佬沙文主義，造成台灣社會內部愈趨嚴重的省籍衝突與統獨對立情勢。

台獨的論述漸由福佬人中心的台灣民族主義轉向公民民族主義，主要是以下兩個因素所造成：一、至一九九二年立法院全面改選，台灣的立法機構已完成本土化，迨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則整個統治集團的合法性已經民主程序獲得認可，而國民黨卻依然牢牢掌握了政權，所謂的「外來政權」論就此連表面上可以成立的理由都付諸東流，更何況總統大權落在台灣人李登輝手上，所謂「台灣人出頭天」的感情訴求也得到了滿足，此際再販賣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已經不會有多大的市場了；二、如前所述，台灣民族主義造成的台獨法西斯作風滋生了嚴重的省籍衝突，在政治與社會領域中都加劇了緊張的對抗。面對中共一九九五年開始連番的武力示警，新黨與民進黨內的非台灣民族主義基本教義派都憂心台灣的內亂將傷害台灣的民主，並予中共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機會，因而倡導省籍與統獨的「大和解」，形成共同對抗中共以維持中華民國的現狀的統一戰線，力主在資本主義民主憲政的框架下，依照民主的規則，分配權力，尋求妥協，尊重多元的差異，維持台灣的安定。一九九六年，彭明敏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旗幟鮮明標舉台獨立場，卻遭慘敗，激起了前已述及的不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的民進黨新世代的強烈批判，並於一九九六年五月七日發表〈台灣獨立運動的新世代綱領〉，明確否定台灣民族主義，提出了具有公民民族主義內涵的主張。因此，很諷刺的是，中共以武力警告台獨，遭到何

六九咬牙切齒的痛恨，卻也遏制了台獨的氣勢，加速台灣民族主義的退潮，逼使台灣內部必須用形式民主的原則，緩和省籍與統獨的對抗。

因而，台獨陣營中公民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台灣民族主義論，主要是現實上台灣民族主義不但已經行不通，而且還危害台灣，再不改弦更張，只能給台灣帶來深重的禍害。這既是迫於政治現實不得不然的轉型，也是台獨內部經過激烈鬥爭才有的結果。彭明敏等從民進黨出走另組「建國會」，台灣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派自行成立「建國黨」，陳水扁提出了「新中間路線」，都是這場鬥爭後的產物。這個路線變化，距今未遠，人物、事證俱在，本不難察知。然而，何六九卻把它描繪得很詩意，說什麼「一般對於斬新民主體制的關注投入之情，遠遠超過了以往遭受歧視欺凌所積累的憤怒，他們一再表現出寬容的胸襟，寧願讓美好夢想通過有別於民族動員的另一種政治程序得以實現」，「所表現出來的寬容和自信，與另一邊的偏執和自大，形成強烈的對比」。這些鬼話根本與實際情況不符，明眼人一看即知純屬何六九爲了諂媚台獨而寫的諛頌之詞，不過是文學侍從之臣常幹的下流勾當，不唯無法欺人，只能增加有識者對他的鄙夷。

## 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曲解

何六九文章的矛頭主要是對準中華民族主義。可是這個蠢才不僅愚昧，他還無比疏懶。他卯足了勁濫加醜詆中華民族主義，但何謂「中華民族」？他在謾罵之前，完全不曾稍稍下點工夫去了解，連最基本的認識也沒有。他所幹的事就是把中華民族主義等同於血緣的漢民族主義，然後再貶斥為排他的、引起嗜血的種族屠殺、種族清洗的種族主義。在他眼裏，兩岸的民主、階級、統獨問題的根子都出在他所曲解的這種中華民族主義。一句話，萬方有罪，罪在中華民族主義。

我們先來「欣賞」幾段他的妙論（也是謬論）：

漢族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以種族認同為主軸的血緣民族主義。……細加分析當前漢族民族主義理念的內涵，我們可以發現，它不但在過去數十年間沒有一絲一毫的長進，而且每況愈下，在許多方面越發暴露文明退化、思想閉塞、道德破產的精神狀況。無論是海峽的此岸或者彼岸，凡是直接或者間接有關漢族民族主義（或者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著，幾乎是千篇一律的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兀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

「炎黃子孫」和「中華民族」的觀念，互相抵觸，漏洞百出，貽笑大方。官方廣加宣傳如此狂妄幼稚的觀念，居然連漢人知識分子也興奮地群起附合。在立論上膚淺而且在精神上相當不理智的血緣論民族主義理念，一旦通過國家機器之手，執意在一個多民族或者多族群的國家內部雷厲風行下去，必定招致強力反彈。果不其然，這是過去和眼前真確發生在海峽兩岸的事。

民初五族共和的口號（以及後來中共的民族政策），可以說是對於血緣漢族民族主義的笨拙掩飾和補救，絲毫無法改變漢族民族主義的血緣論本質，無論如何也欺騙不了中國境內的異族。難怪大清朝一瓦解，蒙古等族紛紛獨立求去。將近百年後的今日，他們仍然要獨立求去。今日的西藏人和蒙古人，即使僑居異國多年，對於國民黨所設置的蒙藏委員會咬牙切齒、深惡痛絕，對於目前直接統治他們的中國更不用說了。在新疆，武裝民族反抗已經進行有年了。若要怪罪帝國主義「干涉中國內政」和「傷害中國人民感情」，恐怕應該先反省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不是。不幸的是，天下間的種族主義者都是先天性缺乏反省能力，因為種族主義是不受理性約束的，甚至於是反理性的。

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在許多情況下其實根本等同於仇外的漢族種族主義）使得中國境內民族問題越來越嚴重。這本身固然是一個大問題，但是，它首先從許多方面扭曲了漢族人民的精神面貌，腐蝕了漢族人民的道義勇氣和政治識辨思考能力，模糊了漢族工人階級的階級觀念和階級使命感。文明社會不可或缺的多元認知和寬容尊重精神，立受重創。一個文明民族之所以偉大的條件，因之凋零；民族靈魂庸俗不堪，甚至於變得嗜血暴戾，把戰爭殺戮當做兒戲，輕率地要動用飛機大炮『教訓』鄰國，以為自己有本領擺出武力威脅的姿態是一件很體面的事。（〈幽靈〉，《左翼》第十五號，第3、4、7頁）

何六九這類對中華民族主義語氣高亢、充滿激情的控訴充斥在〈幽靈〉與〈鄉鄙〉中。他自命「理性」，沒有像很多左翼人士陷入中華民族主義的「魔障」，也顯得非常大義凜然。然而，他的「理性」與「大義」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那是緣於對中國歷史、現實狀況的極其無知與保守反動本質。



## 漢族主要不是基於血緣的概念

關於炎黃子孫與中華民族的概念問題，我們先引幾段史書的記載，給何六九這個蠢才兼懶漢開開眼界：

「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是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記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錄焉。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入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之北，民賴其勤，帝舜嘉之，命為田祖。」（《魏書》，卷一，序紀第一）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諱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出自炎帝神農氏，為黃帝所滅。子孫遷居朔野。」（《周書》，卷一，帝紀第一）

這兩段文字，一是北魏皇帝拓拔氏，一是北周皇帝宇文氏溯其血緣譜系的記載。兩朝都是鮮卑人，

但也自稱是「炎黃子孫」。再往前的西晉時期，鮮卑人慕容氏建立了前燕政權，也說：「其先有熊氏（按：即黃帝）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晉書》，卷一〇八，慕容載記）。是不是只有鮮卑的胡人才自稱「炎黃子孫」呢？那又不然。匈奴人赫連勃勃在西晉末年建立夏國，即「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並稱：「朕大禹之後，……今將應運而興，復大禹之業，」，（《晉書》，卷一三〇，赫連勃勃載記）。非漢族而自稱漢族苗裔的王國，所在多有，此處不一一列舉。北朝的胡人政權不僅自認血統源於炎黃，還積極實行漢化政策，直斥南朝的漢人政權為「南僞」、「島夷」，與之爭中華正統。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胡人向中原地區大規模內徙，建立北朝政權；晉室南渡後，漢人政權直接統治了南方的蠻、僚、俚人等少數民族。數百年間，通過不斷的征伐、衝突，從北到南，促成了漢族與南北各種族裔在血緣、文化上的相互滲透與融合。至隋唐而中國結束南北分裂，復歸統一，完成了一次民族的大融合。隋唐的統治集團俱由漢族與鮮卑族混血構成。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唐高祖、太宗、高宗連續三代俱為鮮卑族女子所生，家族中更頻頻與胡人通婚，這些俱為史書明載，廣為人知。故而，在傳統中國，「漢」「蕃」或「華夏」與「夷狄」之別，主要是根據「文化」而非「血緣」。對此，大陸的歷史學者做了很好的概括說明：

「按照『大一統』理論，『華』、『夷』是可變換的，而區別『華』、『夷』的最高標

準是文化。這個作為標準的文化在當時就是以儒家思想為主體的漢文化。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華夏』，不符合這個文化規範的是『夷狄』。因而，大一統思想很容易為陸續內遷的少數民族所接受，並用來作為自己的政治思想武器。在大一統思想的指導下，入主中原的各少數民族一邊自稱為華夏『先王』之後，在族源上與漢族認同，一邊主動接受漢族文化，在境內努力推行漢化政策，在文化上以中華自居。」（《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2000: 589）

回族的民族學學者也指出：

「在基因和體質方面進行比較，北方漢族與蒙古族更為接近，而與南方漢族距離較大。所以構成『漢族』的最重要的基礎，不是體質特徵和血緣基因的同源，而是文化層面的同化。廣東人是漢族，但是廣東人的體質特徵與越南人相接近，而與北方漢人差別很大，廣東話發音與漢語普通話的差別也很大。中原王朝在區分屬民時，常用的範疇是『化內』和『化外』。所謂『化』在這裏指的是漢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認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則是需要教育開化的『生蕃』、『蠻夷之屬』。中原文化的另一個特

點，就是認為『化內』和『化外』可以相互轉化，『有教無類』，所以古人也懂得辯証法。」

(馬戎 11001:85)

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不只有少數民族的不斷漢化，也有漢人不斷融入少數民族中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相互融合的諸多史實（參考：翁獨健主編 二〇〇一；《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二〇〇〇）。因此，中國著名的社會學與民族學學者費孝通特別指出：

「在看到漢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大量吸收了其他各民族的成分時，不應忽視漢族也不斷給其他民族輸出新的血液。從生物基礎，或所謂『血統』上講，可以說中華民族這個一體中經常在發生混合、交雜的作用，沒有哪一個民族在血統上可說是『純種』。」（費孝通一

九八九）

## 中華民族的內涵

關於「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內涵，費孝通一九八八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 Tanner Lecture 發表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的演講。這篇論文結合了考古學、歷史學、語言學、民族學與作者親自至少數民族地區調查研究的多年成果，對中華民族的形成過程，做了系統的闡述，普獲中國與國際學界的重視，目前已成大陸詮釋中華民族觀念最具影響力與代表性的觀點。且看他怎麼說的：

「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這也許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過程。中華民族這個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還有他的特色：在相當早的時期，距今三千年前，在黃河中游出現了一個由若干民族集團匯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像滾雪球一般地越滾越大，把周圍的異族吸收進入了這個核心。它在擁有黃河和長江中下游的

東亞平原之後，被其他民族稱為漢族。漢族繼續不斷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壯大，而且滲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區，構成起著凝聚和聯繫作用的網絡，奠定了以這個疆域內許多民族聯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的基礎，成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經過民族自覺而稱為中華民族。」

（同上）

在費孝通的理論中，中華民族是由五十六個民族做為基礎，共同構成的一個更高層次的有機統一體。各個民族由廣義的文化（語言、宗教、生活習俗等）構成獨特的群體，但在歷史發展的長期過程中，通過經濟、文化的交流與政治的統合，逐漸為形成一個包容各個族群（ethnic group）的民族（nation）即中華民族創造了有利的客觀條件，到了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在百餘年各族人民攜手進行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的過程中，各族人民陶鑄了休戚與共、榮辱攸關的感情與意識，終乃形成共同的中華民族意識，確立了中華民族在多元的族群文化的基礎上建構起來的一體格局。一九九六年十月，日本國立民族學博物館舉辦「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論」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費孝通提出了書面發言〈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把他的觀點做了簡要的概括如下：

「第一個論點是：中華民族是包括中國境內五十六個民族的民族實體，並不是把56個民

族加在一起的總稱，因為這些加在一起的56個民族已結合成相互依存、統一而不能分割的整體，在這個民族實體裡所有歸屬的成分都已具有高一層次的民族認同意識，即共休戚、共存亡、共榮辱、共命運的感情和道義。這個論點我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五十六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

第二個論點是：形成多元一體格局有個從分散的多元結成一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有一個起凝聚作用的核心。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於他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一個高層次認同的民族。

第三個論點是：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所以高層次的民族可以說實質上是一個既一體又多元的複合體，其間存在著相對立的內部矛盾，是包含了差異的一致，並通過消長變化以適應於多變不息的內外條件，而獲得這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費孝通一九九七）

## 中共的民族政策

中共自一九四九年執政後，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平等原則，在既批判大漢族主義也反對地方小民族主義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推行了一系列尊重少數民族的政治、文化權利的政策（可參考：《原住民族》第12期），先確立法律上的平等，再逐步消除實際上的不平等。費孝通的觀點正是對中國大陸的民族政策的一個理論概括。誠如費孝通所言：

「新中國的成立在我國歷史上是件空前的大事，全國社會結構起了重大變化，其中之一是民族關係的大轉變，從不平等的關係轉變為平等關係。中國是個多民族國家，民族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但是幾千年來基本上沒有變的是民族間不平等的關係，不是這個民族壓倒那個民族就是那個民族壓倒這個民族。在這段歷史裡中國在政治上有過多次改朝換代，佔統治地位的民族也變過多少次，但民族壓迫民族的關係並沒有改變。直到這個世紀的初年，封建王朝覆滅進入了民國時代，才開始由孫中山先生為代表推行了『五族共和』的主張。又經過了幾乎半個世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方出現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事實，並在國家的



憲法上做出了規定。從此我國各民族間的相互關係出現了一個新的民族平等的時代，現在又經過近半個世紀。今天回想起我們中國這個民族關係的根本變化，如果針對當前世界上民族矛盾和戰爭至今未息的形勢來看，不能不承認民族平等是件有關人類共同命運的根本大事。在一個和平大同的世界裡，民族平等是絕不能少的條件。這個條件在我們中國首先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是應當大書特書的。」（同上）

要消除幾千年歷史發展造成的族群之間在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實際上的不平等，從而徹底解決族群之間的矛盾，當然不是幾十年甚至百年所可輕易完成的。尤其只要階級社會沒有廢除，國家就不能消亡，國家不消亡，民族的矛盾也就無從徹底解決。因而，今天中國大陸也還存在著由各種不同因素造成的這樣那樣的族群矛盾。可是，何六九一不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去認識民族矛盾產生的一般根源，二不具體分析新疆、西藏獨立運動的性質，卻片面地歸因於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西藏、新疆的獨立運動是哪些份子在領導？又是基於何種因素搞分離主義？何六九從不一問。列寧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提到：

「在封建關係或宗法關係和宗法農民關係佔優勢的比較落後的國家和民族中，要特別注

意以下各點：

.....

第二、必須同落後國家內具有影響的僧侶及其他反動的和中世紀式的份子作鬥爭；

第三、必須同那些企圖利用反歐美帝國主義的解放運動來鞏固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

的大伊斯蘭主義和其他類似的派別作鬥爭；」（《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275）

一九五〇年代以後的西藏獨立運動，其起源是達賴喇嘛為首的統治階級不願放棄神權統治與殘酷的封建農奴制，不惜充當美、英帝國主義的反共、反華工具，這與國民黨為維護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依附在美國帝國主義之下反共如出一轍，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新疆的獨立運動同樣是一批原有的統治集團，不甘失去既得利益，藉著宣揚泛突厥主義與泛伊斯蘭主義大搞反共反華把戲（參考：陳延琪、潘志平編 2000）。這類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且不論馬克思主義者必然大加撻伐，連自由主義者也頻頻指摘，不予苟同。何六九卻為其打抱不平，把藏獨與疆獨問題一股腦兒全歸罪於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徒見其反動保守的本質，不要說他空口自我標榜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立場純屬欺人之言，他連充當自由主義者的資格也沒有。

何六九若硬要指中國大陸的民族矛盾都是「血緣論漢族種族主義」造的孽，那麼我們倒要質問何

六九：美國是個貨真價實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何以自建國以來以黑白人爲中心的種族衝突不斷，迄今仍暴動頻生？這又是什麼因素造成的？而何六九所頂禮膜拜將之供奉爲「公民民族主義」典範的英國爲何種族矛盾也日形惡化，近年來屢屢發生有色人種的暴動？這些活生生、血淋淋擺在世人眼前的現實，斷非頭腦簡單、知識淺陋、立場反動的何六九所能解釋說明的（對此我們在下文會繼續深論）。至於何六九原本用來譴責所謂「血緣論漢族民族主義」的話：「把戰爭殺戮當兒戲，輕率地要動用飛機大炮「教訓」鄰國，以爲自己有本領擺出威力威脅的姿態是一件很體面的事」，我們奉勸他還是把它奉送給他那「文明」、「寬容」但「民族靈魂庸俗不堪，甚至於變得嗜血暴戾」滿手血腥的宗主國——美、英帝國主義吧！兩百多年來的世界歷史，這種例子還少嗎？

中國大陸固然還存在著諸多有待逐步克服的民族矛盾，但其民族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無可非議的。大凡實際做過調查研究者都可承認其進步性，近年來台灣學界也不乏兩岸民族政策的比較研究，可爲覆按，這裡且引述一位中國蒙古族的民族學學者的看法做爲佐證：

「多族群國家的實踐表明，多元文化的互動並不會產生嚴格意義上的一種民族文化吃掉另一種民族文化的現象，而是會產生第三種甚至第四種文化，至於這第三種或第四種文化稱爲什麼文化，那只是個由時間和空間限定的命名和信仰問題。鞏固和加強多族群國家政治和

國土的一體，有利於多元文化的並存和互動。國家的強大干預可以有效防止毀滅性的民族仇殺，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甚至發展少數民族文化。文化多元和政治、國土一體是一個辯證統一體，在現代化社會的特定歷史階段中，它們應當是並行不悖、相互依托的，中國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對於多族群國家來說，在承認多元文化現實的同時，強調政治和國土的一體，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民族國策。」（納日碧力戈 2000: 224）

### 「理想類型」並不等於現實

從以上的論述可知，「漢」、「華夏」等名詞所指涉的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今日中國大陸的「中華民族」概念更遠非何六九所謂的「血緣漢族種族主義」。何六九在〈幽靈〉與〈鄉鄙〉中對中華民族主義的攻擊，除了反華情緒外，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與理論知識的依據，他有什麼資格談「理性」呢？又是誰有關中華民族主義的論述「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呢？正是何六九自己！

何六九的論述之所以「濫情、粗糙和理路錯亂」，除了他的反動本質與主觀唯心的思維使然，還

由於他自以為聰明又極為輕佻、懶惰。對於民族主義這個極具影響力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他只會簡單地把它視為「缺乏思想內容」、「內容空洞無物」、「不值得分析」、「也無從認真分析」，然後斥為「非理性」、「愚昧」、「思想閉塞」的表現。這個蠢材根本不稍微想一想為什麼被西方社會科學界奉為一代宗師的韋伯（Max Weber）會是個德國民族主義、甚至帝國主義者？為什麼被西方哲學界推崇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且對西方科技文明有深刻批判的哲學家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會支持希特勒的納粹主義？他們也都是何六九所貶斥的「思想貧乏」、沒有「深厚的人文思想根基」、不知「文明」、「寬容」為何物的「閉塞鄉鄙」嗎？也是「以血液從事思考或者以血液代替思考」嗎？何六九之沒有能力理性分析民族主義的成因，只能訴諸非理性的情緒性攻擊，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他隨便看了幾本洋書，但又沒有能力搞懂就濫加曲解，然後愚昧地盲從起來，終於陷入「無異於兒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

在西方學術界被稱為民族主義研究奠基者的孔恩（Hans Kohn），出於西方自由主義的成見，把民族主義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理性、多元、依據自由意志形成的「西方式」民族主義，以英、法、美三國為代表；這種以社會契約組成的民族國家滿足了具有社會進步觀念的新興中產階級建立政治共同體的渴望。另外一種則是以社會有機論為基礎、帶著濃厚感情、神秘與威權色彩的「東方式」民族主義，以東歐、俄國與亞洲國家為代表；這些地區因社會落後、中產階級軟弱無力，故由低層的貴族與

知識份子訴諸民衆的民族直覺抵抗拿破崙的入侵，並倡導民族主義（參考 Smith 1991: 80-81; 1996: 182）。孔恩這樣的分類對比，當然是過於粗糙簡單且不盡合乎事實，但其後不少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仍加以襲取，做為分類民族主義的標準。不過，思慮比較嚴謹的學者如 Smith、Greenfield 都強調這種分類只能當作便於分析的韋伯式理想類型（ideal type），並不能直接套用在具體的現實事例上。韋伯的「理想類型」又稱「純粹類型」（pure type），是在掌握複雜的客觀世界時，從一個特定角度，片面強調某些因素，將分散、無聯繫的現象整理成的邏輯一致而無矛盾的分析概念。因此，這是一種在現實世界中無法經驗到的純粹由思維建構的烏托邦，更不是對客觀規律的理論概括。如韋伯所言：「理想類型是構思出來的概念，既非歷史的實在（historical reality），甚至也非「真正的」實在（"true" reality）。至於把它視為一個實際的情況或行為可當做案例歸類於其下的概念，那就更不合適了。它具有純粹理想的限制性概念的意義，可以拿來比較並考察實際的情況或行為，以闡明實際情況或行為中某些有意義的成份。」（Weber 1968: 93）

所有民族主義都含有「公民」與「族裔」的成分

正因如此，以研究民族主義聞名於國際學術界的英國學者 Anthony D. Smith 一方面用「西方或公

民的模式」(Western or "civic" model) 指稱由「歷史形成的領土、法律—政治共同體、成員享有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及共有的公民文化與意識形態」這些要素構成的國族，另一方面用非西方的「族裔」(ethnic) 模式來指稱「強調血統與本土文化的共同體」的國族觀念，將兩者作為二元對立的「理想類型」加以對比 (Smith 1991: 11)。但他隨即指出：

「實際上，每一種國族主義都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包含了公民的與族裔的因素。有時公民與領土的因素居主導地位；在另一時候則是族裔與本土的組成部分受到強調。……這表示在這兩個對立的國族模式背後，對國族這個與其他集體的、文化的認同相異的東西，是由什麼因素構成的，兩者有某些共同的想法。它們都認為：國族是聚居在連成一整片的領土中的人口；他們必須有自己的祖國；他們的成員享有共同的民眾文化與共同的歷史神話、記憶；成員在共同的法律體系下有相互的合法權利與義務；國族有一個成員可在領土內流動的共同的分工與生產體系……從概念上說，國族在不同的情況下，依不同的比例混合了公民、領土與族裔、宗譜的這兩個方面。正是因為國族有這樣多重的面相，才使國族認同在現代生活與政治中成為如此富有彈性而又持久不衰的力量，並且使它能夠卓有成效地結合其他有力的意識形態與運動，卻不失其本身的特性。」 (Smith 1991: 13-15)

另一位研究民族主義的著名學者 Liah Greenfield 也使用「公民的」(civic) 與「族裔的」(ethnic) 二元對立模式來分析國族主義。但同樣強調：

「當然，必須要緊記在心，這兩種分類僅僅是為了精確指出在不同的——特定的——國族主義中某些表明其特色的傾向。它們必須被看做是可以趨近但不可能完全合乎現實的模式。在現實中，很明顯地，兩種類型混合在一起是最常見的型態，但這些依不同比重組成的混合物，其相異的程度仍大到我們足以辨識它屬於何種類型，因而，這種分類法仍是有用的分析工具。」(Greenfield 1992: 11-12)

這兩位學者的著作何六九在〈鄉鄙〉中都會引用，然而，何六九這個蠢材完全沒有他們的這種認知，只會粗糙而且錯誤地把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機械地視為兩元對立絕不相容的模式。一方是文明、理性、進步，另一方則是愚昧、非理性、落後，兩者判然分明，一在九天之上，一在萬丈淵底。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思考方式使何六九的文章漏洞百出，處處自相矛盾。



## 公民民族主義也靠歷史神話建立民族認同

由於何六九濫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的公民民族主義的「理想類型」，以之盡情嘲笑、斥責所謂「血緣論民族主義」的歷史神話，卻正好暴露了他的淺薄無知。他自以為「理性」地說：

「……人文思想上的條件越是貧乏，人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方向就越接近人類的原始性直覺。正如同稚童習慣在疼痛時喊爹娘一樣，大凡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每當身處危難關頭的時候，總是要祈求於祖宗的保佑。於是，很多晚近的民族主義運動者從一開始都急切要從遠祖身上尋找自我存在的理論根據。除此而外，他們實在不知何去何從。

在此情況之下，明明是近代歷史環境下的一個相當晚近的產物，卻都要追溯遠古，把它說成是一個自古已有，等待被喚醒的事物。明明是為了解決當前（而不是自古已有的）政治問題而展開的運動，與久遠的先人毫無牽連，卻要吟唱『祖宗在注視著我們』。問題是，每當人們追溯遠祖的時候，總是事實與神話不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穿鑿附會，甚至於憑空杜撰新神話。六十年前，有兩位學者嘲諷道，民族可能是『一起錯認祖宗』的結果。在此情

況下，講求嚴格考證的信史觀念都是多餘的，反正只要『信仰產生力量』就夠了。於是，荒郊野外亂葬崗上來路不明的鬼魂，突然之間被一批以孝子賢孫自居的人們供奉膜拜起來，奉為神聖無比的祖宗。亂認祖宗的荒唐事，經過一番的精心修飾設計，成為鄉鄙政治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適用為政治領袖人物心靈閉塞的遮羞布。

……

問題是，思想貧血的血緣民族觀經常有詞窮理盡的時候。所以，對於偏激的民族主義者而言，血緣可以有而且必須有各種同樣具有無法明白言傳和超越理性的替代品和補助道具。例如唯我獨尊的宗教、語言，自吹自擂的優良文化傳統，自欺欺人的歷史傳說等等。在血緣思考驅動下所產生的激情，輕而易舉地尋得血緣論以外的替代品，賦予同等的非理性和反理性激情成分。」（〈鄉鄙〉，《左翼》第二十號 15-16,18）

對這些幼稚的論調，我們引一段 Smith 的話就足夠燭照其淺陋了：

「幾個世紀前，西方國家用血汗澆鑄出民族的認同感，而今西方的觀察家安然坐享其民族認同，卻習於因十九世紀歐洲或二十世紀亞、非洲的民族主義知識份子過甚其詞地編造民

族歷史而對其嗤之以鼻。那些民族認同鮮少受到質疑，也沒嚐過流亡之苦或家國淪亡、文化凌夷之痛的人，當然沒什麼必要為建立獨特可識的認同而尋『根』。然而，當別地方的人必須從屋頂上高嚷：『我們有所歸屬，我們從我們的祖先與我們的歷史知道我們的民族特性。』他們則以含蓄而隱晦的方式也說著同樣的話。民族認同中有許多充滿欺罔與曲解的『神話』及『記憶』，那完全無關緊要。所謂『不證自明』的英國或法國的民族認同正是由這類神話與記憶構成的；有了這些虛構不實的神話與記憶，英國與法國才成其為『民族』，一旦沒了這些神話與記憶，英國與法國不過是一大堆聚居在政治空間裡的人口而已。

當然，『民族』的概念遠不止於神話與記憶。但神話與記憶卻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沒有記憶（雖則是選擇性的記憶），就不可能有認同，沒有神話，就沒有集體的目標，而認同與目標或天命，正是民族這個概念不可少的要素。」（Smith 1986: 2）

Smith 這此話是在指責英、法等國那些「現代化」派的學者，但對盲從其後的何六九也同樣適用。我們並不認為中華民族一定需要靠「神話」來建構。我們只是要藉此指出何六九所虔誠跪拜的英國或廣而言之的歐洲「文明」民族，其民族認同也是靠「神話」建構起來的，也有其「非理性」的根源。

## 何六九演了一齣滑天下之大稽的醜劇

英國與法國被許多西方學者奉為「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先驅與典範，它們的民族認同是怎麼用「神話」建構起來的？又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出版過《西方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West*）等名著的美國世界史專家 William McNeill 對此有扼要的說明：

「在這樣的歷史環境下，歐洲雄強之國回過頭去從蠻族中隨意認祖歸宗，大肆編造祖上神武威猛的英勇事蹟，於是乎近幾個世紀中，所謂各民族國家內率土之民莫非同宗的神話，就這樣根深蒂固起來。（值得一提的是，法國與英國選擇了高盧人與不列顛人做為想當然耳的民族先祖，然而，他們現在的民族語言是分別從侵略高盧人與不列顛人的征服者那裡繼承來的，他們卻樂於無視這些征服者對其民族形成的歷史作用。）全國系出同一族源的虛構之事，自此發榮滋長，尤其自一七八九年以後，這些認蠻族為祖宗的新蠻族國家，訓練所有的成年男子使槍弄劍，用民族認同感使他們精誠團結，心甘情願地服從選定的領袖，這與那些只動員國內部份人力參戰的政府相比，顯示了實際的優勢威力，這種國族同源的論調就更為

盛行」。』(McNeill 1994: 6-7)

McNeill 這段話可以做為 Smith 所言的註腳。何六九在〈鄉鄙〉中指斥「血緣論民族主義」說：「每當人們追溯遠祖的時候，總是事實與神話不分，而且經常張冠李戴，穿鑿附會，甚至於憑空杜撰新神話。六十年前，有兩位學者嘲諷道，民族可能是『一起錯認祖宗』的結果。在此情況下，講求嚴格考證的信史觀念都是多餘的，反正只要『信仰產生力量』就夠了。於是，荒郊野外亂葬崗上來路不明的鬼魂，突然之間被一批以孝子賢孫自居的人們供奉膜拜起來，奉為神聖無比的祖宗。亂認祖宗的荒唐事，經過一番的精心修飾設計，成為鄉鄙政治學開宗明義第一章，也適用為政治領袖人物心靈閉塞的遮羞布。」這些話其實正是英、法等國建構民族認同最好的寫照。這真是曠古絕今的巨大諷刺！何六九這個無知之至的蠢蛋，一邊鄙視、嘲諷「缺乏人文思想」、「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事實與神話不分」、「亂認祖宗」，一邊卻對「鄉鄙政治學」的始作俑者，效愚夫愚婦之所為，頭如搗蒜般地善頌善禱，天下事之滑稽寧有過於此者？何六九著實演了一齣滑天下之大稽的醜劇。

## 中國的歷史文化為各族人民所共創

中國大陸的「中華民族」概念是建立在考古學、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等知識基礎上，兼顧了客觀的自在與主觀的自覺兩個方面，並未訴諸沒有確鑿根據的神話。一般所謂「炎黃子孫」之說，其實是取其象徵符號的意義(1)。大陸學界根據考古學與歷史學的實證研究，認為中國可稽的第一個王朝是夏朝，司馬遷《史記》所載的三皇五帝，只不過是神話傳說中的人物，並非信而有徵。這只要查閱大陸學術界有關中華民族的諸多論述即可得知，此處不贅述。何六九把中華民族主義窄化為漢民族主義，尤其是血緣論漢民族主義，只足以證明他的鄙陋無識。從他的論述中可知他的中國歷史知識沒有超出台灣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範圍。他有關中國歷史的一些看法顯示，他的中國歷史知識水平甚至還不是一個用功的中學生。在何六九的認知裡，中國歷史只是漢族的活動史，只有漢族政權統轄過的領土才屬於中國的疆域。他在〈鄉鄙〉中胡說什麼在中國大陸「人們卻一再被曉示告知必須去霸佔大片從來不會被自己的血親祖先所征服和直接統治過的領土。」這根本是連中國歷史常識也沒有的蠢話。何六九竟然會不知道，中國的疆域是幾千年來諸多不同的族裔通過征伐與搏合逐步擴展而來的，不單靠漢族之力。少數民族或者曾建立地區政權乃至擁有半壁江山（如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與宋、元

之際的遼、金、西夏），或者曾入主中原成立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如元、清），在中國歷史中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文化的內涵也同樣是各民族通過長期的交流融合而成的，在文學、藝術、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等各個方面無不包羅採合了諸多民族的特色。因而，不論在政治或文化上，都不能把中國歷史粗糙、簡單地歸結為漢族史，更不能把中華民族等同於漢民族。胡琴、琵琶之類的樂器原本不是「胡樂」嗎？但今天已成了代表中國的「國樂」。旗袍原是滿族婦女的服裝，如今則成了代表中國特色的女裝。舉世公認的中國文學瑰寶《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也不是漢人，而是滿州旗人。中國現在的疆域主要是繼承滿族建立的清王朝而來。如果何六九要否定歐洲強權所設定的國際法中的主權繼承論，我們也同意，但請何六九立即發動一場全世界的政治大革命，打破帝國主義所控制的資本主義主權國家的國際體系，消滅階級對立，抹除國界，實現大同世界，這才顯得出宏偉的氣魄與無比的能耐。而不是龜縮在台灣一地，只會妄想用無知與謊言，搞一場徒以自欺卻絕對無法欺人的所謂「文化大革命」。

## 中華民族主義的基礎

何六九這個鄙陋的蠢材根本不知道現代中華民族主義的興起與中華民族意識的高漲，並非起於漢

族的血緣觀，而是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帝國主義入侵，強迫中國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貪得無厭地分割、掠奪中國的土地資源、財富，殘酷屠殺無辜人民，中國各族人民爲了對抗侵略，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解放，付出了慘重的犧牲，才用血河淚海澆灌出休戚相關、榮辱與共的中華民族主義與牢不可破的中華民族意識。這個中華民族主義與中華民族意識是用活生生的血海骨嶽的慘痛歷史事實與深入骨髓的亡國危機感自覺地建立起來的，用不著訴諸遠古渺不可稽的神話。清末，中國遭逢帝國主義瓜分豆剖，國將不國，滿族貴族盛豈憤而疾呼：「起我黃帝胄，驅彼白種賤，大破旗漢界，謀生皆自便」（引自馬戎、周星主編 1999: 117）。盛豈不但主張打破滿、漢的種族界限，還把滿族也歸屬於具象徵意義的黃帝子孫，呼籲全體中國人不分族裔、團結起來，共禦外侮。清王朝終於不免覆亡，遜清皇帝溥儀及一小撮前清大臣不甘失勢而充當日本傀儡，在一九三二年成立「滿州國」，也不旋踵倒台，結束一場醜劇，都是因爲違背了中國各族人民不分畛域救亡圖存的這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浩蕩巨流，最終只能淪爲泡沫，消失得無影無踪。我們還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中華民族主義的自覺性。一個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人梁漱溟。對中國現代政治史與思想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梁漱溟以捍衛、發揚新儒家文化聞名，也寫過《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是「鄉村建設」派的領導人物，還擔任過「中國民主自治同盟」的秘書長，是國共兩黨之外，第三勢力的要角。但梁漱溟其實是元朝皇帝宗室的後裔，姓「也先帖木耳」，屬蒙古族。元朝滅亡後，其祖先未隨元順帝逃回蒙古，而取「孟子見梁惠王」



之語，改漢姓爲梁，與漢人通婚，世居於河南、廣西等地，至曾祖父而定居北京成了北京人。梁漱溟終其一生認同的是以儒家爲中心的傳統中國文化，自居爲中華民族的一員，所致力者在於中國的復興（見汪東林 1988）。另一個例子是台灣的名作家李敖。李敖在自傳中明言自己祖上爲苗族，衆所周知，他是個自由主義者，但近年來不遺餘力地批判台獨，積極鼓吹中國統一。像梁漱溟、李敖這樣既非漢族後裔，也不會錯認祖宗，卻都自覺地成爲中華民族主義者的例子，在現代中國所在多有，絕不罕見，是普遍現象，而非特例。他們沒有如何六九所云「以血液從事思考或以血液代替思考」，而是相反，用自覺的理性代替血液，選擇了自己的民族與國家認同。當然，這些都超乎何六九那褊窄淺陋的知識之外。

### 現代化派 VS. 本源派

何六九對所謂「血緣論民族主義」的激情攻擊與對「公民民族主義」的頌揚，根本不是基於紮實的研究與嚴肅的思考，而是囫圇吞棗一些西方「現代化」派學者的論點，在既沒有能力消化，更無本事批判下，排洩出來的一堆臭不可聞的胡言亂語。

關於 nation 與 nationalism 的定義與內涵，長期以來西方學術界並無一致的看法。對究竟是先有 na-

tion 再出現 nationalism，或者是 nationalism 創造 nation，也一直是聚訟紛紜的問題。對於 nation 的起源與形成，西方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認為 nation 乃西方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即現代化）的產物，是經過社會與政治菁英刻意建構出來的，不存在於西方現代化之前，而民族主義也是應現代化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問題而興，此謂之「現代化派」（modernist），右翼的 Ernest Gellner 與左翼的 Eric Hobsbawm 可稱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另一種觀點是，nation 並非到了現代才由民族主義者營建成的人造物，而是古已有之，憑藉歷史、語言、價值觀、血統等要素構成的文化共同體，此謂之「本源派」（primordialist）或「源遠流長派」（perennialists），John Armstrong、Pierre Van den Berghe 等人屬之。（參考：Gellner 1997: 92-93; Smith 1998: 18-23; O'Leary 1998）。

在經歷過德國、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肆虐與二次大戰的茶毒後，西方（特別是歐洲）學術界大多對民族沙文主義深惡痛絕，因而，自 Hans Kohn 以降，研究民族主義的學者多半仇視民族主義（尤其是所謂「族裔民族主義」），把法西斯主義視為民族主義猖獗的必然結果（O'Leary 1998: 67; Smith 1998: 16）。現代化派的學者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從事民族主義研究的，他們有有的從自由主義（如 Gellner），有的從馬克思主義（如 Hobsbawm）的立場，研究歐洲的民族主義，力圖解構民族主義的神話，消解民族主義的動力，庶幾可免民族沙文主義再度為患歐洲，禍及全世界。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Gellner、Hobsbawm 雖則在情感上反對民族主義，但都力求用理性的態度（事實上，他們被批評

者指稱過於強調理性，從而不夠重視民族主義予人歸屬感的凝聚作用，尊重證據，以唯物的方法嚴謹地研究民族問題<sup>(2)</sup>，此所以他們的著作雖不乏可議之處，但終究贏得佳譽，蜚聲士林。

對於「現代化」派歷史學者的心態與觀點，Smith 曾舉出三個特點並予簡短的評論。我們撮要如下，以見其概：

一、對民族主義持懷疑甚至敵視的態度，強調民族主義固有的愚昧與破壞性傾向。Smith 指出，或許因為「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痛感民族情感與民族主義攪動人心的心理層面，故比政治科學與國際關係的學者更猜疑、敵視民族主義，也因而有時使他們易遭受指控，說他們把民族主義這個有多種層面的事像簡單地只歸結為單一的社會—心理因素，犯了過於偏重心理因素的毛病。更嚴重的指控是，他們把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作首要的對象，忽視或迴避了就某種程度來說並不受民族主義宣傳家活動影響的民族構成過程的重要性。這種傾向的結果之一就是，「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刻意低估了民族主義所發揮的某些正面作用，甚至是「建設性」的方面。

二、「現代化」派的歷史學者一般都認為民族主義的理論貧乏，也確信民族是用大量捏造的神話、傳統建構出來的共同體。因而，與許多人類學者一道共同戮力於「解構民族」，並揭露那些搬弄民族主義、利用群眾懷祖情緒為黨派利益服務的團夥在意識形態上的目的。對此，Smith 評論道，如 Hobbsbawm 所承認，只有某些傳統深植於群眾之中，也只有某些傳統可長可久，而民族則是持久存在的

「編造出的傳統」(『invented traditions』)中，最為重要的一個。如果是這樣，在什麼意義上我們該視民族為「編造」的或「建構的」(『constructed』)傳統？為什麼編造民族的行為這麼常見，而且在極其紛雜多樣的文化與社會環境中都能深深打動人心，歷久不衰？不論建構得多麼好，沒有一種人造的事物能像民族這樣飽經興衰榮枯而不亡，或歷經滄桑事變而長存。顯然，民族的構成絕不僅僅是民族主義捏造出來的，而所謂「編造」之舉必須從另外一種意義，即重新組合既存的因素這個意義來理解。

三、「現代化」派的第二個見解與所謂民族與民族主義是「人造」的觀點密切相關，即認為為民族與民族主義具有現代的特性。Smith 指出，「現代化」派的這個主張固無不當，即：民族主義是指一個社會群體的某些成員認為他們該建成「國族」並勉力完成獨立、統一與認同的一種意識形態與運動，這樣的民族主義是十八世紀末期的產物。就在此際，興起了一種民族主義的學說，宣稱世界分成各具特性的民族，民族是所有政治權力的來源，只有歸屬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人類才能獲得自由，國際的和平與安全也有賴於所有民族組成獨立的國家。只是到了十八世紀，在歐洲的國際體系中，這種思想才大為風行。「現代化」派的這些見解大多數的歷史學者都表同意，國族被視為純屬現代的觀念與社會組織型態，其產生須具備國家官僚體系、資本主義、擺脫神權統治與民主政治這些「現代」才有的條件。Smith 對此說提出三點批評：

1. 這種觀點也是有不實的 (mythical) 成分，用言過其實的詮釋來為當前的目的或未來的目標服務。「現代國族的神話」指稱，在現代之前「沒有民族存在」(nationless)，並誇大了現代化促使國族產生的作用。

2. 即使根據「現代化」派的假設所建立的民族主義概念，不同的民族群體之間在型態與分期上也有重要的差異。在西歐與北歐的民族國家是緩慢而持續地浮現的，與後來在民族主義時期才創造的「營造出來的國族」(nations of design)，兩者之間有所差異，這點必須注意。很顯然，在西方「國族構成」(nation-formation)的過程是未預料到的，也非刻意而為，先是由具支配地位的族裔共同體鑄成國家，再逐漸變為民族國家。在其他地區國族構成的過程則需要外部的刺激與有計畫的積極行動。

3. 「現代化」派對民族主義產生的解釋的眞正麻煩是歷史深度不足。「現代化」派只把民族與民族主義視為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化社會過渡過程的產物，這就很難解釋人為何會回歸傳統，覺得族裔的歷史源遠流長。連續與斷裂的平衡受到破壞，於是現代社會所要求的集體認同就變成困惑難解的問題。前現代共同體的文化模式有助於解釋何以在現代世界會有這麼多人把忠誠與團結集中在民族上面，這正是關注前現代的文化共同體之所以必要且重要的原因。世界的許多地方過去是按照古代與中世紀的不同族裔共同體組成其社會與文化結構，並沿襲至今，而現代的民族與過去的族裔共同體共有祖先的神話、記憶與某些文化要素，竟或還共有同一塊領土與名稱，這些事實可提供我們一個更好

的出發點來研究在現代民族的構成中所涉及的文化轉型與重生，以及民族主義在這些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Smith 進一步表示，即使族裔特性的要素是「建構」與「再建構」出來的，有時更是純粹「編造」出來的，但族裔文化內涵的「建構」與「再建構」，數百年來甚至千年來，一直未曾中斷，而有些族裔共同體雖然改變了文化特性，歷經多年，其共同體的特色卻依然清晰可辨，這些事實表示，我們忽略這些共同體的存在，且無知於這類共同體對現代民族構成的影響，實為冒險之舉。（Smith 1996 [1992]: 190-193）

Smith 的上述評析既準確概括了「現代化」派的基本觀點，肯定其可取之處，又兼取「本源」派觀點，指出「現代化」派的盲點，可謂持平之論。

### Gellner 的晚年定論

我們對照 Smith 的上述評析就可很清楚地看出，何六九是在未求甚解地囫圇吞棗「現代化」派的觀點後，即奉為教條，用以批評民族主義。他在〈鄉鄰〉中攻訐強調歷史文化傳承的民族主義者為「粗魯無文的無知鄉愚」、「思想貧血」等等，都是淪為「現代化」論教條主義後的無知妄語。Gellner 在他的名著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中批判地繼承了 Elie Kedourie 對所謂民族乃天然生成的說法的批

評，認為傳統民族主義者宣稱民族（nation）有如中了魔法而沈睡多年的睡美人，有待民族主義者這個王子的親吻，以從酣夢中覺醒的說法，不足採信，強調民族與民族主義是現代化過程的人為產物。Gellner 指稱：

「所謂民族是自然天成，是上帝用來劃分人類種屬的方法，而成為國族之事雖遲延已久，終為政治天命所定，這些說法俱屬虛構。民族主義有時利用先前存在的文化將其轉化為民族，有時加以編造，更經常的是抹除前已存在的文化，這才是實情；這麼做，不論是好是壞，一般說來，也無可避免。」（Gellner 1983: 48-49）

Gellner 這個反「本源」論的論點，是「現代化」派的代表性觀點。「本源論」與「現代化論」雙方曾多次論辯，Gellner 晚年更於一九九五年十月與 Smith 直接就民族是否有其歷史根源展開交鋒。最後在其民族主義研究的晚年定論之作 *Nationalism* 中，他修正了前此的觀點，承認「本源論」也可以成立的論據，他說：

「什麼證據可以判定這個爭議呢？如今我們不再停留在直覺看來互不相容的兩種假說裡

了，雙方就可獲得的所有證據而言，都同樣站得住腳。」（Gellner 1997: 93）

他強調指出，他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

「不管怎樣，就歐洲來說，大體上（黑體字為原文所有）合乎可得到的證據，但也不是天衣無縫，亦非普遍適用於各地的情況。問題仍在未定之天，有待進一步整理證據或提出論證。……我們的看法是，有些民族真正帶著古已有之的肚臍，有些則是由民族主義的宣傳為本民族捏造了肚臍，有些則全然沒有肚臍。我相信迄今為止最多的是第二種情況，但如有確鑿可靠的研究，我仍願修正我的看法。」（同上：96）

Gellner 確實表現了一位實事求是的嚴謹學者的可敬風範。

相形之下，何六九的愚而好自用就顯得相當粗鄙可笑了。他在〈鄉鄙〉中不加思考地引用 Gellner 在晚年已經加以修正的觀點，把 Gellner 針對歐洲民族主義的論述愚昧地奉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教條，拿來濫情攻訐非西方的民族主義。我們前面說過，他誣詆中國有關中華民族的論述「濫情、粗鄙和理路錯亂，無異於乩童的無知迷信和誇張矯做」，正是他自己的寫照，在此又得一證明。



## Nairn 有關民族主義的論述

以上我們已批判了何六九主觀唯心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對中國歷史與現實的無知及盲目吞食西方「現代化」論者的唾餘等種種劣行醜態。但何六九之愚不可及尙不僅止於此。他爲了故示高明而引用了一些洋書作爲論據以壯聲勢，好像他對民族主義問題與英國社會頗有研究似的。其實，在〈鄉鄙〉中，從標題開始，他壓根兒就沒有搞懂他所引據的那些洋書，有些甚至不是一般簡單的誤解，而是完全顛倒了作者的原意。這只有兩種可能：或者是沒有讀懂，或者是故意曲解，蓄意搞知識詐欺，妄圖瞞天過海以欺世人耳目。以下我們就一一加以揭露，拆穿這個自以爲聰明的天下第一等大蠢才的眞面目。

何六九〈鄉鄙之歌〉一文的「鄉鄙」之意，據他自云是借用了 Tom Nairn 的著作 *Faces of Nationalism* 一書第五章 *The Curse of Rurality* 之名，他是怎麼理解 Tom Nairn 這篇文章的意思的呢？他說：

「他們總是對於不知節制的民族狂熱嗤之以鼻。他們之中有人形容這種激情發作是『鄉鄙根性之害』。用句較為通俗的話來形容，他們其實是在譏笑那些夜郎自大的鄉下佬，對於

現代政治文明的見識十分有限，沒有能力掌握諸種較具豐富、明確內涵的政治概念來了解當今世界和界定表達自己的需要，只知道玩弄幾個煽情的口號，謀圖在政治上興風作浪。如此說來，對於高音貝民族主義吶喊缺乏胃口，莫非是成熟文明社會裡的常態？」（《左翼》，第20號·13）

Tom Nain 如果看到他的觀點竟然遭到何六九這樣荒唐的曲解，肯定要張口結舌，甚至怒火中燒。Tom Nain 是個左派，但也是力主擺脫英國的中央集權，要求自主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自一九七〇年代中期，他就認為民族主義問題是現代歷史無可迴避的主要現象，民族主義一方面是被壓迫民族擺脫帝國主義支配，完成獨立與解放的利器，另一方面又造成法西斯主義的猖獗，並成爲法國獨裁者戴高樂與第三世界獨裁政權的護身符，對於民族主義這種善惡兼具的兩面性，馬克思主義未能從理論上妥加處理，因而造成馬克思主義重大的歷史性挫敗（Nain 1977: 329-331）。Nain 指出：

「這樣的民族主義其真義從道德上、政治上、人性上總難說清楚、講明白。因而，用道德的觀點對待民族主義，不論是推崇讚美或痛加譴責都無濟於事。他們只是逮住這頭怪物的這一面或那一面，不願承認這是長在同一個頭上的兩張面孔。但在這個意義上，民族主義有

如古羅馬站在門口的門神 Janus，一張臉向前看，另一張則向後看。民族主義也像 Janus 一樣，站在人類社會邁向現代性的通路口。人類在被迫通過這道窄門時，不得不拼命回頭，盡其可能從過去集聚一切可以找到的力量以通過『發展』的嚴酷考驗。也就是這種情勢有助於我們了解何以所謂『非理性』因素會不能不極其普遍地出現在往現代化發展的過程。」（同上：348-349）

爲了補馬克思主義在解釋民族主義問題上的不足，Zain 根據歷史唯物論，汲取了 Gellner 的「不平衡發展」觀，Andre Gunder Frank 的依附理論與 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從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不平衡發展」的觀點，探討十八世紀後民族主義勃興的成因與現象。Zain 強調，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落後地區的民族爲了外抗強權，力爭上游以取得經濟發展，遂訴諸歷史傳統，發揚民族主義。因而，民族主義既雄心勃勃地向前發展以完成現代化，又回頭崇拜本民族的特有傳統，同時具有前瞻與後顧的兩張面孔。至 1990 年代，又進一步發展他的觀點，結集成書，即一九九七年出版的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何六九所引用的該書第五章 *The Curse of Rurality: Limits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是爲紀念已故的 Gellner 而作，稍加增補後，也收在 1998 年 John A. Hall 編的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中。全文的主旨在

探討族裔民族主義產生的社會經濟根源，從而指出 Gellner 用現代化觀點解釋民族主義興衰的缺失。Nain 文章起首就舉近來在歐洲的北愛爾蘭、西班牙的巴斯克、法國的科西嘉與前南斯拉夫等地大量出現的族裔民族主義暴力衝突為例指出，族裔民族主義的社會基礎是小農及附著其上的傳統文化，族裔民族主義本質上即是由農民階級轉化成民族。現代化是一個犧牲農民的殘酷過程，工業化、都市化造成農村經濟破產，大批農民被迫離鄉背井進入陌生而又競爭激烈的都市，淪為無產者，於是在農村與都市都有眾多在工業化過程中充滿挫折與被剝奪感的群眾。一些都市階級特別是知識份子遂動員這些受挫的群眾以期建立民族國家。

Nain 還引用法國學者 Gerard de puymege 的研究指出，源自法國的「沙文主義」(chauvinism)正是農民(沙文是農民出身的軍人)剛離開農村痛苦地適應都市生活的群眾心裡的深刻反射。而「沙文主義」在初期即是農民如何「被塑造成法國人」的一個方面，在法國的民族神話體系中不斷再生產出農民重視血統與土地(blood and soil)的特質，因而法國人就在意識形態上保留了農民的特性。這樣的觀念還滲透進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帶來的革命成份中。因而法國公民既懷有人權宣言中的公民權利思想，又有濃厚的族裔觀念，融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於一體。這就是一八九〇年代惡名昭彰的迫害猶大裔軍官 Dreyfus 以及目前右翼的排外運動之所以在法國發生的意識形態因素。Nain 指出，現代化包含了好幾代農民在農村的過去與都市——工業化的未來之間的搏鬥，是一場生死交關的鬥

爭。民族主義就是這場戰鬥的本質要素，絕非只是其副作用。

## Naim 對 Gellner 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Naim 據此批評 Gellner 的現代化理論過於強調機械工業、轉化方言為統一的文字語言、民族主義者編造農村傳統等等現代特性的部分，只注意促成變遷的動機與工具，而忽視了作為這個變遷的「原料素材」，即經歷現代化的農民群眾。Naim 認為，馬克斯主義學者 Perry Anderson 等人對 Gellner 有力的批判就是他過於理性主義（over-rationalism）。Anderson 批評 Gellner 的理論過於唯物主義，忽視了現代民族主義不容略過不談的集體意識，民族主義的主要作用不在於 Gellner 所云的促進工業化，而是實現了民族的認同。Gellner 在論述民族主義時未能探索民族主義魅力，遂使他錯失了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問題（Anderson 1996: 425）。Naim 深然 Anderson 之言，但可惜 Anderson 沒能指出民族主義魅力的根源所在。Naim 認為目前最可成立的說法應是，其根源在於大部分形式的族裔民族主義與「鄉村」存在狀態的連結上，Naim 批評說，Gellner 的理性主義使他總是視「傳統」為民族主義者偽造出來的，但在一些重要的實例中，「傳統」確實是浸泡在並非總是虛構的真正傳統的血液中。

Naim 以上述觀點來解釋現代民族主義的勃興與族裔衝突的成因。在他的文章中舉了柬埔寨的波

帕 (Pot pat) 政權與法、德等國的民族主義為例子，來說明在現代化過程中，民族主義者以受損害的農民階級為基礎，鼓吹民族主義，力圖在現代化的殘酷競爭中求勝圖存。而在極端的情況下，就出現了德國法西斯主義與柬埔寨的農民烏托邦社會主義，造成災難深重的後果。Nain 的結論是，由 Gellner 開創的民族主義的現代化理論太過強調隨工業化而來的所有文化因素，對現代性的無往不利也太過自信，Gellner 承襲了啓蒙運動的樂觀精神，認為民族主義促使現代化完成後，便會功成身退，失去影響力，結果低估了在現代化過程出現的城鄉對立運動中，受損害的鄉村所作的長期反撲。

### 何六九對 Nain 觀點的曲解

我們把上述 Nain 文章的要旨拿來與何六九的曲解相互對照，就可看出何六九這個大蠢材根本沒有讀懂 Nain 的文章，他連 Nain 思想的邊都沒沾上。他的思考能力低劣到連 Nain 文章的標題 *The Curse of Ruralty: Limits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都看不懂。其實光從副標題就可知道此文旨在批評 Gellner 的現代化理論，然而，何六九在沒有能力理解全文要旨之下，只憑他反民族主義的主觀情緒就把它錯譯成「鄉鄙根性之害」，通篇拿「鄉鄙」一詞濫情詈罵他所謂的「血緣論漢民族主義」者。Nain 用「ruralty」一詞來指傳統價值觀所從出的鄉村特性，在 Nain 的用法裡「tradition」與「ruralty」是

同義詞。我們在上面已概述了Zain文章的要旨，Zain是要指出產生族裔民族主義及族裔衝突的社會經濟根源，在於在現代化過程受創的農民階級對現代化的反應，通篇沒有何六九所謂「譏笑那些夜郎自大的鄉下佬，對於現代政治文明的見識十分有限，沒有能力掌握諸種較具豐富、明確內涵的政治概念來了解當今世界和界定表達自己的需要，只知道玩弄幾個煽情的口號，謀圖在政治上興風作浪」的意思。Zain 這位左翼的民族主義者一篇有深度的理論文章竟被何六九這個極為弱智低能的假理性主義者隨意糟蹋，拿來當作謾罵民族主義者的工具。這種丟人丟到家的笑話，真是「此事只應台灣有，人間難得幾回聞」了。

## 何六九對英國的諛頌

本來一個人如果資質魯鈍也不見得就是壞事，所謂「勤能補拙」，古往今來不少在學問、事功上卓著聲名者都不是稟性聰穎過人，但卻能孜孜矻矻、勤勤懇懇地治學做事，真積力久之後，終有所成。最糟糕的是，自以為聰明，好行小慧，不肯踏實將事，以為裝腔作勢，耍點詐偽伎倆，就能唬弄人，以逞所圖。何六九就是道道地地的這種蠢貨。他理論文章讀不懂也就罷了，更惡劣的是，他還搞騙術，顛倒原作者之意，來附會自己的偏見，藉此達到唬騙世人的目的。

何六九的〈鄉鄙〉一開頭就對會是十九世紀世界霸權的英國帝國主義大唱頌歌，把英國樹立為不再高唱不列顛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公民民族主義國家的典範，對之大加頂禮膜拜，胡說什麼英國人「對於民族情懷索然無味」、「不列顛民族情操」、「在英國本土已經缺乏市場」。然後以英國的民主、理性、文明為標準，大肆譴責、嘲諷民族主義者與提倡愛國、主張統一者是沒有見過世面、「孤陋寡聞」、「不知現代政治文明和公民意識為何物的鄉鄙」。我們先引幾段〈鄉鄙〉的文字，再來戳穿何六九對英國的歌頌是建立在什麼基礎上的。

「很多近代政治評論家和學者不約而同地觀察到，除了在大戰期間而外，英國人在過去近百年來卻以相當冷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不列顛民族主義。倘若今天有人在這個國度裡登上講壇高談闊論不列顛民族概念或者愛國主義，肯定會引來聽眾們不耐地哈欠連連。如果執意要大張旗鼓提出民族復興或者愛國統一之類的主張，來當做競選綱領，恐怕要遭人笑話，再不然就要被社會一般當做是喜歡鬧事的狹隘種族主義者看待。

.....

有趣的是，在英國本土早已經缺乏市場的不列顛民族情操，卻在許多北愛爾蘭新教徒當  
中越發炒熱起來。長久以來，他們緬懷新教徒過去曾經征服愛爾蘭天主教徒的光榮歷史，每



年定期用大遊行方式向當地天主教徒示威和露骨表達自己的優越感。他們強調新教的宗教認同，要求人們尊重愛爾蘭曾經長期臣屬英王陛下的歷史傳統，誓與英倫祖國永不分離。他們甚至於不惜一再訴諸血腥暴力，可惜無法喚起英國本土的新教徒『同胞』們對於這個『民族大義』的關切。英國許多研究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的英國人根本不在乎北愛爾蘭領土主權歸屬何方；半數以上甚至認為，北愛爾蘭應該從英國分離出去。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左翼》第20號：12,13）

「以專治東歐民族主義問題而聞名英國史學家H.S. Watson甚至於認為，不列顛民族主義是不存在的。關於這個現象的起因，有眾多解釋。不過大多相信，英國人的民族認同與他們的大憲章、國會、法治、公民權利等等的政治傳統和體制機構密切聯繫在一起，幾乎完全沒有血緣論成分。」（同上：25，註2）

## 世界主義是建立在民族國家的基礎上

這幾段文字有關英國與北愛爾蘭的材料，主要取自英國學者 Michael Ignatieff 的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一書。然而，何六九的主觀論斷卻與原作者的看法完全相背。該書是作者爲了探討冷戰結束後何以民族主義再度興起，而走訪前南斯拉夫、德國、烏克蘭、加拿大的魁北克、庫德族人聚居區與北愛爾蘭六個地區，作了深入的調查研究。Ignatieff 在書中自述，他本來自詡爲無國界、超越民族藩籬的世界主義者，但在經過實際考察各地的民族主義問題後，他有了如下的反省：

「全世界至少有一打融多種族裔於一爐的大都市，僑居、流亡、移民的各類人等都在此落腳。居住在這些大都市的專業人士，視超越民族界限的心態為理所當然。……在帝國瓦解後的全球主義時代裡，只有很幸運地住在富裕的西方的世界主義者才得有超越民族主義的意識。全球主義為許多衰弱得無力建立自己不受侵犯的國家的弱小民族帶來混亂與暴力……相  
信世界主義的優點的人無不認為發生在波斯尼亞 (Bosnia) 的族裔衝突必須打住。但極為明

顯的是，世界主義的信念只是那些其民族國家的生存已獲確保的人才能擁有的特權。雖然我們已進入帝國瓦解的年代，但尚未走向超越民族主義的時代，而我也看不出我們要怎麼做才能超越。倫敦、洛杉磯、紐約這些大都市之得以廣納四海、包容寰宇人士，關鍵在於英、美民族國家有能力強制維持其國家秩序。一旦秩序崩潰，如一九九二年發生的洛杉磯暴動，那麼，文明、廣包多族裔的城市就像任何東歐國家，同樣極有可能暴發族裔戰爭，這是顯而易見的。因而，就此而言，像我這樣的世界主義者並沒有超越國族。最終來說，世界主義與超越民族主義的精神總是依賴民族國家為其公民確保安全與文明行為的能力。僅就此意義而言，我是個公民民族主義者，即相信民族國家有存在的必要，也相信公民有責任保衛民族國家，使民族國家有能力確保我們要成為世界主義者所需要的安全與權利。至少，站在世界主義的立場，對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人民所表現的殘暴行為，加以鄙視與感到震驚，都是錯誤的。畢竟，他們只是在為世界主義者長期視為理所當然的特權而戰鬥。」（Ignatieff 1994: 11-14）

Ignatieff 在該書導言的結尾甚至語帶諷刺地說：

「如果愛國主義如約翰遜 (Samuel Johnson) 所云是惡棍最後的避難所，那麼超越民族主義論 (Post-nationalism) 及隨之而來的對他人民族主義感情的鄙視，也同樣可以說是世界主義者最後的避難所了。」(同上：16)

從 Ignatieff 上述的基本觀點，我們就可知道，Ignatieff 是個懷有世界主義理想的，但比較清醒的公民民族主義者。他雖然不贊成族裔民族主義，但通過深入的調查研究，了解族裔民族主義與族裔衝突之所以產生的複雜因素，並不像何六九那麼幼稚地對之任意鄙視，施加濫情的醜詆。

### 何六九對 Ignatieff 的著作斷章取義

Ignatieff 不但清醒地認知到世界主義是只有在確立民族國家的自主權後才能期求的理想，他對英國不列顛民族主義的本質也有極透徹的認識。在何六九所引據的該書第 6 章，Ignatieff 通過探討北愛爾蘭與英國的關係，對北愛爾蘭問題的根源與英國的民族主義做了深刻的剖析。然而，何六九非常卑鄙地完全抹去了作者在全章中的主要論旨，只斷章取義，拿來做為諛頌英國已不高談愛國主義、「對於民族情懷索然無味」的根據。我們在前面摘引過何六九的這段文字：「有趣的是，在英國本土早已

經缺乏市場的不列顛民族情操，卻在許多北愛爾蘭新教徒當中越發炒熱起來。……他們甚至於不惜一再訴諸血腥暴力，可惜無法喚起英國本土的新教徒「同胞」們對於這個「民族大義」的關切。英國許多調查一再顯示，大多數的英國人根本不在乎北愛爾蘭領土主權歸屬何方；半數以上甚至認為，北愛爾蘭應該從英國分離出去。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我們來對照一下 Ignatieff 的原文看看何六九搞了什麼鬼花樣：

「效忠英國的北愛爾蘭人注意到，當阿根廷入侵『不列顛擁有主權的領土』福克蘭群島時，英國人的民族主義情感傾瀉而出（黑體為筆者所加），但對阿爾斯特（Ulster）（按：北愛的一省，為新教徒聚居地）卻漠不關心，這種難以理解的反差，令忠貞的新教徒痛心怨憤。英國本土的不列顛人只要可能就願意放棄阿爾斯特。多次的民意測驗中大多數人支持不列顛放棄北愛爾蘭的主權或者與愛爾蘭共享對北愛的主權。」（Ignatieff 1994: 218）

請看一 Ignatieff 在這裡分明提到了英國人對福克蘭群島事件「民族主義感情傾瀉而出」（the out-

pouring of nationalist feeling) ，可是在何六九的文章裡卻不見踪跡，反而出現了「不列顛民族情操」。「在英國本土早已缺乏市場」的主觀臆斷。關於不列顛民族主義的問題我們等一下再繼續談。且先說英國人爲什麼對北愛爾蘭興趣缺缺，是不是如何六九所云「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

Ignatieff 在概述了不列顛與愛爾蘭在政治與宗教信仰上的對抗歷史後，對英國人漠視北愛爾蘭的原因提出了解釋：

「從一六八八年到至少一九一二年，阿爾斯特的新教徒相信，「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國王（被信仰新教的威廉三世）挫敗，保證了新教徒在愛爾蘭的優勢地位，並確立了不列顛的君主立憲政體，這段歷史是他們與不列顛國家共有的奠基神話。然而實際上並非如此。愛爾蘭最終成爲不列顛民族國家建立中的重大失敗。作爲不列顛認同核心的新教信仰使英國無法把信仰天主教的愛爾蘭完全同化進聯合王國。……不列顛人之無法視阿爾斯特爲不列顛不可缺少的部分，與不列顛人認識到他們的國族建構在愛爾蘭碰到最重大的失敗有極大的關係。北愛爾蘭長期的暴力衝突使不列顛人的心理更加確信，阿爾斯特畢竟是矛盾而難解的異己，即愛爾蘭。」（同上：223）

在 Ignatieff 的分析裡，完全沒有何六九所謂英國人視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為「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這種全憑主觀臆斷而來的胡說八道。

### 不列顛人可列入具有最強烈民族主義的民族之林

對於何六九所頌揚的「除大戰期間而外，英國人在過去近百年都以相當冷漠的態度對待自己的不列顛民族主義。倘若今天有人在這個國度裡登上講壇高談闊論不列顛民族概念或者愛國主義，肯定會引來聽眾們不耐地哈欠連連。」這到底是不是英國的實情？我們來看看 Ignatieff 的觀察：

「一九七八年我從加拿大來到英國。我很喜歡不列顛處在一般人相信的衰落中。它比較沒有那些自視為世界中心的民族的偏狹心態。它沒有美國那麼自以為重要，沒有西德那麼自滿，沒有法國那麼自我封閉。它處在困境中，這使它成了有趣的居住地。……但等住久一點，我就發現在不列顛能容下多文化、多種族與超越民族的世界主義的空間，遠比我原先認為的要狹窄得多。主張包容多文化、多種族與世界主義的人和依然只從英國本身著眼，不願歐洲入侵，確保不列顛的君主政體與議會主權的人，雙方的觀點仍鏖戰不休，未決勝負。這是為

不列顛在歐洲的地位而爭執30年之久的根本原因，只有傻瓜才會相信歷史是站在世界主義者這邊。

不列顛對歐洲的深閉固拒令我懷疑，不列顛人自以為已超越歐洲大陸人低下的民族主義情緒，我過去其實是受了他們的欺騙。這只不過是不列顛人慣有的虛偽矯飾作風的另一種表現。實際上，不列顛人可列入所有民族中具有最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民族之林。實則現代民族主義就是英國人的一項發明。」（同上：221）

## 何六九的知識詐欺

Ignatieff還指出，北愛爾蘭新教徒的族裔民族主義其實是折射出不列顛人真實形象的一面鏡子：

「不列顛的民族意識總體上仍然認為國族是體現在君主而非人民身上。不列顛人自視為君主的臣民（subjects）而非公民（citizens）。一般人民對法治、議會主權、國家穩定這些歷史成就的信守也傾向於表現在把君主政體幼稚地理想化上。可以這麼說，由公民組成的國族



最終會表現出比由臣民組成的國族更堅決也更勇於捍衛這些成就。……在阿爾斯特愛國派對不列顛特性的崇拜中，不列顛民族主義的族裔與公民的兩種成分開始分離。……同樣的分離也很容易在不列顛發生，事實上也正在發生。像國旗與君主這樣的民族認同的象徵一度代表了法治與公民民族國家的外殼；如今已因幻想破滅、不公正與壓迫而淪為純粹是保守反動的象徵。如果一個社會不再教導孩子不列顛的特性是與正義而非族裔有所聯繫，則其象徵符號必將出現在憎恨的招貼上。」（同上：242-243）

以上就是何六九在談英國的民族主義與北愛爾蘭問題時，所曾引用的 Ignatieff 的書中第六章的主要觀點。Ignatieff 揭露了英國人以慣有的虛偽矯飾作風掩蓋其骨子裡濃烈的民族主義，也指出了北愛爾蘭新教徒其實是折射英國本質的一面鏡子。但這些 Ignatieff 的真正主要觀點完全沒有在何六九筆下出現，何六九只是斷章取義曲解 Ignatieff 的原意來附會本身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這不是知識詐欺又是什麼？Ignatieff 寫的是本深度調查報導的書，沒有深奧難解的理論，而且文字明白流暢，如果何六九連這樣的英文都會因沒有看懂致生曲解，那麼我們就該徹底質疑何六九的英文閱讀能力，因而他引據英文資料而發的議論也就沒有一點是可信的。實際上到底是何種情況，何六九有責任向讀者明白交代。

## 不列顛的民族沙文主義洶湧澎湃

何六九搞知識詐欺的卑鄙勾當還不只一樁。英國這個帝國主義大盜，過去幾百年中在全世界幹盡了殘酷屠殺、奴隸買賣、販售毒品、掠奪財富、侵佔土地、欺凌弱小民族的罪惡行徑，犯下擢髮難數的滔天罪行，渾身上下，從頭到腳的每一個毛細孔都沾滿了骯髒的污血，至今雖因帝國瓦解，百病交侵、衰頹不振而爪牙搖搖欲墜，已淪落為二流國家，但不甘國勢中落，猶思逞其餘力，以維凶焰，而不時與其充當新興世界霸主的同源兄弟美國帝國主義狼狽為奸，繼續在東歐與第三世界囂張肆虐。然而，何六九卻費盡心機，大搞知識詐欺，一意想為這個靈魂污濁不堪、形骸衰朽老醜之至的老牌帝國主義美容整型，妄圖把它偽裝成「文明」、「理性」風度翩翩的濁世佳公子，以欺世人耳目。何六九的這種卑劣動機與手段，除前文已經揭發的之外，以下我們再舉一個例證。

何六九在〈鄉鄙〉中不知羞恥地諛頌英國說：

「長期以來，常有人指謂，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用以掩蓋階級矛盾、欺騙無產階級的思想工具。從過去和當前的許多事例來看，這種說法不能說是沒有根據。然而，在資本主義歷

史最為悠久的英格蘭，現在一般（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而最不在乎『民族大義』。」

（《左翼》第20號：13-14）

何六九這段話還加了一個註腳用以證明他所言不虛：

「在一九七九年開始的保守黨長期執政期間，民族情操淡薄的英國資產階級制訂和執行了一系列財經措施，以維護自身的階級利益。這激怒了大多數都有社會主義或者社會民主意識的蘇格蘭人，使得蘇格蘭民族主義大為風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果不是由於那個集中於英格蘭地區的資產階級無意於宣揚大英愛國主義，蘇格蘭獨立派恐怕早已經超過自治派，成為多數派了。Joyce McMillan, "Scotland's Quiet Nationalism", in Richard Caplan, John Fetter, eds.,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1996.」（同上：25-26）

英國現在是不是如何六九所云「包括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反而最不在乎『民族大義』」；英國資產階級是不是「民族情操淡薄」？我們就先看看何六九所引以為據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者Joyce McMillan究竟是怎麼說的：

「更糟糕的是，與保守黨對蘇格蘭要求民主自治越來越深的敵意俱來的還有保守黨極度高揚的反動的盎格魯——不列顛民族主義政見——以高亢、孤芳自賞、反歐洲、充斥南英格蘭本位主義觀點的聲調大聲叫嚷。和歐洲許多新興的反動的民族主義一樣，不列顛主流政治中洶湧澎湃的民族沙文主義，大可以把它理解為民族國家日益無力對抗全球市場與貨幣投機的一種反應，也可以看做是民族主義政客為了重申政府組織的重要性而強力促動的結果，他們藉恐懼外來移民、憎惡歐洲聯盟與其他國際機構、日益偏執地看待持異議的『內在敵人』，鼓動虛假的民族政治問題來推動政務。

但蘇格蘭人只能認同那種最自由與最包容異文化的不列顛民族主義型態，他們以越來越深的懷疑，冷冷看著這種帝國瓦解後猶不甘沒落的妄自尊大，也越來越深切地感到，過去不列顛以自由、包容的方式解決多民族國家的共存問題，因而使臣屬的民族還可過上尚稱愜意的日子，現在這種自由多元的政策恐怕已難以維繫。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格拉斯哥前鋒報》的民意調查發現90%的蘇格蘭青年根本不願自稱是『不列顛人』，而且大部分人認為『不列顛屬性』不如做個『歐洲人』來得重要。

不列顛的政治新風氣、余契爾主義的教條與一九八〇年代『贏者通吃』的政治制度之粗糙與沒有彈性，這些再一次使不僅蘇格蘭人而是不列顛境內的其他人民也同感嫌惡而離心離

德。一九九五年一月，日益壯大的修改八八憲章的不列顛憲政改革運動在倫敦發起了大遊行，參與的不僅是蘇格蘭、威爾斯與北愛爾蘭的改革運動代表，還有黑種不列顛人、流浪漢、殘疾者、公共服務媒體工作者、失業者、醫療工作者、自由派警官、工會人員、選舉改革者與環保運動者，所有的人都抱有同樣的怨氣，感覺受了保守黨16年的一黨統治，自己都遭到邊緣化與排斥。」（McMillan 1996: 78-79）

### 所有的民族國家都有愛國主義

我們在這裡又再次碰到了「此事只應台灣有，人間難得幾回聞」的咄咄怪事。何六九說現在英國人「最不在乎『民族大義』」、英國資產階級「民族情操淡薄」，可是他引為論據的原作者 Joyce McMillan 卻在痛斥代表英國資產階級的保守黨執政十六年，大倡排外的民族主義，使民族沙文主義在「不列顛主流政治中洶湧澎湃」！何六九完全顛倒了作者的原意，藉此來支持他跪拜過了氣的英國帝國主義的正當性。中國古代有「揮魯陽之戈以返落日」之言，何六九這個不但愚昧而且下流的天下第一等大蠢蛋竟然笨到想揮舞詐騙之術充當魯陽之戈來力挽早已日落西山的大英帝國聲威！這是一種什

麼品質？我們且留給讀者判斷。

何六九在文章中一再提到英國人已不興提倡民族主義乃至愛國主義，還引了他所不知道的十八世紀英國文學大家 Samuel Johnson (1709-1784) 說的：「愛國主義是惡棍的最後避難所」一語來譴責民族主義者，譏笑所謂的「愛國流氓」。且不說在多民族國家不宜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混為一談，我們倒要問一問今天哪一個國家（不論其政體與意識形態為何）的學校（至少是中小學）、媒體、政府不在或直接或間接的培養國民的愛國心？哪一個國家不以國旗、國歌作為國家象徵在潛移默化國民的國家認同？我們這樣提問的目的不在對愛國教育、愛國主義下該或不該的價值判斷，而是要指出在整個世界是以國家為單位進行嚴酷的競爭的國際體系時，沒有一個國家會不以愛國主義來凝聚國民的向心力與團結精神，認清這個事實就不會像何六九那麼幼稚地以為英國或所謂公民民族主義國家就不提倡愛國主義了。

何六九頭腦不清的嚴重程度真是令人難以置信。我們在前面引述過，他根據 Ignatieff 的書中材料提到「北愛爾蘭新教徒很是不滿。因為英倫祖國的「同胞」寧願為遙遠偏僻的福克蘭小島一戰，對於近在眼前的北愛爾蘭反而毫不眷戀」。這確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可是頭腦清楚的人，第一個會想到的，為什麼英國舉國上下要為遠離本土，靠征服、強佔來的微不足道的小群島而戰，它的動機與動力是什麼？如果英國真是「文明」、「理性」、「寬容」，那麼它應早早把搶奪來的屬地雙手奉還

原主，並致上深深的悔罪之意，爲什麼還要勞師動衆，置國內失業、困苦的人民於不顧，卻虛靡鉅額國家公帑去展露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呢？然而，何六九完全沒有這種思考。如前所揭露，它既不顧「nationalist」在書中對英國的北愛爾蘭政策所做的分析，更沒有想到英國派軍遠征福克蘭群島正是大英帝國愛國主義的徹底表現。一個國家可以很「文明」地、沒有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地放棄原屬本國的領土，卻很不文明，也很不理性地不願歸還強佔來的海外蕞爾屬地，天下寧有是理？又是什麼邏輯？偏偏何六九這個大蠢材就是沒有頭腦看出這個不可解的矛盾，妄自下了這樣的斷語「可是在英國公民眼中，這些無比『愛國』的北愛爾蘭新教徒大概算是缺乏見識的閉塞鄉鄙吧。」

### Hobsbawm 對福克蘭事件的分析

既然何六九言必稱英國，而且也很標榜「理性」。那我們就來看看也自許理性而且也是左翼的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學者 Eric Hobsbawm 是怎麼分析福克蘭事件的吧！

「戰爭爆發與其後的交戰期間，不列顛是什麼情況？且讓我試著扼要綜述。首先發生的

是許多人幾乎都有暴怒之感，認為斯可忍，孰不可忍，非得有所作為不可。這種情緒遍及所

有階層，充斥於民間。所有黨派，不拘是右派或左派，都有同感，就這點而言，這種憤怒是非政治性的。我知道許多參與這場反阿根廷運動的左派，甚至是極左派，與右派人士有同樣的反應。正是這種普遍的憤怒與羞辱之感表現在第一天的國會議事中，要求採取行動的壓力實際上不僅來自余契爾及其政府，而是來自四面八方，既來自保守黨的極右派，也來自自由黨與工黨，只有極少數例外沒有附和。我想，這是一種可以實際感受到的大眾情緒。任何敏感到這種氣氛的人都知道激動的情緒確實在瀰漫，任何沒有察覺到一般民眾的這種感情，而且在這個階段仍不了解這種情緒並非媒體製造出來而是一種真實的激憤與羞辱之感的左翼人士，應該嚴肅地重新考量他們判斷政治的能力。這種情緒可能並不特別可取，但宣稱不存在這種情緒則是非常不符實情的。

這種勃然大怒的感情與福克蘭群島本身無關。我們知道福克蘭群島只不過是裹在好望角大霧中的一塊遠方領土，我們對其既無所知也不在乎。真與此息息相關的是：一九四五年以來的本國歷史，一九六〇年代晚期英國資本主義加速惡化的危機、特別是一九七〇年代末與一九八〇年代初的經濟蕭條。……因此，阿根廷侵佔不列顛的一小塊領土的消息傳來，許多人氣憤填膺的反應可以用下述的話來表達：『我們是個幾十年來不斷走下坡的國家，外國人越來越比我們富裕、進步，每個人都瞧不起我們，要不就是可憐我們，我們再也不能在足球



上打敗阿根廷人或其他人，不列顛的每一件事都出了差錯，誰也不真的知道該怎麼辦，又該如何扭轉頹勢。但這回一撮外國人認為他們大可直驅軍隊攻佔英國領土，而且以為不列顛人已沒有用到對此莫可奈何。得，這是壓垮駱駝背的最後一根稻草，必須有所行動了。我們對天發誓，我們要讓他們知道，我們不會真的只是躺在那兒任由他們踐踏。』」（Hobswawm 1989: 52-53）

### 左翼不能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

英國的右派當然趁機利用英國人民這種不甘帝國沒落的破落戶情結，出兵福克蘭，大肆煽動民族沙文主義，鼓吹愛國主義，加強軍備。Hobswawm 指出：

「這是個極為危險的警訊。今天蔑視他國的極端愛國主義(jingoism)特別強烈，因為它是做為這個國家大多數人(包括許多工人)感到衰落、沮喪與自卑的一種補償。這種感情又因經濟危機而更為強烈。極端的愛國主義從象徵意義上有助於人民感到不列顛並沒有在沈淪，

還能夠幹出一番事情，還可以受到重視，而且，如他們所說，還是個『偉大的』不列顛。」

(同上·61)

這就是一個理性的英國左翼學者對當時遍及英國上下各階級的極端愛國主義所做的分析，這樣的觀察分析當然與何六九的胡說八道完全背道而馳。但 Hobsbawm 與何六九更大的差異是，他沒有何六九那樣情緒性地譴責愛國主義、譏嘲所謂的「愛國流氓」。相反，他特別指出：

「左翼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左翼之所以不願勉強接受這個國家的愛國主義問題有多種理由，其中有一種是緣於傾向排斥民族愛國主義的國際主義這個特別的歷史性概念……因而，有種感覺認為，愛國主義在各方面都與階級意識有所衝突（確實也常常有所衝突），還認為，統治與主導階級為他們的目的而動用愛國主義可獲取極大的利益，這也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不夠重視愛國主義的問題有一些道理。所以身為一個歷史學家讓我提醒你們，愛國主義不容忽視。英國工人階級長久以來有一個並不總是與富於鬥爭精神的階級意識大不相同的愛國主義傳統。」

Hobbsbawm 還進一步指出：

「愛國主義的危險從過去到現在都是明顯的，其所以危險，是因它過去與現在都極容易導向統治階級的極端愛國主義、仇外的民族主義，當然也極易轉為我們今天所見的種族主義。在愛國主義與工人階級的其他情操與期望分離之際，甚至被用來對付工人階級之際，即民族主義可被拿來對抗社會解放時，愛國主義的危險就特別巨大。沒有人太注意英國憲章派工人運動中的極端愛國主義的原因，是因為它結合了極富鬥爭精神的階級意識，並且為其所掩飾。一旦愛國主義與階級意識分離，而這很容易發生的，其危險就特別明顯。反之，當這兩者攜手並進，不僅會大大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會大大加強工人階級在改造社會的廣泛聯盟中帶頭領導的能力，甚至使工人有可能從階級敵人手中奪得領導權。……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是危險的。」（同上：60）

## 證實了何六九的無知與卑劣

Hobsbawm 從歷史經驗中得出工人的階級意識若與愛國主義結合，將獲得巨大的解放能量，他強調把愛國主義放手交給右派是危險之舉，這恰與何六九大肆攻擊愛國主義成強烈對比。這樣一來，Hobsbawm 卻也就成了何六九所謂的「愛國流氓」了。然而，把 Hobsbawm 對民族主義的深刻研究、對福克蘭事件的深度分析與何六九對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膚淺了解及情緒性謾罵做一對比，誰才理性？誰才有資格稱為左派？我們也請讀者自行判斷。

以上我們逐一批判了何六九對中華民族、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對英國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社會的無知與曲解，完成了我們在前面所說的「逐一揭穿何六九的論述在態度上的不真誠、內容上的錯誤、論證上的邏輯錯亂與知識上的淺陋，證明滿口空話、大話與廢話的何六九，不但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連自由主義者也算不上，只不過是個不自量力，沒有自知之明的蠢才！」，也揭發了他罔顧事實、睜眼說瞎話地為台灣民族主義幫腔助勢，完全扭曲、顛倒他所引據的英文著作作者的原意來支持他跪拜諛頌英國帝國主義的正當性，種種卑劣下流的無恥行徑。我們相信我們的指控雖然嚴厲，但鐵證如山，證據確鑿，無可翻案。何六九竟然想憑這種用極其淺薄的知識、錯亂的論證與

卑鄙的欺詐堆砌起來且充滿主觀偏見情緒的論述，來搞所謂「文化大革命」，確實讓人感覺像個沒有見過世面的鄉鄙愚夫，妄想靠賣弄一點明眼人一看即穿的障眼法，滑稽的要弄幾招花拳繡腿就可充當郎中，行騙江湖，其無法輕易得逞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在前面已明白表示過：

「由於何六九沒有一點坦蕩的君子之風，所謂『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我們也不準備待他以君子，與之商榷決疑，而是毫不留情地徹底揭露他裝神弄鬼、形左實右的反動本質，戳穿他除了會玩弄一些抽象概念，說一些空話、大話之外，根本是個不學無識、思想錯亂的庸妄之徒。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的附言中說：『我回答海因岑先生並不是為了擊退他對恩格斯的進攻。海因岑先生的文章值得回答。我之所以回答是因為海因岑宣言為分析提供了有趣的材料。』我們駁斥何六九也同樣不是因為他的文章值得回答，而是通過對他的批判可以釐清一些與民族主義有關的問題，並對統獨問題提出左翼的觀點。」

## 何六九比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還低劣

何六九以一副正宗馬克思主義者的姿態大談「無產階級世界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可是，正如我們所指出的「他主觀唯心、機械的形而上學思考方式，絲毫沒有一點唯物辯證的觀點」，「在〈幽靈〉與〈鄉鄙〉二文中，我們看不到一丁半點馬克思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影子」。一九一三年列寧在〈論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概念〉中，痛斥孟什維克派的阿·葉爾曼斯基「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以自由派的觀點偷換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的階級鬥爭觀點」（《列寧選集》，第二卷：451）。何六九在民族問題上所幹的勾當，比諸阿·葉爾曼斯基在階級鬥爭觀點上「用自由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其低劣尤有過之，他是如我們在前面所揭露的「緊跟在自由主義者的屁股後面，以連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會有的肉麻語調歌頌起時髦的『公民民族主義』，充分顯示他不過是自由主義的尾巴，而且是較為深思的自由主義者也不肯要的爛得發臭的尾巴。」

這樣的指控並無過當。我們引述過被何六九曲解的自由派公民民族主義者 michael Ignatieff 對公民民族主義與族裔民族主義的基本見解。Ignatieff 指責像何六九那樣「對為建立自己的民族國家而戰鬥的人民所表現的殘暴行為，加以鄙視與感到震驚，都是錯誤的」。在我們曾提到的 John A Hall 為紀念

Gellner 而編的論文集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中，也有多位專研民族主義的自由派學者對「現代化」派過份貶抑民族主義，誇大民族主義的負面性提出了批評，諸如此類的論文，所在多有，不勝枚舉。即使像 Gellner 這位自由主義「現代化」派的代表人物，雖不支持民族主義，但也以嚴肅冷靜的態度，用唯物的觀點力求客觀地探討促動十八世紀末以來民族主義洶湧巨流的社會經濟因素。他不但沒有如何六九那樣憑著鄙陋、淺薄的知識，幼稚地醜詆民族主義，濫肆宣洩反民族主義的情緒，在晚年反而承認民族主義可激發毀家紓難、殺身成仁等崇高無私的情操，他指出：

「我們所論證的民族主義感情的根源既不淺薄，也不可鄙。這些根源可能並沒有在所有的人與所有的社會環境中發生作用（實際上也沒有），但它們確實深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類境況中。它們成了我們的存在與處境的本質要素。他們威力強大，而且是理所當然的強大。也許它們的表現並非全都可取，但就其本身而論，這些民族主義感情的根源既無可迴避，也不可恥。……民族情操可以是，也常常是，真誠而深刻的。胸中懷有深摯的民族情操的人切莫因此而駁斥我提出的「現代化」理論。事情不是這麼回事。我的理論並不否認民族主義感情的濃烈深厚，或甚至加以蔑視。相反，我整個觀點正是以此為至關重要的前提之一。濃烈的深厚的民族主義感情恰恰就是我的理論所完全承認，並且認為必須加以解釋的，我所勉力嘗

試者也就在此。我所提出的解釋是否得當，那是另外一回事，且留待他人論斷。但決不能說，我的理論否認或無視民族主義感情的深厚與真摯。相反的情況才是實情。」（Gellner 1997:

12）

### 何六九的論述雜湊了左右派庸俗觀點之大成

不僅一些西方的自由主義學者不會如何六九那樣像中了邪的乩童裝神弄鬼，滿口胡言亂語，台灣有些治學態度比較嚴謹的自由主義學者也沒有何六九這樣由無知而來的輕佻、張狂。例如：江宜樺在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就以自由主義的觀點對民族主義與台灣的統獨之爭做了深入的探討；兼具進步自由主義與後馬克思主義色彩的趙剛一九九六年一月在《台灣社會研究》第二十一期發表了〈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針對台灣民族主義，從反民族主義的立場批判了族裔民族主義。兩位的論述雖都有值得商榷之處，但態度誠篤，用功頗深，終屬瑕不掩瑜的力作，不論是論證的嚴謹程度或理論的深厚都遠超乎何六九之上，更別提他們根本不搞何六九那種刻意曲解、顛倒所引資料原意的卑劣技倆了。



如前所言，我們批判何六九除了因為他極端淺陋無知卻又輕狂囂張外，還因為他和海因岑一樣，為我們提供了有趣的材料，可藉此探討有關民族主義與統獨之爭的一些問題。

何六九的論述內容頗像美國中國餐館賣給不知正宗中國菜為何物的洋人吃的雜碎，烹調手法極其拙劣，色香味無一具備，深諳中國菜美味者見之無不倒盡胃口。何六九的論述可謂雜湊了左右派庸俗化的觀點之大成。他濫情攻擊民族主義與頂禮膜拜公民民族主義，既來自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膚淺認識，也源於一些自由主義者從個體原子論觀點出發對集體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深懷的疑懼；而他對中華民族主義的厚誣醜詆與對中國統一的排斥則是與新舊型台獨一樣，出自對中國歷史與兩岸現實情況的無知；他在〈鄉鄙〉的最後部分再度跟在自由主義者屁股後面，大談「多元民主」、「民間社會」、「現代文明的公民意識」這些典型的自由主義論調，同樣也是盲從附和某些自由主義者把民族主義與民主對立起來的論調，與在民族問題上雷同，成了自由主義的尾巴。以下我們先談談左翼的民族觀，再對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提出看法。

### 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不必然對立

關於民族與階級的關係，在左翼陣營中歷來有一種流傳甚廣但卻片面的形而上學觀點，即把階級

與民族、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機械地視為絕對對立的兩極。所謂「工人無祖國」被理解成似乎無產階級沒有民族屬性、沒有國民身份，從而把主張民族獨立的民族主義與保家衛國的愛國主義當成資產階級所專有，視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如蛇蝎，避之唯恐不及，時而大加撻伐，似乎一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即有違國際主義的左翼立場。之所以產生這種錯誤的認知，一是未曾深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人對階級與民族關係的論述，二是如列寧所云：「忽略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9卷：128）也就是說，未能根據唯物辯證法，以歷史唯物論深入分析不同民族、不同國家在特定階段與具體情勢下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而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片言隻語當成抽象的公式，據為立場，不加細究即隨處套用。其實，一般在片面強調國際主義，否定民族主義時，都忽略了「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光從字義就可知道是「國家」或「民族」（nation）之間的聯合。「國際主義」正是在承認國家或民族已先存在的基礎上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不是否定國家、民族的存在或反對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而是相反，力主民族（尤其是具有深厚歷史基礎與生命力的大民族）獲得獨立地位，並組成統一的國家，掃除分裂割據的局面，建立具有統一的貨幣、法律、度量衡、關稅與交通系統的大市場，以利資本主義的發展，提高生產力，從而加速社會矛盾，促進社會變革。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的不同之處，是在馬克思主義視統一的民族國家為通向破除階級對立從而促成民族融合的歷史進

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主張各民族國家在獨立平等的基礎上建立國際合作，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則是標準「民族至上」、「國家至上」，力圖在控制國家政權後，以「國家民族利益」為名，掩蓋階級矛盾，並以國家資源做為對外擴張的憑藉。因而，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問題上是根據歷史唯物論，從是否有利於推動人類的歷史進程、有利於世界革命來判斷民族獨立與國家統一運動的作用，而不是用所謂「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抽象原則毫無區別地反對一切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

### 馬克思對民族問題的看法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民族問題的主要觀點，李崇人在《左翼》第十號的〈統獨右左問題的上下求索（上）〉中，已做了扼要、準確的闡述。在此，我們再做一點補充與進一步的申論。一八六六年六月間，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討論了當時發生的普魯士與奧地利戰爭，會中也因「民族特性」問題而引起爭論。普魯東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認為民族與國家皆無存在必要，遭到馬克思的全面批判。馬克思在六月七日與二十日寫信給恩格斯說：

「巴黎大學生中的蒲魯東派（《法蘭西信使報》）鼓吹和平，宣布戰爭是過時的東西，

民族特性是無稽之談，並且攻擊俾斯麥和加里波第等人。把這一策略當做同沙文主義論戰的手段來用是有益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信仰蒲魯東的人（我這裡的好友拉法格和龍格也在內）竟認為整個歐洲都可以而且應當安靜地坐在那裡等待法國老爺們來消滅『貧窮和愚昧』，而他們自己愈是厲害地吶喊『社會科學』，就愈加陷入貧窮和愚昧的統治之下，他們簡直太可笑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24）

「此外，『青年法蘭西』的代表（不是工人）提出了一種觀點，說一切民族特性和民族本身都是『陳腐的偏見』。這是蒲魯東派的施蒂納思想。一切都應當分解成小『團體』或『公社』，然後它們又組成『聯合會』，但並不是國家。在人類的這種『個體化』以及相應的『相互性』向前發展的同時，其他一切國家的歷史都應當停頓下來，全世界都應當等候法國人成熟起來實行社會革命。那時他們將要在我們的眼前做這種試驗，而世界其餘的部分將會被他們的榜樣的力量所征服，也去做同樣的事情。這一切正是傅立葉期待於他的模範的法倫斯泰爾的。此外，所有用舊世界的『迷信思想』來使『社會』問題複雜化的人都是『反動』的。

我在開始發言時說，我的朋友拉法格和其他廢除了民族特性的人，竟向我們講『法語』，就是說，講會場上十分之九的人不懂的語言，我的話使英國人大笑不止。接著我又暗示說，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覺地否定民族特性理解為由模範的法國民族來吞併各個民族

馬克思在這裡明確批判了無政府主義否定民族特性與民族且反對國家的論調，並諷刺侈談超越民族與國家的法國無政府主義者實際上正使用本民族的語言，骨子裡並以領導全世界社會革命的模範民族自居，實際上並無法真正擺脫民族特性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因而，馬克思主義決不是什麼「民族虛無主義」，也決不像無政府主義那樣幻想一夕之間憑主觀意志廢除國家，而是主張通過各國聯合進行社會革命，破除階級對立，創造使國家消亡民族融合的客觀條件。

### 國際主義並不意味取消祖國、犧牲祖國

關於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關係問題，我們舉一個很有典型意義的例子來說明馬克思主義對愛國主義的立場。一八九三年八月法國將舉行眾議院選舉，當年春天，法國的各個保皇派集團在無政府主義者的支持下，大肆誹謗馬克思主義的法國工人黨所主張的國際主義原則是反愛國主義。法國工人黨的全國理事會遂於六月十七日發表《告法國勞動者》的聲明予以駁斥，刊載於《社會主義者報》，並在法國北部一些城市中組織群眾大會宣讀該項聲明。我們大幅徵引如下，藉此闡明國際主義與愛國主



樣，它要求生產、交換和科學方面的社會化組織，所以人類國家的形成不是並且也不可能有害於現存各國人民的、而只能是有利於各國人民的。有利於各國人民取得最高度的發展的。

走上了導致人類全面繁榮的國際主義道路的人，並不是就不再是愛國主義者了。正像上一世紀末法國人既是法蘭西人，同時仍然是普羅凡斯人、勃貝第人、佛來米人或布列塔尼人一樣。

恰恰相反，國際主義者能夠宣稱自己為唯一的愛國主義者，因為唯有他們清楚地了解應該怎樣改善條件，才能夠保證而且一定保證祖國以及所有從敵對變為團結的各國的前途和強大。

人們在高呼『國際萬歲！』的時候。他們也就是在高呼：『勞動的法蘭西萬歲！法國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萬歲！法國無產階級只有支援所有各國無產階級的解放才能解放自己！』

法國社會主義者是愛國主義者，還可以從另一角度，根據另一個理由來論證，因為法國過去是而且現在已經註定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因此，我們要而且不能不要一個強大的法國，這個法國應既能保護共和國不受聯合起來的君主制國家的侵犯，也能保護它即將到來的工人自己的一七八九年免遭資本主義歐洲的聯盟——至少是可能的聯盟——的破壞。

正是法國的巴貝夫、傅立葉和聖西蒙的著作開始了社會主義思想的醞釀，這些社會主義思想後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以科學的完成。

正是法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先行即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在這裡發生的——成了階級鬥爭的大戰場，它為了勞動解放的事業，於一八三二年在里昂、一八四八年和一八七一年在巴黎都曾貢獻出無數的英雄起義者。

正是法國，儘管它的兒女被凡爾賽軍大批屠殺，它在自己的不朽的一八八九年巴黎代表大會上舉起了倒在自己的血泊中的國際旗幟，並首創了五一節的慶祝活動；它第一個在用選票奪來的市政廳上，升起了以奪取政權為目標的無產階級的紅旗。

因為它的革命的過去將保證社會主義的未來，所以當二十三年以前它處於危急之中的時候，意大利、西班牙以及其他國家的國際主義者在三色旗下趕來保衛它，同時，新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置自身的自由於不顧，盡一切力量來阻止對法國進行無理的和罪惡的分割。

……現在，我們已經證明，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不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人類之愛的兩個相輔相成的形式，所以我們面對著我們的誹謗者再次大聲宣佈：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比利時工人黨一同反對資產階級的科堡君主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意大利的勞動者和社會主義者一同反對薩瓦君主國。

對，法國工人黨就是和海峽彼岸年青的而且已經相當強大的工人政黨，一同反對英國寡頭政治的、資本主義的憲政。

對，我們就是並且定要和整個地球的無產階級一同反對一切地方的統治者、有產階級。

而且我們相信，我們法國的同志們、在廠房和田地裡勞動的人民，

一定會擁護黨的全國理事會的雙重的、實質上是同一的口號：

國際萬歲！

法蘭西萬歲！」（《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518-521）

## 國際聯合只能存在於國家之間

恩格斯在看到這份聲明後，於一八九三年六月二十日給馬克思的女兒勞拉·拉法格寫信說：

「工人黨對『愛國主義』採取的新立場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道理的。國際聯合只能存在

於**國家**（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在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假愛國主義者施加的壓力，遲早定會招致這樣一類的聲明，……」（同上：84）

六月二十七日，恩格斯又致函馬克思的女婿，也是法國工人黨領導幹部的保爾·拉法格，針對《告法國勞動者》的聲明提出全面的看法，他說：

「你們對無政府主義者和極端愛國主義的布朗熱份子們的胡鬧提出抗議是完全正確的，……特別是在普選的前夕，決不能聽任別人恣意誹謗。所以對這一點我同意。德國人也不止一次這樣做過，……」（同上：86）

恩格斯對聲明中過份強調法國本位的一些缺失也提出溫和的批評：

「我希望你們的宣言在法國產生影響，但我同樣希望它在德國不為人所注意。理由如下（這並沒有什麼嚴重的，但我認為有責任提醒你們注意，以便你們下次能夠避免）。

關於愛國主義者一詞的使用，關於你們自稱為唯一『真正的』愛國主義者，這些我不想談了。這個詞涵義片面——或者說詞義含糊，依情況而定——所以我從來不敢把這一稱號加於自己。我對非德國人講話時是一個德國人，正像我對德國人講話時又純粹是一個國際主義者一樣。我認為，要是你們只稱自己是法國人，倒會取得更大的效果；因為這反映了事實，其中也包含了由此而得出的邏輯結論。但是我們先不管它，這是個風格問題。

你們以法國革命的過去自豪，並認為它的革命的過去將保證它的社會主義的未來，這也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我覺得，你們在這樣做的時候，似乎太接近布朗基主義了，也就是說，太接近於這樣一種理論：法國註定應該在無產階級革命中起它在一七八九—一七九八年資產階級革命中所起的那種作用（不僅是首倡者作用，而且是領導者的作用）。這是同今天的經濟和政治的實際情況相矛盾的。法國工業的發展落後於英國，目前也落後於德國，德國從一八六〇年以來進步迅速。法國的工人運動今天已不能同德國的工人運動相比。但是，無論是法國人、德國人或英國人，都不能單獨贏得消滅資本主義的光榮。如果法國——可能如此——發出信號，那末，鬥爭的結局將決定於受社會主義影響最深、理論最深入群眾的德國；雖然如此，不管是法國還是德國，都還不能保證最終的勝利，只要英國還留在資產階級手中。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如果你們想把它變成只是法國人的事業，那你們就會使它

成為做不到的事了。」（同上：86-87）

### 主張中國統一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恩格斯還從德國的立場指出聲明中令德國社會民主黨與工人不快的不當措辭：

「而且還有一點非常不好。你們寫道：『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在資產階級報刊上這被翻譯成，『反對德意志國』。而且所有的人也一定會這樣理解。因為法文 empire 既可解釋為『Reich』（『國』），也可解釋為『Kaisertum』（『帝制』）；德文『Reich』一詞則側重在體現著民族統一（黑體字為原文所有）的中央政權這一概念；而這種統一（是德國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他們將誓死為之戰鬥。我們決不（黑體字為原文所有）想把德國推回到一八八六年以前那種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要是你們說的是『反對皇帝』或『反對帝制』，那就不會有任何人反對，雖然那位庸碌無能的威廉不是一個值得這樣重視的人物。敵人是產階級——地主和資本家。在德國，人們對這一點很理解，

所以我們的工人不理解你們提出要幫助他們戰勝柏林的狂人是什麼意思。

因此，我曾請李卜克內西不要談你們的宣言，只要資產階級報紙未提到它。但是，如果有人以這樣不恰當的提法為依據來攻擊我們的人賣國，那就會引起相當不愉快的爭吵。

簡言之，加深些互相了解並無害處——國與國之間的平等同個人之間的平等一樣是必要的。」（同上：88-89）

法國工人黨的聲明與恩格斯對它的評論，給我們提供了瞭解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兩者關係的絕佳材料，極有助於釐清長期以來廣泛存在於左翼陣營中的誤解。從中我們可以明白得知：

一、「國際主義決不意味著取消祖國，決不意味著犧牲祖國。當國家形成的時候，就是通向我們正在朝著人類團結道路上前進的第一個同時也是必經的階段，而且全部當代文明所產生的國際主義則是這條道路上的一個新的階段，而且是不可避免的階段。」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不僅不互相排斥，而且是人類之愛的兩個相輔相成的形式」；三、「國際聯合只能存在於國家之間，因而這些國家的存在、它們在內部事務上的自主和獨立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四、民族（國家）的統一——是社會主義者自身生存的政治條件，決不能使國家陷於四分五裂和軟弱無力的狀態；五、民族的自豪感與愛國主義不可過份膨脹，導致民族沙文主義；六、「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

非單一國家所可為功。因而，長期以來，不論在國際或台灣的左翼陣營中，把國際主義與愛國主義視為對立互不相容的兩極的看法，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原則的真正本義。Hobsbawm 強調把愛國主義完全讓給右派是危險之舉，而工人的階級意識應與愛國主義結合，以戰勝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確有見地。

在法國工人黨的聲明與恩格斯的評論中，還有一點值得一提的是，他們極為注意不允許右翼誣蔑他們「不要祖國」、「賣國」。法國工人黨指責資產階級的「所做所為使祖國的領土遭到侵略和分割，他們的階級把祖國奉送給世界主義金融家匪幫去掠奪」。恩格斯還提醒拉法格，法國工人黨聲明中的不當措辭如果讓資產階級利用作為攻擊德國社會民主黨「賣國」的口實，「那就會引起相當不愉快的爭吵」，從而破壞了兩黨的國際團結。其中的道理至為明顯，鮮有任何一個政治團體或階級組織在屈膝於外國的要求，出賣國家利益，喪權辱國，恬不知恥地充當外國走狗後，仍能見容於本國多數人民，逃過遭受唾棄的命運的，這在中外的近現代史中屢見不鮮，早有明證。而在面對外國侵略領土、干涉內政與壓迫剝削之際，無產階級政黨必然要充當最堅決、最頑強的抵抗力量，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自不待言。

正是基於上述的馬克思主義立場，作為左翼，我們正大光明地承認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員，理直氣壯地主張兩岸應該極力排除美國帝國主義的干涉，結束國家分裂的局面，完成中國的統一，這絲毫

沒有什麼輸理的。

### 何六九是戴著左翼假面具的右翼台灣民族主義者

何六九這個不知馬克思主義為何物的蠢材，先是說了一篇「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日常生活和政治活動中無法迴避的天大問題」、「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和其他階級所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之一，甚至於有可能是某一個時期最主要的共同課題」，因此無產階級不能「不問民族」，台灣的左翼不能迴避民族問題，應該從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提出與右派「絕大不同的」民族觀，「戰勝右翼，帶領台灣工人以及整個社會在此議題上更進一層樓」，「從鬥爭中表現出階級的獨立性和主導能力」，等等的空話、大話，結果是他非但沒有提出「絕大不同」於右派的左翼民族論來「戰勝右翼」、「表現出階級的獨立性和主導能力」，反而是一方面憑著自己的淺陋無知肆意曲解、醜詆中華民族主義，一方面同樣淺陋無知地吹捧公民民族主義，充當自由主義爛得發臭的尾巴，甚至不惜用詐騙手段諛頌英國帝國主義為公民民族主義的典型，最後則突然在毫無論證下，又變成了他所反對的「不問民族」論者，認為左翼「沒有理由要成為民族主義者，無論是血緣民族主義者或者公民民族主義者，左翼人的眼界，應該遠遠超越這個民族認同所涵蓋的範圍」，「能夠從思想上有效反制鄉鄙根性血緣民族主義的，還

不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民族認同概念，而是公民意識本身，真正具有現代文明內涵的政治文化」，「唯他們（非民族主義者）才能夠帶領這個社會真正走出民族思考的狹隘格局」。可是，他那個內容空洞、形態模糊的「不是任何一種性質的民族認同觀念」的「公民意識本身」，那個所謂「公民意識定義下的民族」，到底是個什麼玩意兒？卻始終如夢似幻、像神又類鬼的玄秘莫測。就這樣，何六九這個冒牌的假馬克思主義者在《左翼》上的三篇文章，除了從他的雜碎腦袋中倒出一大堆陣陣惡臭令有識者聞之掩鼻的垃圾，並徹底暴露他卑劣下流的詐偽品質外，他大言不慚地吹噓要「比較為優越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出發」的左翼民族論，最終卻還是個大大的零，獨留下一批假冒偽劣的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劣等貨，供人訕笑唾罵。

何六九之所以大肆吹噓要提出優於右派的左翼民族論讓台灣工人階級「領導整個台灣社會」始，最終卻以右派尾巴的面目出現，主要的原因是他根本未窺馬克思主義的堂奧，妄圖拿一些粗糙的馬克思主義語言做成的劣質脂粉遮掩他那鷄皮黃臉的半調子自由主義。可是，只要一張口，那劣質脂粉即片片剝落，盡露醜怪的本色。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指出，何六九這個帶著馬克思主義假面具，化粧術極為拙劣的蠢材，骨子裡其實是個台灣民族主義者，他曲解、厚誣中華民族主義，明目張膽地扭曲事實美化台灣民族主義，頌揚公民民族主義，大談「民間社會」（其實是指所謂的「市民社會」或「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斬新健康的現代、公民的政治文化」，把資本主義民主體制說得非常「文



明」、「理性」、「自由」，是「漢族人民憧憬已久的民主自由和文化的新紀元」，其所做所為實與台獨學者吳乃德所明白表示的若合符節：

「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民族形成）在目前這個歷史階段和政治環境中，它所面對的『敵人』主要是中國。或者更正確地說，台灣民族主義一直在中國的陰影下發展。而它所對抗的思潮，也是主張大一統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在現實的環境下，它的任務之一主要是在脫離中國，至少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意識型態成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基礎。」（吳乃德 1996: 36）

### 德希達（Derrida）對政治、經濟自由主義的批判

台獨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中期以後之所以漸由福佬沙文主義轉向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公民民族主義，除了我們前面已指出的內部因素外，還有個國際大氣候。那就是東歐、蘇聯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後，全世界的右派無不額手稱慶，認為資本主義的政治與自由經濟體系，已獲全面勝利，於是歡欣

鼓舞地高奏凱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裔美籍的保守派福山那臭名昭著的「歷史終結」論。福山宣稱，過去曾與自由民主政制爭雄的君主政體、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俱已為手下敗將，人類的意識形態與統治制度演進到自由民主制已達終點，自由民主從此在全球獨領風騷，「不分地域與文化，舉世莫不一致熱望憧憬自由民主制度」，再也沒有其他敵手可取而代之，人類歷史的進程至此終結（Fukuyama 1992: XI, XIII）。蘇聯、東歐「實存社會主義」國家的崩潰、轉型與中共鄧小平路線的走向資本主義道路，似乎為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提供了現實的證明，似乎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將通過全球化的浪潮，一統世界，君臨天下。這對數十年來唯美國馬首是瞻，意識形態上徹底臣服於美國的台灣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確是一大福音。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深化，由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與部分中小企業主推動的資本主義民主化也逐步取得進展，李登輝上台後更加速進行，至二〇〇〇年陳水扁在總統大選獲勝，國民黨下台而達於頂點。十多年來，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之類的福山式論調被台灣分離主義者奉為意識形態支柱，成了反對中國統一，主張「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振振有詞的根據。何六九整個論述的意識形態內涵基本上不脫此範圍。我們說他根本未登馬克思主義堂奧，是個蹩腳的冒牌貨，除了前面已揭露、批判的部分外，另一理由即在此。

大凡稍悉馬克思主義者都知道，馬克思、恩格斯畢生用力最多者正是在剖析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

機制，並批判資產階級的哲學、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識形態，徹底揭露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的階級性與虛偽性，提醒無產階級洞悉資產階級傳佈的這些意識形態迷霧，勿為所惑，方克改造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體制，實現真正的自由、平等。故而，只要真正深體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者，即便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或對無階級社會能否實現存疑，也很難再像何六九那樣跟在自由主義者屁股後面天真地相信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會是什麼「文明」、「理性」、令人「憧憬」的「新紀元」。

我們就舉對二戰後的西方思想有重大影響的後結構主義代表人物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為例來說吧。正當福山這類保守反動的自由主義者得意洋洋地宣告資本主義大獲全勝，馬克思主義已然失靈之際，德希達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在美國加州大學河邊分校召開的「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學術會議上，發表專題演講《馬克思的幽靈們》，極力抨擊以美國為首高唱的所謂「全球化」、「國際新秩序」，痛斥福山所傳播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福音書之虛妄，大聲疾呼應該繼承馬克思主義徹底的批判精神。他指出，以福山為代表的保守反動的意識形態正形成世界文化霸權的獨斷教條，政客濫予誇飾，媒體齊聲頌揚，知識圈與學術界也有一大批人同氣唱和，這套佔居主導地位的論述成了狂熱謳歌的符咒：

「這套咒語被迴環讚頌、頂禮膜拜，大加吹捧，成了信守不渝的萬靈處方，有如萬物有靈論者的魔法。它以步伐整齊的節奏宣稱：馬克思不靈了，共產主義完了，死定了，共產主義的希望、論述、理論與實踐也隨之長眠九泉，永難再起了。資本主義萬歲！市場萬歲！經濟與政治的自由主義永世長存！」（Derrida 1994: 52）

德希達還借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主張，由強權支配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與國際法必須改變，以建立「新的國際」，並指出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下，自由主義所謂「民主、自由、人權」論述的偽善不實：

「由於國際法已出現多種危機，我們才力圖建立『新的國際』機構。這個『新的國際』觀點已揭發了人權論述的限制，今天國際政治經濟上的實際不平等遠遠超越過往的人類歷史，只要市場法則、『外債』與科技、軍事、經濟發展的不平等依舊支撐這樣令人驚怖的實際不平等，人權的論述就終究不夠充分，有時顯得偽善不實，而無論何時則都是徒具形式、自相抵觸的。正當有人厚顏無恥地傳播名為自由民主理想的福音，自認已最終實現了人類歷史的理想：不再有人類歷史中侵害諸多類人的暴力、不平等、排斥、饑荒以及經濟壓迫，此時就

更有必要宣揚這種『新國際』的觀點。且莫陶陶然於歷史的終結，歌頌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市場的降臨，也不用歡慶『意識形態的終結』與偉大的解放論述的末日，我們切不可忽視世界各地無數觸目可見的苦難景況：

人類再怎麼進步都無法讓我們無視在地球上男人、婦女、兒童遭受奴役、饑饉甚至滅絕的人數之多，就絕對數字而言，是前所未見，史無前例的。」（同上：85）

這就是一位具有批判精神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對台灣分離主義者奉為無上教條的「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所做的深刻批判。

### 資產階級民主也同無產階級相對立

幾十年來，台灣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深深依附於美國，學術、文化也同樣淪入被殖民的境地，美國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通過學術、文化買辦與媒體在台灣紮下了深厚的基礎，成了反共的工具，也為分離主義者提供了意識形態的武器。一些局限於狹隘的小資產階級世界觀的知識份子無法超越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樊籠，並不令人訝異。但何六九以正宗馬克思主義者的口吻侈言所謂「無產階級世界

觀」、「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整個論述卻未脫自由主義右派的框框，屢見對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頌揚，大談什麼「民間社會」、「民主自由和文化新紀元」、「現代文明的新紀元」。他也與分離主義者一樣，淺薄地自以為比中國大陸「文明」、「現代」。

在我們前面引用過的法國工人黨《告法國勞動者》聲明中，曾以自以為法國的民主共和國比較優越的姿態表示「法國工人黨就是和德國社會民主黨一同反對德意志帝國」。恩格斯對這種錯誤的心態提出批評說：

「歸根到底你們的共和國是老威廉和俾斯麥造成的。和所有我們的君主國的政府一樣，它是資產階級的；……

共和國的形式——這只是對君主制的單純否定，而推翻君主制將不過是革命的必然結果，在德國，資產階級政黨如此破產，以致我們可以從君主制直接過渡到社會共和國。今後，你們不能再把你們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看作別國人民應為之努力的東西來同君主制相對立。你們的共和國也好，我們的君主國也好，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的：如果你們幫助我們反對我們的君主主義資產者，我們就幫助你們反對你們的共和主義資產者。這是一個相互的問題，絕不是慷慨的法國共和主義者解救君主國的不幸臣民。這不符合國際主義的思想，更不符合

你們的共和國倒在沙皇腳下這樣一個歷史情況。不要忘記，如果法國為了沙皇的利益並在沙皇的援助之下同德國打起仗來，正是德國將成為革命的中心。

.....

另一方面，你們把共和國本身說成是無產階級所渴望的東西，把法國說成特等民族，這就使你們避而不談同俄國的聯盟或（更確切地說）臣服於俄國這一不愉快但是推不翻的事

實。」（《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87-89）

恩格斯在這裡強調了兩個重點：一、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也好，君主專制國也好，「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二、法國當時是「倒在沙皇腳下」，同俄國聯盟「或（更確切些說）臣服於俄國」。因此，法國沒有理由自以為比君主國的德國優越。恩格斯的批評說明了如果具有真正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就會清醒地認知到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和君主專制國一樣，「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因而真正的左翼所著力者在於批判資本主義民主徒具形式的虛偽不實，揭露自由主義是維護資本主義剝削制度、麻痺工人階級政治意識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所標榜的「自由」、「民主」、「平等」雖然動聽，在資本主義下卻根本不可能真正實現。而臣服於他國的無產階級既無法得到真正的解放，更沒有資格談什麼「解救君主國的不幸臣民」。

## 台灣資本主義民主的欺騙性

台灣這十幾年來，以急就章的方式完成了政治經濟體制的資本主義化改造，繼一九八〇年代在「經濟奇蹟」論的催眠下滋生「經濟暴發戶」心理後，朝野上下又瀰漫了淺薄的「政治暴發戶」心態。正如王立民在〈總統大選的幾點觀察〉中所指出的：

「『主權在民』論這些年來在李登輝為首的右翼勢力極力鼓吹下，已被塑造為台灣的主流價值觀，成了牢籠台灣人民的意識形態。……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也早已指出：『普選制不是為了每三年或六年決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麼人在議會裡代表和壓迫人民。』事實上，資本主義國家從總統以降的各級民選行政首長、議員莫不通過選舉從人民公僕異化為社會的主人而享受榮華富貴，鬧出層出不窮的愚民自肥的醜聞。所謂三權分立，制衡監督，實則形式大於實質。不法的醜聞遭揭發後，嚴重者雖可能被迫下台。但趕下了虎又從統治階級中再遞補上狼，或遲或快重演濫權自利的把戲。歐、美、日本的投票率之所以奇低，常不過半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民看膩了這些選舉把戲，又無力改變，只有以不投票來消極抵



制。而台灣民眾則剛服下『主權在民』的迷幻藥不久，猶陶陶然於『頭家』的封號，誤以為投票選出騎在自己頭上的統治者就是『民主』而沾沾自喜。」（《左翼》第四號：18）

陳水扁上台後，一連串的財經、勞工政策（包括近日完成的經發會共識）無不日益暴露其右翼政權的本色，即無不日益證明恩格斯所說的資產階級民主制與君主專制「同樣都是同無產階級相對立」的論斷。在台灣政治經濟體制「自由化」、「民主化」之時，其實也就是階級矛盾與日俱增之際。多年來，李登輝、民進黨等分離主義勢力利用虛假的「省籍矛盾」做為奪權鬥爭的工具，掩蓋了實質的階級矛盾。如今，台灣民族主義者高唱的「台灣人出頭天」已實現有年，台灣的政治經濟問題卻每下愈況，金權政治泛濫不止，財富分配日益惡化，資產階級的權力有增無已，工人階級則不但政治上無權、經濟上受剝削的境遇沒有改善，其團結、爭議、組織等各種權利也正遭逢進一步的壓制。面對這樣的情勢，何六九所為何事呢？他在充當統治階級的幫凶，用自由主義的論調，與分離主義者齊聲唱和。念茲在茲者不是揭露作為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政治、經濟自由主義的欺騙性，而是不惜用詐騙的卑劣手段，美化英國帝國主義，吹捧公民族主義，大談「民間社會」、「公民意識」，極力推銷以自由主義為內涵的所謂「嶄新健康的現代的、公民的政治文化」，汲汲於鞏固資本主義民主體制。其根本目的就是執行我們前面引述過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吳乃德所說的：

「因此在現實的環境下，它〔台灣民族主義〕的任務之一主要是在脫離中國，至少脫離中國民族主義。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成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也成為台灣民族主義的合理化基礎。」

何六九不止一次的聲稱自己是「非民族主義」者，但這就跟他滿口「左翼」、「無產階級世界觀」實則形左實右是自由主義的尾巴一樣，純屬欺人之談。他整個的論述完全站在台灣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不論是對中華民族、中華民族主義的曲解或對「二二八」事變的解釋<sup>(3)</sup>，都是十足台灣民族主義者的論調。近年來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的分離主義者提出「公民民族主義」論，其用意在以「公民意識」培養出台灣民衆與中國分離的「國民意識」，何六九之所圖亦不外乎此，但這除了能吸引一些脫離實際、不食人間煙火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外，收效不可能太大。

### Habermas 論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

何六九幼稚地以為只要通過曲解、醜化中華民族主義，抹除台灣民衆的中華民族意識，大肆推銷「公民意識」，就可達到鞏固他的台灣民主共和國的目的，這只能暴露他主觀唯心的思維方式與他對

他所跪拜的西方資本主義極其無知。我們在前面已批判過他不加深思地囫圇吞食「現代派」學者的論點，把「族裔民族主義」與「公民民族主義」機械地視為絕對對立的兩極概念，因此，他根本不知道，英、法等國的資本主義民主制是與強調共同祖先、歷史、文化的民族認同，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同體共生的。關於這點我們在前面已有所論述。這裡我們再舉 Habermas 的觀點來加以補充。

自二十世紀九〇年代 Habermas 即積極贊成歐洲統合，並進一步鼓吹「世界社會」。他認為以民族國家為單位的主權國家已無法妥善處理內部日趨多元的文化與外部的全球化趨勢，民族國家將趨於式微，原本由主權國家構成的國際體系必須重新改造，聯合國的組織形態也應加以變革，使之具有「世界政府」的作用，能有效執行根據民主、自由、公正的原則制定的世界性法律規範，維護全世界的人權，以利建立一個自由、民主、平等的「世界社會」（參考：Habermas 1999）。Habermas 這個源自康德（Immanuel Kant）的構想，理論上是否可以成立，實際上是否行得通，遭到左右各派學者的強烈質疑，此處我們不予討論。我們只是要指出，Habermas 即使在鼓吹超越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世界公民社會」，為民族國家高奏輓歌之際，也並不像何六九那樣極其知無地割裂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中的族裔與公民成份，對民族主義濫加醜詆。Habermas 在論述民族主義與資本主義民主制的關係時說：

「然而，只有中央集權的領土國家才塑造了歐洲的國家體系。16世紀時，從英國、法國、

葡萄牙、西班牙與瑞典這些王國中產生了領土國家。其後，在按照法國模式民主化的過程中，這些領土國家也逐漸轉化成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形成確保了資本主義得以在全世界發展的一切條件。民族國家既提供了法治管理的基礎也確立了個人與集體得以自由行動不受政府干預的法律框架。還有一點，而也正是這點此際令我們關注，民族國家為同質的族裔與文化奠立了基礎，這也使政府的民主化自18世紀開始得以逐漸推進，雖則這是用排斥、壓制少數族裔的方式完成的。民族國家與民主實為法國大革命的生子。從文化的觀點來說，民族國家與民主都是在民族主義的蔽蔭下茁長的（黑體為筆者所加）。」（Habermas 1992: 2）

Habermas 還進一步指出民族主義所形成的民族集體認同之所以能「發揮摧化早期的現代國家轉型成爲民主共和國的作用」，是因爲：一、宗教改革後，天主教與新教決裂，雙方衝突的結果，宗教開始多元化，君權神授論不再能做爲王權正當性的來源，政治權威必須轉而從俗世的人民中取得統治的正當性；二、在經濟與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民衆被迫脫離傳統的社會關係，解除了現代社會早期的行會等社會組織的束縛，變成既可自由流動卻又孤立的個人，於是產生了社會整合的問題。此時，民族的集體意識可使互不相識的陌生人結合起來，積極從事政治活動。民族國家正是運用民族認同促成社會整合，並以同一民族的人民主權論推動民主化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在這樣的過程中，原來臣屬

於威權統治的人民就逐步取得公民身份。因而，「民族主義促進了從私人屬民變為公民的身份轉化」（Habermas 1996: 284-285）。

Habermas 在闡述民族主義與民主的關係時，不像某些自由主義者片面地把強調集體意識的民族主義與從個人主義出發的資本主義民主完全對立起來，而是明白揭示了由民族主義滋生的民族意識、民族認同在促進民主制度發展上的重大作用。

### 單憑抽象的人權與民主觀念不足以凝聚人心

他特別指出，從專制國家轉型為憲政民主國家，徒有抽象的人權與人民主權觀念，不足以為功：

「如果最終沒有從臣民中產生由自覺的公民構成的民族，就不會有推動這種轉型的力量，即使在形式上建立了共和國也無濟於事。要有這種推動政體轉型的政治動員，就必須獲得一種比有點抽象的人權、人民主權觀念更能打動人民心思的訴求。這個缺口是由現代的民族觀念來填補的，它首先能激起生活在共有的領土的居民對同一共和國產生歸屬感。只有具備基於共同歷史、語言與文化的民族認同，只有意識到屬於同樣的民族，散居於廣大領土各地的

人民才會感到政治上休戚相關。公民們於是自視為整體的一部分，不論這個整體用什麼樣的抽象法律術語構成。這類的民族自我意識是指由知識份子用傳奇的神話、歷史與文學傳統精心建構起來的獨特民族精神，並經由當時的大眾媒體廣為傳播。這樣的文化認同為政治認同提供了社會整合的基礎。

這說明了何以公民身份是用雙重符碼拼寫成的：它不僅僅是用公民權利界定的法律身份，而且還是用文化界定的共同體成員。兩個方面首先是互為補充的。不從文化的角度詮釋政治成員的權利，歐洲民族國家在發軔期就無力達到我所稱道的主要成就：即從法律上賦予公民民主的權利，建立一種新式的、抽象層次更高的社會整合。」（Haberman 1996: 285-286）

Habermas 一貫主張理性主義。他雖然不支持民族主義，認為民族主權國家的形式已不能適應多元文化與全球化趨勢的要求，因而鼓吹用民主憲政的政治文化取代民族國家同質的傳統文化做為新的民族認同依據，形成以民主憲政原則為核心的「憲政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但他仍實事求是地充分肯定了民族主義在促成西方資本主義與其民主制度發展上的積極作用<sup>(4)</sup>。何六九滿嘴「理性」，侈談「公民意識」、「真正具有現代文明的政治文化」、「公民意識的民族認同觀念」，可是，不論是他反對的民族主義或他主張的「公民意識」，他都不曾用心研究、思考過，對民族主義除了激

情謾罵醜詆，對所謂「現代的、公民的政治文化」除了盲目的歌頌禮讚，我們都看不到什麼基於可靠的知識、理論而來的理性論述，觸目所見反而是一大堆胡言亂語、瀰天大謊與下流無恥的詐術。這與我們所引述過的 Smith、Nairn、Ignatieff、Hobsbawm、Habermas 等人的理性態度相比，其差距真不可以千萬里計。這些西方學者的論述也恰如照妖鏡一般，讓何六九那用「左翼」、「理性」的詞句包裝的卑鄙猥瑣、非理性的醜陋原貌，立時無所遁形。

## 國族認同與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確立與民族主義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點除了剛才引述過的 Habermas 的觀點外，十九世紀英國的自由主義理論名家 John Stuart Mill 與法國歷史學家 Ernest Renan 也都有所論列。Mill 指出：

「在一個由不同民族構成的國家，自由的制度近乎不可能確立。實行代議制度必須有統一的公眾意見，但在一國的人民中若沒有同胞感情，特別是如果使用不同的語文讀與說，那就不可能形成統一的公意。」（Mill, 1993: 396）

法國的歷史學者 Ernest Renan 在 1882 年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What is a Nation? 闡述了構成「國族」的要素。Renan 分別就種族、語言、宗教、物質利益、地理等各種因素，逐一探討它們與國族形成的關係，結論是：單憑這些因素不足以構成國族，國族的成立主要依靠人民的精神與共同意志。Renan 這篇影響深廣的演講，已成研究國族問題的必讀之作。其中有諸多洞見常為後人引用，如：「遺忘歷史，甚至搞錯歷史，是形成國族的一個必要因素，因而歷史研究的進展常會危及國族意識。」自由主義者尤其喜歡徵引這句話：「一個國族的存在就是每天的國民公決」，來做為公民民族主義的依據，似乎國族僅是經由個人的選擇、同意構成的。但這只是片面地理解 Renan 的原意，從而扭曲了 Renan 的觀點。其實，Renan 是這麼說的：

「一個國族就是一股精神，一種情操。這股精神或情操是由兩種實則為一的东西構成的。其一繫於過去，另一項則立於現在。一是共同擁有一筆豐富的歷史遺產，另一則是眾意僉同，和衷共濟，為光大家業願奮鬥不懈。諸位先生，人不可能憑空出世的。國族之得以存在，就像個人，是先人長期歷盡艱辛，流血、流汗、犧牲、奉獻的成果。在各式各樣的崇拜中，敬拜祖先是無可非議的，我們之成為今日的我，是拜祖先之賜。英勇壯烈的史詩、聖賢豪傑之士與輝煌燦爛的歷史——我是指真正的輝煌，這些必然成為我們確立國族觀念時的可貴



資產。既分享過去的榮耀，又具有共同的意志；合力完成豐功偉業，且願再接再厲！這些都是一個國族存在的必要條件。犧牲越大、越多，愛也就越深。……歷史的光榮與憂患，同心擘劃，共創遠景；共患難，同歡樂，齊希望；這些事情比認同於海關與根據戰略構想而劃定的疆界要有價值得多。這些事是即使種族不同，語言有異也都能共同體會的。我剛才說『共患難』，共患難確實比同歡樂更能團結人。在國族的記憶中，苦難比勝利更有價值，因為苦難會迫使人民興起匹夫有責之感，要求人民共赴國難。

因此，我們明瞭了，過去所做的犧牲與未來要完成的規劃共同使國家凝成牢固的統一體。國族必有其歷史傳承，只是就當前的角度來說，這個歷史傳承都包含在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裡，即，同意並且明確表示願意共同生活在一起。容我用個比喻來說，一個國族的存在是每日的國民公決，就像個人的存活即是宣告生命仍在延續一樣。」（Renan 1995: 153-154）

Renan 雖然過分突出了主觀因素對國族形成的作用，顯現了濃厚的唯心傾向，但他既主張國家認同取決於個人的選擇，又強調歷史文化因素對個人的意識與意志的決定性作用，事實上是結合了公民與族裔的兩項要素來建構他的國族認同論，這與片面強調公民政治意識的公民民族論者有著極大的區別（參考：Yack 1996: 197-198）。

## 國族認同分裂使台灣民主制度的基礎不穩

Mill 與 Renan 就民族認同與民主及國族認同與公民意識之間的關係所陳述的觀點，在我們探討台灣的民主問題與統獨之爭時，很值得注意。著名的自由主義學者胡佛曾對台灣的國家認同出現分裂而危及民主制度提出如下的看法：

「但對中國有所了解的人應該知道，中國具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及一個很厚實而寬廣的文化底子，未來發展的潮流，仍然會很澎湃的。今天在發展的道路上雖遭到一時的挫折，總希望全體中國人一起來奮鬥。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更要心存『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胸襟。如有人自外於中國，甚至對中國人的苦難加以嘲弄，一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認同上的道德問題，引發激烈的衝突。時下很多人把兩岸對抗當成是一種利害衝突，恐怕失之膚淺。因之，我們如拋捨中國人根本認同的道德問題而不談，必然不能把握住問題的癥結。

我一向主張民主自由，但民主自由是國家內的一種制度，如大家對國家認同欠缺共識，

也就是發生不同的國家認同，民主自由的根基就非常動盪，有關的制度就會變形。台灣最近幾年來的民主化，像政黨及選舉等相當程度地成為國家認同衝突下的武器，很多人都抱著惶惶不安的心情看選戰中『中國人』與『台灣人』的對罵及毆打，我們很為這樣的民主發展擔心。」（胡佛·1995）

台灣民族主義者吳乃德根據Zinn的觀點也指出了台灣國家認同的衝突對民主自由體制造成了諸多難題：

「在正常的民主過程中，執政的一組政治領袖，在其執政期間對外代表了全國，對內則有足夠的權威動員全國的社會資源解決社會面臨的難題。然而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政治體中，不同群體的人民對敵對的一組政治領袖必然懷著不信任感，甚至認為後者不具有合法性。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情況下，政治領袖——即使是執政的一方——的權威和信任，因此只及於部份的人民。

在國家認同有所衝突的政治體中，『忠誠』的反對——民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比較不容易生存。因為具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反對者的『居心』較可能被懷疑。而當執政者壓制反

對者的時候，壓制的行動不但具有較高的合法性，而且也比較可能受到民眾的支持。

在國家認同衝突的情況下，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的必要條件，也比較可能受到壓制。我們在上面提過，國家認同的形成固然有歷史力量的作用，可是歷史力量要發生作用，主要是人為加工的社會工程的結果。國家認同的創造和散佈，很大一部份來自人為的努力。民主社會中的言論自由因此是型塑國家認同的重要條件。正如MIII指出的，如果單一國家認同的形成先於民主化，那麼它對民主鞏固不會造成障礙。可是如果一個社會在國家認同尚未獲得一致之前就先民主化，那麼民主化帶來的不是國家認同的共識，而是更激烈的、更清楚對立的國家認同。這對民主鞏固將是一個難題。民主體制中的言論自由，將如何保障宣揚不同國家認同的言論，尤其當其認同的對象是一個對該社會懷有敵意的國家？『民主政治的生存經常需要一個經由基本共識所建構的情感架構，政治歧異在這個情感架構下得以被容忍。』

(Emerson 1967: 223)」（吳乃德 1997: 26-27）

胡佛與吳乃德俱為自由主義者，也都具備現代的政治公民意識，但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知與感情卻有極大的差異，也就是在公民與族裔這兩項國族認同的要素上，兩人並不一致，導致在國族認同上南轅北轍，分屬統獨兩方。他們都看出了由於在國族認同上產生重大的分歧，故而台灣的民主制度難

以鞏固。他們的觀察證諸台灣這十多年來的政治發展，特別是民進黨執政後朝野政治勢力的衝突對抗，可謂道中了台灣政治亂象的要害。不過，他們提出的對應之道，卻因國族認同的歧異而迴不相侔。胡佛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中國人根本認同的道德問題」，分離主義者如再「自外於中國，甚至對中國人的苦難加以嘲弄，一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認同上的道德問題，引發激烈的衝突。」換句話說，分離主義者一日不放棄醜詆中華民族與中國並回歸中國人的立場，那麼不僅台灣內部的激烈對抗無法消弭，兩岸的緊張關係也不可能好轉，台灣的民主制度自難有鞏固之日。吳乃德則從台灣民族主義的立場視中國為「敵人」，主張以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為對抗中國民族主義的思想武器，並用發掘、重構台灣歷史等方法推動台灣的民族主義「運動」，以期形成台灣的國族認同，解決台灣內部的國族認同衝突問題（吳乃德 1996: 36; 1997: 25-29）

自史明、王育德以降的台灣民族主義者多年來想利用捏造、曲解台灣歷史來建構台獨史觀，塑造台灣民族的認同，在迭遭統派學者的批判、解構後，如今已然失去公信力，除了一些台灣史盲尚為其所欺外，已不可能取信於台灣多數民眾。吳乃德設想用重構台灣歷史來促成台灣民族的認同，終屬徒勞，對此我們不加贅論。我們在這裡只集中討論現今分離主義者用來對抗中國統一的主流論述，即從自由主義出發，標榜「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以「公民意識」、「公民社會」為內涵的「公民民族主義」，指出其理論上的缺陷。

## 台獨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論缺乏正當性

許多自由主義者經常以「天賦人權」、「社會契約」這類沒有實際根據的神話與個人主義的原子論哲學觀來論證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道德上的正當性，振振有詞地大肆鼓吹「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並由此推出「民族自決」、「公民投票」等涉及國家主權爭議的主張。台灣的分離主義勢力目前正在拿自由主義的這些抽象原則當作教條，做為推動與中國徹底分離的意識形態工具。自由主義這一整套所謂「天賦人權」、「自由、民主、平等」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馬克思與恩格斯早在《神聖家族》、《資本論》、《經濟學手稿》、《反社林論》等經典著作中予以徹底的批判，任何真正具有馬克思主義素養的人，都不會再為其所惑。即使在非馬克思主義者中，只要肯結合實際認真探討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學者，也已指出其理論上的缺陷與運用到現實中出現的問題。多年來許多自由主義者根據個人主義的原子論把民主自由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對立起來，反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集體主義價值觀，自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以來已遭到受黑格爾哲學影響的「共同體論」(communitarianism)學者的強勁批判(參考：Muhall and Swift 1992)，由於與我們要討論的焦點無直接關係，此處不予細論。

台灣的分離主義者根據自由主義的抽象原則抬出「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公民民族主義」等主張，自以為很符合「文明」、「民主」的資本主義「普世價值」觀，希圖獲得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的支持，達到脫離中國的目的。其實，這不但是對資本主義民主理論的認識不足所產生的幻想，也是出於對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無知而打的如意算盤。美國最富盛名的民主理論學者 Robert A. Dahl 早已指出，一般倡導民主制度的人總是預設，已先存在一個民主制度在其中實施的具體確定的完整政治疆域，但他們很少探究這個完整的政治疆域是由什麼原因、什麼力量形成的？這個政治體的人口與領土的大小，為什麼是目前這樣而不是另外一個數字？事實上，實施民主制度的國家，其人口與領土疆界不是也不可能由民主理論與民主制度本身來確定，而是由歷史與政治的力量決定的。Dahl 舉加拿大魁北克省要求獨立與美國康乃迪克州要求對節育政策有自主權等議題為例指出，小至停車大至住宅政策、外交事務乃至於地方的完全自治、徹底獨立等爭議都涉及兩個方面：一是提出要求控制的事項的範圍 (scope)，二是哪些領域 (domain) 內的人有權決定這些事項。他認為，對於哪些事項可以要求控制與誰有權決定這些事項的爭議，通常沒有普遍適用的原則與解決方案，而必須視具體的環境條件：

「就如同這些主張本身，可行的解決之道也極大程度取決於特殊的信仰、傳統、神話、歷史經驗，簡言之，取決於一群具體的人類所具有的紛繁多樣的經驗構成的現實，經常，或

者說極常，關於範圍（scope）與領域（domain）的爭議並不是由合理的訴諸正義、自由、民主、自決、效率與其他抽象理念的力量來獲致解決，而是以暴力與強制的力量。抽象的價值觀只不過是為獲勝的結果的正常性充當合適的合理化根據。」（Dahl 1989: 195）

Dahl 特別指出「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every people defines itself）與「政治獨立自主是絕對權利」（political autonomy as an absolute right）這兩種常被提出來做為普遍適用原則的訴求，其實是虛幻不實的解決方案（illusory solutions）。他質疑「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說，雅典人曾自認是住在獨立而民主的域邦中不同於其他希臘人的秀異群體，兩千年後，現代的希臘人自稱是一個民族而雅典人如今是更廣大的希臘人中的公民；維吉尼亞人在美國革命時認為自己是個維吉尼亞人的成份多於是個美國人，一八六一年美國爆發內戰，維吉尼亞人則自認為是南部聯盟的公民而非北方聯邦共和國的一員，今天則認為自己無疑是美國公民。由此可見，所謂「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本身無法判定上述那種民族認同的主張是比較合理的，每種主張都符合「每個民族都自我界定」的原則。若照此原則，那麼要解決相互衝突的民族認同就唯有依靠宣傳與強迫，這麼一來，這個原則也就無法成爲解決民族認同問題的方法，不啻宣告無解。關於「政治獨立自主是絕對權利」的說法，Dahl 也質疑說，一個民主國家如果宣告承認政治的獨立自主是絕對的權利，只因爲任何一群人令人信服地表現出



他們新而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體可以通過民主程序治理，就允許他們獨立自主，那麼國家或任何強制性的組織就都不可能存在。因為這樣一來，任何一群人只要在任何事務上遇到國家的強迫就可要求並通過分離來獲得獨立自主。他認為，這實際上是為無政府主義合理化，因而若認可政治獨立自主的絕對權利實屬錯誤。（Dahl 1989: 196-197）

Dahl 在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中，用一整章的篇幅討論什麼時候一群人構成有權民主自治的人民？結論是：

「我們無法在民主理論中解決民主政治單位的範圍與領域怎麼樣才適當的問題，就像多數決的原則一樣，民主的程序必須以適當的單位為先決條件。民主程序的判準必須以單位本身合乎法理為前提。如果單位本身是不適當或不合法理的——即如果它的範圍與領域沒有合理的根據——那麼就不能只因為遵照民主的程序就認為它是正當的……。」

要合理判斷民主單位的範圍與領域，我們就必需超越學理深入到實際判斷中去。因而，在實際的世界，什麼人構成民主目的的『人民』（What constitutes "a people" for democratic purposes）這個問題，由經常使用暴力與強制的政治行動和衝突來決定的可能性遠遠大於根據由民主的原則與實踐而來的合理推論。因為如我們所見，在解決這個特殊問題上，民主理

論並沒有多大效用。我曾說過，民主的構想並沒有產生確定的答案。民主的構想是以歷史與政治所已經給予或將給予的答案為前提的。」（同上：207, 209）

## 台灣政治紛爭的癥結

Dahl 在這裡明白指出，哪些公共事務該被訴諸公決？而又是哪些人該被列入有權決定那些公共事務的「人民」範疇？例如：加拿大魁北克省的人民有沒有權利單靠本地的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獨立？所謂「多數決」是指魁北克省一地人民的多數，或是全加拿大人民的多數？這些爭議往往不能靠抽象的民主理論與民主程序本身來解決，相反，通常是議題範圍與誰是有權決定的人民主體的問題，經由歷史傳統與政治力的衝突對抗加以確定之後，才可能實行民主的程序。Dahl 這個觀點獲得西方不少研究民族主義與民主轉型問題的學者的重視（參考：Brubaker 1998; Stepan 1998）。

我們根據前述 Mill、Renan 與 Dahl 的論述，來看台灣當前的政治紛爭，當可洞悉箇中癥結。台灣目前的狀態是：一、自李登輝主政以後，逐步朝脫離中國的方向滑動，至提出「兩國論」而徹底表露分離的意圖，但格於中共的反對與美國的不支持，自陳水扁上台至今，猶不敢推翻現有憲法，重新制

憲，改變領土主權範圍，公開宣佈法理上的獨立，卻又不肯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於是處於「統一無心、獨立無膽」，不統不獨的懸浮不定狀態；二、由於在最根本的國族認同上產生分歧，朝野各黨派對重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公共政策時生齟齬、對抗，屢屢無法取得共識，難以協調合作，使台灣的整體發展遭遇嚴重的障礙，這在陳水扁以絕對少數僥倖當選總統後，反對台獨的民衆與黨派認爲其缺乏足夠的正當性，在不信任感之外更增加了不服與不平之心，情況尤其惡化。實際上正應驗了M三所說的：「實行代議制度必須有統合的公衆意見，但在一國的人民中若沒有同胞感情，……那就不可能形成統合的公意。」台灣的民主政治之所以搞得亂象不止，一方面因爲中下層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飽受過度勞動之苦，無力也無暇了解、過問政治事務，真正當家作主，唯有冷漠以對或淪爲政客煽動、操縱的對象，而統治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也大多不脫「政治暴發戶」之氣，類多沐猴而冠者流，眞解民主眞義者尙不多見，遂致政壇群魔亂舞、怪象環生。另一方面則是國族認同分裂，對台灣前景、目標所見互異，自難能和衷共濟，生休戚與共之感。面對這種情勢，台灣分離主義者的主流對策是，暫借「中華民國」的招牌，拖延統獨對決的時刻，企圖從歷史文化教育上，逐漸消除台灣民衆的中國意識，同時以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對內培養台灣國的國民意識，以統一國族認同，對外則藉此爭取美國爲首的國際勢力支持，走向法理上的獨立。但我們可以很肯定地斷言，這樣的如意算盤到頭來終屬徒勞，理由如下：

## 「台灣主體性」的幻覺

一、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過的，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之得以確立，並非單靠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所可為功，其前提是具有以歷史、文化、語言為基礎的強固的民族認同，用 Habermas 的話來說就是：「民族國家與民主都是在民族主義的蔽蔭下茁長的。」台獨的台灣民族主義問題不在於它鼓吹民族主義，而在於「台灣」民族主義之缺乏可靠、令人信服的依據。台灣數百年來是中國的一個移民社會，台灣漢人從語言文字、宗教、文化乃至整個生活習俗無不襲自中國大陸，因而台灣社會保留了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認同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中國意識。台獨妄圖在這源遠流長、根基深厚的中國文化傳統之外，另搞一個與之對立的「台灣文化」，創造出「台灣民族」的認同，這除了像史明、王育德及其徒子徒孫那樣，用淺薄的知識、粗陋的理論硬生生地捏造、曲解台灣的歷史文化外，別無他法。但也正因其手法粗糙，往往荒唐錯謬，與史實及現實生活體驗過於乖違，種種謊言詭辭很容易就被批駁、揭破，流為笑談。台獨運動的主要導因是二二八事變與國民黨在台灣的法西斯統治。「二二八」事變的起因與性質本是專權又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政權在其統轄區荼毒人民而普遍激起中國各地民衆抗暴中的一環，國民黨在台灣的高壓統治也是其政權的法西斯本質使然，基本上都不是什麼省籍

矛盾，更談不上民族壓迫問題。可是，淺陋無識又急功近利的台獨卻硬是加以曲解成外省人甚至中國人壓迫台灣人，胡扯什麼台灣民族主義，高喊反民族壓迫。國民黨在台灣除了黨政軍上層在蔣介石時代主要由外省籍權貴掌控外，不論是政府機構、學校、官營的企事業單位都大量任用台籍人士，地方政治也交由台灣的地方派系分贓，至蔣經國當政更加速進行本土化政策，連上層統治集團也吸納了不少台籍人物。經濟上則用「獨裁開發」的手段，削弱地主階級，扶植自耕農，並全力發展依附於美日帝國主義的加工出口經濟，培植了大量的台灣資產階級，在付出鉅額的人與土地成本下，造就所謂的「台灣奇蹟」。在這個過程中，不分省籍都被編入了不同的階級。台獨罔顧這些客觀現實，渲染省籍矛盾，乃至無限上綱到民族矛盾，搞了幾十年卻始終無法獲得台灣多數民衆的支持，到今天不僅台灣民族主義已沒什麼市場，連民進黨也須改走所謂「新中間路線」，將台獨主張模糊化，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國民黨統治下，得利的不都是外省人，受壓制剝削的也不都是台灣人，拿省籍甚至所謂台灣民族來做爲劃分敵我的標籤，是註定要失敗的。台獨沒有令人衷心信服且穩固的歷史文化做爲民族認同的基礎，單憑抽象的民主、自由、人權觀念，很難收凝聚人心鞏固國族認同之效，這是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公民民族主義』論難期有成的重要因素。

二、如 Dahl 所指出，徒有「民主程序」不足以解決民主的範圍與領域問題。哪些議題可以訴諸公決，參與公決的人民其內涵如何構成，難以由民主理論、民主制度本身來確定，而是取決於歷史與政

治力。因而台灣分離主義者提出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等主張，並無法從民主理論中獲得正當性。對於台灣的主權歸屬，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反台獨勢力都認為在兩岸的憲法都主張「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台灣無疑是中國的一部分。故而台灣的主權問題不能單靠台灣本身來決定，而是全體中國人皆有權參與決定。衆所周知，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與國際勢力干預下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台灣分離主義者片面主張將台灣脫離中國內戰狀態，企圖引進國際勢力把台灣由中國的內政問題轉為國際問題，不論在現實上或法理上都無法證明其正當性與可行性。今天台灣分離主義者既不敢也不能修改中華民國憲法，並向國際宣告獨立以取得法理上的獨立國家資格，卻又不願遵守憲法明白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就顯現了其左支右絀的困境。故而所謂「住民自決」、「公民投票」不論在台灣內部、中國大陸或國際上都不可能獲得有力支持。台灣分離主義者想罔顧實際情況，拿自由主義抽象的民主理論當普世適用的萬靈公式，如 *Dunin* 所言，這是難以站得住腳的。

三、因此，我們必須撇開抽象的自由主義民主理論，從實際情況出發來看台灣的統獨問題。十幾年來，所謂「台灣主體性」的論調在台灣分離主義者口中叫得震天價響，可是，說來諷刺，這種表面上冠冕堂皇的「台灣主體性」骨子裡卻是由匍匐跪拜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性構成的。我們這麼說絕非出自主觀偏見。只要看看分離主義者歌頌日本殖民台灣是為台灣的現代化奠基，李登輝、金美齡等人對日本右翼勢力的諂媚、逢迎，再看看李登輝、陳水扁為首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對美國的卑躬屈膝，美

國主子喝令立正，絕不敢稍息的奴顏媚骨。最近的例子則是美國發生「九一一」事件，外交部長田弘茂主動表態台灣必須站在美國這一邊，行政院還自動下令要台灣為「九一一」下半旗致哀，種種不勝枚舉的例證，無不彰彰明甚地顯示台灣分離主義者十足卑賤的奴性。他們所高喊的「主體性」實際上不過是仰美日帝國主義鼻息，鑽在美日保守勢力的褲襠下搖尾乞憐的奴性。台灣分離主義者之所以會產生自欺欺人的「主體性」幻覺，主因在於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之前，台灣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搞出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八〇年代後又進行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造，遂在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籠罩下，沾沾自喜，以為可以永遠攀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之後，脫離中國而發展出比中國大陸優越的政治經濟體制，卻完全不自覺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是依靠什麼樣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形成的？台灣的政治經濟體制又有什麼內在的弱點？是否真能獨立自主的發展？當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發生重大變化後，台灣又將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 台獨日暮途窮的政治經濟分析

關於這些問題，李崇人在〈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做了很扼要的分析：

「近二十年來，在中共開放大陸市場，港、台資金大量湧入大陸下，港、台、大陸已逐漸形成一個統一的中國經濟圈。這個趨勢在兩岸加入 WTO 後，會更加快速的進行。由於兩岸在八〇年代之前的發展戰略不同，兩岸在經濟結構上有高度的互補性。大陸在毛澤東時期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脫鉤，不以市場經濟的價值規律為指導原則，主要著力於重工業、國防工業與高科技，走的是重積累輕消費的路子。台灣則是加入世界體系的國際分工，按照比較優勢論，充當跨國資本的加工出口基地，發展勞力密集的輕工業，急功近利的結果是，重工業的基礎薄弱，基礎科學與高科技都難望大陸項背。因而大大限制了台灣產業結構升級的潛力。八〇年代後，大陸與東南亞也紛紛效法東亞的加工出口模式，其土地、勞動力成本本來就低於台灣，加上台灣內部勞工與環保運動風起雲湧，更加重了企業的生產成本，做為台灣加工出口經濟主幹的中小型企業除了大量外移大陸與東南亞之外，別無生路。九〇年代後，大陸加速了經濟增長，內部市場擴大，高科技產業也開始茁長，而台灣的生產成本有增無已，政治鬥爭在民主化後更形劇烈，整個投資生產環境日形惡化，催化了台灣企業加速外移至積極招商引資的大陸。而且，此際外移的已不僅是中小型的勞動密集產業，大型企業與電子、信息產業也趨之若鶩地往大陸投資設廠。過去，民進黨一再以危及國家安全的理由堅決反對兩岸三通。近來，從總統陳水扁到大批民進黨立委卻大談三通為台灣經濟發展所必須，李登



輝限制台商投資大陸的「戒急用忍」政策已不合時宜，應早日鬆綁。以前聲嘶力竭地高喊的所謂國家安全忽焉置諸腦後，不以為意了。這很鮮明地顯示了客觀現實的發展趨勢。綜而言之，統一的中國大市場的形成是兩岸的政治、經濟、社會產生結構性變化的必然結果。

二戰後，中國的分裂是美國利用台灣做為遏制中共的工具所致。八〇年代前，台灣在美國卵翼下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與中國大陸隔絕，依附在美、日帝國主義下，成為美日經濟圈的附庸，獲得高速的經濟增長。但台灣的依附型經濟並不具備自主發展的能力。八〇年代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丕變，美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支援轉弱，大陸實行經濟的改革開放，台灣的產業結構轉型發生困難，迫使台灣重回中國經濟圈。這些因素使台灣的分離勢力陷於愈來愈不利的處境。

眾所周知，台灣要從中國徹底分離出去，沒有美國的鼎力支持絕無可能。台獨運動從來不具備獨立自主的能力。過去如此，未來也必然如此。面對中國大陸強勁的民族主義，美國若公然支持台獨，就必須冒與北京開戰的危險，這非但將危及美國本土，也破壞了美國推動資本全球化與和平演變中國的大戰略，無論如何是得不償失之舉。在美國看來，台灣進入中國經濟圈，可與全球資本共同戮力演變中國大陸，有利於使中國早日與美國親善，並可降低兩岸的緊張關係，避免美國捲入戰端，這遠比支持台獨符合美國利益。台灣在美國這樣的戰

略構想下也只能俯首聽命。主張台獨的陳水扁從總統大選前到僥倖當選後，一再申言，他的兩岸政策會讓美國滿意，即可窺見此中消息。

台灣的漢人無論是血統、語言、文化、宗教無不源自中國，而台灣與大陸近百年的兩度分離又無不為帝國主義所造成。台獨在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大肆煽動反中國的情緒，企圖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這無疑只能製造兩岸人民的仇視對立，尤其為深懷反帝民族意識的大陸人民所無法容忍。台灣要搞獨立，兩岸只有戰爭一途，絕沒有第二條路可走，這是無可迴避的現實。台獨人士經常自說自話什麼兩岸是遠親近鄰，台灣獨立之後，兩岸可以親善友好，成為兄弟之邦，這些純屬自欺欺人的痴人說夢。其實台獨要能成功，只有一個可能，那就是：敦請美國主子出兵打敗中國。不過，付出的代價卻是，美國從華盛頓到洛杉磯都能遭到中國核彈攻擊而死傷慘重，台灣也落得個一片斷壁殘垣。姑不論要美國為台灣建國流血只是天方夜譚，果然成真，請問又對誰有利？從這點來說，台獨只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沒什麼獨立自主而言，從而台獨也沒有什麼左右派之別，思維上都是主觀唯心，實踐上都是帝國主義的奴僕。」（《左翼》第十一號 30:32）

## 台獨欲為美國忠狗亦不可得

李崇人的上述分析是一年前所撰，證諸陳水扁政權在不久前通過經發會修正了李登輝的「戒急用忍」政策，放鬆了對台商投資大陸的限制，足見其分析的正确性。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分離主義者猶不知今夕何夕，對此憂心忡忡甚至痛加指責此舉將導致台灣融入中國經濟圈，喪失台灣的「主體性」。殊不知在台灣經濟成長率下降，失業率不斷攀高下，再不改弦更張，放棄台獨的意識形態，將引發政治、社會的動盪，陳水扁即面臨政權的「正當性危機」，總統寶座終將不保，民進黨政權只有垮台一途。這不是空喊什麼「台灣主體性」、「公民意識」、「公民社會」所能濟事的。李崇人的分析很冷靜地指出台灣獨立所要付出的重大代價與其在當今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下難以得逞的結構性因素。這是包括何六九在內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必須務實面對的問題，光是抬出正當性薄弱、實際上也做不到的「住民自決」、「公民投票」，大談「公民民族主義」、「公民意識」、「公民社會」等論調，情緒性地指責中共「蠻橫」、「不文明」，理論上既站不住腳，也無補於實際。

何六九很在乎左翼統一派斥責台灣分離主義者是美、日帝國主義的「奴僕」、「走狗」。我們在這裡先引述在日據時期曾以漢人的孺慕之情賦詩呼喚祖國的台灣老作家巫永福的一段話：

「台灣人受過台灣光復時的浩劫記憶猶新，二二八事件慘案的歷史傷口陰影依然存在，四十年戒嚴的憎惡，更有四萬元舊台幣兌換新台幣壹元的痛苦經驗，對大陸不再有幻想。因為政治對生活的品質影響極大，其好壞對人的思想影響也是最現實，猶如古諺謂，『願作太平狗，不作亂世民。』感情歸感情，現實歸現實，台灣為自求多福，安定發展，大家一起來建設新國家、新台灣有什麼不好呢？」（巫永福 1989）

這段話是巫永福〈台灣獨立為什麼不好？〉一文的結論，通篇以我們上面批判過的「自由民主意識」、「台灣主體性」為立論依據。我們感興趣的是，巫永福坦白承認「願作太平狗，不作亂世民」，意即願當在台灣享受民主、自由、富裕的「太平狗」而不願成為中共專制統治下的貧窮之民，這相當有代表性地準確道出了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心聲。這也很符合「公民民族主義」論強調擺脫族裔觀念與感情，根據「理性」，自由選擇國族認同的主旨。關於源自「台灣主體性」幻覺的心理，我們已經批判過。這種一廂情願的「太平狗」思想，目前碰到的實際問題是，台灣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並無自主性可言，台灣若斷絕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聯繫則必將陷入經濟危機，而美國主子在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考量下，不願冒犯中共以致危害美國的利益，非但不肯公開支持台灣獨立，在李登輝提出「兩國論」激怒了中共之際，還勒緊拴在台灣頸子上的皮帶，加以制止，李登輝分裂中國的圖謀遂告流產。這顯

示了台灣連充當美國走狗對抗中國的價值都大為降低，欲如冷戰時期之為美國忠狗也不可得了，陳水扁上台後的「四不一沒有」政策就是這種背景下的產物。今天，台灣的國民黨、親民黨、新黨等在野勢力已認清了這個現實，明白宣示「不當美國對抗中國的馬前卒」、「不做美國反中國的棋子」、「不充當中美對抗的炮灰」。唯獨何六九之流的台灣分離主義者還不拋棄幻想，妄圖靠繼續抱住美國大腿，以建立台灣共和國，豈不悲哉！在美國主子心中，拴在台灣分離勢力這條走狗脖子上的皮帶，視其利益考量，可緊可鬆，一旦不合所需，甚至會為其製造麻煩時，毫不猶豫地加以絞殺，烹調成祭品，絕不是不可能的事。真到了那一天，那也只能說台灣分離主義者自甘下賤，咎由自取，怨不得誰。

### 左翼的中國統一觀

我們可以很明確地正告何六九之流的分離主義者，只要他們一日不擺脫依附美、日帝國主義的奴才習氣，不論抬出什麼冠冕堂皇的理由，在深懷反帝意識的中國人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心目中都不能獲得脫離中國的正當性。正如恩格斯在批評拉法格時所說的，臣服於俄國下的法蘭西共和國沒有資格談要幫助德意志帝國的工人階級尋求解放。恩格斯在一八八二年二月七日致考茨基的信中說：

「一個大民族，只要還沒有民族獨立，歷史地，甚至不能比較嚴肅地討論任何內政問題。……無產階級的國際運動，無論如何只有在獨立民族的範圍內才有可能，……民族獨立是一切國際合作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427-428）

這也是我們對統獨問題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基本觀點。

以研究世界史與民族問題聞名的英國馬克思主義者 Hobsbawm 曾指出：

「原先正統的十九世紀自由民族主義與當前力圖用分離主義來界定群體認同的潮流正相對立。自由民族主義旨在擴大（黑體字為原文所有）人類社會、政治與文化單位的範圍：力求統合與擴張而不是限制與分離。這是何以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與自由且革命、民主的十九世紀傳統如此志趣相投的一個原因。反殖民的民族主義者視『部落心態』、『地方團體意識』或其他局部與地區的認同為反民族的意識，這種反民族的意識是為眾所周知的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利益服務的，因而必須加以摒除，或說至少要將之置於民族意識之下。」

（Hobsbawm 1996 [1992]: 257）

Hobbsawm 的這個論點很可以說明我們從中華民族的立場主張中國統一的立場。

我們通過批判何六九的論述，全面表述了左翼的統一觀。我們歡迎統獨左右的各路「方家」就此提出質疑辯難。我們強調「方家」是要著重指出，有意義的論辯，正如我們在本文之首引述的 Habermas 的理性溝通論所言，須具備四項要件：1、陳述的言詞明白易解；2、陳述的內容真實可信；3、態度真誠；4、論證精當令人折服。故而，我們期望有經過慎思、明辨，不但從理論上，更是建立在現實情況上，提出證據可信，邏輯一貫，論證精審的批評，讓我們在統獨問題上有更深刻的認識。至於用詞之「文雅」或「粗暴」尚屬其次，我們不屑於帝國主義者與何六九之流「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偽君子慣技。只要真能以「理直」做為基礎，我們不懼任何「粗暴」的批判。我們願以此不算不情之請的要求，就教於各路方家。

### 註釋

1. Smith 指出，『神話、記憶、價值與符號象徵』四者合一構成「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myth-symbol complex』）。這個「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經歷史記錄傳遞，並塑造了個人經驗，集代代相傳、擴展綿延不絕的信念與感情之大成。因而，要找出族裔共同體（ethnic）的特性及其經

久不衰的原因，不能求諸地理環境、階級結構乃至軍事與政治關係。換言之，要掌握族裔認同特性就必須探究其神話與符號象徵的形成與內容，了解其歷史記憶與中心價值，亦即其「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並查知其在族人中散播與傳承給後人的機制。由於神話、符號象徵、記憶與價值是承載在變動極為緩慢的人造器物與活動中，並藉之傳播，故而族裔共同體一經形成，在正常情況下，任它物換星移，總歷久常存，代代不息，甚至可達千百年之久。千姿百態的社會與文化過程都可在其中演出，而不論吉凶禍福也都會影響其休咎安危。西方研究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派學者通常偏重強調民族主義具有促進國家的政治與文化統一、發展經濟與克服社會失序等「工具性」、「功能性」的作用，而忽略了民族國家的族裔根源及「神話」、「記憶」等凝聚人心、維繫民族認同的重要性。Smith 提出「神話—符號象徵」綜合體的概念正是為補正「現代化」理論的缺失。（見 Smith 1986: 15-16）

2. 馬克思主義者的 Hobsbawm 具有歷史唯物的觀點毫不出奇，但政治立場反共的保守派 Gellner 卻吸收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自稱其社會學研究的立場是「多形式的唯物論」，明確堅持研究社會事物應一般地先考慮其物質的決定因素。因而，它的民族主義研究常被批評過於強調經濟因素，有經濟歸原論之嫌。英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Perry Anderson 還語帶不滿地說：「他的民族主義理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心一意地貫注在經濟功能論上。」（Anderson 1996: 425）另一位英



國馬克思主義學者 Tom Naim 也指出了 Gellner 的現代化理論強調了社會經濟力量造成了現代特性。(Naim 1997: 11-12)

3. 台獨曲解「二二八」事變將其起因非常幼稚膚淺地歸諸所謂落後的中國政權統治先進的台灣所導致的文化衝突。何六九這個台灣史盲附和台獨這種可笑的論調，並為了醜詆他所謂的血緣論民族主義還歸罪於漢民族主義。他在《鄉鄙》中說：

「在血緣方面差異不大的族群和民族當中，往往互相表現出最大程度的敵意，一方奉血緣的『民族大義』之名，向另一方作出最是血腥殘暴的『淨血』殺戮。國民黨對待敵國的殘暴佔領軍講求以德報怨，而對於在血緣上同樣屬於廣義漢族的台灣人則以血淋淋的大殺戮相待，絲毫不念血緣之情。」（《左翼》第二十號：19）

又加上註解說：

「台灣人曾經長期受到異國文化影響，這似乎特別引起國民黨集團的憎恨，因而被視為背祖的異類。」

關於「二二八」事變的起因與經過，近年來隨著史料與當事人的見證的大量出現，真相已日見明朗，一些比較根據客觀證據立論的著作也已出版，足可證明台獨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此處我們只要引證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自由派學者郭廷以的《近代中國史綱》的一段材料

就可駁倒台獨與何六九對「二二八」事變的荒唐解釋：

「抗戰後期，甘肅、四川為徵兵徵糧，均曾發生過民變，以甘肅為嚴重。勝利之後，一九四六年九月，四川亂事又起，眾至十餘萬，不久平定。十二月，西康以不堪省府主席劉文輝的橫徵暴斂，大規模的暴動繼之而來，眾至五十餘萬，組織『政治革新委員會』，歷時三個月。」（郭廷以 1980: 780）

這裡所敘述的大陸各地民變發生時間都與台灣的「二二八」相去不遠，而起事民眾的人數之多，規模之大，又遠過「二二八」。請問這也是所謂的「文化衝突」或者「血緣論漢民族主義」造成的嗎？分明是國民黨政權既暴虐又無能，激起全中國各地的民憤，才同時造成包括「二二八」在內的民變蜂起，「反饑餓」、「反迫害」的學潮亦復洶湧。台獨卻硬要說什麼是中國人壓迫台灣人，落後的中國統治先進的台灣所致的鬼話，還很可笑地據此推論說，香港在回歸中國後也會發生類如「二二八」的文化衝突事件。結果，時至今日，台灣的政治是一片亂象，而經濟情況比香港還糟。台獨的幼稚論調遂不攻自破。

4. 江宜樺在《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一書中，忽視了 Habermas 對民族主義在鞏固歐洲民主制度上的肯定。他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對 Habermas 的觀點做了不盡準確的解讀（江宜樺 1998: 110-113），有一部分甚至是誤解（同上: 122）。

## 參考書目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Anderson, P. (1996) "Science, Politics, Enchantment," in Hall, J. A. and I. Jarvis eds.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 Gellner*, 407-426.
- Balibar, E. and Immanue-Wallerstein (1991) *Races, Nation, Class*.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Balakrishnan, G. (1996) *Mapping the Nation*.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Berlin, I. (1981) *Against the Curr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etton, R. (1988) "From Ethnic to Civic Nationalism: English Canada and Quebec."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11:1, 85-102.
- Brubaker, R. (1998)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Nationalism."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72-306.
- Caplan, R. and John Feffer eds. (1996)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States and Minorities in Conflict*. 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hbour, Omar and Micheline R. Ishay eds. (1995) *The Nationalism Reader*.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 Dahl, Robert, A. (1989) *Democracy and Its Critics*. New He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H. B. (1967)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N.Y.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1978) *Toward a Marxist theory of Nationalism*. N. Y. and London: Monthly Review Press.
- Derrida, J. (1994) *Specters of Marx*. Tr. By Peggy Kamut.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1994) *Encounters with Nationalism*. Oxford: Blackwell.
- (1997) *Nationalis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Habermas, J.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Future of Europe," *Praxis International* 12:1-19.
- (1996) "The European Nation-State-Its Achievements and Its Limits.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Sovereignty,"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281-294.
- (1998a)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ed. by Maeve Cook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1998b) *Between Facts and Norms*. tr. by William Rehg.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1999) *The Inclusion of the Othe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 Hall, J.A. (ed.) (1998)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ll, J.A. and I. Jarvie eds. (1996)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Ernest Gellner*. Amsterdam-Atlanta, GA: Rodopi.
- Hall, S. (1996) "New ethnicities," in David Morley and Kua-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441-449.
- Hobsbawm, Eric (1989) *Politics for a Rational Left*,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1992)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1992】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in Europe Today." in Gopal Balakrishnan(ed.) *Mapping the nation*, 255-266.
- Hroch, M. (1985) *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 "From National Movement to the Fully-Formed Nation: The Nation-Building Process in Europe." in Gopal Balakrishnan ed. *Mapping the nation*, 78-97.
- (1998) "Real and Constructed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91-106.

- Ignatieff, M. (1994)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and Giroux.
- Lundestad, G. ed. (1994) *The Fall of Great Powers*. Oslo • Oxford: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Neill, W.H. (1994) "Introductory historical commentary." in G. Lundestad ed. *The fall of great Power*, 3-21.
- McMillan, J. (1996) "Scotland's Quiet Nationalism." in Richard Caplan and John Fetter ed. *Europe's New Nationalism*, 75-84.
- Mill, J. S. (1993 【1861】) *Utilitarianism, On Liberty,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London: Dent; Rutland, Vt. Tuttle.
- Morely, A and Kua-Hsing Chen eds. (1996)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Mulhall, Stephen and Adam Swift (1992) *Liberals and communitaria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Nain, Tom (1977) *The break-Up of Britain: 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 (1997) *Faces of Nationalism: Janus Revisited*. London • New York: Verso.
- O'Leary, B. (1998) "Ernest Gellner's Diagnosis of Nationalism: A critical overview, or,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 is dead in Ernest Gellner philosophy of nationalism?" in Hall, J.A.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40-88.
- Renan, E. (1995) "What is a Nation?" in Omar Dabbour and Micheline R. Ishay eds. *The Nationalism Reader*, 143-155.
- Smith, A.D.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Homes & Meier Publishers.
- (1986)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Oxford: Blackwell.
-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Las Vegas-London: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1996) 【1992】 "Nationalism and the Historians." in Gopal Balakrishana (ed.) *Mapping the Nation*, 175-197.
- (1998) *Nationalism and Modern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Greenfeld, Lian (1992)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tepan, A. (1998) "Modern Multinational democracy: transcending a Gellnerian oxymoron." in John A. Hall ed. *The State of the Nation*, 219-239.
- Wallerstein, I. (1995) *After Liberalism*. New York: The New Press.
- Weber, M. (1968) *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r. and ed. by Edward A. Shils and Henry A. Fin-  
ch. N. Y.: The Free Press,

- Yack, B. (1996) "The Myth of the Civic Nation." *Critical Review* 10, no. 2 (spring 1996), 193-211.
- 馬克思·恩格斯 (1956-198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列寧 (1977) 《列寧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江宜樺 (1998)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張茂桂等 (1993)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費孝通 (1989) 〈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北京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
- (1997) 〈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 納日碧力戈 (2000) 《現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構》，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 馬戎 (2001) 《民族與社會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戎、周星主編 (1999) 《中華民族凝聚力形成與發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翁獨健主編 (2001) 《中國民族關係史綱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編寫組 (2000) 《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與發展》，北京：民族出版社。
- 郭正亮 (1998) 《民進黨轉型之痛》，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原住民族》第12期，台北：原住民部落工作隊。



- 巫永福 (1989) 〈台灣獨立爲什麼不好？〉，《首都早報》，1989.10.4 第9版。
- 陳延琪、潘志平主編 (2000) 《泛突厥主義文化透視》，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 趙剛 (1996) 〈新的民族主義，還是舊的？〉，《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21期，1-72。
- 汪東林 (1988) 《梁漱溟問答錄》，香港：三聯書店。
- 李崇人 (2000)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上）《左翼》，第十號。
- 〈統獨左右問題的上下求索〉（下）《左翼》，第十二號。
- 吳乃德 (1996)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5-38，台北：月旦出版社。
- (1997) 〈國家認同和民主鞏固之衝突、共生與解決〉，收於游盈隆主編 (1997) 15-30。
- 游盈隆主編 (1997) 《民主鞏固或崩潰——台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台北：月旦出版社。
- 郭廷以 (1980) 《近代中國史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 胡佛 (1995) 〈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序〉，收於石之瑜《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書局。
- (2000) 〈用寬廣的眼光破解政治難題〉，《聯合報》，2000.1.6 第15版。

（原載二〇〇一年七月～九月的《左翼》第22、23、24號）



# 從《台灣論》風波剖視台灣分離主義的 奴才意識

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扭曲台灣歷史，為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正當化的無恥調言，激起了台灣學術文化界的有識之士、婦女團體與在野黨派的大加撻伐。而台獨派的知識份子、政治人物與團體則極力聲援小林與其台獨盟友金美齡、許文龍等人，雙方激烈的鏖戰，在台灣喧騰數月之久，始漸平息。在這次風波中，自李登輝以降的台灣分離主義者，以被殖民者的身份卻站在殖民者立場，歌頌日本殖民統治，諂媚日本帝國主義主子，充分暴露他們毫無自尊、自覺的奴顏與媚骨。對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奴才意識，不論是為爭取台灣人的尊嚴或遏止日本右翼的進一步猖狂囂張，避免軍國主義的惡靈復甦重生，都必須深加剖析，嚴予批判。

## 一、台灣分離主義者肯定日本殖民統治的功蹟

在《台灣論》中，小林善紀引述了台灣分離主義者諸多推崇日本殖民統治，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殖民辯護的言論。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這位被小林稱為「具備純粹日本精神的人物」、「日本精神的繼承者」，在與小林會面時，開門見山就說：「我覺得有必要讓現在的日本年輕人瞭解日本的事情。……必須讓他們瞭解，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時期，日本人究竟做了些什麼？學校的老師大概只會告訴他們，日本將台灣納入殖民地，而且做了一些損人利己的事情吧！然而日本在台灣所做的一切，卻值得在歷史上好好記上一筆！一定要讓他們知道！日本人曾經在這裡做過了不起的事情！……大家都會這樣認為，如果台灣未曾經過日本統治的話，今天的處境恐怕比海南島還要淒慘吧……」（小林善紀 2001a: 22-23；另參見：李登輝 小林善紀 2001: 11）。李登輝的這些言論令小林有不可思議之感，他發現李登輝觀點與其一致，兩人的企圖十分契合，不覺又驚又喜。李登輝的好友、大資本家許文龍更為露骨地為日本帝國主義張目說：「現在的日本人真的很對不起以前的日本人，日教組的教育方針錯誤，完全不提日本戰前的功績，一味地認為過去的都是錯誤。他們一再強調日本犯了侵略中國等錯誤，日本人也做了許多好事，沒有那麼壞。」（小林善紀 2001a: 202）許文龍完全站在日本殖民統治者的

立場指稱，為抗日而犧牲的台灣義勇軍不值得高度評價為「英雄」，「說得更明白些，庶民並不在乎統治者究竟是誰——只要社會能夠有秩序，治安良好，稅金合理……誰來統治都一樣！」（同上：127）。他稱頌日本的殖民統治說：「日本人當時爲了促進自身的利益，對全世界展現日本的國威，確實在台灣投下難以衡量的心力，完成許多偉大的事業……而台灣人也因此得以嚐到幸福的滋味。……以統治者的角度而言，衛生醫療與教育可說是最不划算的投資。因爲投下的資金至少須等二、三十年才能見到成效。英國、西班牙等老牌的殖民帝國，從未花心思在殖民地的教育普及上。以我個人的觀點，日本的台灣統治確實稱得上良、心之舉。當時台灣不僅容易找工作，收入也不錯，再加上治安良好，簡直與天堂相去不遠，因此吸引大批移民。而且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台灣。……由於日本人在滿州推行各種善政，因此吸引大批華北人民移居。……台灣的基礎建設幾乎都在日治時期完成，……我們確實有必要感謝當時的日本人，給予他們公正的評價！」李登輝對許文龍的說詞表示：「我百分之百同意！日本人的確在台灣做過了不起的大事！」（同上：134-135）類似的論調也出現於李登輝的一些密友如：蔡焜燦、彭榮次、何既明等在日本「皇民化」運動中成長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口中。

李登輝、許文龍等人諸如此類諂媚日本殖民主義，踐踏台灣人民尊嚴的無恥言論，遭到反對日本殖民主義者的激烈抨擊，台灣的原慰安婦甚至痛罵許文龍侮辱慰安婦的言論爲「禽獸」、「畜生」之行。但台灣分離主義者卻在《自由時報》、《台灣日報》、《新台灣周刊》、《自立晚報》等分離主

義色彩鮮明的報刊雜誌上，以評論、座談會等方式大肆讚揚《台灣論》，聲援李登輝、許文龍、金美齡等人的媚日言行。台獨社團更四處舉辦贈送《台灣論》的活動，為《台灣論》助勢。以下我們略舉數例，以見其一斑。台獨「建國黨」主席何文杞說：「統派及統派媒體對《台灣論》的叫囂、炒作『慰安婦』議題來仇日反台灣，事實上他們心裡非常害怕，因為小林善紀雖是日本右派作家，但他的《台灣論》一書透過書中政治人物、日治時代台灣人、戰後受國民黨殖民教育的年輕一代，及一般民眾等各個世代及階層來闡揚台灣意識，將此台灣意識歸統於『新傲骨精神』，所謂的『新傲骨精神』即作者源自『傲慢』之義自創的語言，其要傳達的訊息是敢於用自己的直覺與認知貫徹其志，而從這個意義下，我們循著《台灣論》的脈絡行走，『新傲骨精神』就是台灣人不同於中國人和韓國人的傲慢，而是具有個人主義與獨立自主的獨特性格，所以，『台灣人已經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民族』，『在這個鳥嶼獨特的歷史經驗中，台灣人的國民性格已然誕生！』（《自由時報》二〇〇一年三月六日）。台獨派的「旅日台灣同鄉會」會長林建良則表示「《台灣論》是站在台灣人觀點描繪台灣歷史的著作」（小林善紀 2001b: 155）。由高雄地區的教授、醫師組成的台獨社團「南社」也強調：「小林善紀這本書對台灣歷史有真實交代，如果不是鏡子，至少也是棍棒，可以敲醒台灣人民，讓台灣人民思考自己的過去與未來。」（同上：147）。台獨聯盟主席黃昭堂讚賞《台灣論》說：「我對這本書的評價很高，……整體來看，對台灣是很有幫助的一本書」（《財訊》，二〇〇一年三月號）。台獨社團「台

灣教師聯盟」、「台灣教授協會」甚至主張把《台灣論》列為教科書補助教材。台獨派人士在《台灣論》風波中，支持小林善紀、李登輝、金美齡、許文龍等人的行動，就充斥著這一類的論調。

台灣分離主義者之所以肯定《台灣論》，發出這些荒謬無恥的言論。主要是因：一、臣服在日本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下，成為日本帝國主義思想的俘虜；二、企圖勾結日本右翼勢力，與中國對抗，達到分離的目的。

## 二、從後殖民理論觀點剖析奴才意識的形成

曾任義大利共產黨總書記的著名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葛蘭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很深刻地指出，不論要奪取政權或鞏固統治，都必須運用好武力與文化這兩項既對立又統一的因素，即：強制與同意、壓迫與說服、暴力與文明、威勢與教化，必須雙管齊下，兩者並舉（Gramsci 1971: 169-170）。葛蘭西特別強調了在政治鬥爭中取得知識、道德上的意識形態主導權（hegemony 或曰文化霸權）的重要性。意識形態的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意識形態包含了世界觀、價值觀、道德規範等內容，構成了人行動與為人處事的主要依據，更確切地說，人作為主體是由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參考：Althusser 1977: 127-186）。

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不僅僅是用暴力壓制殖民地人民，掠奪殖民地的經濟資源，還以優勢文化自居，摧毀殖民地的固有文化傳統，用殖民者的價值體系重新塑造被殖民者的價值觀，宰制被殖民者的心靈、思想，使被殖民者不論在肉體上或心靈上都淪為馴服的奴才而不自覺。殖民主義這種意識形態的控制，對殖民地人民的危害比暴力統治更為深遠，為禍更為劇烈。殖民地人民心靈上遭受到的殖民體制毒害，並不會因為殖民勢力的退出而立即冰消瓦解。殖民地在形式上獲得政治獨立後，殖民者的意識形態主導優勢或文化霸權依舊可以持續發揮控制前殖民地人民思想的主宰作用。後殖民理論的興起正是為了清理殖民主義在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的遺毒，力圖摧陷帝國主義的文化霸權，祛除前殖民地人民思想中不自覺的奴性，使之從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樊籠中超拔而出，重建被奴役者自覺的主體地位，恢復其尊嚴與自信。

法農（Frantz Fanon）在批判殖民者通過破壞、扭曲殖民地的文化傳統以建立殖民主義的文化霸權時說：

「壓迫者並不力圖讓自己相信被壓迫民族及其文化在客觀上不存在。而是盡其所能地想方設法要被殖民者承認業已化成其本能的行為模式的本國文化是劣等的文化，要被殖民者認為他的『民族』是不真實的，最終更要被殖民者自認連他自己的生理結構也是混雜不清、滿是缺陷的。」（Fanon 1966: 190）



法農還指出：

「殖民主義不會只滿足於統治被支配社會的現在與未來。殖民主義不會僅是緊緊掌握一個民族，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就甘心罷手。殖民主義還會依據邪惡的邏輯，把摩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殖民時期的特徵就是殖民者力圖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看看殖民者的所做所為就可知道他們幹得十分徹底，殖民統治所希望做到的，實際上就是要當地人相信殖民主義是為照亮身陷黑暗的他們而來的。殖民主義有意造成的效果是，讓當地人以為，要是殖民者離開，他們馬上就會重新淪入粗野、墮落、野蠻的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凡是拿起武器捍衛本民族存在的價值，凡是要拿出證據證實本民族存在的價值，願意坦露胸懷研究本身歷史的殖民地知識份子，就必須剖析他的人民的心靈。」（Fanon 1966: 170-171）

許多後殖民理論家都強調，民族獨立其實未必意味殖民主義的結束。殖民時期殖民者在知識與價值體系上的優勢並未隨殖民統治的消失而偕亡，依舊陰魂不散，盤踞在前殖民地人民的心靈。民族在形式上的獨立只是掩飾了殖民統治對殖民地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上的損害（Gandhi 1998: 6-7）。印度著名的後殖民理論家南迪（Ashis Nandy）認為，以暴力為手段的強盜式殖民主義攻城掠地，赤裸裸地展現了本身的貪婪，但以「自由」、「文明」為名，自詡要開化落後地區、啓蒙不文明國家人民心智的殖民主義，旨在征服被殖民者的心靈，其為害較不易察覺，影響卻更為深遠。南迪指出：

「這種殖民主義在控制身體之外，還統御心靈。它使被殖民社會傾其全力徹底改變本身文化的價值體系。在這個過程中，現代西方的觀念無孔不入四處滲透，從時、空領域，至心理的範疇，概莫能外。『西方』現在是無所不在，既在西方之內，也在西方之外；在各種結構中，也在心靈中。」(Zhang, dy 1983: xi)

雖然後殖民理論批判的鋒芒主要是針對西方的歐美帝國主義，但也同樣適用於日本。日本自「明治維新」開始的所謂「近代化」運動。其中，心思即「脫亞入歐」——脫離野蠻未開化、落後的亞洲，亦步亦趨地向西方學習，以求與歐洲強權並駕齊驅，躋身於世界強國之林。在獲得中日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的兩次勝利後，日本儼然以亞洲的雄主自居，自以為負有「開化」尚未近代化的亞洲落後國家的「文明」使命，並以此為對外侵略的口實。它對台灣、朝鮮的殖民統治與西方帝國主義如出一轍，同樣在殖民地烙下了深重的傷痕，而尤以台灣為嚴重。

日本據台前三十餘年的施政主要側重在鎮壓抗日運動與掠奪台灣的經濟資源，尚未暇全面改造台灣人的文化、意識。到一九三〇年代大舉入侵中國大陸，進而染指東南亞諸國後，為了補本國人力、物力之不足，遂全力動員殖民地人民與物資，投入所謂的「大東亞戰爭」。於是展開同化運動，著力於消滅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意識，禁用漢文，鼓勵改用日本姓氏，崇拜日本神道教，並大肆發動鄙視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的反華、仇華宣傳，力圖改造台灣人成為誓死效忠日本天皇的「皇民」，實際

上就是意圖使殖民地人民成爲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的奴僕、鷹犬。這集中表現在一九三七年開始的「皇民化運動」上。這些歷史的鏽痕很生動地呈現在當時的「皇民文學」與楊威理所著的葉盛吉傳記《雙鄉記》中。日本的殖民統治在台灣製造了一種喪失自尊、自覺，身爲被殖民者卻站在殖民者立場歌頌殖民統治的奴才意識。

前面提到主體是被意識形態建構起來的。「主體」的英文 subject，其實有相反的雙重涵義，它既指相對於客體的認識主體，在歷史中產生能動作用的主體，又指被統治的臣屬之民。因而，人若是不經過批判性的反思與實踐，穿透由教育、傳媒等方式塑造的意識形態，那麼就只能成爲受統治階級意識形態宰制的沒有清醒的自覺意識的「臣屬之民」，而不是真正具有自主能力、自覺意識的「主體」。

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殖民統治就像法農所說的：「……徹底挖空當地人的腦袋，……把魔掌伸向被壓迫人民的歷史，加以扭曲、變形乃至摧毀。……使被殖民者疏遠本身的文化，……」。然後再灌輸日本統治者的世界觀、價值觀，力圖在台灣人民腦中建構所謂「日本精神」的意識形態。於是，一些台灣人就這樣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俘虜，喪失了自尊與自覺，產生了身份認同的迷失與危機。這種身份認同的迷失與危機在台灣光復後，由於「二二八」事變與國民黨的白色恐怖高壓統治又受到了強化，構成台灣分主義的心理基礎。

台灣分離主義者自早期的台獨運動領導人王育德、邱永漢，以迄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等人不

斷發出「日本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日本建設台灣有功」之類的媚日論調，正是喪失了主體性的奴才意識的表現。極為諷刺的是，這些以台灣人的代表自居，經常高喊要建立「台灣人的主體性」以脫離中國的分離主義者，實質上，在骨子裡卻是最缺乏真正的台灣人主體意識的日本帝國主義奴才。

在《台灣論》裡，李登輝、許文龍、蔡焜燦、何既明這些成長於「皇民化」運動中的媚日派，津津樂道日本殖民台灣時的基礎建設與教育普及，深致感恩戴德之意，充分顯示其不自覺的奴化意識與對殖民統治本質的無知。關於李登輝等人的這類媚日論調，已故的台灣史專家戴國燿教授曾一針見血地批判說：

「李登輝對台灣史的見解，也有他的侷限性。比方說，他看重日帝留下來的產業基礎建設，但歷史的大是大非他並沒有搞清楚。從社會科學的立場而言，殖民統治是應該分為三個層次來討論：第一、殖民的動機；第二、殖民統治的過程；第三、殖民統治的結果。」

就動機論，日帝統治台灣不是為了慈善，更不是為台灣人的利益。就過程論，史實告訴我們，日帝是殘忍無道的，如『西來庵事件』（1915年，引發屠村事件）、『霧社事件』（一九三〇年，日帝用毒瓦斯彈鎮壓原住民）。就結果論，殖民統治留下的『遺產』如何解讀？當前被自我迷失者視為正面價值者主要為產業基礎建設，這些難道是日帝甘願留給我們的嗎？當然不是——日帝戰敗只好捲鋪蓋走路，留下帶不走的基礎建設罷了。這些建設的主要資金，還不是來自台灣的稅金，僅以教育建設

為例，台灣人納稅建校，卻限制台灣人入學，李先生不也曾過苦頭的嗎？對此猶不清楚，豈非可歎！再如嘉南大圳，原本設計是為了日系糖業公司確保原料甘蔗供需所做，當年多少台籍蔗農受其苦遭其辱，這個大是大非若都能忘記，還能面對自己的祖先嗎？我真不敢相信嘉南平原老百姓的後裔，會那麼沒有骨氣地健忘。」（戴國輝、王作榮 2001: 55-56）

戴國輝更毫不留情地痛斥台獨的「被殖民心態」說：

「建構具有主體性的台灣人意識是使之超越特殊性的先決條件，但既往的意識卻始終耽溺於日本殖民地統治的遺毒，及戰後政治性挫折的傷痕，過去台獨人士所主張的『台灣民族論』，不僅不接納台灣的外省人，甚至主張台灣人和中國人是不同的民族，台獨原本是一種政治選擇，但為此不惜在『國民黨把台灣當殖民地統治』的誤認下，形成排外、閉鎖的心態，甚至讚揚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殖民統治的功勞。此種『被殖民心態』也存在於一些中產階級以上的台籍知識份子中，尤其他們在戰後遭到太多政治性的折及傷痕，抑鬱的苦悶終於爆發成對體制強烈的不滿。」

這種心態可以說是日本殖民體制統治下，受到日本殖民價值體系的殘害，失去對自我民族、文化的信心暨信仰，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過去殖民統治者的價值體系，以『日本尺碼』來看事情。將日本初期統治台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視為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或『台灣是經由日本統治才被近代化』的類似議論，就是『日本尺碼』遺害之最明顯的例子。」（戴國輝 1999: 197-198）

殖民統治者在殖民地實施的教育，主要用意在於改造被殖民者的意識，加以馴服、奴化，塑造效忠殖民主人的「臣屬之民」(subject)。可是，許文龍、何暨明、蔡焜燦這些日本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奴隸卻毫無這樣的認知與自覺，在《台灣論》中，頻頻對日本教育表達感謝之意。日本學者西野英禮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教育曾有如下極為深刻的批判：

「借著教育制度的確立或同化教育的美名的所謂『教育』，是使在日本統治時代長成而被剝奪以母國語表現的台灣人，現在無法用母國語來寫文章，只能寫日本語。台灣的新文化就在胎兒時的情形被絞殺了。由於日本人的教育，台灣人民的精神負擔與被破壞的情形很大，是無可比喻的；企圖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不知自此之後還要使台灣民眾的痛苦再挨幾十年？我以為在日本的台灣殖民地化之中，最受誇的教育制度的確立，不就是對於住民最為野蠻的行為嗎？我以為這是比任何血腥彈壓，還要來得野蠻！從最近新聞雜誌的記事看到日本話在現在常被使用，就好像被害之深重新被指出；同時其記事的愚蠢及得意的樣子，使人不堪忍受。殖民地化的結果，不可以說是惡的也有，善的也有。看起來只有善的，但其善在結構上可以產生巨大的惡，這就是殖民地制度。」(西野英禮 1985〔1961〕)

西野英禮所指出的「使台灣人忘掉民族性的白癡化教育的弊害」，最明顯地體現在許文龍的身上。日本帝國主義餘孽及其徒子徒孫多年來對發動侵略中國與亞洲各國的戰爭始終沒有悔罪之意，一再不

惜捏造證據，矯詞強辯，文過飾非。如：對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誣指是中國方面先殺害日本士兵才引發中日開戰；對1932年侵佔中國東北，成立偽滿州國，誣稱是爲了建立五族共和的王道樂土；對「南京大屠殺」則睜眼說瞎話地妄斷爲「虛構」；而對普受譴責的「慰安婦」性奴隸制度更極力否認與日本政府、軍隊有關，狡辯其純爲民間招募妓女入軍服務交易的「商業行爲」（詳情參見蘇智良2001，特別是第7章）。日本右翼反動勢力的這些無恥調言，許文龍毫不思考、查證，照單全收，在《台灣論》中，大放厥辭，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行徑矯飾辯解。從《台灣論》中看到殖民主義對被殖民者的意識形態毒害竟可以如此之深且久，真令人悚然而驚，不寒而慄！

### 三、日本右翼與台灣分離主義者狼狽為奸的企圖

李登輝等台灣分離主義者的厚顏媚日除了意識形態上陷於日本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囚籠無能自拔外，還有個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妄圖憑藉日本右翼的力量，與中國對抗，達到脫離中國的目的。小林善紀在《李登輝學校的教誨》一書的後記中，區分了兩種「親日派」：

「以前我曾聽說，台灣的親日派實際上分兩種類型。一種是無條件的偏袒日本，認爲自己所受的日本教育是很了不起的，日本式的作法都是好的。這些人也可稱爲『愛日派』，主要了解日本殖民

時代的老一輩人居多。但是，他們對於日本的喜好其實是非常感情用事，一旦遭受日本嚴厲的對待，恐怕就會無法承受。另一種可以稱之為『冷靜的親日派』，這些人對於日本完全不存任何幻想，而且戰後幾度遭到日本的背棄，對日本也深感失望。

而這些人雖然非常了解日本壞的一面，卻非常冷靜：深知台灣要生存唯有靠日本。因為這樣的想法，就算日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他們對日本的親善態度也不會有太大改變。

從這樣的分類法來看李登輝先生，他應該是屬於冷靜的親日派吧。當然，不只是李先生，我想很多對台日關係鞠躬盡瘁的台灣人，大多都是屬於這一派的。

而且，他們絕不是戰略性的親日派，單單的只是冷靜的親日派。

這些戰後不斷遭到日本背棄，但對日本的親愛之情仍深深埋在心坎，始終於日本有所期待，持續給予日本鼓勵的冷靜親日派，確實大有人在。」（李登輝 小林善紀 2001: 193-194）

小林善紀指出，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所謂「冷靜的親日派」的親日表現，並不只是單純出於感情因素，還有實際利害關係的考慮。小林在接受《中國時報》記者劉黎兒的專訪中也指出了李登輝的親日言論背後別有政治企圖：

「李登輝先生除了他本人對日本的親密感情之外，我和他幾次見面，感受到其實也還有戰略的成份在內，彼此厲害關係一致，他才會和我如此相交一番，別忘了他是政治家，對於台灣的處境隨時懷



有危機感。……因此李登輝是拼命以親口來博取日本人的好感，以備一發生紛爭時，日本能伸出援手。」（小林善紀 2001a: 261-262）

那麼，以李登輝為代表的台灣分離主義者出於利害關係考量的政治企圖是什麼？

衆所周知，中國大陸與台灣今日的分裂，是一九五〇年六月廿五日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帝國主義出兵干預中國內政所造成的結果。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與台灣依附在美國霸權支配下的和平框架內（Pax Americana），使右翼勢力獲得了安全的保障與經濟的發展。尤其台灣更是靠著美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的支持，才得以維持與中國大陸對峙的局面。但美帝的保護傘同時也就是控制的鎖鏈。日本與台灣在美帝的支配下，實質上都缺乏真正的主權與自主性，在大政方針上須俯首聽命於華盛頓的指令，不得違背美國帝國主義的國家利益，一旦發生利害衝突，日本與台灣通常只能忍氣吞聲，不敢反目對抗。日本在二戰時遭到美國的痛擊，廣島、長崎受到美國原子彈的重創後，作戰意志瀕臨崩潰，終於不得不投降，故而日本右翼勢力對美國深懷怨憤。然而戰後日本右翼須靠美國重掌政權並重建經濟，心中的不滿只能隱忍不發。但當日本在美國羽翼下，經濟高速增長，國力增強，羽翼漸豐後，日本的右翼也就日益感到不耐，不甘再雌伏於美國的淫威下。於是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日本右翼既不斷發出要敢於向美國說不的聲音（石原慎太郎與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及石原說「不」的系列著作可為代表），也重新編織起恢復二戰前稱霸亞洲的美夢。在台灣方面，美國對台

政策的主軸一直是參養台灣政權充當牽制北京的一條忠狗，栓在台灣頸上的鎖鏈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變化而可緊可鬆。在蔣氏政權時代，美國以台灣做爲遏制（contain）中國大陸的工具，既保護台灣不被北京解放，又制止國民黨反攻大陸。自一九七〇年代美國採取聯中制蘇聯的戰略，於一九七二年與北京簽訂《上海公報》後，接受北京代表中國的合法性，一九七九年更與北京建交，在名義上承認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實際上維持了「兩個中國」的局面，但台灣的地位顯然不及七〇年代之前來得鞏固。李登輝上台後，逐步推動與中國漸行漸遠的分離策略，企圖把台灣從實質獨立於中國大陸之外的現實，進一步爭取以美國、日本爲主的國際勢力的支持，達到法理上脫離中國成爲獨立國家的目的。但這樣的企圖，遭到北京強烈的反制，導致中美關係的緊張，從而危及美國的利益。一九九六年三月北京對台灣發動威攝性質的軍事演習，美國出動航空母艦示警，北京亦派遣核潛艇應對，顯示不惜與美國一戰的決心，雙方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美國深感事態嚴重，警覺美國有被李登輝爲首的分離主義勢力拖向與北京正面衝突的危險。美國總統柯林頓於一九九六年七月中旬在《紐約時報》坦白承認過去對華政策的認知有誤，柯林頓政府急速調整對華政策，以「減少分歧和麻煩，擴大共識與合作」的「建設性」態度處理中美關係。在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二日訪問美國之際，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告要「建立建設性戰略伙伴關係」。一九九八年六月柯林頓訪問中國大陸時更明白宣示了美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

的「三不」政策。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李登輝在未得到美國同意下逕自發表「兩國論」，這項破壞兩岸關係，連帶影響美國利益的主張，引起美國當局極度不滿，隨即派員制止李登輝落實「兩國論」，「兩國論」遂胎死腹中，未能遂行，徒然成爲李登輝一廂情願的夢想。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的右翼勢力與李登輝對美國都共同懷有相當程度的不滿。

日本右翼一向懷抱稱霸亞洲，進而與歐美帝國主義爭雄於世界的野心。即使在戰敗後，他們對發動侵略戰爭一點也沒有悔罪之意，恬不知恥地宣稱對外侵略是爲了「自存自衛和將亞洲從歐美統治下解放出來」。在他們眼裡，殖民朝鮮與台灣非但稱不上罪過，而且還是幫助朝鮮、台灣現代化的功德之舉（參見蘇智良：2001）。故而，日本右翼始終沒有忘情於台灣，時時不忘把台灣納入自己的支配之下，以爲對抗中國之資。此所以數十年來日本右翼不斷支持台灣分離主義運動的主要原因。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台獨運動以日本爲基地，台獨的主要成員不少人或於二戰受日本殖民教育或於戰後留學日本，具有濃厚的親日思想，長期以來與日本右翼有著千絲萬縷的密切關係。王育德等親日派所撰寫的台灣歷史，就是以肯定日本殖民台灣爲台灣奠定了現代化基礎爲基調，這種謬論流傳日久，已成爲台灣分離主義的主要觀點，李登輝也加以附和。小林善紀的《台灣論》正是採取了親日派台獨的歷史觀來爲日本的殖民台灣正當化。

正如小林善紀所指出的，李登輝的親日（實則是媚日）的言論，除了感情與思想因素，還有所

謂的「戰略成份」。前已述及，日本右翼與李登輝都對美國懷有不滿與不信任感。李登輝也見到日本右翼自一九八年代後，有日益抬頭之勢，不論是出於情感或現實的考量，在李登輝看來，日本右翼都是比美國更值得依靠的力量。於是，在《台灣的主張》、《亞洲的智略》、《李登輝學校的教誨》等書中，李登輝便一方面批評美國的對華與對日政策，一方面不斷期望日本不要喪失自信，不要對美國太過軟弱地言聽計從，要日本對美國與中國大陸擺出更強勢的態度，充當領導亞洲的角色。在《台灣的主張》中，他說：

「我曾多次提到，自己受到日本的影響很多。而台灣在發展的歷程中，也自日本獲益良多。很多日本人對於台灣曾是日本殖民地的事實，表現得很敏感和困惑。以他國為殖民地，絕非良策，就國際道義而言，更非光彩之事。但若一直耿耿於懷，不願向前看，對日本既無益處，對台灣也無幫助。」

（李登輝 1999: 190）

在與小林善紀會面時，李登輝一開始就說「亞洲非得由日本來領導不可」，對小林批評日本的教育否定戰前的歷史，他也很露骨地回應說：

「值得同情的是，日本的年輕人一味的接受『以前的日本做了很多壞事，是個壞國家』的觀念與教育，年輕人認為日本老是受到批判，自己是生長在一個『很無趣』的國家，因而喪失自信。

其實沒那回事，以前是以前，現在是現在，兩者都很重要，沒有以前哪有現在呢？日本應該正視

這一點，由此出發好好的改善教育才行。

就我看來，日本人本身並沒有認真在思考『日本是什麼』。日本應該是有自己的主張才會去參戰或與其他國家競爭。這是日本在具備國家主體性之下所做的事，但現在的日本人卻很少有這樣的意識。……可以說，日本人的想法已經改變了許多。『以前，自我否定得太過分，不能再這樣下去』的想法愈來愈強烈。這是非常好的事。

大家不妨以這為契機，不論在政壇或民間，彼此徹底溝通檢討，創造出國內的共識來。日本一定要從這點出發，創造出應有的意志和信念，從過去喪失自我的狀態中走出來。

而且，我認為日本人應該揚棄對過去全盤否定的態度，積極肯定現在。這麼一來，日本才能真正站起來。」（李登輝 小林善紀 2001: 139, 142-143）

李登輝近年來頗多迎合日本右翼立場的言論，當然獲得日本右翼份子的歡心，中嶋嶺雄、石原慎太郎等日本右翼學者、政客對他頗多揶揄，固不待言。小林善紀更是推崇他為「激盪的二十世紀末亞洲的偉大政治家，從世界史的觀點來看，無疑的，他也是一位足以千古流芳的大人物」（同上：7）。小林之所以發出如此言過其實的肉麻頌辭，原因無他，就是小林自己說的：

「對於受到中國、韓國、美國等戰勝國追究戰爭責任，已經極度疲累的日本人來說，他的話聽起來很舒服，也更加讓我們確信，日本是個可以發揮主導權的國家，在亞洲只有日本能擔起龍頭角色。」

(同前頁·195)

李登輝推動台灣與中國分離的國際策略就是呼應美國與日本極右派所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強調台灣有利於美國、日本的戰略價值。他在《台灣的主張》中說：

「從地理位置來看，台灣的存在如果出現危機，甚至為中共吞併，台灣週邊海域將會陷入危險，使日本在經濟與軍事上遭受孤立，而致威脅日本的『存在』。因此，從戰略上來看，台灣的存在具有重要的意義，可惜多數的日本人都未能充分理解此事。」

台灣對日本而言，並不只是浮在南方的一座島嶼，更不僅是出口產品的對象而已，它同時也是攸關日本生存命脈的重要屏障。

台灣海峽的海、空路是西太平洋不可或缺的國際貿易航線，因此，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財產。即使美國和日本有部分亞洲專家及戰略專家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但如果以台灣海峽的和平安全問題為代價，向中共作出讓步，則美國與日本亞太事務的領導地位勢將弱化，對攸關自身的重大利害與生存問題，也將失去發言權。」（李登輝 1999: 242, 246）

對李登輝的這個看法，日本右翼學者中嶋嶺雄呼應道：「就日本政府官方的立場來看，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所揭櫫的『周邊事態』，並未明言涵蓋台灣。這在官方的發言上，或許說得過去，但事實上卻是不可行的。台海的安全是日本的生計命線，具有攸關存亡的重要意義。」（李登輝 中嶋嶺雄

2000: 94)

李登輝這些與美、日保守勢力聲氣相通的國際戰略思考，代表了整個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思維。民進黨新上任的台灣總統陳水扁在去年接受日本《世界》雜誌專訪時就說：

「今天台灣的存在，對日本應只有好處。如果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日本的安全就會立刻受到威脅，台灣海峽對日本人而言，同樣是生命線，日本所需物資必須經過台灣海峽。所以台灣海峽出現危機或者戰爭，不只台灣，日本乃至於美國在西太平洋的地位，都會遭受威脅，陷於不利狀態。」（原載《世界》2000年2月號，此處轉引自小林善紀2001b: 108）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在高度評價《台灣論》時，也說「現在我們面臨一個很強大的對手，中國一直不放棄武力攻打台灣，我們要尋求我們的朋友，可能日本就是尋求的對象之一。」（《財訊》2001年3月號）

小林善紀在批評西尾幹二〈正因為深信，所以強烈質疑〉一文（《正論》平成13年2月號）時，很明確地道出了他出版《台灣論》的意圖與推崇李登輝等親日派台灣人的原因：

「我主張，日本應基於國家利益，勇敢地在外交上打『台灣牌』，這是金美齡女士一貫的主張，某個程度上我同意這種『打台灣牌』做法。因此，我透過台灣多桑世代，如蔡焜燦先生、許文龍先生的見解，將日本殖民統治與歐美做法完全不同的狀況，介紹給日本年輕人了解。然而，台灣的媒體還

是有人對我大加撻伐。說，『日本右派漫畫家《台灣論》這本書，試圖利用台灣正當化日本的殖民統治』……台灣海峽對日本確保自己的海上航線（Sea Lane）安全，難道不重要嗎？如果日本想抵擋中國、圍堵中國，台灣不是非合作不可的朋友嗎？即使日本外交打台灣牌，誰曰不宜？只可惜日本人完全不了解，李登輝等『日本統治世代』的台灣人，對維護日本國家利益有多難得的貢獻。而要珍惜這類情緣，眼前是唯一的機會，像我這樣戰後出生的日本人想緬懷、見證殖民統治時代的種種，當下是唯一機會，錯過就不能重新再來。這一切簡直就像時空膠囊，都活生生地保存者。對日本人而言，台灣確實是珍貴的國度，因為在這裡，我們可以如在目前地，非常真實地體會到戰前的狀況，以及歷史演變遺留的痕跡。』（小林善紀 2001b: 100, 113）

通過上述的分析與論證，台灣分離主義者與日本右翼相互勾結、狼狽為奸的企圖可謂已昭然若揭。

#### 四、結論

日本從十九世紀末年開始對外侵略，走向帝國主義的道路，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造成亞洲太平洋地區無數人民的傷亡與難以估計的財產損失，最終導致日本人國破家亡，民窮財盡，還遭到人類亙古所未有的原子彈轟擊的慘禍，真可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以損人始而以害己終。二戰後，日本諸多



具良知良能的有識之士痛切反省悔禍，對日本的帝國主義歷史作出了深刻的批判，期望日本人民能不忘前事，以為後事之師，永遠不再讓悲劇重演。然而，一些怙惡不悛，愚而好自用的日本右翼份子面對血淋淋的歷史教訓，依舊執迷不悟、冥頑不靈，非但不知以史為鑑，還猖狂攻擊日本靈智清明之士的自省史觀為「自虐史觀」，甚且，或迴避鐵證如山的史實視而不見，或捏造不實的證據，或曲解已有的材料，千方百計掩飾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厚顏無恥地為侵略與殖民統治辯解，乃至妄稱日本軍國主義發動的太平洋戰爭為「大東亞聖戰」。對日本右翼份子這些既冷血又無恥的詭語，凡受過日本侵略、殖民之害的人民幾乎無不嚴詞予以駁斥，但卻出現了唯一的異類，那就是台灣的分離主義者。

二戰後，原殖民地紛紛獨立，舉世莫不視殖民主義為不可饒恕的罪惡，原殖民地人民也大都戮力於清理、批判殖民主義的遺毒。自二十世紀七〇年代末開始，國際學界更興起後殖民理論的熱潮批判新、舊殖民主義。日本右翼言偽而辯地肯定日本帝國主義有功於殖民地的現代化，自然在國際上沒什麼市場可言。在曾為殖民地的韓國尤其遭到強勁的反擊。然而，台灣的分離主義者既始終未能擺脫日帝意識形態的枷鎖，又妄想藉日本右翼之力謀求獨立於中國之外，竟腆顏附和日本右翼的謬論，為日本右翼的傲慢添加柴火，增長其氣焰。小林善紀之敢於在《台灣論》以狂妄傲慢的口吻宣傳所謂的「日本精神」，振振有辭地美化日本的殖民統治，就因為他在台灣驚喜地發現了舉世難覓的知音，為日本右翼的「殖民有功」論找到了佐證。從而為攻擊日本的「自省史觀」尋獲了難得的彈藥。他在接受日

本《正論》雜誌專訪時，得意洋洋地說：

「了解日本統治時代真相的台灣多桑世代及其子孫，卻不一定會認為『日本過去是殘酷的侵略國』，甚至願意和日本人分享那段共同的歷史。既然確實有這樣的人存在，作為日本人，我下定決心與他們交往，並期待他們在台灣國內有更大的發言力量，真的是魯莽之舉嗎？既然解開日本人綁住自己的『反日·自虐』精神枷鎖，其歷史鑰匙就在台灣，我們為什麼不打開這扇門呢？至於眼前激烈的批判聲浪，只不過是那些害怕打開這扇門的人在興風作浪而已。」（小林善紀 2001b: 130）

小林在飽聞台灣分離主義者諛頌日本殖民統治的功勞後，更加堅信日本帝國主義的正當性，在《台灣論》中公然露出帝國主義的醜惡嘴臉，不知羞恥地說：「以亞洲整體的『公』益來思考時，毋寧說，日本的殖民反而能帶給人民更大的幸福。」（小林善紀 2001a: 90）

對於台灣分離主義者多年來媚日言行所造成的惡果，已故的戴國輝教授早在1995年7月7日抗日戰爭勝利五十週年的一篇專文中就很感慨地批評說：

「留日一待已有四十年。目睹耳聞日本人愈來愈傲慢，藐視對待亞洲人，有時深感我們台籍人士是否該負起一些責任來。由來五十年間的日據時代，我們的前輩流過血，身陷囹圄更不在少數。但傾向台獨建國的鄉親們，還有人人口聲聲講『後藤新平是台灣近代化之父』一類，沒有社會科學水準的話。叫日本的有識之士都會來個捧腹大笑。主張台獨建國是一回事，尋求日本人的支援情有可原，但

日本人對亞洲鄰人，卻是一貫地只吃硬不吃軟。千萬該記住，我們台籍人士繼續縱容日本朋友，說些甜言蜜語，並非真正做朋友之道。雖然它可以部分地幫助日本人補償因一貫受韓國人的尖銳批判所衍生的不安心態。」（戴國輝 1999: 133-134）

李登輝的密友何既明在《台灣論》中會很激動地告訴小林善紀：「如果要接受中國殖民的話，還不如當奴隸快活些！」（小林善紀 2001a: 90）言下之意是寧可當日本奴隸，也不願做中國人。從辯證法的觀點來說，主人與奴隸是對立的統一體，主人要成其為主人，必須要奴隸願意承認其為主人才行。一旦奴隸不甘被奴役，奮起反抗，則主人就不能維持其統治地位，主奴的對立統一關係也就遭到破壞，人與人之間才有建立自主、平等關係的可能。台灣分離主義者在《台灣論》風波中毫無自尊、自覺的媚日的奴才言行，不僅侮辱了台灣人的尊嚴，更值得憂慮的不良後果是，他們恬不知恥地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期待日本右翼重啓稱霸亞洲的野心，與中國對抗，希圖在日本的卵翼下與中國分離，自甘充當日本右翼的走狗、鷹犬，這必將助長日本右翼的囂張氣焰，為日本再度對外侵略擴張鳴鑼開道。一旦日本軍國主義再起，不但亞洲甚至世界都將重受荼毒，日本人民也必再遭不幸的災禍。一八七一年馬克思在《機密通知》一文中說：「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為自身鍛造鐐銬」，一八四七年恩格斯在紀念波蘭起義的國際大會上演說時也指出：「任何民族當他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這正是我們批判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及台灣分離主義份子的奴才意識的主旨所在。

## 參考書目

- 小林善紀著 賴清松、蕭志強譯（2001a）《台灣論》，台北：前衛出版社。
- 蕭志強譯（2001b），《第二波台灣論》，台北：前衛出版社。
- 前衛出版社編（2001），《台灣論風暴》，台北：前衛出版社。
- 金美齡、周英明著 張良澤譯（2001）《日本啊！台灣啊！》，台北：前衛出版社。
- 李登輝（1999）《台灣的主張》，台北：遠流出版社。
- 李登輝、中嶋嶺雄著 駱文森、楊明珠譯（2000）《亞洲的智略》，台北：遠流出版社。
- 李登輝、小林善紀著 楊子瑩譯（2001）《李登輝學校的教誨》，台北：先覺出版社。
- 戴國輝、王作榮口述 夏珍記錄整理（2001）《愛憎李登輝——戴國輝與王作榮對話錄》，台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
- 戴國輝（1985）《台灣史研究》，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1995）《台灣結與中國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
- （1999）《台灣史探微》，台北：南天書局。
- （2000）《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台北：南天書局。

陳映真（1998）〈精神的荒廢〉，收於《清理與批判》，台北：人間出版社。

蘇智良（2001）《日本歷史教科書風波的真相》，北京：人民出版社。

西野英禮（1985）〔1961〕〈殖民地地的傷痕——帝國主義時代日本人的台灣觀〉，收於王曉波編《台灣的殖民地傷痕》，台北：帕米爾書店。

李壽林編（2001）《三腳仔——〈台灣論〉與皇民化批判》，台北：海峽出版社。

Fanon, F. (1966)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New York: Graoe Press.

——(1967) *Black Skin White Masks*. New York: Grove Press.

Gramsci, A. (1971) *Selei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

Nandy, A. (1983) *The Intimate Enemy: Loss and Recovery of Self Under Colonialism*.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aid, E. (1993)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Gandhi, L. (1998) *Postcolonial Theory*. St. Leonards: Allen & Unwin.

Altusser, L. (1977)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Verso.

（發表於二〇〇二年二月廿二日～廿五日在日本東京都立命館大學舉行的第五屆「東亞和平與人權」

國際研討會）



附錄

# 穿越統獨的迷思

——一場精彩的意識辯論會

主持人：林忠毅（台北醫學院醫學系三年級）

主講人：杜繼平（五月評論總編輯，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

邱義仁（民進黨副秘書長，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

題 綱：台灣前途座談會

1. 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
2. 台灣的歷史地位
3. 國家認同

自立晚報編案：十月廿六日台北醫學院學生活動中心舉辦一場「台灣前途座談會」。由民進黨副秘書長邱義仁與「五月評論」總編輯杜繼平擔任主講，分別就獨立和統一提出針鋒

相對的看法。這次對談有一個特色，就是雙方一改從前統獨雙方所常援引的民族論立場，純就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立論，頗具新義。此外，兩位主講人都是接受國民黨完整教育系統的新生代，都以批判立論提出統一和獨立的主張。本報政經室特爰予整理刊出，以供參考。

杜繼平：統獨問題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國以台灣海峽為界分裂為二，要瞭解今天統獨爭議的原因，勢須先對中國的分裂做一番歷史的考察。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一九四五年重歸中國版圖後，為什麼在一九四九年後又形成與大陸對峙四十年的局面？這不能不從當時的國際政治形勢談起。

### 統獨問題的歷史前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最終由歐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聯合蘇聯、中國等國打败了德、義、日法西斯國家。可是，在法西斯主義的三國同盟敗降之後，資本主義勢力與社會主義勢力之間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對立問題日趨尖銳，中國的國共兩黨也在外侮——日本帝國主義招降以後，由共同抗日轉為互爭雄長。抗戰勝利後沒有多久就發生了國共內戰，美俄兩國分別支持國共兩黨。美國以大量的武器、物資、金錢援助國民黨，但由於國民黨專制、腐敗、官僚貪污無能，戰能到處「劫收」原日本佔領區的民產，據為己有，激起人民極大怨憤，大量的美援也被官僚浪費、貪污掉了。所以在短短的四年內，



就迅速地被養精蓄銳多時的中共擊潰。

美國對國民黨失望透了於是在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白皮書，把失敗的責任推給國民黨，表示不再介入國共內戰，要靜等塵埃落定。同時，美國認為中共進一步打垮國民黨取得台灣是指日可待的事。

然而，國民黨何以能夠繼續統治台灣四十年？這是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挽救了國民黨瀕於危亡的命運。

韓戰使中、蘇共聯手對抗美國，美國爲了防止中共勢力的延伸，把台灣劃入圍堵中共的戰略地位，派遣出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再度介入中國內戰。並且運用強權，利用「對日和約」泡製了台灣地位未定論，再把台灣主權弄成懸而不決的國際問題，以方便它干涉中國內政。像一九五八年「八二三」炮戰，美國就在物資、武器上大力援助國府，撐住了中共的攻勢。所以，由於美國介入中國的內戰，支持國民黨繼續在台灣統治，造成中國長期分裂才有今天的統獨問題。

### 兩岸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

一九七九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前，台灣在美國的政治、軍事保護下，獲得安全上的保障。美國從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給予台灣約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及相當數量的軍事援助，這才把國民黨在台灣軍事力量及經濟發展支撐起來。

美國在台灣經濟發展上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它協助國民黨進行土地改革，改進農業技術，且因為美援的各項用途必須經過美國同意，故而，五〇年代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對於台灣經濟政策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五〇年代末期，美國的產業工資上漲，利潤率下降，資本家漸漸無利可圖，就必須輸出資本、設備、轉移低級技術到第三世界的未開發國家，利用第三世界的低工資勞力賺取利潤。台灣當時正想由農業社會邁向工業社會，正苦於缺乏資本，於是訂立鼓勵外資投資的條例，給予種種優惠，因此以美日為主的外資大量流入台灣。

不過，這些從美日輸入的工業和設備，許多是因爲過時和高污染不合美、日國內標準而遭到淘汰，台灣當時因急於發展經濟、且毫無防污染環保的觀念。於是，高污染，造成勞工職業傷害的工業和設備，也紛紛轉移到台灣。

國民黨以「犧牲農業、扶植工業」的經濟發展策略，實行低糧價，導致農業無利可圖，逐漸把農村的大量勞動力壓擠出來進入工廠，爲外銷導向的加工出口經濟提供了豐沛、廉價的勞工，造成六〇至七〇年代的經濟起飛。此外，這兩位數字的高成長率建立在戒嚴體制上，不准罷工、籌組工會來壓制勞工權益，造成吸引外資的穩定環境。

相對於台灣，中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體制。一九七九年以前，中共將建設重心擺在重工業、國防工業和基本工業的發展上。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下，輕工業和農業發展不足，而且平均主義的分

配原則使民生日用呈現匱乏狀態，海峽兩岸人民的物質水平因而有了極大差距。但，中國大陸在經濟上打下了紮實的工業基礎，並擁有某些尖端科技；台灣則因為先發展加工出口的輕工業，今天面臨產業難以升級的困境，也使兩岸經濟呈現出朝向相反順序發展的現象。

### 獨立運動的國內因素

在冷戰時代，資本主義陣營充滿著反共氛圍；台灣從政治、經濟、軍事、學術、文化、思想上無不受到美國的支配影響，台灣留學生也主要集中美國地區，美國式思想浸透人心，美國的價值觀念成爲主要的中心。而國民黨爲了確立統治的正當性，長期聲稱反攻復國，醜詆大陸的政權及人民不遺餘力，並且視中國大陸爲鬼域，禁止兩岸人民有任何交流。台灣居民既無法與對岸接觸，又長期浸潤在美國與國民黨的思想薰陶下，自然很容易視中國大陸爲異國。再者，隨著台灣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一批接受美式價值觀念的中產階級，更由於國民黨的高壓統治與鎮壓本土文化，藉口統一來鞏固政權等各種因素，皆激起了相當份量的民怨。於是，因爲對於國共兩黨的不滿，台灣內部就形成了一股設想脫離中國的勢力。

邱義仁：基本上我切入問題的思考方式和杜繼平先生非常不一樣。

台灣產生統獨問題，或者說爲什麼有人主張台獨和統一？我認爲，不盡然是國際政治經濟的因素

所促成。長期以來，在政治、哲學上就出現很大的爭論，「客觀環境到底對於主觀意志能夠產生多大的影響？」如果認為人的主觀和一項政治主張，完全受到客觀條件之制約，而沒有人的主觀因素存在，我並不同意。

我部分同意台獨主張受到長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但分析台灣為何有人主張台灣獨立，應該論及國內因素，依我看主要是權利意識。換句話說，某個地域的人民有權利意識主張要過怎樣的生活。例如，方才杜先生所提示的國際政治經濟局勢雖然改了，但仍有人為著主張台獨而努力。這就表示台灣人民基於權利意識，有權利提出對於台灣前途的看法。

除國際政治經濟的因素與權利意識，我認為第三個因素就是國內局勢的變化。

### 不是絕對互斥的零和遊戲

國民黨統治台灣四十年，形成一般所謂的「經濟起飛」與經濟大餅無限地膨脹，社會各階層也從中取得一定的分配；只是資本家和勞工各自取到不公平分配的情況下，並非一種「零和遊戲」，不是某甲全部搶走某乙應該得到的分配。既然台灣的經濟分配不是零和遊戲，人人都取得經濟大餅的一份好處，那麼人們必須思考統一以後這種分配的好處是否繼續維持下去？也就是為什麼有人主張台灣獨立的原因。

依照統計，台灣的國民所得六千美金，中國大陸只有四百美金，兩者相差十五倍。如果兩岸統一，台灣將發生下面兩種狀況：(一)降低台灣的生活水平；(二)如果不願意降低生活水平，就有可能增加五十倍的稅賦要繳交給中央政府。但無論兩種狀況的結果如何，對我而言並不合理，也沒有必要。

回顧台灣的政治經濟發展，最具影響力的兩大政策就是五〇年代土地改革與六〇年代實行獎勵投資條例。我必須強調這是「政府的政策」，無論美國是不是基於圍堵赤色政權而給予台灣經濟和軍事援助，就如同杜先生的主張觀點，此處不再贅述。但國民黨實施土地改革的結果，瓦解了台灣傳統地主的力量，國民黨因而獲得大量資金，而這些資金的再分配並沒有流通到農民手上。農民受到肥料換穀政策和土地分期償付的影響，地主以土地換得廉價的公營股票也虧損不小。換言之，土地並沒有造成當時民間社會的資本累積，卻是國民黨第一次累積了國家資本。一直到六〇年代實施獎勵投資條例，台灣民間從這時才開始獲得資本累積。

有關部份外資進入台灣的問題，我與杜先生的觀點差別很大。坦白說，當時簡單的台灣加工業並不需要大量資金，倒是現階段面臨著經濟轉型時期，才迫切需要大量資金。實施獎勵投資條例以後，台灣社會開始資本主義化，也開始出現了一批中產階級，再加上中產階級強調西化的權利意識，向社會提出民主改革的要求。於是，進行民主改革的過程中就遇到了統獨問題。

## 以社經結構權衡意識

土地改革和獎勵投資條例兩種政策，基本上都是政府的產出物。當面對台灣這樣那樣的問題時，我們很難單純地只從民間社會的角度來看統獨問題，我認爲這把問題砍了一半。在台灣不民主的情況下，國家機器對於民間社會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例如戒嚴體制可以鎮壓工人和政治運動。因此，無論喜不喜歡，我們都無法迴避政府產出物的功能，必須嚴肅思考國家機器的問題。這時候，我認爲又會遇到統獨問題。

爲什麼國民黨長期抗斥國會全面改選？依我看不是單純的民主政治問題，背後隱藏著國民黨的法統問題，從而繼續宣稱代表全中國的正統地位。其次，國民黨之所以不肯承認現實，在台灣實施地方自治法制化？因爲國民黨認爲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份，這項前提使國民黨不肯重新規劃一套行政計劃。由此可見，國會改選與地方自治等各項公共政策，一一都會遇到國家認同的選擇。

我再舉外籍勞工和大陸農工原料兩個例子。

大陸勞工可不可以進入台灣勞動市場？同樣道理，當我們抗拒美國農產品進口台灣，則大陸農工原料進入台灣要不要予以抗拒？假設台灣是一個獨立國家，當然要抗拒大陸勞工和農工原料；如果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則我們應該歡迎。但我在這裡並不想討論抗拒與不抗拒的選擇，而是凸顯做選擇

以前，我們首先遇到了統獨立場的問題，才能選擇最能符合全民利益的立場。

當然，主觀的權利意識可以主張台獨，也可以主張兩岸統一。但每個人必須客觀評估那一種符合人民的最大利益，或者說，在主觀意識和客觀條件不斷展開辯證過程中，去評估互動、變化的形勢是否朝向著主觀意識想要的結果？這是選擇統獨立場的人必須衡量的問題。

我雖同意杜先生對於形成統獨問題的歷史分析，但不認為有必要特別強調。我不同意杜先生的意見是：歷史因素究竟佔著多大重要的地位？我的答案是：不很重要，卻應該把主觀的權利意識與台灣的社經結構所形成的利益要求，如何擺到國際政治經濟的局勢去衡量，才是比較重要的思辯工作。

杜繼平：從國際因素看，七〇年代後美國採聯中制蘇策略，兩極對立的冷戰禮制開始解凍。台灣做為美國圍堵中共的利用價值下跌，原來支持台獨的美國現不再公開支持，且承認台海兩岸的統一問題是中國人的內政。

### 兩岸的經濟互補

近年來，兩岸交流日漸頻繁，消弭了不少隔閡與仇視，中國大陸不再被民衆視為異國鬼域。大陸方面，自一九七九年實施經濟改革，活絡商品經濟、發展生產力、放鬆經濟管制、實行多元經濟體系、允許私營企業，不再偏重於重工業，同時注重輕工業、農業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昇，再以豐沛的低廉

勞力，對台灣、南韓、香港、東南亞等新興工業國家形成強大的競爭壓力。

台灣經濟正面臨夾殺理論的困境，產業升級盤旋不上，游資充斥，股市、房地產狂飆不已，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公平。台灣產品過去主要依靠美國市場，但現在在美國貿易赤字一千多億美元，已是世界最大債務國。因為美國感到焦頭爛額而壓迫台幣升值，要台灣優先購買美國商品來減少對美貿易順差，如今美國已不可恃，台灣只有另尋市場出路。

據估計，目前兩岸的貿易額今年可達廿億美元，已有八百餘家廠商把資本投向中國大陸。台灣經濟的這種轉變是經濟規律的必然結果，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剛才邱先生提到客觀環境與主觀意志的問題。我同意兩者之間有辯證性，人的主觀意志也當然應該作用於客觀環境，但人的主觀意志應該是在考察客觀條件與規律以後，再照著規律發揮主觀意志，從而改造客觀環境使之朝向符合我們主觀意志方向發展，而絕不是無顧客觀條件和規律，大肆發揮主觀意志。

### 寸土必爭的中共

大陸有重工業基礎，有某些先進的科技，如有其他條件配合，兩岸有可能形成經濟互補的局面。中共指出台灣若宣告獨立，將出兵解決。這是不是虛聲恫嚇或言出必行？中共有一個原則就是「針鋒



相對，寸土必爭」。從五〇年代的中印邊界戰爭到一九六九年的中蘇珍寶島事件及一九七九年的中越戰爭，以及最近對南沙群島的態度，在在都顯示中共對國土完整的重視，所以對中共的警告不能以恫嚇視之。

另外，有些台獨人士把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孤立，歸咎於政府不肯改國號。並以爲改稱「台灣共和國」就可以重獲國際社會的承認。殊不知，只要中共仍視台灣爲中國的一部份，任何與中共建交的國家都不致於冒著觸怒中共的代價，承認台灣獨立。

邱義仁：在申論杜先生和我對於客觀現實有不同評估觀點之前，我補充說明一些意見。

### 以台灣利益為立場

台灣共產黨在日據時期也提過台灣獨立的主張，當時的列強形勢與一九四九年以後的國際政治經濟背景不同，顯示主張台灣獨立並不純粹只是受到國際因素所制約。但我不完全排除國際制約的因素，例如外蒙古獨立問題，發生在中國大陸剛解放以後政權尚未穩定的階段，再加上蘇聯從中干預，以及外蒙古人民內部的利益和不受重視的差別待遇等主觀因素，終也造成外蒙古獨立。因此，我不認爲國際因素佔有主宰控制的地位。

論及台灣獨立有沒有可能？這是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同意杜先生的意見，他認爲台灣獨立有沒有

可能性必須從政治、經濟上作實際的客觀評估。當然，台灣目前也有著一種天真型的台獨論者，以為只要宣佈獨立，國際社會馬上放鞭炮歡迎台灣加入聯合國。我想，天下沒有這麼好的台獨。我主張台獨論者應該覺醒到必須走上艱辛、刻苦的路子。同時，我也不認為台獨是不可能的。

但，我主張台獨，是有「一定期間」的前提條件。渡過了這段期間，也許我會同意杜先生的意見：「統一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是我認為比較負責任的台獨主張，乃必須評估這樣那樣的代價是否願意付出？從我個人的立場來說，我是願意付出。而且顧及到台灣本土的利益，我認為台獨是最好的出路。

### 兩岸經濟互斥而不是互補

從經濟角度來看，兩岸是否可能進行經濟互補？我認為可能出現互補和互斥兩種作用，但現階段不可能達到互補，原因有下列幾項：(一)國共兩黨的敵對狀態，國民黨的中央總預算軍費仍佔一半，北京也不願意放棄武力解決，造成敵對狀態的事實兩黨都要負責任。(二)到中國大陸投資的台灣業者大部份是夕陽工業，但中國的勞動力豐富，像紡織和鞋子業不需要很長時間就可趕上來。因為未來的形勢必然是兩岸競爭愈趨激烈，相互排斥而不是互補。如今年七月一日中國貿易部開始對台灣產品設限就是例子。可是，我倒認為科技原料可能互補，甚至鼓勵交易。(三)購買力問題。中國大陸的潛在市場很

大，但購買力不強。因此，我主張可能互補的可以直接貿易，但互斥作用的貿易雙方都害怕被「套牢」，就涉及國家認同與公共政策如何規劃的根本問題。

從政治角度來看「國際社會是否接受台灣獨立」與「中共武力解決」這兩個問題，首先，我反對把台灣獨認為是一種萬靈藥。無論台灣地位未定論是不是國際列強作弄出來的結果，但國際法的措詞上使用「尊重」(acknowledge)而不是「承認」(recognize)這個字眼，來回應中共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這種政治主張。因此，國際上並非完全排斥承認台灣獨立的可能性。當然在中共施加壓力的情況下，大部份的國家可能不會承認而採取觀望態度，但觀望可能轉而承認台灣獨立的事實。

### 建立為主張付出代價的主體性

再回溯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宣佈台灣獨立可不可能生存一段時間？中共可不可能封鎖台灣？我的答案是：「目前中共並沒有這樣的能力」當然，我們還要客觀評估可見的未來中共有沒有能力摧毀台灣，如果可見的未來主張台灣獨立將威脅兩千萬台灣人的安全，那就不好。但屆時也有可能台灣形勢大好。

根據美國「傳統基金會」的研究，台灣作最壞的打算，在中共完全封鎖下可以支撐九個月。同時我也懷疑中共有能力維持九個月封鎖，而在封鎖期間其他國際因素完全不會介入？倒是我要強調，這

些軍事行動我都不擔心，主張台獨論者最需要考慮軍事行動可能帶給台灣社會的心理效應。例如封鎖和飛彈攻擊下，資本家可不可能捲款跑到美國？因此，心理效應將造成最大影響。任何主張台獨的人在可見未來的工作重點，就是不斷建立台灣人願意為他們要求的主張付出代價的主體性。

如果可見未來的努力階段過了，要求刻苦實現可能性的機會都沒有了。那麼我會接受不再主張台灣獨立。

### 從未主張台獨要寄望於中小企業和資本家

邱義仁：我從未主張台獨要寄望於中小企業和資本家。同樣主張台獨也有著不同寄望。我是寄望於生產民主制。在整個生產過程中，我不完全同意馬克斯的經濟學，認為只有勞動力累積資本。我認為資本和勞動力各有生產過程的價值，反對資本家可以決定分配多寡這種父權觀念，也不同意一切資本累積全部由勞工取得。那麼由誰來決定分配問題？我主張投票決定，由設計出來的一套制度讓勞工、資本家和社區代表來共同決定協商。

我反對民族論，任何基於民族感情都可能產生沙文主義，這是不樂意見到的。至於如何評估國際分工下台灣經濟的發展？我認為台灣既可在世界體系中從邊陲進到半邊陲，就有可能進到核心國家。國際分工體系是變動的，可以從英國變動發展到美國為中心國家，同理台灣也不必抱持悲觀，但我的

意思不是指進到核心國家很容易的事情。

在結論上，我要批評部份主張統一和獨立的爭論。諸如基於民族感情主張台獨，或把炎黃子孫掛在嘴上……等等。這些論點，過去我在嘴上也講過，但我不斷地修正自己。現在我主張台獨，認為台獨的可能性必須去堅持、評估、鞏固它。（本題係根據學生發問而答）

### 從國際分工看統獨

杜繼平：要在國際分工體制中改變位置，必須從資本、技術、市場等項因素看能否形成一個自主的經濟系統，一切依本身具備的條件為轉移。台灣經濟主要依靠外銷和貿易，貿易依存度達100%，不像日本的貿易收入只佔GNP不到20%。也因為台灣貿易的依存度高，若中共封鎖台灣海峽，通商管道一經封閉，加上心理威嚇的效應能撐多久頗成問題。

杜繼平：邱義仁先生和我在思考、討論統獨問題上，都同意要由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來看台灣未來的走向，也同意應實際地評估客觀現實的條件。雙方所不同的是對於客觀現實的評估，比如在評估國際承認問題與台灣經濟條件時，就頗有歧義。邱先生認為台灣與大陸的電腦業未必是互補的，可是最近一些台灣電腦業者正準備組團赴大陸考察，因為大陸電腦工程師月薪約一百五十元人民幣，在台灣則需要廿倍以上的價錢才聘得到，價差頗大。因此台灣電腦商人認為到大陸設廠頗有賺頭。

## 把客觀評估交給人民檢證

又，邱先生很強調國家機器對於政策產出上的作用，但台灣現在的國家機器並沒有那麼大的自主性；從內部來說，國民黨統治台灣數十年，隨著經濟發展已跟台灣本土的政經利益集團緊密地結合，官商關係密切，國家機器的政策要受到相當影響，如最近的股市風暴就是例子，證實國家機器不再是高踞社會之上。從外部看，國民黨在台灣長期受到美國影響，政治、軍事領袖若沒有美國支持，能做多久就很難說，這是有跡可尋的。

再從經濟來說，邱先生認為台灣既可在世界體系中從邊陲進到半邊陲，就有可能也進到核心國家。可是牽涉到台灣能否成爲一個自主自足的經濟體系？就有一個客觀標準，不是我們想如何，就如何。談到台灣的未來，剛剛有位同學問到工人和農民的分配問題。隨著台灣資本主義的發展，我認爲接踵而來的一些棘手問題，並不會因爲台灣獨立而消失，甚至可能更棘手。主張台獨的人士也要考慮到今天國民黨所面臨的問題，在你們接掌政權以後是否更有能力解決？或是更束手無策？把這些利弊得失、所要付出的代價很實際地評估出來，交給人民思考和檢證。如果多數人覺得利多弊少，值得、可行，獨立的可能性就提高，反之則減少。我個人當然覺得獨立是利少弊多，會產生很多副作用，也相當困難。

總之，台灣應該多接觸瞭解大陸，逐漸交融之後，共同思考一個可以使兩岸人民互利而副作用最小的統一方式。

（轉載自一九八八年十月卅一日、十一月一日自立晚報）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杜繼平著. -- 初版. -- 台北市：人間，  
2002[民 91]  
面； 公分

ISBN 957-8660-77-4 (平裝)

1. 台獨問題-論文, 講詞等 2. 政治-中國  
-論文, 講詞等

573.09

91014053

階級、民族與統獨爭議  
——統獨左右的上下求索

著者／杜繼平  
發行人／陳映真  
出版者／人間出版社  
社長／陳映和  
地址／台北市潮州街九一之九號五樓  
電話／02-23222357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排版／龍虎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漢大印刷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汐止鎮大同路一段三六七號三樓  
訂書專線／02-26418661  
登記局版台業字第三六八五號  
初版一刷／二〇〇二年八月  
定價／三八〇元